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河海社会学 (学生版)

Journal of Hohai Sociology

2021 年秋季号

总第 33 期

河海社会学 (学生版)

Journal of Hohai Sociology

主 办：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河海社会学（学生版）》编辑部

指导老师：沈洪成

主 编：马超群

副 主 编：童欣 吴晓彤

编 辑：陈奕含 顾瑞 刘纪矜 潘恩慧 邢小龙

薛雨珍 徐雨菡 徐婧怡 杨梓聪

投稿 E-mail: sociology_hhu@163.com

刊 号：校 028



欢迎扫描二维码添加关注
《河海社会学（学生版）》微信公众账号

目 录

暑期调查

研究生

- 柔化与同位:民间环保组织脱嵌“环保小世界”的实践策略..... 牛 帅 (05)
- 村医发展及现状调查——以苏北某区为例 汪函丹 (18)
- 数字乡村中的农村电商内生发展——以浙江白牛村的电商发展为例..... 李 琳 (27)
- 红旗渠精神的承载者——林州修渠老人群体调查报告..... 赵聆茹 (39)

本科生

- 饭圈的“神话”——拉康理论视域下的饭圈文化研究..... 李卓燃 (53)
- 退捕背景下渔民生计资本的重建与挖掘——以苏州太湖渔民为例..... 李 汀 (63)
- 灯饰产业集群现象的社会学研究 龚 宇 (71)

环境研究

- 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演变: 历程与逻辑 赖慧苏、曹海林 (96)
- 隔绝、掠夺、规划与共享: 野生动物管理模式探讨..... 吴 迪、顾金土 (109)

社会问题

- 政策变迁与村民计策——基于苏南 N 市 WX 村征地拆迁的案例研究..... 秦祥瑞、沈毅 (118)
- 后脱钩时代地方性行业协会的生存与发展——基于江苏省 A 市的研究... 孙旌程、王毅杰 (134)

社工专栏

-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徐雨菡 (147)
- 社会工作者助力多元共治农村人居环境咨询方案
——以 Y 村“三清”“三包”为例..... 秦佳等 (161)
- 我不是坏小孩——单亲家庭儿童攻击性行为矫正..... 张桃桃等 (175)

硕士毕业论文信息

- 2021 届社会学专业硕士论文信息统计表..... (186)
- 2021 届社会工作专业硕士论文信息统计表..... (188)

新闻快讯

- 我院社会工作专业师生在第十三届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苏皖片区年会荣获佳绩. (38)
- 我院研究生在“2021 中国社工教育协会年会”优秀论文评选中取得佳绩..... (108)
- 河海大学获批移民科学与工程交叉学科..... (133)
- 社会学专业博士钱志远与硕士李鸿香分别荣获 2021 年江苏省优秀博士、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34)



暑期 报告

暑期调查实践为社会学专业学生提供了接触社会、扎根田野、方法提升和视野拓展的宝贵机会。在 2021 年的暑期调查实践中，社会学专业 2020 级硕士研究生与 2017 级、2018 级、2019 级社会学专业本科生带着一定的问题意识进入田野，对环境治理、农村电商、教育政策、亚文化群体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调研，获得了丰富的一手资料，最终形成了 100 篇暑期调查报告。在综合社会学系老师建议的基础上，编辑部进行了再次遴选，本期推选出 7 篇优秀调研报告，希望与读者进行交流。

柔化与同位：民间环保组织脱嵌“环保小世界”的实践策略

牛 帅

摘要：民间环保组织是推动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在获取治理参与空间的过程中，民间环保组织需要调整实践策略，以更为灵活的方式构建协同治理关系。S 环保协会的探索与实践表明，采取柔化和同位的实践策略能够同政府和企业构建起合作关系，有利于民间环保组织深入参与到环境协同治理之中。面向政府的柔化策略包括配角理念以及助手服务，面向企业的同位策略包括推动企业抱团治污和构建环保平台。这种实践策略有利于消解政府和企业同民间环保组织的对立关系，并能够凭借嵌入双方的合作关系来构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助推民间环保组织脱嵌于“环保小世界”，拓展治理参与空间。

关键词：柔化 同位 民间环保组织 参与空间 实践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治理态势演变驱动着社会组织应当在环境治理体系中发挥更有力的作用。作为社会维度的主要代表，近些年来，民间环保组织在多元环境治理中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期待。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1]，中办与国办发布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中，要求发挥社会组织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中的支撑作用^[2]，等等。民间环保组织在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广度与深度在制度设计中得到显著加强。

尽管在制度设计中，早有文件要求发挥民间环保组织在多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但绝大多数民间环保组织依旧缺乏特定和稳定的制度化渠道参与进环境协同治理之中。鉴于此，一些民间组织倚

靠对抗式策略，通过抗争以及举报等方式，反向拉动政府以及致污主体进行环境治理。例如，民间环保组织招聚志愿者长期通过各种方式举报企业非法排污，并通过媒体、信访等渠道向地方政府施压来促进环境治理进程。事实上，对抗式的实践策略一方面强化了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治理力度，另一方面，却引起了上述被反向推动的治理主体对民间环保力量的排斥，民间环保组织长期以“麻烦制造者”的形象呈现在地方政府和致污企业的刻板印象之中，导致参与环境治理的制度空间不断遭受挤压。由于对抗式策略所引起的负面影响，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反而局促在“环保小世界”之中，将组织活动受限于“观鸟、种树、捡垃圾”等不涉及重大利益冲突的事项中^[3]。

治理机制被定义为“一种互动的完整性在其中得到确定的制度矩阵”^[4]。环境协同治理结构应当是各治理主体处于一种稳定的互联状态，而非以对立的实践关系构成的彼此分割的状态。现实的参与症结激发了一些民间环保组织试图转变对抗式行动策略，以更为灵活的实践策略来试图构建同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正常沟通路径，进而寻求环境治理参与空间的拓展，解除“环保小世界”的约束。例如，民间环保组织绿水通过调整行动策略，以“情感化表达”改变了对抗式话语，推动了民间环保组织同政府和企业之间建构起亲和协同治理关系，助推民间环保组织环境治理空间的扩展^[5]。

近些年来，学界围绕民间环保组织的环境治理实践展开了大量研究，发现民间环保组织在积极调整实践策略来拓展环境治理的参与空间。本文以民间环保组织 S 环境保护协会（下称 S 协会）¹为研究个案，围绕其环境治理实践以及行动逻辑展开分析，进而探讨民间环保组织脱嵌于环保“小世界”的实践基础。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面对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差别利益，民间环保组织何以能够同政府和企业等主体构建起合作关系，推动环保组织脱嵌于“环保小世界”？

本文选择 S 协会作为研究案例，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该环保协会秉持社会利益优先的理念，放弃了民间环保组织以对抗式互动去反向推动环境治理的行动策略，拓展了民间环保组织的活动空间，提供了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其二，课题组对 S 协会进行了深入性的调查访谈，收集了丰富的资料素材，能够为本研究提供坚实基础。针对该民间环保组织，课题组先后进行了两次实地调查。第一次为 2020 年 11 月份深入当地，同该民间环保组织负责人、企业主和村居主任进行了深入访谈，得到了关于该环保协会的初步认识。第二次为 2021 年 7 月底到 9 月初的实地调查，笔者以实习生的身份同该民间环保组织的多位负责人进行了深入访谈，并因实习身份获取了该环保组织的历年活动资料和年度总结，实习期间还同当地环保局、治水办、企业家等进行了访谈。

二、案例简介

2013 年，S 协会成立于浙江省的一个经济强镇，由当地一位热衷于环保事业的何姓企业家（下称何会长）创建。何会长试图通过联合民间的力量推动当地环境治理，实现其环保梦。在协会的创建过程中得到了时任该镇党委书记的大力支持，该书记希望通过民间环保协会的组建来推动当地“五水共

¹按照学术惯例，该民间环保组织以及其他关键性的地名与人名均已做了匿名处理。

治”¹。该协会在创会后的几年时间内，积极服务于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工作，并通过助力中小企业治理污染，推动了当地环境治理进程。

S 协会有着同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双向亲和性基础。由于中国社会形势的复杂性，民间环保组织或多或少地拥有官方色彩。该协会由地方政府支持成立，这种支持体现为该协会成立时当地政府为其捐资，并在协会注册时候给予了方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尽管 S 协会由地方政府支持成立，但该民间环保组织依旧以民间性为主，是属于同政府关系较为密切的民间环保组织。这种民间性表现在该组织在人事、活动组织上的自主性以及运营资金的自主筹集等²。同样，该协会的创立者何会长为当地著名的企业家，在协会的创建以及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该镇企业家的支持，这种支持表现为部分企业捐资。总而言之，该协会同当地政府和企业的联系较为密切，这也为后续 S 协会参与到地方环境治理提供了基础。

相较于此前民间环保组织多以对抗式实践来反推治污进程，S 协会则有着同政府和企业的亲和基础来避免采取对抗式行动策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亲和基础并非能够自动转化为民间环保组织参与当地环境协同治理的“门票”。为能够涉身于当地环境治理之中，挣脱“环保小世界”的束缚，进而保留同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亲和基础，S 协会放弃采用对抗式行动策略，分别采用“柔化”与“同位”的实践策略来构建同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实践关系，试图以此来解构盛行于民间环保组织与政企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进而拓展环境治理参与空间。因此，在该协会成立后，其工作主要围绕两个中心：一条为围绕政府，配合政府的环境治理活动；另外一条为围绕企业，助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治理环境污染。践行以上工作需要构建同上述不同主体的亲和关系。面对政府，该民间环保组织利用“柔化”策略来构建同政府的信任关系。一方面，S 协会要求在实践中要以“甘当配角”的话语艺术来获取政府对民间环保组织的信任。另一方面，该协会在实践中积极配合政府的环境治理工作，为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遇到的棘手问题出面解决。在此话语理念以及实践策略的影响下，S 协会同当地政府建立起了信任关系，并因此顺利进入环境治理中心领域，得以在涉及重大环境利益问题当中发挥民间环保组织的协同作用。正是同政府的亲和关系，促进了该民间环保组织能够脱嵌于民间“环保小世界”，为后续助推当地致污企业环境治理奠定了基础。面向企业，S 协会通过“同位”策略，变监督者为服务者，通过站在企业主的一方，而非站在对立面方式来助推当地企业治理污染。一方面，该协会通过帮助当地一批缺乏治污能力的中小企业以抱团方式实现污染治理，维持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相对平衡，避免了一批缺乏治污能力的企业被环境规制“一刀切”。另一方面，该协会通过搭建企业同污染处理机构的对接平台，推动企业落实环境政策。而正是因为 S 协会的“柔化”和“同位”实践策略，在同政府、企业构建起合作关系的基础上，该协会得以搭建起多方沟通的“桥梁”，建构起“以‘信任—服务—

¹2013 年浙江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作出了“五水共治”决策。“五水共治”是指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这五项，其中以治污水为要，该项政策快速推动了浙江省污水治理进程。

²尽管政府在协会成立时候为其捐资，但该民间环保协会在运作过程中，经常接收 S 协会会长企业的资助并由会长提供办公场所，因此，其不必同一般民间环保组织在最初发展阶段，因资金等而陷入困境。

合作’为特征的合作机制”^[6]助推环境治理体系的建构。

三、面向政府的“柔化”策略

政府环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角色决定了同政府构建合作关系是民间环保组织处理对外关系的核心。民间环保组织需要获取政府的信任去获取制度化参与空间，同地方政府构建合作关系是民间环保组织是否能够介入地方环境治理工作的重要基础。一方面，合作能够为民间环保组织赋予组织合法性，另一方面，同政府的合作关系能够为民间环保组织提供制度内渠道来参与进地方环境治理，为民间环保组织涉入协同治理提供了可能。帕特南认为“在一个共同体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合作本身也会带来信任”^[7]。由于 S 协会在创会初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这本身就赋予了该协会同政府有着一定的合作可能性。更进一步，为获取参与当地环境治理的“准入权”，获取地方政府的信任，S 协会在同当地政府的交往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柔化”策略建构了同政府的环境协同治理关系。“柔化”策略即通过树立民间环保组织对当地政府无威胁且有积极助力的姿态，通过在话语表达以及治理实践等方面助力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工作，以此来维持同政府的合作关系。

（一）配角理念

配角理念是 S 协会为维持同政府的合作关系而采取的话语艺术和理念策略。公共领域的信任关系首先是政府信任关系，信任是彼此合作的前提^[6]。S 协会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在理念上主动将自身以配角的身份信号传递给地方政府，意图通过对配角身份的“弱势化”“己方化”来减轻政府部门对民间环保组织的戒备心态，以此做到取信于政府，强化参与的可能性。因而，在该协会主办的各项活动中，其积极邀请相关政府部门共同开展活动，一方面，强化活动的权威性，另外一方面，力图通过同政府部门的合作，强化彼此关系的深化。

注重合作，形成合力是我们协会今年开展工作的一个亮点。我们坚持“合作共赢，赢在环保”的理念，同时树立“为了环保，甘当配角”的意识，一年里，积极同有关单位、部门共同开展举办各种形式的环保活动，在合作的过程中共同推动了环保事业的发展。（资料来源：S 环保协会 2014 年度内部总结）

配角理念是 S 协会从社会效益出发衍生出来的实践话语。该协会创立时期，正值中国的环境治理态势有了明显的演变，政府部门开始对环境污染给予更大的关注力度。在此阶段，政府部门同样陷入环境“政绩跑步机”^[8]中，对环境治理有了更为明确的绩效驱动力。正是这种转变，赋予了民间环保组织得以有突破口来寻求同政府合作的空间。该协会正是在此趋势下，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的环境治理工作。S 协会秘书长对此解释道：

“甘当配角”即民间环保组织要有大局观，无形的理念当中，实则是这片土地的普通民众受益。此外，（我们）民间环保组织在乎的不是配角不配角的问题，因为这就是公益，这就是协会的使命。例如，浙江省推行的五水共治和剿灭劣 V 类水等都是政府的事情，但同时也是关涉这个地方大环境的一个事情，是社会效益显著的事情。因此，协会能够在其中推动环境得到改善，（对于我们来说）甘当配角是一件境界高的事情。（访谈记录：ZF20210813）

配角理念还体现在 S 协会不愿在一些事务上损害政府颜面。在“五水共治”时期，该环保协会组织该会会员参与巡河并拍摄当地水系被污染的照片，协会管理人员在收集并仔细甄选后，有选择性地提交给当地环保部门进行举报。甄选一方面是要去除指向不明确的照片，提高举报质量。另外一方面，该协会意图通过甄选的方式控制举报数量，避免因举报数量过多而引起政府部门的不满¹，以此来维持同地方环保系统的关系。该协会的负责人为此作出了解释，“做公益要从多方面的因素考虑，尤其是要考虑政府的颜面”。可以看出，S 协会在助推当地环境治理中，依旧需要遵循社会的潜规则，以此避免双方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维持沟通的渠道，把握好度，使得民间环保协会的参与度基本能够在政府接受的范围之内，为环保 NGO 赢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不仅是 S 协会所秉持的配角意识在脱嵌于民间“环保小世界”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实的需要也赋予了民间环保协会成为政府部门“配角”的可能性。当地环保力量的相对匮乏赋予了 S 环保协会能够作为政府的补充力量，该协会工作人员谈到：

我们这边政府的环境执法队总共只有八位正式的工作人员，而镇上工业企业数量达上万，仅凭此规模的环保执法队难以对环境污染作出全面监督，而（S）协会的存在则相对打通了渠道，一方面协会可以作为补充力量，构建政府与企业的桥梁，推动企业推进环境治理，而另一方面，则可利用协会的动员能力来促进当地全民环保的落实。（访谈记录：CYM20210728）

总而言之，在维持同政府的合作关系这一过程中，该环保协会秉持配角理念要求，以此来确保同政府的沟通渠道畅通，而现实的环保需要也赋予了 S 协会成为“配角”的可能，进而提升了其参与环境治理中的机会。正是因此，该环保协会在日后政府遇到棘手的环境治理难题的时候，得以通过前期同地方政府建构的良好关系，顺利进入当地环境治理中心工作之中。

（二）助力政府解决棘手问题

建构主义认为，合作关系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互动中生成的^[9]。在助力政府环境治理工作进程中，向政府证明民间环保协会的价值所在，是更易吸引政府为民间环保组织打开制度化参与渠道的实践策略。民间环保组织在相当长的阶段被视为政府“麻烦制造者”，为此同政府的交往中始终被蒙上一层阴影。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利益契合程度决定了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支持或限制。^[10]为去除“麻烦制造者”的负面标签，S 协会从实际行动入手，在以直接行动助力政府解决棘手问题的过程中，力图实现同政府利益契合，以将“麻烦制造者”的标签转化为“麻烦消解者”“政府帮手”。正是因此，该协会得以向政府证明同其合作的价值性，并由政府提供给民间环保组织更多的制度参与空间。棘手的环境问题出现在 2013 年底，由于“五水共治”政策的推行，地方政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环境治理运动，在治理当地废塑料加工作坊²时候，出现了作坊主自焚以阻拦环境治理的恶性事件，导致政府治理行动受挫，在当地的环境治理受到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S 环保协会应政府邀请，积极参与到当地村民的环保观念提升中，在系列活动后，为政府环境治理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便利。

¹这种不满可能表现为政府部门因民间环保协会的过多举报而凸显自身的无能。

²当地将其界定为非法作坊。

废塑料作坊以从事废塑料洗涤加工为主，即将批发的废弃塑料进行打碎并漂洗干净进行再加工。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新村居民就已开始涉猎废塑料洗涤加工，由于技艺简单、原料便宜，生产利润较高，且这批作坊不办证以及缺乏污染处理设备、不纳税，因此这批小作坊的废塑料加工有着较正规企业更具成本优势。当时新村废塑料行业的发展程度密集到村内有 1/3 的家庭直接从事废塑料行业，间接从事的不可计数。其中，从事生产销售的主要为中青年劳动力，搬运、洗涤等主要为老年群体，全村老少绝大部分参与到该项产业中去，正是因此新村早已成为附近地区远近闻名的废塑料洗涤加工点，附近几个村庄也在新村的影响下从事废塑料加工，在当地，围绕新村形成了废塑料清洗以及加工基地。需要注意的是，新村长期从事废塑料洗涤加工的代价是当地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废塑料洗涤加工会产生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污水，新村作坊长期将生产污水直排进河道中，导致当地污水横流¹。落后的产业以及严重的污染导致市政府早在 2006 年就开始对全市废塑料行业进行专项整治，新村废塑料洗涤加工作坊被要求统一整治关停。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环境治理的长效管理机制尚未形成，以及废塑料加工场点投入成本少、技术含量低，新村废塑料行业在整治后迅速死灰复燃，2008 年，地方政府又对新村废塑料作坊进行了一次集中整顿，这次整顿几乎打掉了所有废塑料作坊，新村从事废塑料行业的村民急遽减少。2008 年以后，村内仍然遗留着少部分村民继续经营着废塑料作坊，地方环保局也依旧来过村内整治过几次，拉闸限电等手段层出不穷，但是部分村民也依旧借助各种方法继续生产，例如遭遇拉闸后从邻居家借电。好景不长，新村剩余的废塑料作坊在经历了同政府持续多年的拉锯战后，在“五水共治”推行后，终于同政府迎来了一次激励的交锋。正是此次交锋，为 S 协会的介入提供了机遇。

2013 年底，地方政府在新村所在的废塑料加工片区继续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废塑料整治专项工作，这一次，政府意图彻底打掉新村所有从事废塑料洗涤加工的小作坊，彻底杜绝废塑料污染情况。地方政府要彻底根除新村废塑料行业有其现实依据，因为该村地处当地一条主要河流的上游，废塑料生产制造的水污染使得该村河流发黑发臭，污染过的河水通过导致中下游的治河难以推行，因而，当地政府意图通过 2013 年的整治来为“五水共治”加速。2013 年，该镇政府进村整治拆除非废塑料作坊的过程中，由于政府的意图同从事废塑料生产的村民不一致，个别经营着废塑料加工坊的村民抵触情绪严重，采取各种方式阻碍执法，最严重的为一户业主以自焚的方式反对强拆废塑料作坊。新村村支书对此事件进行了描述：

当时我们新村有一户经营废塑料加工的村民，在面对政府执法部门整治时，他心里想政府要拆除废塑料作坊，你（政府）把我的饭碗都打破了，那这让我怎么生存，结果就是老实人想不开，然后身上泼了油漆点着自焚，不过最终得以抢救回来。（访谈记录：DBM20201123）

因为自焚事件，新村村民对地方政府的执法存在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导致整治工作难以顺利开展。

¹这批作坊工厂造成的污染表现为，废旧塑料的原材料主要为一次性的医疗器材以及其他附带各类污染物的物品，而经洗涤会随着清洗的水渗入地下。此外，焚烧废塑料会产生硫化物等污染气体，对人体造成伤害。新村的污染程度尤为严重，据新村村支书介绍，该村废塑料行业整顿结束后，经过多次清淤后，河底淤泥依旧有着严重的刺鼻气味。

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对立情绪导致了以强制方式进场治理的失败，而换种方式进场成为当地政府的考虑。此时，S 环保协会在当地已积累了不少声望，并且同政府有着一定的亲密度，环保协会开始进入当地政府的视野之中。于是，地方政府来寻求协会的帮忙，“民间协会介入是不是会更好呢。”环保“小世界”的突破需要合适的契机去介入环境问题之中，而新村自焚事件为 S 协会带来了能够展现民间环保组织的价值的机会。环保协会的切入点为提升当地废塑料作坊主以及居民的环保观念。

(S 协会) 会长当时说过：治污先治水，治水先治人，治人先治心。心就是思想，即要把人的环保观念予以纠正。污染的源头实则水，水一旦污染了河田灌溉等导致粮食都被污染，鸡鸭鹅等也要被污染，直接导致人类直接受到污染，所以说治污先治水，治水先治人，要把人的行为更改过来，而治理心则是要把人的环保观念给调整过来。(访谈记录：ZF20210813)

为了转变新村从事废塑料居民的抗拒思想，S 协会发动环保志愿者们进村开展环保巡回演出，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宣传环保理念以及废塑料洗涤加工带给新村以及当地人民的切身危害。¹此外，在 S 协会的组织下，新村村民参观当地早已转型成功的陈村，在陈村的参观使得新村不少居民支持废塑料加工的想法开始产生了动摇，而这也为后续政府的再次整治提供了情感支持。事实上，协会在此所发挥的作用有几何，确实无法进行估量，到底是从事废塑料行业的村民意识到无法抗衡公权力，还是环保协会的温和方式取得了村民的理解。但是，当后续政府部门再次赶赴新村整治小塑料作坊时候，新村得以顺利完成废塑料作坊整治²，并在 S 协会的技术支持和部分资金支持下，开始了该村内河的水污染治理。

陈村之前和新村地理位置和发展条件各方面都一样，当年陈村由于发展电镀等产业同样是所谓的垃圾村和重污染村，但是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将陈村建设成为成为公园式生态旅游村，新村村民在看完陈村之后，反响还是比较大。(访谈记录：ZF20201122)

“支持”与“配合”实质上就是一种资源相互依赖的关系。^[11]民间环保组织配合政府环境治理行动的目的是以换取政府对民间环保组织活动的支持。因此，在当地政府在推进环境治理工作中遇到阻碍，作为第三方力量的民间环保组织凭借其民间亲和性，在潜移默化或者说是更易被群众接受的方式来影响居民的决策。以主动作为的方式助力政府的环境工作。一方面推动了政府环境治理进程。另外一方面，凭借民间环保组织的出色行动，向政府证明民间环保组织的存在合理性以及价值，为彼此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这也是作为民间环保力量主动构建同政府的亲和关系，来为能够深度参与进环境治理当中构建联络。因而，在新村的表现，为 S 协会更进一步涉入当地环境治理中提供了更广的空间。比如，2014 年当地政府在治理一养猪大村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时，S 环保协会同样被邀请继续涉入其中，继续在协同治理中发挥作用。

民间环保协会能够置身于环保“大世界”中，并同政府维持相对友好的关系，需要以不同的策略

¹关于文艺演出，有一件趣事。S 协会进村组织环保文艺演出时候，当地话中环保和饭煲的读音一样，新村村民以为环保文艺演出是要分发电饭煲，就纷纷前来观看。

²事实上，在这次整治后，新村又有零发几家废塑料小作坊，直到 2020 年，新村的废塑料作坊才宣告彻底终结。

来强化政府对民间环保组织的信任和依赖。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依附性地位有着民间组织的主动建构[12]。在“柔化”策略的运作中，S协会一直以“依附（配角）”“有作为”的方式获取政府信任，使得该协会在同政府多年的相处中，一方面利用其甘当配角的理念减缓政府部门的警戒，另一方面，以助力政府解决棘手环境问题为突破口，向政府证明其存在的价值。以助力政府的柔化方式去参与进当地环境治理中，为民间环保组织寻求同政府的合作提供了新的范式。同样，需要注意的是，S协会能够涉入当地的环境治理当中，尤为重要是环境治理整体态势发生演变，而在此背景下，政府愿意从民间环保协会手中获取配合，民间环保组织得以从政府手中交换支持。

四、面向企业的同位策略

以对抗式策略反拉企业治理污染导致民间环保组织同企业之间处于断裂状态，而无法有效构建彼此之间正常的沟通渠道。在面对传统的对抗式策略，S协会从开始就采取同企业“同位”的策略，这种“同位”策略集中表现在民间环保组织角色的转换，从监督者转换为服务者。S协会协调企业中小企业以抱团治污的方式实现污染的主动治理，并通过组建环保平台的方式来为企业和污染处理机构之间搭建起沟通渠道。

（一）推动企业抱团治污¹

民间环保组织在对抗式话语表达中始终同企业存在沟通鸿沟，而无法搭建起同治污主体企业的切实联系。致污企业往往视民间组织为“麻烦制造者”，民间环保组织则视致污企业为“贪婪索利”而不知治理的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组织。共识在双方的对抗式语境下难以形成，协同治理更如难事。该协会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即由当地知名的企业家创立，并在发展中受到企业捐资支持，因此，这一特殊性质决定了该协会同当地企业具有一定的亲和性。²此外，同当地企业的亲和关系驱动着此前民间环保组织一般以对抗式策略来反推企业治污的方式难以落地，因此S协会致力于通过“同位”的策略通过协助致污企业主动治污，即置身于企业的发展角度，保持致污企业同位的角度，而非对立面，来帮助企业实现治污，实现了民间环保组织在实践层面同企业达成了协同治理污染的局面。

在环境治理态势转变过程中，位于乡镇的缺乏治污能力的中小企业正面临着环境规制的考验。早在八十年代，费孝通在《及早重视小城镇的环境问题》一文中就呼吁关注小城镇的环境污染问题。^[13]然而，由于我国的环境治理长期呈现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环境规制对这批中小型乡镇企业难以形成有效制约。此外，由于缺乏治理能力以及治污理念，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这批企业长期处于致污的状态并规避政府的监管，在治污思想、治污能力以及治污进程上同国家环境要求处于断裂的轨道上。当环境治理的严厉要求落实到这批位于乡镇的散乱污小企业身上时，污染治理设备的门槛导致这部分致污企业难以进入自主治理阶段。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乡镇散乱污企业由于治污能力的匮乏，以及

¹因此项目，S协会斩获多个荣誉。

²事实上，当地以汽摩配产业为主，S协会会长所属；企业同样在汽摩配链条上，因而，当后续同一生产链条的中小企业寻求协会帮助时，协会有着基础情感去帮助那批企业。尽管可能有着一定的利益关系，但笔者认为帮助当地企业治污是更多的基于社会利益，而非其他利益主导环保协会从事该项目。

缺乏行业协会等渠道助力其解决碎片化的问题，这批类型的企业往往在越来越严厉的环境规制中要求关停。在 S 协会所在地区，“五水共治”政策推行后，一大批中小型致污企业正面临着同样的命运，被要求治污或者限期关停。可以料想到，这批企业由于缺乏治污能力或者治污成本远远高于其可承受范围，那么，关停似乎是这批企业的终极命运。而作为民间环保组织一般也乐于看到这批致污而不治污的企业走向灭亡。而 S 协会由于其特殊的背景，即会长以及部分协会领导由企业家担任，且协会的发展受到过企业的资助，该协会有着较为亲和的关系同当地的企业组织。因而，当一大批中小型致污企业面临困境时候，S 协会的介入提供给这批企业一个利益整合机会和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并通过民间环保组织和政府的亲和关系助力这批致污企业构建起同政府的沟通渠道，使得这批散乱污企业得以创新治污机制，实现环境规制下的主动治污。

2013 年末，浙江省环境规制的强化要求全面治理“污水”，而这也成为乡镇散乱污企业治污的开始。在 S 协会所在的百强镇中，由于从事酸洗、发黑工艺¹涉及的小企业多年来以“重污染”“散乱污”“污染长期直排”的标签示众，在环境治理态势转变后，这批乡镇污染企业面临不得不“治污水”或者关停的格局。而需要关注的是，这批企业由于发展历史原因以及位处乡镇，发展规模较小且污水处理设备不足或者压根没有，面临着环保规制下关停的选择。对于长期以来污染直排的涉及酸洗和发黑工艺的污染企业，当地政府提供给这批企业两种选择：其一，关停企业，其二，在一个月期限内治理污染，此后不得进行污水直排。在此背景下，该地涉及酸洗、发黑工序的小作坊企业面临着生存危机。

“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以及“五水共治”在当年掀起了“治理污水”的风暴。而我们这地方的酸洗和发黑企业多年来长期将生产污水偷排、漏排、直排入河道中，导致河道污染十分严重。因此，环保局要对这部分企业进行整治，如若这批企业不开始治污就要“全部打掉”。（访谈记录：ZF20201122）

环境治理态势的转变令长期以来以直排、偷排等手段来逃避治污责任的乡镇散乱污企业面临着严厉挑战。事实上，正是因此，政府环境制裁的强化激发了这些原本不想治污且缺乏单独治污能力的企业的求生意志。

在政府要求这批酸洗和发黑企业限期治污或者关停后，当地酸洗和发黑的一部分企业主前来寻求协会帮忙²。同样，由于会长的情怀，他也想要帮这批小污染企业探索出一条路来走可持续发展的。因而，在协会同这部分企业的沟通下，招聚受到环境规制的小企业开会商讨，开会的结果就是准备以企业抱团的方式去自主治理污染。进行抱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小企业居多，而一套（治污）设备的费用高达几百万，小企业没有能力去落实，而这也是协会推动企业进行抱团的理由。由这部分致污企业抱

¹发黑、酸洗为重要的工业加工工艺，在使用这三种工艺过程中往往会使用大量硫酸、硝酸等重污染药剂，其生产废水有较强的污染性。

²为何企业缘何寻求 S 协会帮助呢，环保协会工作人员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一是因为会长的个人魅力大，热心帮助，这也是其创办环保协会的原因。二是当时协会在当地的影响力已经很大，且同政府有较亲密的关系。此外，据笔者调查所知，会长的企业同这批企业一样同属于汽摩配产业链，因而有着更为亲密的关系和对这批小企业的同理心。

起团来共同建设污水处理中心，各家企业分摊建设和污水处理费用，共同治理污染。而由协会代表企业前去同政府协商，请求给予这部分企业政策和时间宽限。（访谈记录：ZF20210813）

S 协会前去同政府协商是以企业的治污为前提，而协会能去同政府协商同样基于双方的亲和关系，致使该协会能够有着渠道去代表企业去同政府协商政策。在 S 协会会长同该镇党委书记的协商下，政府原则上同意允许这批致污企业改造升级，进行抱团治污，并将原先的限定治污期限由一个月调整为半年，并允诺为企业建设污水处理厂提供批地便利。此外，重要的是，政府在其中的态度由原先的严厉制裁再到支持企业治污，发生转变的原因一部分是民间环保协会的出面协调提供了转机，有利于节约政府的治理成本。而另一方面的原因，“一刀切”的环境规制导致政府同其发展经济的职能相悖，S 协会的介入则能够帮助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寻求平衡。环保协会的工作人员对此提供了解答。

政府为什么能够答应这种请求，重要因素还是源于发黑和酸洗这两项工艺在整个产业链中的作用，倘若将这部分小企业全部打掉，那整个产业链中的附属企业也将要发生困难。而政府也依旧是追求 GDP 数字的，要追求经济与环境的平衡，而不能因为“五水共治”而一刀切，要考虑大局。¹（访谈记录：ZF20210813）

在 S 协会同政府协商后，该地酸洗和发黑两大工艺²的小企业开始走上抱团治污的道路。其中分散在全镇的 27 家酸洗企业整合为一家股份制公司，并在该协会的和企业代表的支持下，向政府争取到 20 亩土地作为厂房并建设污水处理设备，实现了治污升级。需要注意的是，获批土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 14 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污水处理厂尚未建设好，在过渡期内，这部分酸洗企业所产生的废酸³由此协会出面协调处理，S 协会经过多方考察，在江苏省寻求到能够对接处理废酸的治污机构，但由于这批小企业往外转运废酸的资质不足，S 协会主动担负外运责任，协调该镇酸洗企业生产后的废酸运往外地进行处理⁴。

发黑工序的企业较酸洗企业有着便利条件，即全镇从事发黑工序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林村，正是如此，使得林村发黑企业能够更快且更容易集中起来建设共用污水处理厂。在 S 协会的协调下，林村 85 家从事发黑工艺的企业向政府提交申请联合建设大型污水处理系统的报告，将 85 家企业排放的废水统一纳入管道接入在村内计划建设的废水处理中心，进行统一治理后排放。在 S 协会的协调下和发黑企业的努力下，当地政府将林村 600 多平方米的土地批予计划建设的污水处理站⁵。2014 年初，该污水处

¹另一位 S 协会的工作人员给了笔者补充回答，即在 S 协会前去同地方政府协商前，S 协会组织招聚受到影响酸洗以及发黑企业进行组织，而这也从之后发黑企业联名向政府申请中看出，不难看出，S 协会也意图通过联合企业来为自身的协调筹集谈判筹码。

²正因 S 协会助力成功酸洗以及发黑工艺的企业抱团治污，当地从事电泳以及喷漆工艺的企业同样也去寻求过协会的帮助，并通过租借厂房建设污水处理厂实现了治污。

³废酸是在酸洗过程中，利用酸溶液去除钢铁表面上的氧化皮和锈蚀物后残存的污染液体，污染性强。

⁴因废酸的转运较为危险，故转运需要较大的机构进行担保。因此，S 协会担任了这部分酸洗企业废酸外运的责任，一旦发生泄漏，则 S 协会会长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⁵由于批地的程序过于复杂，该废水处理中心在尚未取得许可证的前提下率先动工，当地政府处罚 1 万元后，通过其他手段将此块 600 多平方米的土地正式转为污水处理中心的土地。

理站耗资 400 余万建成，由 85 家发黑企业分摊建设污水处理中心的费用，林村发黑企业开始截污纳管进新建成的废水处理中心。此后，林村废水处理中心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污水治理，发黑企业根据污水排放量来交付处理费。原先缺乏独立治污的乡镇小企业在地方政府和环保协会的支持下，利用抱团治污的模式转型成功。

在推动致污企业主动治理污染过程中，S 环保协会以“同位”角度助力这批散乱污企业治理污染，并借助同政府的亲和关系来为政府和企业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以此推动当地环境治理。环保协会在此过程中，通过为酸洗企业提供废酸转运责任担保、为寻求治污的企业向政府协商政策和延长过渡期、为重组后的企业向政府协调地块，在整个过程中，S 协会同这批企业站在了同一立场，即在治污的前提下保全企业发展，而源自政府的反馈也同样是基于这一前提，在三者的互动过程中，协同治理得到有效释放。但需要注意的是，同企业的同位策略的建构有其特殊的原因，即该地区主要的从事行业为汽摩配产业，而协会中部分成员的企业就在汽摩配产业链中，帮助这部分企业以抱团治理污染的方式如同救助产业链和助己。同时，也正因为这层企业主身份，加深了民间环保组织对这些企业的同情/同理心，使其能够站在同位的角度去帮助企业治污。

治理的理念强调的原则是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中建立一致或取得认同。^[14]可以看到，民间环保组织将源自政府的绩效和企业的发展等多方不同利益聚焦到环境治理当中，将政府的应急整治的机械做法予以中性调整，民间环保组织的存在调试了中国政府在面临促进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职能时，面临的紧张角色^[15]，而这也给予了民间环保协会参与环境治理中的现实空间，也为政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来缓解环境治理中的困难点，使得民间环保组织成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的角色，搭建起环境治理两大主体之间的沟通渠道。

（二）环保对接平台

“同位”策略还体现为在致污企业和污染处理机构之间搭建平台。“同位”不同于换位思考，而是致力于为企业污染治理提供新的可能空间。由于 S 协会所在镇工业发达，但多是以中小型乡镇企业为主，企业常因环境政策不稳定而缺乏对政策以及治污技术的理解，出现了相当一部分企业对新出台的政策认识不够，企业发展跟不上环境政策发展的情况。因此，为推动这批企业能够获取到环境治理的最新消息，该协会常以服务者的身份进入企业宣讲环保知识和环保技术。“环保知识进企业”项目结束后，由于一大批企业缺乏同污染处理机构之间的对接平台，该协会主动在外考察联系外地有资质的环境治理平台，为当地中小企业引进的平台包括环评报告、排污许可证办理、验收监测、危废咨询与处置等服务，畅通当地中小企业的需求。在此过程中，S 协会构建了企业和污染治理机构的桥梁，推动了这批企业治理污染的进程。

2015 年到 2016 年，环保协会组织专业的环保导师进入企业，为企业主及员工讲解目前的环保破坏的严重性，保护环境的迫切性，并带来专业的环境保护方案，并在每个企业，做为期一周的环保知识巡回展览。通过此次环保知识进企业活动，可以让企业的领导及员工，了解环境的严重性，迫切性，也可以知道，自身应该如何参与环保，有些企业生产的同时，也考虑到环境保护的问题，但是苦于没

有专业的指导，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可以通过此次活动，为企业带来更全面的环保技术，最终达到全民参与环保的目的。（资料来源：S 环保协会 2015、2016 年度工作总结）

目前 S 协会的主要工作为当地部分规上企业（部分主要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污染的企业）提供环境政策宣传和技术指导，主要聚焦点为构建以企业家为主体的环保协会，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环境治理。因此，该协会目前协同当地环保局招聚该镇规模以上的能够产生污染的企业（当地有 356 家）加入 S 协会，通过聚集该类企业，一方面收取会费来提高自我造血能力，维持协会生存。另一方面，企业是环境治理的主体，但常以污染治理技术的匮乏，S 协会抓住这个参与空间，为当地企业提供环保政策宣传以及污染治理技术指导，以此来服务于当地环境治理，以环保协会的资源优势互补企业发展。

五、研究结论

民间环保组织倚靠对抗式行动策略和将活动局限在“环保小世界”的实践导致了环境治理参与空间的萎缩，因而需要选择合适的实践策略和话语艺术，拓展民间环保组织的治理参与空间。S 协会能够同政府和企业构建协同治理关系，一方面有赖于环境治理整体态势的演变，政府和企业需要集中部分注意力来化解环境规制的影响，正是如此，为民间环保组织同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治理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依托于该组织践行的“柔化”与“同位”的实践策略，得以同政府和企业构建起亲和关系，使得民间环保组织得以凭借多方之间的信任来充当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促进协同治理的实现。

民间环保协会、地方政府以及企业有着合作的利益交叉点，政府意图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得到平衡，企业则希冀在环境规制下实现发展，民间环保组织则坚持环境得到保护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可以看到，三者的利益存在着明显的重合点和交叉点，密集的利益交叉点的特殊性也驱动着 S 协会能够从中搭建桥梁，参与进环保“大世界”之中。

回溯民间环保协会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变迁历史，可以看到，民间环保组织应当注重采用灵活的时间策略去充当两者环境治理中的“缺位”角色。众所周知，政府和企业环境治理当中必然有其“盲点”而无法涉及。例如，政府在自焚事件后的尴尬境遇需要民间环保协会以温和方式去助其破局，小企业在要求治污后需要民间环保协会以协调者的身份向政府争取政策。因而，民间环保协会可以选择尝试以服务者的角色去帮助政府和企业去协调治理中的难点和痛点，在服务中建构彼此之间的亲和关系，并以此推动多方共治，拓展民间环保组织的活动空间，而更多的涉入到“大社会”之中，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作出贡献。因而，民间环保组织可以转变思路，不必常以“监督者”的身份自居去直面企业和政府，而选择更为温和的方式或者说更能让政府和企业感受到民间力量的价值性，而选择同其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即民间环保组织是否可以在更大的合作舞台上助力治理主体的环境治理行动，这应当是民间环保组织在推进环境治理中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此外，审视 S 协会的环境治理参与，需要注意的是，S 协会成功有其特殊因素，其能够利用资源优势来同政府和企业的缺陷进行功能互补，而这种特殊因素相对而言，对民间组织的实践提出了难点。

参考文献:

- [1] 网页报告 1, 2017,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 [2] 网页报告 2, 2021,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20-03/03/content_5486380.htm.)
- [3] 晋军、何江穗, 2008, 《碎片化中的底层表达——云南水电开发争论中的民间环保组织》, 《学海》第 4 期。
- [4] 奥利弗·E·威廉姆森, 2001, 《治理机制》, 王健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5] 陈涛、郭雪萍, 2021, 《共情式营销与专业化嵌入——民间环保组织重构多元关系的实践策略》, 《中国行政管理》, 第 2 期。
- [6] 孔繁斌, 2012, 《公共性的再生产: 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7] 罗伯特·D·帕特南, 2001, 《使民主运转起来》, 王列、赖海榕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 [8] 任克强, 2017, 《政绩跑步机: 关于环境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 《南京社会科学》第 6 期。
- [9] 高猛、赵平安, 2019, 《政府与 NGO 合作关系的逻辑与生成——建构主义的视角》, 《学术探索》第 4 期。
- [10] 江华、张建民、周莹, 2011, 《利益契合: 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以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为案例》, 《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 [11] 唐文玉, 2010, 《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 《公共管理学报》第一期。
- [12] 张虎彪, 2013, 《环保 NGO 的政治机会空间的营造——以 C 市环保协会对政府的行动策略为例》,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 [13] 费孝通, 1984, 《及早重视小城镇的环境污染问题》, 《水土保持通报》第 2 期。
- [14] 冯钢, 2010, 《转型社会及其治理问题》,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5] 洪大用, 2012, 《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第 9 期。

☆作者简介: 牛 帅, 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潘恩慧

村医发展及现状调查

——以苏北某区为例

汪函丹

摘要：作为拥有政治驱动力且相对廉价的医疗资源，乡村医生在中国乡村医疗卫生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几位村医的半结构式访谈，对延续半个多世纪的村医制度进行了细微的了解。理论不足但经验丰富的乡村医生为农村感染病的防治、基础医疗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这一意义和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正在逐渐消解，农村医疗体系和农村一样，被抛在现代化、城市化之外。同时，新的服务要求的出现使得村医一职的必要性再次被强调，而其作为职业的发展路径、福利待遇、退休机制都存在诸多阻碍。而对于农村医疗体系的维护和长久发展而言，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乡村医生 乡村医疗 职业发展

一、导言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的资源配置大致呈现出城市优于农村的分布状况。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分布与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导致了众多问题的出现，医疗卫生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水平落后的状况，政府组织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对人们的卫生观念进行改善。观念上的变化由运动产生，但卫生医疗基础设施以及专业人员的配备无法仅凭卫生运动进行改善。为了改善医疗资源不足的状况，政府积极推动合作医疗的诞生，并积极吸纳原有医疗人才进行培训，赤脚医生、农村助产士等具有专业技术的人员逐渐成为新中国农村卫生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一时期，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室、生产队卫生员制度随之普遍建立。

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到来，国家的目标转移到现代化，对于农村医疗的重视也难以继，赤脚医生随着时代的浪潮而逐渐退隐，缺乏合理管理和规范的赤脚医生们改头换面，成为村医。政策层面，农村合作医疗解散，村医的诊疗模式引入市场规则，对于大众而言成为了巨大的负担。新的世纪的到来伴随着几次医疗体制的改革，为了保护民众利益，农村医疗的重点——村医重新被纳入国家的监管范围。

总体而言，农村医疗有关的几次改革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医疗的困境。政府近年来增加的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从根本上并未对农村医疗制度进行创新，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最主要的承担者仍然是村医。与之相应的是村医的待遇机制、管理机制和退休机制都未得到切实有效的落实，多次文件的出台实际上并未切实改变村医们的生存境况。基层医疗体系建设失效，专业人员不断流出，农村医疗卫生逐渐走向衰败。外在干预机制的失败要求我们注重体系中个人的存在，本文集中于某一地区的村医，利用访谈的方式，从个体生命历程出发，以微观的角度探寻和分析基层医疗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二、从政治运动中走出来的赤脚医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大跃进失败后，年轻的村医 A 刚刚参加工作，正式走上了村医的工作岗位。1965 年，国内外局势严峻，四清运动如火如荼，为了将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和卫生革命，夺取医疗卫生的大权，赤脚医生作为农村医疗的重要力量被组织、发展。仍是年轻人的村医 A 在当时凭借这一职业体会到了无上的光荣，现在回忆起他仍然是感叹的：那时候赤脚医生红呢，亦农亦医……革命年代给予的政治身份的定性，让赤脚医生一职的社会地位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升。同年 6 月 26 日，毛泽东和身边保健人员进行了谈话，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其核心内容及精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仍然成为了正式指示，迅速扩展到基层，被称为“六·二六指示”。根据“六·二六指示”，赤脚医生的选拔和培养摒弃了学历门槛，放弃了理论要求，开始注重实践经验的培养。为了快速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短期培训成为了赤脚医生们跨入行医行列的主要培训类型。同时，赤脚医生的选拔具有强烈的人情色彩，选择某个人成为赤脚医生是村干部的职权内容，在无法自由流动的六七十年代，赤脚医生一职对于一般村民而言极具吸引力。虽然有过直接的询问，但是受访者除了透露过成为赤脚医生一职的艰难以及他们受大队等推荐、任命的正当性，其余内容皆是含混带过，他们或许都拥有某些获得资格的、不便言明的“门路”。

七零年代初，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基于村医们的认知，经询问是 1969 年之后），村医 B、C 以及村医 F 陆续开始参加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村医 B 读完高中便需要开始寻找出路，迷茫的他开始成为了村医的后备力量，开始在卫生室跟随老医生（有经验的医生）学习（这一学习经历给予了其充分的实践经验的吸收及实践训练的机会）。村医 C 在文化大革命时开始失学，仅有小学学历的她也同样成为了村医后备力量的一员。村医 B、村医 C 及村医 F 拥有不同的文化水平，但在村医这条职业生涯中却是经历了同样的发展道路。他们的培训经历是毛泽东关于农村医疗卫生指示的鲜活的示例。关于为何选择赤脚医生一职，而非走上乡村老师的道路，拥有高中文化水平的村医 B 表示，那时候，当医生和当老师钱拿的差不多啊，但是当医生还是自由，不像老师，那时候，唉，那时候哪有现在这么大差别……低进入门槛的赤脚医生作为职业，吸引了大批各种学历的农民，农村医疗力量迅速壮大，农村医疗体系逐渐建立起来。

村医 B、村医 C 和村医 E、F 在相近的时间参加工作的赤脚医生，都经历了三年左右的培训，先到 XX 学习，再到 XX 学习，然后再到 XX 卫生院学习。都是一开始先在卫生室学（地理范围逐渐扩大，地理等级逐渐提高，但是最大地理范围和地理等级并没有超过市）。村医 D 参加工作的时间和其他村医的工作时间差值过大，将近有二十年。但是村医的培训方式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更，1988 年高中毕业的村医 D 同样是经历了三年培训，同时，相较于其他村医，由于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他的入职培训地点并未超过区级。二十年左右的村医培训的最为重要的变化发生在理论学习部分。医疗卫生事业及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村医的入职培训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环境。培训，培训是在卫生院培养了两年，江都卫校培训的，脱产学习了一年……先是卫生院学习一年，后来卫校一年，再到医院再培训一年。

赤脚医生们的主要职责也由“六·二六指示”定了下来。村医 A 说：那时候国家出一个“六·二六指示”，毛泽东发的，那时候……血液虫病，毛泽东要消除农村慢性病。毛泽东认为慢性病的诊治和防治是当时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最为重要的内容，而这一认知是国家整体性的恶劣卫生条件以及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稀缺导致的。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缺乏这一状况不仅在建国初期十分显著，也持续到了市场改革开放后，到 2010 年左右才发生整体性的变动。所有被采访的赤脚医生在回答疾病类型变化的提问时，答案总体呈先趋同状态——慢性病种类的变更。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卫生意识薄弱、卫生环境差、个人卫生习惯难以养成等原因造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普遍病症及问题，村医们将其归源为外部因素。以前是黄种病、血液病、肠道病、痢疾这些，主要是传染病，像脑膜炎，这个是简单的，这个是分级度的，最严重的是天花……还有常见病，感冒、肠胃炎、囊肿……而导致这些普遍病症的主要原因，村医们的归因也称呈现出时代特征：最年长的村医 A 说，生活在艰辛年代……那时候卫生条件差，生活条件差，吃是不得吃，喝是不得喝……老早是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导致水肿，个个的都要去干活的……繁重的农活以及缺少充分的营养成为村民诸多病症的主要原因。村医 B 等同一代村医则指出，早期不是水泥路，到处擦擦……过去都是外因……而这一阶段的外因主要归咎于普遍存在的环境问题以及村民们尚未提升的健康卫生意识。关于慢性病变更的具体时间，村医们并无完全的定论，他们指出诸多的因素中，生活条件的提升是至关重要的。生活条件的提升促使人们获得了更高水平的健康卫生意识，同时，毫无节制的生活习惯同样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疾病困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不仅广泛出现在老年人群体中，并且存在着向更加年轻的中年人甚至是青年人蔓延的趋势。与过去相同，农村区域的当代慢性病仍然由村医们进行日常的护理和诊疗。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浪潮席卷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农村医疗体系在这一时期成为了真正的独立户——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这一时期，来自集体和上级的各种补助都停止了，村医们也不再需要对上、对村集体负责。村医们主要的盈利模式是通过药品的差价来获取足够的利润，以供养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在毫无监管的经营过程中，村医们能够获取的利润是巨大的，但利润的获取则完全依靠自己的技术以及名气，这造成了村医们之间的利益竞争和不同村医对于同一时期的评价差异，但这种竞争并未阻碍更多的新村医的诞生。村医 B 指出，（政府和国家）基本不管了……医药公司进药，完全私人，那个时候一个村都几个呢，乡村医生多，那块挣钱。村医 D 就是在八十年代末开始走上乡村医生的岗位，拥有高中学历的他，在村医发展（挣钱）前景一片大好的情况下，经历了相同模式的培训后及新设的考核后，成为了一名“永久”的乡村医生。同时，今天仍在卫生室工作的医生，大多是这一时期加入乡村医生的职业队伍的。

九十年代，为了改善普遍存在的农村就医难题，调整农村药价，国家开始重新调整对于乡村医生的管理方式。在保证乡村医生一定收入的同时，为了不增加政府负担，政府仍然采用“以药养医”的方式，并逐步将药品的差价进行了硬性规定，严控村医可以从中获取的利润范围。对于村医们而言，这一措施使得他们无法获得以往水平的收入，同时也无法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

2009 年新一轮医改，我国开始正式启动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工作，取消药品的差价，并于次

年对基础医疗人员收入问题等相关问题作出答复。在“如何稳定乡村医生队伍”一问中的四项措施，基本都在基层进行了实施。但从收入这一部分出发，乡村医生的待遇较以往确实存在着明显的下降，同时国家补贴的并未完全到位，导致乡村医生的收入较改革后并未得到有效保证。村医 D 表示，钱？钱很少的啊！……从差价变成固定服务费，然后现在病人也少……搞来搞去，现在是绩效工资了，但是还没有到最低工资标准……你说说你说我们要怎么生活？上面会补贴日常开支，但是没说是多少，下来一千多块钱，你看我这里夏天要开空调，不能热着人，冬天也要开，电费都不够，还有这么多东西……毫无晋升途径和收入保障的乡村医生一职不仅无法维护现有医疗人员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同时也阻碍了新的乡村医生加入的可能。

三、医疗体系末梢的村医

作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基础，村医们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他们以全年无休的状态服务村民，真正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时代下，村医们从农村居民医疗卫生的作用主力，成为辅助者的角色，但对于特定年代的人而言，他们的作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二十四小时待命和固定的就诊时间 随着时间的流逝，老村医们都逐渐退休，离开卫生室，但他们的职业生涯并未随着离开卫生室而中断。凭借几十年行医经验获得的认可，居住在当地的人们在需要寻医问药时，第一时间总会想到本村或邻近村庄的村医。提及具体的工作时间，村医 A（完全退休¹）表示：

夜里日里，起早带晚，人家这会夜里来了，敲锣打鼓的，先生啊，小孩不舒服啊，这儿看好了，门一关再睡觉。夏天还好些呢，你到冬天，夜里冻死了，脱衣裳穿衣服的。

人家看吧，要求你去。老头老奶奶，哪里不舒服了，请你去看一下，你不能不去撒。庄上人哎，外地人也要去。人家相信你，才喊你，不相信你都不喊你了。服务态度还要好，还要规矩。不得意思哦。

但是当下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时间待机制已经不属于“退休”村医们的日常要求。调查访谈到的几位从卫生室退下来的村医都将自己的营业时间定在了上午这一时间段，某人抱着手臂脱臼的孩子在午后时段拜访一位相关经验丰富的村医时，就吃了一个闭门羹。初次走访寻找各个村医时，他们的住所都大门紧闭，周边人给的回复都是“喝酒去了”，“打牌去了”，“明天早点来”。退休的村医已经不再依靠医生这一职业为主要谋生手段，家庭供养的压力较其年轻时也有了很大的消减。从外部因素来看，村医不再是当地可达范围内的唯一医疗点，农村居民对于该职业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村医也不再需要迫于人情压力而无休止的为附近群众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仍在某村卫生室供职的村医 D 表示，

我不干的（指在家里提供医疗服务），现在不允许的，也没有必要，就在上班时看看就好了。

在村医和就诊者共同变化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特殊群体——老人。出于减少医疗花销、自身行

¹ 完全退休：返聘期结束，同时医务室不再交付相关公共卫生任务。按照村医 C 的叙述，“他被踢出去了，所以这些资料也不给他做。” 受访者中仅有村医 A 是处于这一阶段。

动不便以及更愿意找熟人等多方面的原因，老人仍然是村医们最主要的病人群体。早上、晚上都是老人们的就诊时间，而为了在某位熟悉的村医这里看病，他们更愿意延后自己的就诊时间。

我昨天下午就有点不舒服嘞，今天就这么早跑过来……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改变了国家对医疗体系和应急体系的认知和思考，村医们也对其深有体会。

以前？以前不重视的，后来不是非典嘛，非典就重视了，现在又有新冠。

而村医们作为基础卫生医疗体系的组成部分，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村医 A 和村医 C 在谈到两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都表示，

那一年从四月份一直到六月份，那些从外地的回来都要做检测。回来个把两个月，一直到六月几号，忙死了，天天要跑。

天天去人家家里查，测量体温，要做记录，还要报到村里，村里还要报到镇上，这东西也没人见识过，就像感冒一样，发热咳嗽。那个非典，也是不断的变异。

村医们需要承担基础的卫生防疫工作，但是医疗防护保障则无法保证到位。村医 D 表示，

就带个口罩，哪还有什么防护，你不去怎么办，只有你几个。

面临重大卫生公共事件时，村医作为医务的有经验者是必须完全投入的，无论当时是否处于退休状态。广大的农村区域仅凭县级、市级的管理和支援是不现实的，村医在这里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作为当地生长起来的村医，无法脱离的人际关系网络使得他们的职业被逐步赋予了终身的意义。

农村养老 在逐步迈入老龄化的当今社会，养老成为了全社会不得不面临严峻考验。与过往的医疗资源缺乏一样，农村的养老同样缺乏足够的资源。不愿离开土地的老年人的养老如何解决其生存、就医问题？时间改变，但方案未变，从前的赤脚医生构建起农村医疗体系，当下的农村医生承担乡村养老医疗问题的重担。

每一位（除了被完全退休的 A）村医的诊疗区域的桌子上都有着厚厚的几本资料，其他区域也散落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手册。村医 D 详细地叙述了这些资料和内容，

啊，就你得帮老年人量血压吗，几周测一次的，说要建档……老年人是免费的，国家补贴，就造福老年人的，但是苦了我们。你看，这么多资料要填，我就坐在这里填要填好几天。填完还没结束呢，你以为结束了啊？我们还得录入电脑，传到网上去，他还得审核，审核过了就好了，不过还得搞。还没完呢，还有呢。

对于资料的意义和作用，乡村医生们并不清楚，只知道是上面交下来的任务，得做。而在日常生活中，这一公共卫生服务为大众提供了基础的少数几项检测，对于慢性病的监测和防治而言，存在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就资料的后续使用而言，发挥实际效用的可能性还值得商榷。

而由于基层医疗人员的匮乏，某个地区的资料只能由一两个村医来完成，但是村医 B、C、D 都表明，资料的真实性无法确保。

你说我给不给他们做（提供量血压等医疗服务）？我给的啊！那又不是所有人都在，那我也没办

法追到人家家里去找人。那你说，老人都在，他来我就做啊，那怎么可能按照他（上级或医院）给的时间就交上去，人家又不是都能来，有的有事就不来了，人家自己找时间来。

那你看，还有的，还有的就不来，他就找他村里的，量一下没事就好了，干嘛跑到这里来，那你说我的资料怎么做？又不可以不做，其实我都不想做，给的那么少。

村医在农村养老医疗的提供中，仅能发挥辅助作用，村医不可能也无法解决老年人可能存在的重大疾病等，仅能提供慢性病的监测等功能。从根本上来说，农村养老的重担仍未有效的解决或者可能的解决思路，村医作为辅助功能为主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无法承担过度的医疗服务需求，这必然要求政府在农村养老方面探寻更多的可能的手段，而非仅仅停留在追求资料的完成。

四、管理混乱的卫生体系

在家行医 退休的乡村医生都在继续着自己的行医生涯，无论年纪多大。除村医 D、E 仍为在职村医，且严肃否认自己在家行医以外（但未证实），其他村医都退休在家里继续行医。同时村医 F 的儿子表示，

他（指父亲）现在还在，还在这个医务室里面，挂那边，然后到这边（家里）来就诊，明白吧？

而问及和规定是否冲突时，其儿子含混并且将话题带过，称不是一个系统（未证实）。村医 C 非常气愤地表示，

他（上级或规定）不让我们看的！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呢，还不是他们一句话的事，我们饿死也没事！怎么可能不看呢？那怎么活下去，孩子不养了，一家子不活了？再说我也没害人，这不是救人的事吗，再说生病的人也愿意来找我，他们跑那么远来找我我不看，你也说不过去啊！你说怎么可能？

村医 A 和村医 B 则相对平缓地表示了类似的内容，

我也要活下去的，就算你说你不做，结果乡里乡亲的，来找你，你不帮忙，传出去你怎么办？人家要怎么说你。

就调查情况而言，村医 C 的家庭诊室人员流动最为频繁，早上八九点的时间，求医问药的人挤满了小小的房间。而其他村医在访谈期间也陆续有病人来看医生。相比起两个村医 D、E 所处的卫生室而言，在家行医的几位村医的就诊环境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与卫生室清晰的地区划分（不一定使用）不同，在家行医的村医们都以家里的某个房间为主要诊疗地点，问诊、开药以及用药等都在一个地方，而家里有宠物的也未被禁止在此区域出入，家庭看诊确实存在着极大的卫生问题和安全隐患。

但这并不是单纯的禁止家庭行医这一条规定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规定颁布以来对乡村医疗问题的影响近似于无。村医的家庭行医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单纯颁布某些不合实际的规章制度是纯粹的懒政行为，家庭行医根源是村医的生计问题和居民的低价医疗资源的获得问题的合谋，无法有效地处理这两个问题，就无法真正处理好屡禁不止的家庭行医问题。

地区待遇差异 乡镇级别的政务公开至今为止都未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果，而作为收补贴的村医在这一过程中更是积累了很多怨气。由于村医的补贴来源于上级的发放，地区性的财政成为决定村医待遇的重要因素之一。

村医 C 表示，我们都只是拿钱，但是拿多少钱，从来没人跟我们说，我跟你讲，我有个亲戚在上面，我上次问他的，他说上面下来给村医多少、多少钱呢，结果最后下来只有那么一点点，在上面说好的，结果还不是他们愿意给我多少就给多少。

村医 D 补充道，当然不一样的，其他地方给的比我们这里多多了，我跟你讲，算下来我们这里都是这个省最低的那一部分了，当然你要说有没有比我们低的，我说实话肯定是有的，但我们得到的绝对不算多。

待遇问题还不仅限于此，村医 A 和村医 C 都指出，非典说好会给补贴的，我们千死干活那么久，累得要死，结果什么都没拿到，你去问，问他们就说没有，没有就是没有，问了好久都是没有，你就只能接受。

现在嘛，现在还稍微好一点，那个新冠说有补贴，那补贴就下来了，下来的很快，说到底还是他们贪，谁知道我们的钱被他们搞到哪里去了。

而村医 D 的情况相对而言更差，非典有补贴吗？我都没听说过！现在这个新冠肺炎倒是有的，但是拖拖拖，拖到现在也没发下来，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通过各个渠道了解到一些待遇信息的村医们认为自己的权益被侵占了，部分甚至采取了上访等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但本次的受访者都未参与过类似的行为，多是从同行那里获得的信息。

村医 C 指出，我没去，我不敢去，当初那个 XX 要我去的，说去把钱要回来，我没去，我说我再看看……要到了没？听说是没有，他们去了然后什么都没弄到就回来了，我一开始就知道不会那么容易的。

村医 D 表示，我知道，我都认识他们的，我们还有微信群，你看……但是要钱真的太难了，哪有那么容易？他们要是可以要到，其他人也会去的，所以他们很难要到的……这都是基层搞的鬼，跟党中央没有关系的。

较于同样为乡村服务的乡村教师，乡村医生的待遇等各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未退休的村医在医改的过程中，待遇上下波动，处于低值时甚至无法养家糊口。作为基层医疗的关键，他们付出的和获得的并不相称，所以主职外的各种挣钱行为也无法制止。除了居家行医，村医 D 还在村集体内兼任某个职位，用以补贴家用。

培训和考核 在不断规范管理的村医体系中，培训和考核在村医的职业生涯中占据重要地位。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到今天，培训一直是村医们日常无法回避的存在。为了规范和建立现代化的卫生医疗体系，政府积极组织乡村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出于考核目的获取的知识在农村医务人员的医疗实践中发挥的效用是不得而知的。Fang Xiaoping 指出，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助产士所学习的科学规范的助产程序在现实条件下往往不能够实现。而不断增加的培训和考核对于村医们的日常诊疗以及生存带来了麻烦。

村医 A 说，培训。还是一个半月，自理，生活自理。学习一次都要花上上千，书本费都几本给你，还要交钱。

村医 B 也委婉地表示了苦于培训的情绪：培训，培训很多的呢，你还得自己出钱，但不去又不行，培训一下走掉，人家来看病也没办法。

村医 D 和村医 F 的儿子则指出考核任务给村医带来的负担，现在要考的越来越多，你要去考出来这个证，不考人家就不给你行医，两三年得去考一个这个，三四年得考一个那个，我们旧时代出来的人，现在哪里考得过那些小年轻，但是不考又没办法，人家不给你处方权。

除了行医资格的考核，公共卫生服务的考核对于村医而言则更为紧迫和日常。他们所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需要提供服务、填写资料以及等待考核，而就村医 D 反应，考核的严格和刻板经常让他们的前期努力一扫而空。

他们考核你知道怎么考吧？就突然给你打个电话，问问村医给你提供那些服务了吧？我当然是会提供的，你看那些个量血压什么的，但是那些老人哪里懂，他们突然接到个电话，突然被问，有的老人就说没有，好了，那考核结束了，那个人资料就是不合格，他管你做不做，反正不合格就不给钱，我辛辛苦苦做，最后就只有一点钱，钱哪里去了？啊，都给上面医院拿走了！累活就我们干，反正挣钱是别想了。

双头被领导的村医务室，村医们承担着来自村集体和医院双方的压力和任务，但是产出的结果得不到足够的回报让村医们无法对自身的职业和上级达到较高的认同。

五、有出无进的基层医疗体系

我退休了？那关我什么事，没人就没人吧！大家都要生活的嘛。

这是无论在职与否的村医的共同回应，他们清楚地认知到村医这一职业没有未来，更不会出现后继者。

首先，就当下的工资标准而言，专职的村医生计无法得到保证。对于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中老年村医来说，村医的工资并不是他们的重要生存来源。他们有子女赡养，且不属于家庭的供养主力，对他们而言，村医作为一份职业是可以的，也是可能的。但是年轻一辈的医护人员成为村医就目前而言意味着，没有上升的渠道和可能，没有足够的薪资去供养他们的家庭，成为村医是职业道路的不能存在的选择。

村医 D 表示，我们一辈子就这样了，就这样了，你看年轻人怎么可能来，我们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就算他不当医生都不会来。

我们村医现在就是要被丢掉的。以前没有医生嘛，他要我们，现在大医院的医生有那么多，市里也有，人家有钱的也不用来我们这里看病，那现在我们就是累赘了，赶紧甩掉才是真的，哪有还给你管退休的，我们村医，而且没有编制……

政府在 2009 年的医疗卫生改革中，特别指出对乡村医生进行统一管理，但不采取编制聘用。这一措施使得村医们在现有待遇、福利及退休待遇等方面和乡、镇卫生院职工产生了差异。横向同乡村教师对比，乡村医生的待遇仍然是具有相当差距的。

形式上的新进者是存在的——委培生。村医 B 和村医 D 说，委培生，现在都是家里有关系才做委

培生的，家里有关系哪里需要到这里来，就算来了也只待个把月就走，没有人真的会被调过来的。现在就没有新人进来了，我们走了就没有医生了。

逐渐退休的老村医和无新人再进的农村基础医疗体系正在和中国的乡村一起陷落，且速度远远快于乡村陷落的速度。农村医疗尤其是老人医疗如何提供这一问题随着村医们逐渐退出舞台而显得越发严峻。

六、结论

作为政治化、制度化、廉价化的医疗资源，乡村医生在中国乡村医疗卫生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最广阔大地上的千万人民，在积贫积弱的年代，靠着赤脚医生获取最基础的诊疗和护理。在重新构建农村科学医疗体系、破除医疗封建迷信的过程中，赤脚医生扮演者最为革命的力量和角色。在农村基础广泛的慢性病防治的过程中，赤脚医生是护航者和中坚力量。凭借着不断积累的经验，赤脚医生们用实践填补理论的空缺，成为民众眼中的“全科医生”。

农村医疗体系是破碎的，是脆弱的。仅凭几个人支撑起来的村级医疗体系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居民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但是这一意义和作用并未为乡村医生群体本身带来政府层面的获得。城市和乡镇的发展缩短了农村居民外部医疗资源获得的时间和成本，这进一步加剧了村医作为群体在政府层面的负担，如何减轻这个负担是当下政府想要积极推动实施的。

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医疗资源和公共卫生服务资源短缺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上的解决，村医作为医疗卫生体系末梢的作用仍然积极的发挥着，无法根本解决资源短缺问题以及无法提出新的政策方案的当下，村医的重要性仍然是不能忽视的。这不仅要求政府加强对于基层医疗提供者的管理，更要求政府为基层医疗服务提供者安排合理的报酬机制以及退休机制，真正让做出贡献的村医们得到应有的回报。村医们都是长期工作在一线的有经验者，合理利用其建设农村基础医疗体系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一利用不能是盲目的、强制的，需要充分考虑村医群体的意见和诉求。

农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需要创新实施方案，负担交给极少数的几个人是不现实，也是不明智的。新方法和新资源的投入就目前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新的医疗资源和医疗体系的建立需要面对根本问题的挑战，从源头处理，才能为真正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1]许三春，2012，《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

[2]Xiaoping Fang, 2017, *Bamboo Steamers and Red Flags: Building Discipline and Collegiality among China's Traditional Rural Midwives in the 1950s*, *The China Quarterly*.

☆ 作者简介：汪函丹，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潘恩慧

数字乡村中的农村电商内生发展

——以浙江白牛村的电商发展为例

李琳

摘要：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电子商务是助力农村跨越数字鸿沟、开拓新的乡村产业以及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力的重要途径。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白牛村的电商内生发展过程中，不同类型的能人在农村电商的各个发展阶段中分别发挥引入数字思维、将产业扩大、争取政策支持等作用，同时外部刺激对于激发农村内生力也具有重要作用。而现阶段电商村所面临的各种发展难题还需要通过乡村内部突破来解决。

关键词：电商村 农村内生力 数字乡村 能人

引言

在 2019 年 5 月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总号：1662）指出“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进行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其中，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是建设数字乡村的题中之义，也是数字乡村建设的目标方向。同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农发〔2019〕1 号）也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要求“深入推进‘互联网+农业’，扩大农业物联网示范应用”。推动数字乡村建设，需全面掌握数字时代的新技术、新理念、新业态，促进现代数字技术与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的全面深度融合。数字乡村的具体建设工作离不开对于农业、农村、农民“智慧三农”打造，而其中，农业科技创新实现生产智能化；农村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实现城镇化；农民具有数字素养实现自我发展，这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最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所要求的。但想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如果只靠涉农政策扶持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提升农村数字化发展的内生动力，才能更有效且更加持久地提升农村发展动能。鉴于此，该调研报告通过展现一个电商村的发展过程，以及反思在该村电商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以为电商助推农村内生发展实现数字乡村目标提供案例参考。

一、浙江省数字乡村推行的政策基础

浙江省早在 2003 年，就相继出台了有关“数字浙江”建设的政策文件和制度设计，如《数字浙江建设的规划纲要》（2003）；《浙江省促进大数据发展实施计划》（2016）；《浙江省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2017）；《浙江省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方案（2018-2020 年）》《浙江省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行动计划（2018-2022 年）》《深化数字浙江建设实施方案》和《浙江省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总体方案》（2018）等来推动全

省的数字化发展^[1]，前期的数字化政策指导集中在政府社会治理层面，以城市为重心，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但这也为全省的城市及农村带来了数字化思维的种子以及为以后开展数字化发展的提供基础便利。

就近期关于数字乡村的规划来讲，在 2021 年 2 月 18 号，浙江省省委就推动全省数字化改革召开大会，省委书记袁家军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全面部署数字化改革工作，把 2021 年定为数字化改革的元年，提出要将数字化改革打造成重要窗口的重大标志性成果。全省数字化改革的重点是构建“152 工作体系”，“152”的“1”就是建设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5”就是五大应用系统：党政机关整体资质、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制 5 个综合应用；“2”就是理论体系和制度规范体系。6 月 24 号浙江省全省数字化改革推进会以后，全省数字化改革进入了以“152”体系的框架为基础，以多化场景为重要抓手，体系化规范化推进数字化改革的新阶段。由此可见，浙江省推行数字乡村建设的顶层政策谋划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而浙江省包括临安的数字化建设注重社会资源能力现代化能力的提升，这一关注点也是基于现在浙江省各乡村的数字化建设实践提出的。乡村创业创新焕发活力，宁波市象山半岛农业星创天地、杭州市临安区、嘉兴市桐乡崇福农创园等一批创业创新基地走向全国。而本次调研聚焦于作为数字乡村试点的杭州市临安区昌化镇，具体描绘该镇的乡村通过电商发展出一条能够持续激发本土产业兴旺的道路。本论文基于 2021 年 7 月对临安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的座谈以及对当地村干部、不同级别的电商户、对电商协会负责人、普通村民等 20 余人的访谈调研以及对照 2015 年的实地调研资料做历时性研究，将杭州市临安区昌化镇白牛村的电商发展过程厘清并试图总结白牛村自我探索电商下乡过程中的经验，以为其他地区乡村自发探索数字化建设提供路径参考。

杭州市临安区地处浙西北，全区的户籍人口是 54 万，辖 13 个镇、5 个街道、270 个行政村，36 个社区，区域面积是 3126.8 平方公里，东西狭长有 110 余公里，全区的公路的里程达到 2940 公里，是浙江省陆地面积最大且公路里程数最长的区。临安区从 1958 年至今经历过县、市、区的行政区划，在 17 年 9 月 15 号正式撤市建区，成为现在的杭州市临安区。临安区自 2019 年承担了国家数字乡村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区等一批改革试点工作，而临安的特产农产品主要有山核桃、天目雷笋、小香薯等，而临安的电商镇以及电商村也是基于此特色产业基础之上引入互联网而诞生。在这些特色产品之中，临安山核桃无论是销售量还是知名度都是作为最主要的电商产品，同时山核桃也是引电商入乡的“引擎”。

临安民间加工山核桃有数百年历史，人工栽培与加工技艺记载在 200 年前开始，最早的山核桃加工方法，只供自己使用，村民用石头砸、脚踩或是石臼椿的方法脱蒲，量少且果实不美观，然后使用盐水煮脱涩，煮好之后在烘干。经过百余年，传统山核桃加工方法延展出一套复杂而独特的工艺：白露时节山核桃采摘下来之后，用当地独有的木质山核桃砵脱蒲，然后用水清洗浮选，这一步也是延续到现在用来筛选不同品质山核桃最简单好用的方法，然后再暴晒 5 天，等到果肉干燥且有香味之后就可以开始蒸煮以脱涩，烧火的原料则是去年的空籽山核桃，煮 2 小时之后，山核桃外壳自然氧化变黑，变成“黑珍珠”，这便是最初的原味可食用山核桃干果。随后，因为桶煮山核桃颜色较浅，为了使山核

桃颜色更黑更好看，村民们将河里的石头与山核桃放在一起在铁锅中炒制，加入盐后调味，发明了椒盐新口味山核桃，之后为了增加山核桃口味，加入糖、奶味食品添加剂等创造出奶油味山核桃。这是在早些时候当地人就探索出的口味炒制方法，直到现在，临安的山核桃基本上也延续了这三种口味的山核桃炒货。煮后的山核桃还需要烘干，竹编的烘篮和火缸、木柴炭都是就地取材且最大限度保留当地炒货的风味、营养和外观。被誉为中国山核桃第一镇的临安市昌北岛石镇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所产出的山核桃属临安质量和产量最佳，但如果销售山核桃最多、最早的镇却是离岛石镇 40 公里之外的昌化镇，而在昌化镇之中要数白牛村算是最早通过电商打开本土山核桃销路，成为“淘宝村”的电商村。

二、白牛村电商发展历程

白牛村地处昌化镇西面，距昌化集镇 3 公里，距杭徽高速龙岗镇出口 5 公里，省道穿村而过，交通还算便利，是安徽宁国、昌西等地区物资流通的关键节点。2007 年行政村撤并，原白牛、高犁、沥溪三村合并成如今的白牛村。最早在 2007 年，白牛村就有人开始了电商的尝试，2012 年，白牛村已经成为全国首批 14 个“淘宝村”之一，获得了“中国淘宝村”的荣誉称号。在 2014 年成立了电商党支部，2015 年成立了白牛电商协会，帮助当地电商的正向发展。白牛村的电商以山核桃仁作为主打产品，2020 年全村电商共 69 户，电商全年销售额达到了 4.7 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为 128 万元，人均收入 39030 元，通过电商产业实现了生活富裕的目标。现在白牛村已经围绕电商形成“电商+旅游”“电商+文化”“电商+党建”等一系列产业。围绕着“电商+文旅”，在电商产业发展的同时，白牛村还对道路、绿化、住宅房屋、休闲场所等整体乡村面貌做了改造。白牛村基本可以算是在数字化推动乡村振兴的道路中的成功村落，并且白牛村的电商是该村村民自行引入并发展壮大，这一案例的梳理对于探索数字乡村的内生动力具有借鉴意义。

（一）能人带动传统乡村电商探索

在发展电商产业之前，白牛村村民和其他传统靠农业和外出打工的农村别无二致。白牛村 90% 都是山地，土地资源并不是非常丰富，可谓是一个无自然资源、无特色经济、无产业项目的“三无”村。白牛村本村种植山核桃非常少，主要是以售卖其他村的山核桃为主，以山核桃为特色的电商产业一开始其实也是在“经济不景气”之下萌发出来的。当地提到最先做淘宝的是一位名叫潘晓忠的退伍军人，实际上将电商“思维”带入白牛村的是他的小舅子汪平波。

电商以及互联网的市场敏感性需要对当地资源有科学认知的人才把握。当时汪平波在杭州市的大学毕业读外贸专业，而汪平波一家往返于村里与当时的临安市（2017 年改为临安区）售卖山核桃。那一年山核桃价格突然骤降而且销量不佳，为了把家里屯的五六百斤山核桃卖出去，汪平波向父亲提议可以在淘宝上开一家网店售卖山核桃，并且帮助父亲注册了“逸口香”临安山核桃店铺。一开始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先炒两三百斤放到网上卖，结果一举获得成功，在几周的时间里就卖掉了这“试水”的两三百斤山核桃。获得初步成功之后，汪平波一家进一步放开手去做网店销售，成立了第一个白牛村的临安山核桃电商品牌“逸口香”，并且在运行平稳之后将店铺交给父亲汪玉彪打理。通过网店“逸口香”，汪平波把囤积的所有山核桃从线下销售转到线上销售，并以高于当时线下的价格一个月就售出

几百斤。对比当时在白牛村线下销售的价低销量低的亏本买卖，汪平波一家通过这一尝试不仅将自己的囤货卖了出去还进一步收购其他山核桃商家的滞销炒货进行网上销售。

汪平波一家的电商销售在 2006 年底初步尝试就获得成功，而此时的潘晓忠在退伍之后留在绍兴自己开店铺卖炒货，2007 年过年回家团聚的时候，汪平波和潘晓忠的妻子邵洁一起商讨山核桃的销售并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当时潘晓忠一家在绍兴的小买卖做的也没有什么起色。在听闻这一“出路”之后，潘晓忠就让汪平波帮助自己申请好淘宝账号以及淘宝店铺“天玥山里福娃”。潘晓忠在刚开始接触电商的时候也是什么都不懂，关于计算机的一切也是从头学习，不会电脑打字、文化水平不高需要查字典、不会拍出吸引人的商品照片、店铺没有什么装扮、更不懂什么运营，虽然有汪平波帮助申请好店铺，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潘晓忠最开始的电商之路还是跌跌撞撞。最开始对于电商的担忧是不知道从网上销出的产品能不能收到钱，但是等到第一单山核桃通过互联网交易出去、收到钱款以及商品好评之后，潘晓忠才放下心来，准备把实体店关掉，专心回到白牛村做农村电商。

在潘晓忠最开始探索电商的时候，是在亲戚的帮助下免费申请好淘宝店铺，拍照、设计店铺都是最原始最基础的模式，尤其是在白牛村里，电商作为当时的新鲜事物，在具体运营店铺的时候，没有其他人有能力提供帮助，如何把店铺开下去只能依靠潘晓忠自己坚持。

那时候不和现在一样，说有 ps 可以美工，我们就买了一个自己的傻瓜相机，然后把图片一拍，然后截个图就上传了，就很真实的一个东西，那时候在视觉效果上没什么掩盖的东西，客服、包装、找快递都是自己做。

但在这个时期，市场发挥着巨大的推进作用。2007 年也是淘宝网快速发展的时期，淘宝平台的流量都是免费分给店铺，即使自己没有足够的投入购买广告和流量，官方流量也不时会提供给小的商户。从注册到运营，电商平台基本都是免费提供并且各种活动参与门槛较低，这就大大减少了当时电商户的投入费用。

很快，在 2007 年底，在白牛村的其他潘晓忠的亲朋好友听闻电商可以赚钱之后也都开起了“淘宝”，将线下销售转为线上销售。潘晓忠作为在村里最早开始尝试“淘宝”的电商户，在亲戚的询问之下也向他们教授开“淘宝店”的方法，“兴农山核桃”、“洪斌山核桃”等最早一批的电商户都是汪平波的伯父、表兄弟，而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是白牛电商村一股不可忽视的电商力量，并且都是电商在白牛村发展初期就开始学习开店的。除了亲戚之外，现在在白牛村最大的电商户“盛记”也是在 2008 年初学习潘晓忠的经验开起了电商。2007 年底，在白牛村掀起了“开淘宝店”的“潮流”，而在随后的几年里汪平波还接触了医疗外贸电商，并最终在 2010 年将“逸口香”品牌以及场房全部转卖给自己的表兄弟汪超一家，选择专心做利润更高的医疗外贸电商，也由此潘晓忠成为了坚持到现在的最早的电商户，是白牛村电商起始的“领路人”。白牛电商从发展伊始就是一人带动全家人一起参与山核桃电商产品的销售-客服-包装-发货的家庭作坊式电商模式，并且随后在熟人社会中以血缘关系、朋友关系最早作为纽带蔓延开来，形成了“一户带一户”的传播路径^[2]，电商在白牛乡村扎了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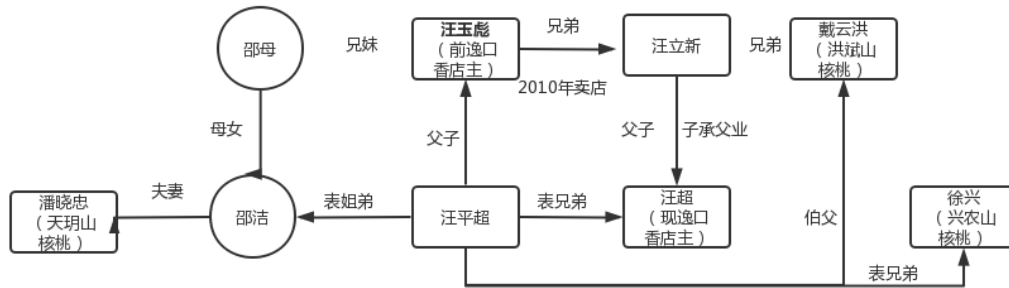


图1 白牛村发展初期电商思维传播路径及范围¹

当时潘晓忠的电商销售也只是单纯将线下产品转移到线上去销售：即当时的“天玥”以及“逸口香”都只是将生产加工好的成品放到网上去卖，他们自己并不加工山核桃等坚果。几年过后，线上炒货销量越来越大，潘晓忠等一众电商户开始购买厂房以及炒货加工器械。自此，购买原材料——炒制——包装——线上销售——快递——售后，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参与对象，“天玥”“盛记”“逸口香”等积累较强的电商逐渐构造起一整套的电商产业链，不仅是白牛村自身，很快白牛村的电商辐射带动周边农村电商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如物流、包装、印刷、生产加工等产业，形成了“白牛效应”。

在2006年——2013年，白牛电商初步发育的1.0形态中，电商户自己以及市场起来决定性作用，政府以及组织较少干预，可以说白牛电商是“野蛮生长”的阶段。早期电商平台比较少，基本上只有“淘宝”“赶集”等电商平台，由于销售的都是山核桃等炒货，商品的同质性强，在白牛电商村发展初期，电商户们为了抢占市场以及获得更多的流量难免有恶性竞争，压低价格甚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售卖只是为了冲销量，“赔本赚吆喝”是价格战中各家电商户都或多或少用过的方式。根据白牛村的电商户的回忆，在2009年开始，打价格战现象就开始出现，一直到2011年低价恶性竞争都还是困扰电商户的难题，明明知道这样对于自身是一种损耗，但对于刚开店的电商户来说价格低才能让自己的店铺迅速走进买家视野，有了第一次购买，以后再回头客，生意就好做了。在这种市场竞争中，自然是根据电商户的实力以及一些运气，有的电商户坚持做了下来，也有一些小的电商户被市场淘汰。

邱泽奇、黄诗曼通过对曹县的实证分析和模拟实验对电商经营模仿与创新的持续和深化提出了“熟人社会—线上市场—能人触发”模式，^[3]该模式中对于电商下乡初期以及后来的电商推陈出新具有较强解释力，可以看出，白牛村的电商发展路径也是符合前期“能人触发”以及后期创新推广过程中“熟人社会”发挥知识传递作用。电商初入白牛村的路径基本符合能人模式，但对于能人类型其实还可以更加明确。不同于村干部能人因为上级政府规划而引入新产业，白牛村的能人是基于其对于本地

¹ 注：箭头表示电商思维传播方向及店铺转向

文化以及科学知识的掌握精准的将新产业引入传统农村。

相较于其他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较为封闭的农村，白牛村人自古就有经商的文化传统。临安市白牛村北边就是一条河（昌化溪），白牛村在历史时期就一直作为码头，并且白牛村作为重要交通节点，一直交通便利。并且正如上文所介绍，白牛村虽然是在农村，但农业资源并不丰富，白牛村民也并不都是十足的农民，最初开拓尝试电商的人都是原本就从商的农民，他们在接触电商之前就一直进行线下销售，本来经商使得他们的思想观念会比传统种地农民接受新鲜商业模式更加容易，运用互联网拓展销售也能够被解释为他们顺应商业发展趋势的行为选择。但相较于城市的生活条件，农村在基础设施以及对于商业的敏感性还是有一定弱势，吸引数字人才、留住高素质人才，白牛村依旧存在着这一难题。

（二）组织创新以求突破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他认为“我们所指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尽管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能够导致经济生活的变化，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经济变化；还有另一种经济变化，它是不能用从外部加于数据的影响来说明的，它是从体系内部发生的。而创新发展经济体系中的价值创造是对现有生产要素不断进行重新组合的过程，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市场；(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的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一种新的组织。白牛村在确定了主销产品且产地稳定、主要的生产方式在一定时期里不会改变，网络所提供的线上市场在一定阶段内足够销售，在白牛村发展 2.0 阶段要想做出创新发展无疑是要在组织创新上做出突破。

为了对山核桃为主的产品价格进行规范以避免电商之间的恶性竞争以及对电商户的规范和升级改造，白牛村在 2014 年筹划，2015 年正式成立白牛电商协会。由协会专职负责为电商户提供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服务指导，包括摄影、店铺装修、客服培训、快递议价等专业配套服务。协会成立之初就将全部电商户纳入协会，并且建立微信群随时沟通联系。除此之外，电商协会对于抑制恶性竞争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由于电商协会的负责人也多年从事电商，所以对于每一年山核桃的价格以及成本比较清楚。每年农历八月白露之时就是山核桃“开杆”之日（即采摘山核桃），所以白牛电商每年的旺季是从 9 月一直到次年 4 月，每一年电商协会都会制定当年山核桃的最低价格，原则上各家电商户不得低于最低价格进行网络销售。对于各家电商户的山核桃售价，因为都可以从网上看到，所以协会负责人也会时常监督。虽然协会不能完全杜绝恶性竞争的问题，还是会有一些电商户低价销售，但对于大多数电商户来说，协会具有一定的约束效果。协会不会限制山核桃的售卖高价，但是对于山核桃的质量把控是近几年来白牛村政府一直最关注的问题。相对于 2015 年之前求量的 2.0 电商发展模式，现在白牛村电商进入求质求品牌的 3.0 时代。对于价格的控制也与保证品质这一目标相关，行会已经制定好山核桃的质量和价格，如果低于制定价格很多，那么就意味着品质会有所折扣，“以陈充新”“以次充好”，在品质管控之下，低价往往与此相关。为此，村干部加强对于打造白牛品牌的村内宣传，经常开会苦口婆心，让电商户意识到白牛村品牌树立起来实属不易，质量上面一定不能有点差错。“谁砸掉这

个牌子，谁就是千古罪人”这也是书记经常嘱托电商户的话语。

行会组织想要发挥作用如果只靠行会新制定的规范条例是远远没有约束力的，在作为“熟人社会”的农村发展出的电商协会还是要在在乡约规则的指导下，通过乡土社会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共同体，来指导人与人之间获得生产、生活和交往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只单纯违反行会规定，可能也就是罚款或者退出的惩罚，而若是违反乡约的越轨行为，将受到共同体成员的舆论谴责而不仅仅是经济惩罚，更有沦为孤立的个体的风险。乡约是乡土社会稳定的润滑剂，是维系乡土秩序的软约束，也是行会有可能发挥作用的深层原因，通过满足乡民的利益需求，以行会规范所修改的新乡约内化到乡民的思想意识深处，形成在“熟人社会”中的理性约束。

除了成立电商协会，在2015年几家做的比较大的电商户：天玥、洪斌山核桃、兴农山核桃等最开始也是当地规模较大的电商户为了降低成本，增强整体实力成立了“奔跑公司”。成立奔跑公司的电商户走的是淘宝C店的路线，成立奔跑公司之后，各家电商户依旧存在并且在销售时依然销售自己的品牌，公司只是把线下的货源、供应链整合了，并且以几家电商户的快递总量谈判快递费用以期降低物流成本。奔跑公司在最伊始起到了降低成本、提高品牌知名度甚至是产业垄断的效果。公司成立之初，几家电商户是根据当年的销售额比例入股，但是在奔跑公司运营一年之后，各家的实力会有所涨跌，但年底分红还是根据年初的占股比例划分，导致分红不公的问题。因为利润分配的原因，奔跑公司在运营两年之后的2017年就结束了。虽然奔跑公司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仍然是白牛电商大户为了当地电商能够进一步发展所作出的尝试。

组织创新失败的原因表面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导致的，但实际上，组织的解体恰恰是为了维护更加重要的乡土关系，由上可知，该组织的主要参与者除了都是具有一定实力的电商户，更是平日关系良好的亲戚。在一两年的尝试中，因为利益分配不均所产生的关系裂痕不利于长期的社会关系维护，更不利于全村范围内电商产业的扩展。“不要因为买卖而伤了和气”这可能是亲属关系复杂的电商村避免过度恶性竞争的一个内心准则。

（三）主动寻求政策关注支持

农村是否能够并且适合发展电商这种商业模式，在电商发展之初谁都不能给一个定论，只有当地人自己尝试了、坚持下去才知道发展电商是否是农村发展的一条新出路。在2010年时，白牛电商就已经发展的小有规模并且村里能够坚持做电商的农户都能够通过电商这一方式赚到钱。村政府也是在2010年左右意识到“开淘宝店”并不是几家商户的“小打小闹”而是可以带动全村致富的产业。

临安市经历过县、市、区的行政区划，直到2017年9月才撤市划区。原来作为杭州市人大代表的现任白牛村金书记是土生土长的白牛村人，也因为此，他能够了解白牛村村电商发展的实际状况，知道村民们自行发展的很有冲劲，但也知道只靠村民自己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是不够的。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就与当时临安市的领导商讨要关注白牛电商发展的问题，但是当时对于农村发展的传统思路依旧是“工业反哺农业、以工促农”，并且当地电商户因为害怕后续需要交税，对于自己的电商数据有所隐瞒，所以当时临安市的领导并不认可做电商也可以带动农村的发展，没有认识到白牛发展出的这一电

商特色产业的重要性。但白牛书记没有放弃帮助白牛电商被政府部门了解，经过市领导更替，以及不断地劝说，在 2013 年 9 月左右，正是在白牛山核桃电商最火热的时候，当时的临安市领导到白牛调研，亲身实地的看到白牛电商已经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调研回去之后就立马召集全市的镇长书记、纪委领导以及农办主任开会，要关心白牛电商发展，要给政策以及补助支持白牛村的电商发展，自此支持农村电商发展的政策才一步步出台落实。

围绕“品牌、标准、聚集、融合”的方向目标开展推动电商工作。免息贷款，提高信用额度，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搭建银行与白牛村电商产业合作的有效渠道和平台，改善后发和基础薄弱电商户的融资环境；场地资金补贴，凡是白牛村的电商户去其他省市参加展销会，参加展销的费用全部可以补贴；人才方面，对具有高素质从事农业的“新农人”群体给予返乡补贴，开展一系列例如“天目 E 创客”的农村电商人才培养工程。除了政府支持，现在临安区包括白牛村的村民在具体实践中对新信息的接收主要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引进来”——大学生学习了相关商业知识能够在当地农村学以致用，帮助自己家人试水尝试新鲜模式的电商销售或者农产品种植技术，另一方面是“走出去”——主动参加商业展销会，在大城市里开线下店铺感知商业发展的趋势。

电商不仅带动白牛村的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白牛乡村治理方式的创新以及治理能力的提升。2012 年，白牛村就成立了电商党支部，在 2014 年白牛村提出 1+1+x “电商+党建”模式，“1+1+x”即是指“一位支部委员+一位电商大户+若干普通电商户”。当地村干部们关心白牛电商的发展，为了对电商户进行有效管理和引导，成立 5 个支部委员分管 5 个团队，根据区块距离以及关系划分，一个支部委员带动一个电商大户再带若干名普通的电商户，通过大户引导小户怎么做运行、广告、店面装修、拍照片，而支部委员是电商大户和政府之间的桥梁，负责和电商户沟通所需要的支持，以及对于政策的实施所作出的反馈能够及时向上传达，在电商淡季负责对电商户进行规范检查，对农产品的品质进行监督。

白牛村电商的内生性表现一个最大的体现就是当地村民先是自发克服困难发展电商产业而随后政策、基础设施根据所遇到的问题在由村内具有政治权利的村干部向上反映争取资源以及空间。村干部积极主动向上反映当前阶段发展的阻碍以及争取上级政府部门的关注以求得“知名度”带来的更多便利。

（四）应对疫情直播兴起

2020 年疫情对于各行各业的发展都是一个挑战，但白牛的主要产业是电商，相对于其他实体产业所受到关店的冲击，电商产业主要体现在销路受阻以及快递的流通性不畅上，并且在这样疫情所带来的风险之下，消费者也会采取更加保守的消费行为。并在此情况下，为了推广山核桃，直播电商崛起，微商发挥更大的作用，给白牛电商新发展模式带来了契机。现在传统电商纷纷向直播电商转型，并且白牛直播电商也是通过当地电商户自己尝试拓展出的道路。

最早在进行直播电商销售的是当地的林之源品牌，林之源的老板是一对青年夫妇，现在主要的电商平台是天猫，主打产品质量以及品牌。林之源的方老板在 2019 年就有做直播的想法，也是因为疫情之后拓展销路才正式开始直播。电商直播主要是在抖音平台上，方老板在之前就有关注过抖音直播，

所以也学着其他直播在平台自己开了账号，一开始只是每天晚上播两三个小时适应直播，然后逐渐延长直播时间。现在林之源的电商客单白天主要是源于传统电商平台，晚上和其他直播带货时间一致，基本每晚 8 点开始女老板亲自直播，有时会直播到凌晨 1 点左右，平时还会拍一些小视频放到直播平台上。林之源在此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直播，主播也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直播带货完全是通过多看其他人直播学来的。主要出于对于直播成本的控制，直播一般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而且直播内容主要是回答弹幕问题，对于推销商品以及直播号的运营现在基本上还是初始阶段。经过一年多对于直播带货的坚持，林之源的直播号现在有 8 万关注，也是当地山核桃电商直播模式的模范。现在各个电商户都想要尝试直播带货，但是没有直播人才。电商户苦于自己不会直播，想要聘请主播，不仅价格高还难以聘用，村里会直播的年轻人许多都有自己的直播账号，不愿意售卖山核桃，村外的主播又不愿意到村里直播、生活，所以现在当地的直播难以大范围开展。

针对这一问题，政府部门已经作出反应，现在联合淘宝村播学院，建立“淘宝村播基地”，想要培育和服务“草根”网红。2020 年 10 月，由政府部门的下属单位负责的电商大楼在白牛村交付。一方面，电商大楼主要起到宣传介绍白牛电商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起到提供直播场地的作用。

三、白牛电商发展路径梳理

在内生性脱贫路径的研究中，可以把内生的路径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坚持内外部结合的路径；二是以内部导向为主的路径。而在这两种路径中，以白牛村为例的这一类农村电商更符合出内外部结合的路径。

对当地资源有清晰认识的能人是推动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内源性动力，但在全过程中，具有不同资源的能人所发挥的时序以及功能有所不同但相互联系：先是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能人结合自己所学科学知识以及根据对本土实际情况的认识将新的观念、思维、方法论引入农村，通过社会关系的联系，随后由经济资本更加的充足的能人来将观念落实实践，并以亲戚网络和邻居网络推广形成由点及面的更大范围的产业群，发展稳定小有规模之后，当地村干部能人更加有责任以及“底气”去向更上一级的政府部门争取更多的政策便利以及口碑资源，而其中所争取到的人才吸引政策能够将更多的具有各类人力资本的能人吸引进入乡村以不断有“新鲜血液”注入当地的产业发展，由此形成推动当地产业不断向前发展，这便是乡村数字化内生发展的内源性动力。

李源等（2004）通过比较浙江和广东的典型案得出，内源性发展会为区域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外源发展需通过培育内源性动力而发挥作用。内源性并不意味封闭式发展，也需与外部进行要素交换和信息交流。而白牛村案例中所体现出的外源性动力，主要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

第一，服务型政府给予当地较为自由的市场空间。白牛村所在的地区本身就具有商业素养，当地村干部以及镇政府对于商业行为的管控较为宽松，尊重市场原则，这一点即使是在现在也一样适用，对于现在可以提供政策补贴的新电商户，政府部门不会一开始就对其进行管理引导或者是给予直接物质帮助，而是给电商户一定的自由度让他自己先去探索，这就保留了当地人的内生发展的活力，不会因为政策扶持就形成“等、靠、要”思想。并且，由电商户到村干部再到上级镇政府，关于数字化

发展的实践、经验、问题沟通都较为畅通，比如对于电商大楼的费用问题，当地村民不愿意一开始就付费，那么村干部听到这样的反馈之后就会和管理电商大楼的部门去协调费用问题，并且最终结果也是在电商大楼的前几年不会收取场地费用，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满足当地村民的诉求。

第二，作为试点以及宣传带动品牌效应。自白牛村 2015 年成为首批挂牌“淘宝村”之后，在几年内许多具有一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的商界、政界、学界领导都来过白牛村调研参观，这无疑又进一步提升了白牛村的知名度，相关的临安山核桃也在这样的带动之下更容易被消费者所听闻。“临安山核桃”逐渐具有品牌力量，成为山核桃产业的金字招牌。

第三，有更多机会接纳外部知识及资源。浙江省自 2003 年就开始着手数字化发展的探索，这近 20 年所打下的基础以及数字化思维是该地所独有的优势。而杭州市临安区所在的华东地区是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且与上海等地距离较近，受辐射作用，当地人也具有更多的机会走出乡村去各类展会、国际国内活动学习新的知识、技巧。除了在网上学习新的电商形式，展会之类提供一个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可以拓宽当地电商的分销渠道。白牛村作为电商村其电商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不仅是传统电商平台、微商、微店也占据一定比例，相较于传统电商由平台提供的广泛线上市场，微商更加注重社会资本所连接起来的网络，每一次展会活动都能让更多全国的电商户连接起来，微商之间可以互卖产品，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拓宽电商产品的种类。

服务型政府给予更自由的市场空间、宣传打开知名度、展会之类的机会从村外引入更多的资源和技术这三点共同形成对于白牛电商村内生发展的外部刺激。

四、电商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白牛村电商所发展出的山核桃特色产业，当地的电商当季产品时序是 9 月到次年 3-4 月是全村无论大小各规模山核桃网上店铺都售卖，但其他淡季月份（5 月到 8 月），只有存货量大的品牌或者店铺继续售卖山核桃，而其他较小的店铺往往是停业，大部分小电商户在这段时间选择休息养精蓄锐；而山核桃的淡季恰好是当地小香薯的成熟时间，所以还有一部分小电商户在这一段时间售卖小香薯，以作为补充使得全年都在盈利状态。但相较于衣物、小商品等电商，农产品电商普遍存在产业链短且单一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创新的问题，在数字创新发展经济体系中，数据作为新的要素丰富了原有的生产要素体系、形成了更多生产要素的组合，是一种新的价值创造方式。康瑾，陈凯华在数字化背景下拓展了熊彼特的创新发展经济理论，指出数字创新发展经济体系通过投入创新数字化、产品创新数字化、工艺创新数字化、市场创新数字化、组织创新数字化等五类渠道实现价值增值。^[4]但现实情况是，数字化机器好引入，但是再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山核桃或者是小香薯在产品创新数字化、工艺创新数字化两个方面都难以突破。现在包括整个临安的的山核桃在产品本身上所做的创新也只局限于外包装和颗粒形态，而加工工艺由上文所提到的都已经是百年传下来的方法，既方便又成本低，所以即使有新的数字化机器引入，如果价格较高，替代作用也不会很明显。而产品上的难创新在面对广泛的线上市场只是难免会显得力不从心，当地品牌的产品特色也会被其他更具知名度的电商企业的类似产品所掩盖，这样的情况不利于本地乡土电商的壮大。

其次，电商村仍然存在少部分人受益垄断市场的问题。一方面，不是所有地区都能够找到独属于本地区的特色产业，某地对于某一类型产品在市面上的垄断以导致其他后发展地区难以找到特色产业或者是对其他地方的该产业形成挤压；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同村也存在着同质化产品竞争的问题，先发展的或者资本积累比较雄厚的大电商户无论是否合作都因为抢先占领市场而使得后进入的或资本力量比较小的电商户难以存活。在白牛村的调研过程中，现在发展较好并且能够做下去的电商户都是在当地最早一批做电商的人，被问及后来才开始的电商户有没有可能发展超过之前发展的电商户实现弯道超车，无论是电商户还是村干部都认为不可能，这也反映了白牛村后期发展的动力一定程度上会受到阻碍。

第三，对以现在已经开始做电商或者已经发展成为电商村的农村来说，第一级数字鸿沟的困境并不是最大的阻碍，但是数字信息的及时获取以及针对网店的升级、运营以及数字社会新发展内容能够做出跟进这一信息使用的第二道数字鸿沟，对于电商村以及想要发展农村电商的农民来说依旧是最大的挑战。这也与农村的数字人才引进以及当地乡贤或带头人的努力相关，也就是说怎么源源不断的吸引新的具有文化资本的能人加入乡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四，在农业农村数字化过程中，数据互联互通能力弱，跨部门、跨系统间的数据打架、数据不兼容现象时有发生，信息采集渠道单一，数据协同能力差。电商户为了防止以后电商交税或者需要补税，难以向当地政府汇报准确数据，在电商发展初期可能存在向上虚报的问题，而发展良好的电商存在数据向下虚报的问题。平台数据和政府数据存在一定差距也不利于对于当时电商发展实况进行有效判断。

五、结论

建设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在数字化时代下激发农村产业振兴的进一步规划，而数字鸿沟是当前阻碍乡村振兴战略落实与数字中国战略实施的关键因素，也是激发农村数字发展内生力首先需要跨越的障碍。在涉农规划中通过前期扶贫工作经历的“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再到两者结合共同实现精准扶贫目标的实践中，探索出能人带动、电商产业助力扶贫等模式对于数字乡村内生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以杭州市临安区白牛村的电商从无到有再到兴旺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当地村民、村干部由自身实际出发结合当地特色产业争取资源基本实现全村的产业兴旺以及村民富裕。而白牛村的数字化内生发展是内源性动力结合外源性动力共同催生的，各类能人能够在不同发展阶段起到相应的作用，并且不断争取外部资源支持内源发展。但电商的不同发展阶段都会面临不同的发展阻碍，现在白牛村所面临人才限制、场地不足、产业链难以延长、各方面数字化资源难以互联互通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参考文献：

[1]刘俊祥、曾森，2020，《中国乡村数字治理的智理属性、顶层设计与探索实践》，《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2]邵占鹏, 2017,《规则与资本的逻辑:淘宝村中农民网店的型塑机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3]邱泽奇、黄诗曼, 2021,《熟人社会、外部市场和乡村电商创业的模仿与创新》,《社会学研究》第4期。

[4]康瑾、陈凯华, 2021,《数字创新发展经济体系:框架、演化与增值效应》,《科研管理》第4期。

☆ 作者简介: 李琳, 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刘纪矜

※ ※

社会学专业博士钱志远与硕士李鸿香分别荣获 2021 年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近日, 江苏省教育厅与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发布了《2021 年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的通知》, 河海社会学专业博士钱志远(指导教师: 孙其昂教授)的《业主行动与社区秩序生产——以一个商品房社区为例》荣获“2021 年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社会学专业硕士李鸿香(指导教师: 陈涛教授)的《从草根探索到政府嵌入: 基于一个“淘宝村”生命史的研究》荣获“2021 年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评选工作旨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促进研究生科研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强化学位论文的正确导向, 努力推动全省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此次论文评选本着公开、公正、优中选优、宁缺毋滥的原则, 层层遴选, 择优推荐, 经过培养单位初评推荐、研究生教指委复评、综合评议、专家委员会审定和公示等环节, 最终确定了 2021 年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 共评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00 篇、优秀学术学位硕士学位论文 150 篇、优秀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 150 篇。

一直以来, 河海社会学学科高度重视研究生培养, 鼓励研究生的学术创新精神, 在充分理解国内外社会学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选择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追求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努力培养既精通理论又能充分理解中国现实的优秀人才。钱志远与李鸿香两位同学的获奖是社会学研究生培养工作之专业与用心的集中体现。我们将再接再厉, 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 以开放的心态积极促进师生与各界优秀人士的学术交流; 在注重研究生培养过程的规范性、实效性的同时, 精益求精, 进一步提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期待未来有更多同学取得优秀学术成果!

红旗渠的述说者

——修渠老人群体修渠经历调查报告

赵聆茹

摘要：红旗渠精神激励无数成员朝着社会良性运行发展的方向迈进。作为红旗渠精神的物质本体——红旗渠，其修建过程凝聚着数以万计林县人的汗水与血水。红旗渠的直接诉说者——修渠老人，目前存世之人已为数不多。本次调查立足于通过访谈七位修渠老人，了解他们在修渠时的所闻、所历与所想，以最直接的方式来尽可能重现修渠时的情况。调查发现：第一，修渠老人对红旗渠的评价呈褒贬不一的态度；第二，对当时修渠妇女的工作态度、能力高度认同，即充分肯定妇女在修红旗渠做出的贡献；第三，由修建红旗渠时衍生出的红旗渠精神并非完全自发形成，而是离不开当时任务规训与意义感锻造等行动机制发挥的推动功能。

关键词：修渠老人 红旗渠精神 红旗渠

一、导言

（一）研究背景

1. 研究背景

我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农业大国，作为农业的命脉——水利，国家历来对水利事业的发展极为重视。从秦始皇驻兵五岭到汉武帝募民徙塞，至曹操实行屯田制，历朝历代都有与水利相关的政策。建国后，国家领导人和水利部也不断加强水利事业的建设与管理。1958年在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下，一场以增强蓄洪和灌溉能力为目标的浩大水利工程——治淮工程正式启动，在之后的近三十年以来，直至70年代末，新中国的水利建设预定目标基本实现。在此前提下，水利部也不断加强、加快水利事业发展步伐。2021年12月17日，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国英主持召开部务会议，会议强调，“十四五”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全面强化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水利事业之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红旗渠作为我国六、七十年代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如今素有“人工天河”、“中国的水长城”等美誉。20世纪60年代初，三万七千名的河南林县（今林州）人用一锤、一钎、一双手削平1250座山头、架设155座渡槽、凿通隧道180个，修建提灌站45座、砌土石方1700多万立方米，建成了享誉全球的“世界第八大奇迹——红旗渠”。1969年7月，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的面完成标志着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正式竣工。红旗渠的建成，成为当时外国友人理解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一个重要宣传窗口。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同国际友人介绍：“中国有两大奇迹，一是南京长江大桥，

一个是林县红旗渠。”1974年，我国派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为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在联合国放映的第一部影片便是《红旗渠》（该片为纪录片）。1996年6月1日，江泽民同志到红旗渠视察时，亲笔题词：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省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红旗渠已由昔日的生命之渠逐步演化为现今的精神之渠。

2. 调研目的

在调研前期与中期，自己的调研目的着重体现在通过口述史的方式，借助修渠老人回忆修渠时的艰难环境与困苦生活等方面，最终以文字方式来对红旗渠及有红旗渠衍生的红旗渠精神进行宣传。

调研后期，随着对修渠老人的深入了解与多次的锻炼，老人所讲述的内容以及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不仅仅包括本次调研前期所要寻找的方面。在部分修渠老人的讲述中，因为年少时，将自己的青春挥洒在了红旗渠的渠畔上，他们也提到了自己的现实需求。因此，在本此调研目的增设出了第二个：如何看待这些修渠老人的现实需求？

（二）研究方法

1. 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研究者在带有特定的研究前提下，借助观察者自身的感官或是使用一些研究工具来直接观察研究对象。在本次的研究中，被研究者实则包括两方面：一是在研究前期所选取的红旗渠景区部分。通过对红旗渠景区进行实地观察，笔者采用攀登一线天、沿着渠畔前行等方式，使得自身的感官切实体会当初修建红旗渠时的环境的恶劣与工程的险峻，感受当时建渠时的艰难。二是笔者在访谈过程中，通过观察受访人员的语气语速、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对其进行解读与分析。

2. 文献搜集法

本报告通过系统的搜集红旗渠与林县的文献资料、档案史料、会议记录及地方志等内容，特别是有关红旗渠的统计材料、与红旗渠有关的新闻报道等，以地方志及红旗渠志为基本资料之一，包括目前搜集到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出版的两版《林县志》，最终结合访谈音频、视频等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进一步勾勒报告框架、完善报告内容。

3. 访谈法

访谈法是研究者在带有一定目的的前提下，采用与受访者口头对话或交流的方式来收集资料。由于对红旗渠的研究多体现在精神方面，而对红旗渠精神的研究又多处于理论层面，应然性总结多，无法真实体现当时修建红旗渠时的艰难。为更深入、细致的了解修建红旗渠时的阻碍及红旗渠的价值，本次调查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基本访谈内容包括以几方面：一是修渠老人的现今基本情况；二是曾在红旗渠上的工作；三是对红旗渠及其精神的看法。

二、调查地点与调查人员基本情况

(一) 田野素描：红旗渠基本情况

红旗渠作为一条人工渠，在山西省内的平顺县石城镇侯壁断下设坝截流，将漳河水引入当时的河南林县。因此，起初该工程以引漳入林命名，1960年3月6日到7日，林县引漳入林委员会在盘阳村召开全体会议，会上把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命名为“红旗渠”，意指高举红旗前进。红旗渠于1960年2月11日正式开工，1965年4月5日实现总干渠通水，至1969年7月8日正式竣工，历时近十年。红旗渠包括总干渠、干渠、支渠和斗渠。总干渠全长70.6千米（山西省石城镇——河南省任村镇），从分水岭分为三条干渠，第一干渠向西南，经姚村镇、城郊乡到合涧镇与英雄渠汇合；第二干渠渠向东南，途径姚村镇、河顺镇和横水镇马店村，第三干渠渠向东，直至东岗乡东芦寨村。渠灌区共有干渠、分干渠10条，总长304.1公里；支渠51条，总长524.1公里；斗渠290条，总长697.3公里。如图1所示。

红旗渠工程总投工5611万个。总投资12504万元，其中国家投资4625万元，占37%，社队投资7878万元，占63%。渠渠修建10年当中，三万七千名林州人民，以公社为单位（后期搜集具体资料），切实投入修渠队伍中，先后有81位干部和群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其中年龄最大的63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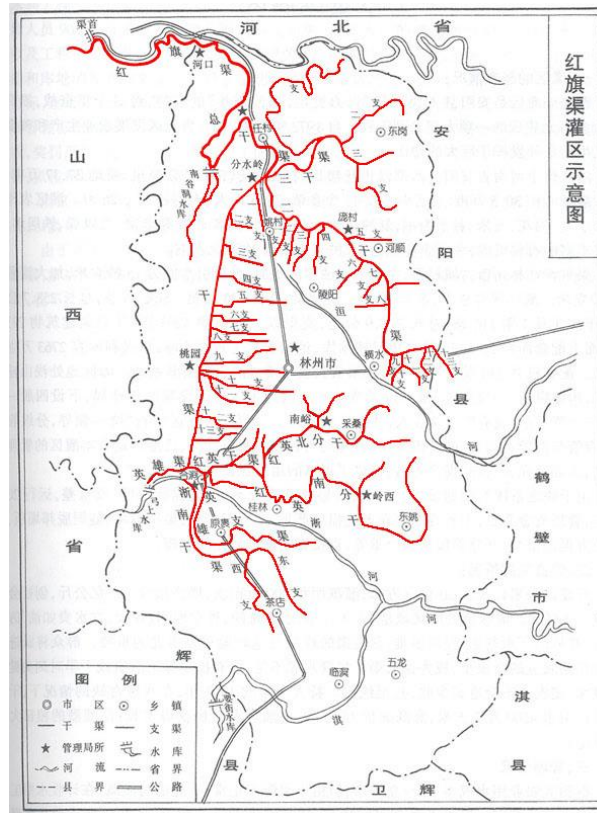


图1 红旗渠工程图

（二）被访概况：群体选择与基本情况

在进行调查前，笔者在好友的帮助下联系到林州市当前负责搜集修建红旗渠老人信息的工作人员，在该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选定了七位修渠老人。这七位老人皆是参与过修建红旗渠总干渠，其中特等劳动模范 2 人，甲等劳动模范 1 人，3 位普通民工。被访人员基本信息见表 1。

表 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编号	姓名	荣誉	性别	年龄	工作内容	修渠后工作经历
1	GSJ	无	男	95	担石灰、抬石头等	教学、写书
2	RYC	特等劳模	男	93	除险等	宣传红旗渠、做农活
3	TYC	甲等劳模	男	88	宣传股股长，负责宣传等	四所所长
4	WCW	无	男	85	安全保卫员，负责安全保卫等	写书
5	DDY	无	男	83	除险、碎石打基等	写书、医生
6	YBJ	无	女	84	割草、打钎等	公社做活等杂活
7	ZMJ	特等劳模	男	73	点炮、背水等	小学体育老师、红旗渠干部学院宣讲团成员
8	LJS	无	男	52	无	联络修渠老人

三、红旗渠建渠源起及发展

祖祖辈辈缺水盼水，红旗渠引来了漳河水。
水库蓄住了山谷水，红旗渠灌满了库池水。
浇地渠库池齐放水，一渠水可顶两渠水。
平整土地合理浇水，大家都来节约用水。
关键保好渠管好水，林县就不再愁缺水。

——杨贵 《赠言十水》

（一）建渠想法何以萌生

1. 建渠缘由：死亡与逃离的交织

因为缺水，那时候的林县是一个死亡与逃离交织的城市。1920 年大年三十的黄昏，太阳就在刚刚还悬挂天边，转眼间天色就变暗了。林县山村的茂林家新媳妇望见自家茅屋亮起来的油灯，担水的步

伐不自觉的快来起来。突然，被一块凸石绊倒，辛辛苦苦从远在十几里外的黄崖泉挑回的一旦水，瞬间消失的无影踪。尽管家里人并未对这个新媳妇埋怨什么。等吃饭的时候，家里人在新房的梁下找到一具尚存余温的尸体。正月初一，这家的一家之主带着全家一起踏上了逃荒路。新媳妇以死来同那消失的一旦水对话，用失去生命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水的流走，带走了一条鲜活的生命，也赶走了世居在这里的桑林茂一家。

因为缺水，林县的姑娘嫁人，不图对方的钱与地，就图他家有水洗脸。

因为缺水，林县人惜水如金。那时候的林县人，一辈子只洗三次脸：出生、结婚、去世各洗一次。洗过的水还要重复利用，你洗完之后他（指家里人）洗，一盆水一直洗到黑乎乎的不敢洗。尽管如此，林县人还舍不得倒掉这盆脏水，他们就用这盆脏水来和煤，充分实现水的价值。

据 1995 年版的《红旗渠志》记载，在红旗渠修建之前，全县的 550 个行政村中，就有五分之三个村人、畜吃水困难。其中跑 2.5—5 公里取水吃的有 181 个村，跑 5—10 公里的有 114 个村，跑 10—20 公里取水吃的有 2 个村。林县每年因远道担水误工达 480 万个，占农业总投工的 30% 多。

面对十年九旱的林县，26 岁的杨贵接到了党中央的命令，开始带领林县人民踏上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寻水之路。

2. 建渠困难：已知与未知的交错

(1) 粮食短缺。红旗渠始于 1960 年，此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短缺问题十分严重。林县当时粮食严重不足，“偷偷”动用了 4500 万公斤的储备粮。修渠时，渠上的粮食采用定额分配的方式，每人一顿二两粮，但这也无法满足修渠工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修红旗渠时期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没什么吃，就吃草、吃树皮、吃野菜等，给的补助粮一天才吃七八两。（GSJ）

当时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缺少粮食，有过百日休整。在百日休整的时候很多人都饿得出现了浮肿。（WCW）

粮食不够吃，挖野菜、摘树叶充饥，一天六两粮食不够吃。（DDY）

修渠当时可艰苦了，粮食不够吃，人干的活儿多吃的是稀汤寡水，还要定量分配，如果吃的慢的话就没有饭吃了。（YBJ）

(2) 资金不足。引漳入林预计需动土 1700 万立方米，预算 1 个亿而对当时只有启动资金 250 万元的林县而言，这无疑是一组天文数字。

(3) 修渠过程的未知困难。尽管在修红旗渠之前，林县兴修水利的历史可追溯到 1268 年修建的天平渠。此后，小型饮水工程不断出现。1959 年底，“林县全县建成中小型渠道 1364 条，水库 36 座；池塘 2397 个，旱井 27120 眼，水井 5652 眼，引山泉 650 个”（《红旗渠志》，1995）。修渠技术雄厚。但红旗渠是建于太行山，太行山的石质异常坚硬，不利于开渠凿洞，不仅如此，在修渠的过程中也遇到种种未曾遇到的困难。

60 年 2 月 10 日从分水闸到山西这一段全面展开修渠工作，挖了一个月之后，老书记上渠一看，有

的人因为理解错误，把渠挖平，有的往上挖，有的往下挖，挖的不一致，有的大队挖的像小鸡窝一样，一个坑一个坑。老书记见此状上火了。加上因为往山西挖，山西的老百姓更是有意见，放炮跟地震一样，把牲口惊跑了，猪惊跑了，房子震裂了。(ZMJ)

1960年是红旗渠修建的开始之年，什么工作都是开始头年比较难，既没有工作经验，也没有劳动工具，缺乏工具。我在城关公社，光城关公社头一年死在渠线上的就有15名工人。死15名工人，我是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当时的渠线长3250米全都是在悬崖峭壁之上，上面是悬崖峭壁，下面是沟壑纵横，十分危险。(WCW)

(二) 建渠何以可能

红旗渠修成离不开团结协作，无私奉献。上去了37000人，这些人的心是一块儿的，做事都是团结协作的，当一个人抬杠子不行的时候，另一个人立马就上去接过他，这就是团结协作。有的人在外面也有工作，有的是老师，有的是工人，人家在外面一个月100块钱，人家为了修红旗渠来林州，一个月才两毛钱就扔了原来工作来修红旗渠。人家不懵不傻，人家扔了自己的工作来修红旗渠，有的还捐钱，这就是无私奉献。(GSJ)

1500公里的红旗渠，不仅仅只在坚硬如铁的太行山腰打基、打钎、搬石头、抬石灰，还需削山头、架渡槽、凿隧洞，修渠工人用双手挖出的石头都可以在修建一条连接哈尔滨与广州的“长城”！与其说“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是红旗渠精神的内涵，是红旗渠精神的体现，倒不如说这十六字更是渠建成功的缘由所在。

1. 自力更生

红旗渠的建成，离不开修渠人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修建红旗渠时，国家对红旗渠的资金、粮食补贴微乎其微。民工吃不饱怎么办？野菜、树皮遍地是食物，甚至饿了抓起手边的一捧雪都可以吃。吃饭时，妇女让小的先吃饱，大家相互让让，度过渠上的一天又一天。资金不够怎么办？在调用林县私设的小金库200万元基础上，大家勒紧裤腰带，建筑材料能省则省。面对修渠时未知的困难，大家发挥自我主观能动性，迎难而上。ZMJ生出巧法点炮，提高了点炮的工作效率；为不让除险工作落后，RYC摆脱自身对高度的恐惧，向他人学习如何下岭除险……无数位修渠人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在那处贫瘠的山区，以顽强的意志力、令人惊叹的智慧与勇气展示着林县人自力更生的态度与行动。

2. 艰苦创业

问起修渠老人对当时建渠的最大感受时，几乎每位老人的回答逃不过一个字：苦。苦似乎是那时修渠人的共同感受。

修渠当时可艰苦了，粮食不够吃，人干的活儿多吃的是稀汤寡水，还要定量分配，如果吃的慢的话就没有饭吃了。(YBJ)

面对恶劣的天气，修渠工人根据不同的天气情况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唯一不变的原则就是能干干活就尽量干活。

下雨能背背雨，下再大的雪也不停。遇到路滑的情况就拄着棍子上去，然后弄弄草，搬搬石头，

通通渠。那时候小雨当做晴天使。(ZMJ)

3.团结协作

红旗渠的工地上，你照顾他，我照顾你是常有的事。根据自己的劳动量来“照顾他人”，让渠畔的修渠人心拧到了一处。

刚开始他们都不愿意跟我一起，我抬石头都是照顾他们，不能压坏人家，压坏咱不要紧。(GSJ)

常言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在建红旗渠时，男的抡锤打钎，女的手扶铁钎，是红旗渠上一幅生动的画面。

男的能干动的活妇女照样能干。毛主席说男女平等。女的做抬石头、煨石头，只有不会垒石头。你说要是和泥，人家比男的手还快嘞。(ZMJ)

4.无私奉献

在确定修渠人员前，无数青年积极报名参加，渴望在渠畔上挥洒汗水，将浊漳水牵回家。修渠时，GSJ连命都不要，也要把渠建成。

去修红旗渠都是自愿报名的，大家都争着去，因为党员干部都带头去，党员干部争先。我是自愿报名去的，都是自愿报名去的，一听说修红旗渠是好事，大家都踊跃报名，不让去修渠还会有意见。(GSJ)

那时候我想的是为红旗渠多出力，出力是好事嘛，就像是打日本一样，人家担够了就去歇息，我够了还一直去担，担多了怎么办？有的民工老了或是有的人还小，担不够，我就把我多担的那些任务记在他们名下，就跟现在的扶贫一样。(GSJ)

1963年，水电部办了一份刊物叫《水利建立》。我当时投稿有二十一块钱的稿费，我想这些稿费是我宣传红旗渠得来的，不能归我，我就把这些稿费交给伙房，中午让炊事员去割了些肉，给大家改善伙食。当时的觉悟都很高，稿费自己也不舍得花。(TYC)

红旗渠上的无私奉献，不仅体现在林州人自家身上，外乡人人的无私奉献也激励着无数林州人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为什么咱们修渠这么有劲头，两个外乡人（吴祖太与杨贵）还一心为我们服务，咱是本土人，不出点力能行吗？(ZMJ)

四、红旗渠的述说者

（一）建渠人物

1.红旗渠的“推动者”

（1）红旗渠的宣传人—TYC

TYC修渠前曾是林县县教委小教组组长。老人如今已是口齿不清，反应迟缓。但当问及关于红旗渠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时，老人便开始有逻辑的向我们道来红旗渠带给他的四件高兴事。但最高兴的还是自己能活下来。

60年2月21，听党召唤去引漳，十一年春秋战太行，尽职尽责搞宣传，与民工同住，七五更搭黑修渠忙。最难忘的是红旗渠党委书记指挥长马有金亲自介绍我并对我进行了入党仪式。想入党、盼入

党十几年，红旗渠上得实现。(TYC)

71年五一，水电部办红旗渠展览时，第一个下车的钱占英部长。他对我说欢迎首长来省级展览，我对他讲了红旗渠，他问我红旗渠渠首在哪，我回答了（侯壁段）。他对我们说，红旗渠讲的不错，可以对外展开。(TYC)

晚上，提前开饭，办展览的人提前去天安门看烟火。大约晚上八九点，随着歌声的播放，天安门城楼上我们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向我们招手。当时很高兴，咱们林县的一个21级小干部都能在这里。(TYC)

提及渠上难忘之事时，TYC热泪盈眶向我们诉说着：1960年的3月28日，牢记在我的心窝，晚饭上工地，研讨钻洞法。去时三人行，说笑多欢乐，回来就两人，低头多寂寞。吴哥（吴祖太）哪里去，洞塌神仙亡。继承革命志，迎水还故乡。(TYC)

渠上友人的突然离世，让早已神志不清耄耋老人记忆至今。

（2）红旗渠的“安全线”——WCW

在修渠前，WCW曾在部队当过三年兵。当兵的经历，练就了WCW不怕困难，迎难直上的果敢与勇气。在红旗渠的工地上，WCW任安全员一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安全保卫员作为站在危险边缘的工作人员，在群众与危险之间划出了一道安全线。

安全员负责红旗渠整个工程的安全保卫工作，整个红旗渠工程非常非常危险，有的地方甚至比战场上还要危险，红旗渠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人们都是在几百米的悬崖上面被绳子吊着，在那个平台上面抡锤打钎。打开炮眼儿，用炮崩。整个红旗渠都是用炮给崩出来的。(WCW)

我在工地的工作，主要负责安全保卫，一个是指挥点炮，另一个就是指挥除险。RYC是在总指挥部负责除险工作的，我是在分指挥部负责凌空除险工作的。点炮的时候安放好炸药以后，全渠线的工人听号声疏散撤离到安全的区域才开始放炮。(WCW)

当时除险的工人没吃饱饭，要下去除险，有些害怕，我负责安全保卫工作，这是我的责任。我毅然代替了他下去除险，第一次除险，我也很害怕，但这就是命令，这就是任务，必须得完成。(WCW)

WCW还有一则感人的故事：修建红旗渠是没有假期一说，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WCW在接到修渠通知时，正值结婚不久时，接得到通知的第二天便上工地，连媳妇都没告诉。问其原因时，WCW对我们说了五个字：为人民服务！如今的WCW，同GSJ一般，加入了书写红旗渠故事的写作中。书中的故事由自己完成，书本的出版为自费。尽管出版费价格不菲，但WCW为了让后人了解到自己，了解到红旗渠，也就不在乎价格了。红旗渠上的领导人员，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因为渠上有这些领导的工作的缘故，修渠民工的工作不仅得以在面对困难时继续展开，更是高效的展开。

领导搬一块石头，群众就搬一座山头。领导要是出点汗，群众的汗水流成河！（ZMJ）

2.红旗渠的“现行者”

（1）红旗渠的书写者之一——GSJ

修渠多少年，GSJ就在渠上多少年。35岁的GSJ见证了太行山的改变，也见证了红旗渠的建立，

同样，红旗渠也见证了GSJ的“成长”。在修渠之前，GSJ曾是平原省¹的模范教师。因1957年间政治斗争比较激烈，自己深受其害，遭到停职处理。修渠的10年间，GSJ在渠上面对无数困难不低头，充分发挥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修渠前，GSJ家里已是穷得揭不开锅。修渠前拿的“新鞋”还都是自己的妻子从村里供销社的破鞋堆里找了一双不对称的鞋。修渠时，当时修渠任务定质定量。但超额完成任务、专挑困难任务执行一直是GSJ的“常规操作”。

当时往上一担石灰60斤，当时上山担石灰我每次100斤，我最多担过170斤，到山上一秤，人们都很吃惊，说：你看这个汉子弄这么多，你就不怕沉吗？你就是气死驴，你成了“铁肩膀”。(GSJ)

在红旗渠上人们都知道我担石灰（头）厉害，都给我起名铁肩膀。还有一个我抬石头，我只抬大石头，不抬小石头。(GSJ)

GSJ一直想在闲暇之余充分实现自我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对红旗渠的修建上，也表征于记录渠上的英雄人物与感动事迹。

我最有权利写红旗渠，因为我一直修红旗渠。我上红旗渠时就打算写红旗渠，但当时没有那个条件（没钱、没笔、没纸）……我看到这个事情，感动的我，这么好的人，人家九点活泼的来了，十点就没了命，因为救别人而把自己的命没了。所以我就决定把红旗渠上的事情写一写。但当时的自己头戴“右派”的帽子，那时候也穷，五毛钱也没有，也没有纸，什么都没有。没有我就捡起来包装水泥的纸当纸，那东西遍地扔的都是，那时候自己仅有五分钱买了一支铅笔，这就是我修（写）红旗渠的工具，我就一直修红旗渠，就一直写红旗渠。就这样把红旗渠的什么事都记下来了。(GSJ)

渠上十余载，GSJ以三亲行为（亲历、亲眼、亲闻）记录着惊天动地的红旗渠。直到如今，早已退休的GSJ还在继续书写与描绘着红旗渠的故事，以文字和图画的方式向世人诉说红旗渠上的故事，让自己的子孙能够了解并传承红旗渠。

我看到小学生的时候，当校外辅导员的时候，我会向他们宣传，勤俭节约的品质，让他们少买零食吃，节约钱花。(GSJ)

我就印了这几本，这成本可高了，我花了让你上万块钱。我应该这些（现阶段的画本与书记）主要是给我子女留的，让子女们学习，都是自费，想把红旗渠精神给传下去。(GSJ)

（2）红旗渠的“无畏者—除险能手 RYC

1996年6月1日，江泽民同志莅临红旗渠视察时，特意问道劳模RYC，在座谈会上第一句话就问：“听说你修红旗渠时砸掉了几颗门牙，现在怎么样了？”

RYC在红旗渠的几年，可谓是传奇。1960年2月，三十出头的RYC拿着党员介绍信，来到红旗渠总指挥部。年轻时的RYC十分胆小，连纸炮都不敢放，旁人都说：“YC的胆没有跳蚤大”。在建南谷洞水库时。RYC放了一个小炮就吓得不得了。临阵退缩不是RYC的风格，迎难而上才是他的选择。就这样，南谷洞水库的放炮经历锻炼了RYC的胆量。刚上渠时，RYC就负责放炮。为了点好炮，不浪

¹ 1952年11月，平原省撤销，将新乡专区、安阳专区、濮阳专区，新乡市（地级）、安阳市（地级）划归河南省，参见百度百科：平原省，<https://mbd.baidu.com/ma/s/ogoUQv93>。

费原料，RYC 一夜未睡，钻在炮筒里挖炮眼。天亮时，挖好一个口小肚大的药洞，紧接着开始装药，一直忙到晌午。刚开始时，RYC 放炮，另一位修渠人除险。但由于除险任务紧，但除险工作进度慢，除险工作远远落后于其它任务。于是，RYC 开始除险。

过去那个不敢放纸炮的 RYC 已经变成了大炮手，为啥不能变成下岭除险的 RYC！红旗渠需要我放炮，我学会了放炮；红旗渠需要我下岭，我也一定能学会下岭。（RYC）

除险工作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建渠之前，需要在山上崩山头、炸石头，大块的石头掉下去后，峭壁上还有一些活泛的石头，容易掉落，给底下工作的工人们造成生命危险。因此，这些碎石需要有人在底下工人开工前提前清理。RYC 便是做这份工作的带队队长。崖头楔上三根钢钎，把绳套盘上，另一头套在腰上，RYC 攥着一把铁镐便跳下去除险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在修南谷洞水库，会放炮的人不多，当时杨贵书记是领导，鼓励让我学习放炮，我就开始学习放炮，并承担了放炮工作。后来在修渠的过程中，一直出现飞石伤人事件，当时著名的城关镇“槐树池事故”，一下子砸死了九名施工人员。施工很难继续下去，于是指挥部决定成立除险队，成立除险队之后，没有人干过除险工作，没有人有任何经验，我就去找山西境内一个以采药为生的老头儿王天生，拜师学习学习除险。慢慢的我就组织了一二十个人来进行除险工作。（RYC）

RYC 的除险是出了名的，新华社社长穆青曾评价说“除险队长 RYC，阎王殿里报了名”。亲眼看过 RYC 除险的穆青曾经也激动地流下过泪水。RYC 的除险爆破经历可以说是九死一生。RYC 在一次执行爆破崩山的任务当中，被埋在了石头下面，被石头埋了有 20 多米深，当时的指挥长马有金命令工人们赶紧救人，拼命喊，用撬棍撬开巨大的石头，一直干到晚上，用手电筒往石头里面打光，RYC 才有反应。外面的人不断撬石头，里面的 RYC 也在不断的往外刨，往外爬，这样才出去。当时 RYC 衣不遮体，马有金指挥长直接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披在 RYC 身上，把他抬到了山下的村民家里养伤。当时正在安阳开会的省委书记刘建勋同志和杨贵闻讯立马赶到了现场，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抢救，RYC 才恢复了意识。真的是九死一生，可是第二天 RYC 又坚决担负起了除险任。

在虎口崖除险，当快要扑进凹檐里的时候，不巧凹檐顶掉下一块石头，砸在他的嘴上，三颗牙齿横在嘴里，一阵麻木，鲜血顺着嘴角流下来，RYC 取掉牙齿，忍着巨痛，一直坚持到完成任务从崖崩下来。工地领导让他去医院治疗，但他放心不下，惦念着自己不去除险，修渠民工就会多一分危险。第二天，戴着口罩背着大绳又上山下岭除险。

（3）红旗渠的宣讲者—前仆后继 ZMJ

ZMJ 现今 72 岁，与我们交谈时意气风发似少年。临走时还同我们开了个玩笑：“别看我年龄大，现在咱们比跑步，说不定你们还跑不过我嘞！”

ZMJ 一家三代（其父、本人与其子）护渠人。ZMJ11 岁时，其父民工张远任积极报名参加红旗渠的修建队伍，担任三个村的技术员，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倒下了。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ZMJ 就被母亲送上渠，面对孩子的哭闹，ZMJ 母亲仍坚持这个选择。就这样，ZMJ 在渠上 9 年，用了 6 年时间把水带回去。ZMJ 的孩子如今任职红旗渠灌区管理处合涧渠管所，至今仍是一名“护渠人”。

当时渠上放小炮不做活，放大炮人们不知道厉害，父亲离炮更近，当时父亲让一排人走，都不走，炮声一向，把父亲砸死了。2月10开工，4月29父亲离世。(ZMJ)

……后来母亲走了多远返回去对我说：你不把水带回去，别见我这个娘。当时我就不敢回去。13岁（被访说得应该是自己的虚岁）上渠，9年把渠修成，6年把水带回去。(ZMJ)

刚上渠的时候，由于ZMJ的父亲牺牲于建设红旗渠的宏伟事业，加之自己年龄小，ZMJ只是负责一些杂活。但ZMJ对自我的定位远非止步于此。ZMJ在自己的“努力下”，不仅成功成为一名点炮手，同时收获了“小老虎”的称号，获得曾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穆青的赞誉。

那时候我去渠上放炮，人们对我说，你爹让砸死了，我怎么敢让你去放炮。每天都是干杂活。下工的时候每次我都往前窜。我就去看他们是如何点炮。(ZMJ)

穆老上渠时我正在解背书的袋子，他问我：“你多大了？”我怒气冲冲的说15了！人家一推我，把我推到了稀泥里，那时自己更生气了！他又问我多大了，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了，不敢说自己15了，就支支吾吾的说。后来那个人给我称了称（背水的重量）多少：127斤。结果他又叫了我小鬼，对我说：你是个豹子。你也是个小老虎。最后我在渠上有个外号叫做小老虎。(ZMJ)

3.红旗渠的劳动者

相比上述几位被访而言，接下来的两位修渠老人他们更多的是怀着一颗平常且又激动的心情进入修建红旗渠的队伍中。

DDY作为第一批修渠人，从总干渠修到红旗渠的竣工。期间干过得工作种类不计其数，也曾除过险。与RYC不同的是，RYC的除险是具有英雄气概的义无反顾，DDY的除险更多展现的是我们平常人心中的担忧与被动。

今天会出现一块石头突然飞过来，除险的时候也害怕，提溜着你，往下看，看到下面的人就如同火柴一样，很害怕，除险也害怕，也不想去，但不得不去，就得去，公社大队有指标，不去要不然会斗。(DDY)

见过生死的DDY，似乎更能看得开无常的世事。一名叫董焕琴（年龄未满20岁）的女小工，曾在DDY面前被石头活活锉死。这件事刻在了DDY脑中。也许有了这么一段经历，DDY在公与私面前选择了前者。

曾经在之前的住的楼房里做过业主委员会主任，土地局的人之前让掀翻一堵墙，在两栋楼之间盖栋房，当时给我送来5000元：我说，这个钱谁要谁负责，我可不敢要，我们开个群众会，群众通过之后，可以请咱们吃一顿饭，如果要钱之后，老百姓有意见我们不管。有人说这个没事，拿着钱。我说：这个钱我不敢要，要对不起老百姓，我就算借钱生活也不要。(DDY)

我的屋子里有一块大镜子，每天自己给自己照照镜子，（并对笔者说）妞，人这一辈子，要自己给自己照镜子，比如我那天做错了，我得改改。(DDY)

作为这七位被访修渠老人的唯一女性，YBJ。当时由于自己没有孩子，也处于未婚状态。领导考虑到其顾虑较少，便派YBJ加入红旗渠前期的准备队伍中。1958年的正月十五，YBJ一行人骑着毛驴到

任村镇。第二天到了河口，便在河口铺好被子，睡在荒地上，早上醒来是，发现身边有很多掉下来的大土块。后因城关公社槐树池事故的发生，指挥部就让大部分妇女回去，YBJ便在其中。

身为平常人的他们，一生平平安安。在这次调研中，谈及的内容虽没有上述几位人物的英勇事迹，或是如今早已与红旗渠相连甚远，有的只是那一段修建红旗渠的平凡经历与感悟，但每一位能够站在红旗渠工地上的修渠人都是英勇的，因为他们的背后是自己的家庭，无论处于主动还是被动，他们将的家庭放在身后，投入建设林州的这个大家中。

（二）“红旗渠”的延续

1.身体的“延续”

红旗渠的苦与险，是如今停留在修渠老人脑海中无法抹去的记忆。建渠是一件苦活、累活，更是件险活。几乎每位修渠老人的身上都有修建红旗渠时的烙印。RYC 如今整整齐齐的一排上门牙，便是因为当初除险被砸掉的地方；TYC 因被石头砸伤而无法伸直的手背；WCW 半夜从梦中惊醒……这些都是红旗渠留给他们无声的记忆，提醒着他们身上所拥有的红旗渠痕迹。

50 岁的时候就因为伤病提前退休，在修红旗渠的时候积攒了很多伤病。（WCW）

2.精神的“延续”

官方宣传上，曾经作为红旗渠精神的宣扬者 RYC，到现今红旗渠精神的宣传者 ZMJ，他们走遍祖国大地，或是五湖四海的学者前来聆听，向国人播撒红旗渠精神的种子；非官方宣传上，GSJ、DDY 等修渠老人以文字、绘画、教学等方式向世人及后代诉说着红旗渠渠畔上的故事，传扬着历久弥新、永不过时的红旗渠精神。

五、调研发现

（一）红旗渠的评价：褒贬不一

红旗渠作为林州一项重要的对外宣传窗口，且红旗渠精神含义已获得国家领导人的肯定。但修渠人对于红旗渠的评价存有矛盾之处。赞赏者认为红旗渠的修建发挥了提高粮食产量、解决吃水问题等作用，批评者（在七位被访者中，有一人对红旗渠批评，一人不对其发表看法）认为这是一件耗费大于所获的消极工程。在此工程，据官方统计因修渠而献出宝贵生命的有 81 位林州人，加之修红旗渠时带给老人自己身体与心灵创伤，一直影响至今。（未能进一步深究其原因，此为本次调研一大遗憾）。

（二）修渠妇女群体的高度认同

在对修渠老人进行访谈时，问及修渠妇女的工作情况时，修渠女性老人因其工作态度与工作能力等获得了老人们对其修渠妇女群体的高度肯定与评价。不仅如此，以绘画为红旗渠精神传播载体的红旗渠精神宣传人 GSJ 通过对女工人工作时状态进行描绘。

男工人占到修渠总人数的 60%到 65%，妇女能顶半边，女工人也什么活儿都干，不怕苦，不怕牺牲和男工人一样干活。（DDY）

郭秋仁，也是个女生，是个女炮手，打钎子（一个人扶着钢棍，两边各有一个人在打这个棍子，打峭岩），当组长；韩云亮，也是开山洞的能手，管装炮、放炮，女人当炮手，不比男人差，女的也是

好样¹的。(GSJ)

男的能干动的活妇女照样能干。毛主席说男女平等。女的做抬石头、煨石头，只有不会垒石头。你说要是和泥，人家比男的手快。(ZMJ)

(三) 任务规训与意义感锻造的双重影响

红旗渠之所以能够建成，离不开当初红旗渠精神的支持以及人们对维持自身生存与生活的基本物质需求的渴望。但如何能够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各个公社的林州人民汇聚起来，以“这些人的心是一块儿的，做事都是团结协作的(GSJ)”的姿态来建渠，这也是建渠成功的重要一环。

1. 制定任务

在修渠前，修红旗渠的负责人会将修渠任务划分并下达至各个乡镇的公社大队，此后，制定公社中的每个人每天任务量，以分发木棍的方式，明确修渠工人每天任务量，若完不成任务，会进行相应惩罚。

县里按照各乡镇公社大队的人数多少进行分配，一个公社一段渠。(DDY)

修渠的工地上有广播员，一直负责宣传工作，如果有人偷懒的话，就会被广播出去，当典型遭到批斗。(YBJ)

2. 意义感的锻造

无论是在修渠前的动员，还是面对修渠时的艰辛，一句句激励人心的口号、歌谣总会出现在修渠人之中，口号声一遍遍的鼓励着万千修渠人，让他们咬紧牙关。不仅如此，在红旗渠的工地上，还会时常播放老三片，让工人们产生情感认同。时至今日，修渠老人们仍记得那一条条脍炙人口的口号：

大干一百天，迎来漳河水，重新安排林县河山。(ZMJ)

领导搬一块石头，群众就搬一座山头。领导要是出点汗，群众的汗水流成河。(ZMJ)

当时学习老三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TYC)

六、结语与讨论

GSJ的“紧、忙、苦、硬、险”五字简明扼要的概况了当时修红旗渠的情况。对修渠老人而言，修渠的日子是艰苦的，也是难忘的。但修渠的经历带给老人的是后人无法体会的精神财富。

让众人知道林县有一个红旗渠精神是宣传红旗渠取得成效最为基础的一步；让世人进一步了解红旗渠精神，体会何为红旗渠精神，红旗渠精神所发挥的作用则是宣传该精神的核心。面对所剩无几的修渠老人，宣传红旗渠及其精神任重而道远，借助修渠老人的力量进行宣传却又十分必要。因为红旗渠不仅仅是红旗渠了，它是林县人的基石，修渠人是红旗渠的基石(LJS)。

本次调研通过与被访老人进行访谈，再经资料的整理与汇总，首先，笔者发现自己的对修渠老人所说的事、情、景的深刻程度要远远高于书本上的文字记录。通过访谈，修渠老人们或用肢体动作向我们讲述着修红旗渠时的盛况，或满含泪光的眼神同我们讲述那时个人经历与所遇之事。其次，本次

¹ 好样：林州方言，指为人、做事厉害的意思

调研涉及群体类型较少、访谈涉及面较窄。因此，若作为毕业论文，后期将增加访谈成员类型、拓宽访谈面等。最后，本次暑期汇报内容主要体现对修渠老人修渠时个人经历与修渠情况再现，存在资料搜集内容浅显，缺乏深入的了解与追问，且文章内容逻辑性差等缺点，后期会对其着以解决。

参考文献:

- [1]崔忠芳, 2021,《重返红旗渠: 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中国广播影视》第7期。
- [2]董俊铭, 2020,《口述史料研究视角之下的红旗渠女性修渠人形象刍议——以李改云和郭秋英为例》,《名作欣赏》第11期。
- [3]甘磊、陈官运、马泽锴、曾威华, 2021,《红旗渠曙光渡槽结构安全评价》,《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中英文)第1-14期。
- [4]贺震, 2020,《在红旗渠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与生活》第11期。
- [5]2008, 红旗渠纪念馆,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11月27日。
- [6]李春灿, 2021,《地域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以河南省地域红色文化的融入为例》,《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7]孙红旗、王军红、李红霞, 2020,《新时代传承和弘扬红旗渠精神研究》,《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第5期。
- [8]王宝玉, 2020,《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 争做新时代出彩林州人》,《安阳日报》, 10月31日。
- [9]魏德忠、李楠、魏德忠, 2021,《摄影值得耐心地对待》,《中国摄影》第3期。
- [10]王会民、李颖, 2021,《新时代诠释红旗渠精神的四重维度》,《安阳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 [11]许东升, 2021,《太行之雄——红旗渠》,《中国税务》第3期。
- [12]岳晓娜、张永青, 2019,《基于水利工程史视角的红旗渠价值研究》,《安阳工学院学报》第3期。
- [13]周洁, 2021,《红旗渠: 太行山的“人工天河”》,《新民周刊》第13期。
- [14]张静、张智栋, 2020,《红色文化资源在旅游城市中的应用研究——以红旗渠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为例》,《参花(上)》第10期。
- [15]朱越星, 2020,《领悟红旗渠精神 增强干事创业信心 百名干部对院“十四五”规划进行结构化研讨》,《船舶设计通讯》第2期。
- [16]常江潇、周晓虹, 2021,《新中国工人阶级劳动传统的形成——以洛阳矿山机器厂为例》,《社会学研究》第4期。

☆ 作者简介: 赵聆茹, 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刘纪矜

饭圈的“神话”

——拉康理论视域下的饭圈文化研究

李卓燃

摘要：近来，娱乐圈明星“塌房”事件不断，在感叹娱乐圈的混乱的同时，人们也惊叹于粉丝群体的疯狂行为，这也让笔者思考近年来兴起的饭圈文化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符号运作机理。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借用拉康与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研究饭圈的叙事方法，指出饭圈文化的实质在于饭圈构造的符号叙事使一级符号的意义化为空洞，并在此之上任意组织全新的意义，最后使得明星“以不在场的方式在场”；饭圈体现为粉丝“想象界”与资本“象征界”的互构：资本塑造的饭圈文化通过文本、图像等多种符号的组合缔造想要的意义——通过象征化的方式掌控在场与缺席，并通过“询唤”捕获主体，在粉丝心中构建了想象的形象；而粉丝进一步通过自己的想象形象塑造象征界，获得了“掌控的权力”。

关键词：饭圈文化 拉康 象征

一、前言

近来，娱乐圈的乱象不断进入大众视野，从郑爽堕胎，到吴亦凡入狱、张哲瀚的精日风波，人们在感叹娱乐圈的混乱时，更加感到惊异的，是微博中粉丝们对于自己爱豆的维护：许多粉丝的言论已经疯狂、无知到让人难以理解。比如某艺人被曝父母贩毒，其粉丝竟说出“缉毒警察失去的只是生命，而我们哥哥失去的可是出道的机会啊”这种言论；吴亦凡入狱后，竟也有粉丝开始质疑中国的法律体系；张哲瀚在靖国神社做出不当行为后，也有许多粉丝为他辩护。在对这些粉丝的行为感到难以置信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仅仅是因为娱乐圈的偶像崇拜吗？仅仅是因为饭圈文化吗？这样一种心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据统计，肖战、蔡徐坤、王一博等流量明星其粉丝数量都已经在二千万左右，这代表中国的粉丝的群体已经十分庞大，对于其内部文化的研究也显得十分重要。

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对于粉丝文化的研究不在少数，而本文尝试以一种新的视角：语言研究以及微博制度研究相结合的模式，结合拉康的相关理论，尝试对如今粉丝文化的心理机制、内在成因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拉康的自我建构理论

（一）镜像阶段与想象界

对拉康来说，自我产生于镜像阶段，婴儿在镜子前把自身与自己的镜像同一起来，最终确立了自己的同一性身份。实际上，婴儿认同的镜像只是他的身体的一个影像，是一个虚幻的存在。因而婴儿的自我仅仅是自我的理想，婴儿在镜像前沉迷于他自己的想象形象。同时，这一“镜像”不一定是作为实在的镜子存在的，它可以是他人，比如父母、兄弟，甚至是偶像。而“作为镜像阶段延展的想象

界，就是一种主体认知的想象秩序，这一秩序在内部表现为主体自我同一性的一种‘误认’，即对自身的镜像或某种原始意向的自恋性认同；在外部表现为主体间的想象关系，在这一想象关系中，一个人对他人的理解是由他自己的意象塑造的，被知觉到的他人是一种想象的对象。”

拉康也强调：主体的自我与这一镜像存在着“侵袭性”——这一镜像终究是外在于主体的“他者”。这一侵袭性在于：“在自我把异于自身的对象凝定为一个理想的形象加以认同的同时，也就把自我与他人的紧张关系引入了自身内部而形成一种内在的张力，引入了一种敌对的结构”。镜像认同这样的一种形式“凝结于主体的内在冲突的张力中，并终将唤醒他对他人的欲望对象的欲望：原初的协作迅速演变为侵袭性的竞争，并由此而生发出他人、自我和对象的三元组。这个三元组在奇观式的共享空间中闪烁着，并以其自身的形式结构铭刻在其中”。

总之，想象界构建了一个误认性质的自我同一性幻象（这一误认是不可避免的），建构了主体与其构成性认同的关系以及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想象性的镜像作为一种关系中介构建了主体审视自身以及他者世界的方式。

（二）作为大他者秩序的象征界

主体在步入语言的那一刻就步入了象征界。象征界通过命名将物象征化，这正是在场与缺席的颠倒之处：“词语只有作为虚无的痕迹才能成立……借助词语，概念将消逝者留住”¹命名是物的在场的一种隐喻性替换，词语的在场是以物的不在场作为代价的。“在物被语言象征化的过程中，那被命名的不是物之存在或在场，而恰恰是物之存在的虚无化，是物的缺席”。

同时，象征界作为一种秩序，是先于主体存在的，就好比我们的语言、文化、道德、法律等社会意识形态都是先于我们存在的，并且主体必须认同这一秩序，才能够主体化，即“通过认同于社会化的象征秩序和法则，通过把外在于自身的社会的大法内化为自己的自我理想，使自己成为可以为大他者所承认的社会性存在”。

主体在象征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在语言结构中的一个位置，其中缝合着某个意义所指，主体在其中获得了某种身份性的存在。就好比主体认同自己是“父亲”、“老师”、“丈夫”等，以这些能指构建了自己在整个社会的象征秩序中的位置，从而看到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在这样的一种象征秩序中通过语言与他人进行象征交换。

主体在象征界中获得自我理想——主体“对外部对象的一种内投射，把外部对象的某一特质内化为自身的一个结构性维度”并且，这样的一种象征性认同式的自我理想具有一种“回溯性建构”的悖论性作用：“象征功能表现为主体的双重运动：人为他的行动定个目标，然而这只是为了在适当的时候给予他的行动以一个基础的位置。”²拉康在这里以实验科学作为例子：“实验科学并不是由它所处理的数量来界定的，它更是由它引人的现实的尺度来界定的。”一个实验测量工具在假说被证实之前就制成了，因此这样的一种工具使观察无用的同时又成为了观察的严密的工具。范式的革命往往也彻底重塑了科学界对于自然界的观察角度。一种科学的范式、一种思维的范式，作为一种象征认同，在主体认同的那

一刻回溯性地建构了主体对于过去以及未来的认识，象征认同建构了主体对于世界的认知。

总之，象征界通过“询唤”捕获主体——即人在意识形态中对社会身份产生认同，在福柯式的“规训”中成为主体，并且借此获得了欲望与自我理想。

三、饭圈的神话叙事学

饭圈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我们不妨想一想，粉丝心中的爱豆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一种缺席的方式，一种以缺席的方式在场。什么意思？有多少粉丝真正能面对面的和自己的爱豆交流？哪怕有线下见面会、演唱会，但是终究是少数，并且，这样的面对面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相反，粉丝们接触最多的，是明星的照片、视频、综艺，是一些号召力强的粉丝对爱豆的描写、叙事，是明星的团队塑造出来的明星形象，说白了，一种明星的“神话”、“符号”。明星一直是以不在场的方式在粉丝心中在场，而明星的“再现”方式主要有两种：整个文化圈的叙事以及粉丝心中的幻象。同时这两者也是一种互相结构的关系。

正因为明星是以不在场的方式在场，所以整个饭圈文化的核心就在于它的象征叙事，在于它塑造的整个符号体系。这种符号体系就是整个饭圈文化的基石，也是解构饭圈文化的突破口所在。

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思想界、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在他的作品《神话叙事学》中，通过对法国流行文化的一系列图像、文本的符号含义的分析，指出了法国资产阶级通过流行文化构造的神话叙事。其中尤为重要的一项是：二级符号，这一概念和鲍德里亚的“拟像”很相似，指在能指原先的所指意义上附加了新的一层意义，而这一层意义和原初的能指关系已经不大了。就比如许多奢侈品广告通过这种神话修辞术赋予了其产品新的意义：购买这个产品，你就拥有了和“上流阶级”一样的身份地位。本章尝试对饭圈文化中的多种主体：微博、粉丝、明星、明星团队等的话语进行分析，试图找出饭圈文化背后的神话叙事。

（一）作为基石的微博

新浪微博一直以来都是饭圈文化的聚集地，从热搜、话题到超话，微博的结构在饭圈文化的增长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助推作用，微博也塑造出了一种独特的饭圈文化形式。于是笔者认为，在对微博营销的结构分析中，能够看到一些象征界对于粉丝文化的塑造作用。

1. 话题

微博和其他社交媒体的最大不同之一，就在于它的群体性特征：微博不仅仅是以个人在个人的空间发博客，关注他的人可以看到这样的形式。微博运用了种种方法营造群体性的话题与热点。其中之一就是“话题”功能：话题，即就是微博热点、个人兴趣、网友讨论等多种内容，经过话题主持人补充说明和加以设置的，与某个话题词有关的专题聚合页面。以这样的方式，对相关话题感兴趣的人可以迅速聚集在一起，在同一个话题下发表观点，也可以通过搜索相关话题迅速找到与这一话题相关的言论。微博热门话题榜有着巨大的曝光量，是微博营销的重要手段之一，微博上会有对微博平台上用户关注度和讨论量较大的话题进行展示的榜单。其中分为总榜和分类榜单，总榜中又有小时榜和24小时

榜；分类榜单则细分为明星、社会、时尚、生活、游戏等各种分类。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迅速将用户集中到一些热门话题下，大大增加了微博获取流量的能力。

2.热搜

热搜和话题一样，也是一种将大量用户吸引到某一话题上的手段。不同于话题的是，热搜更具时效性，关注度也更大，可以说是所有微博用户关注点的中心所在。所以也不乏许多“买热搜”的行为，也就是通过金钱交易快速将某一话题推到舆论的中心，博取关注度。

热搜是饭圈神话构建的一个重要部分，它起到了“邀请”的作用。通过热搜，特定的偶像话题被呈现在大众眼前。热搜是神秘的，吸引人的。一方面，它有着极大的关注度，另一方面，它的表达是含糊的、神秘的。比如“许魏洲说不是乔欣我不来”“肖战发博晒囤货自拍”“杨幂初秋静谧感大片”。这些标题，看上去说了些什么，它意指着某种事情，但是它又什么都没说——它仅仅是一件事情最简单的概括，光看着一句话人们其实什么都不了解。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人们会好奇，这件事情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关注它？

这正是饭圈文化这一象征秩序的邀请。人们能感觉到这一热搜背后肯定有着什么事情，会忍不住的好奇，好奇这背后的象征界——某一饭圈的象征界。当人们点进去的时候，也就进入了这一象征界。当然，这并不代表人们就被吸粉了。但是是否成为粉丝这件事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这一特定的饭圈文化已经得到了宣传，更多的人熟悉了其中的特定词汇，至少，更多人知道了这个偶像的存在。

3.超话

新浪微博的超话是以某话题为中心，很多对该话题感兴趣的网友讨论交流的聚集地，类似于一种网络社区。超话是饭圈文化的聚集地，许多饭圈相关的，比如“打榜”、“刷数据”等行为就和超话息息相关。超话往往围绕一个人或者一事物开设。这里主要讨论明星的超话。超话真正实现了“饭圈”的“圈”的特点。如果说前文的话题、热搜都是围绕着某个特定话题展开的，吸引的也是关注特定话题的人，那么超话吸引的就是关注特定明星的人，是一个明星所有粉丝的聚集地与交流的社区。

不同明星的超话内部的结构构成不同，但大体上都是以：帖子、精华帖、明星动态、视频、相册、作品以及二创空间组成的。如肖战的超话有“最好的你”模块，粉丝在里面表达自己的爱意，发一些肖战的图片。“顾魏”模块则是肖战最近参演电视剧中的角，粉丝在其中分享喜欢的剧照；蔡徐坤超话中是“小菜园”，王一博超话中是“摩托小区”，都是起到闲聊空间的功能。可以看出，虽然超话大体结构都是一样的，但是这种自定义功能的存在更加深了粉丝的身份认同。

超话排名：超话排名每周都会更新，是粉丝活跃度的重要数据之一，也是品牌方及媒体评判和选择艺人的指标之一，更是各类平台总结明星数据的重要数据来源之一。超话排名意味着整个饭圈的活跃指数，互动指数和凝聚力。超话排名取决于影响力值，影响力值由粉丝完成积分打榜获得。粉丝通过“完成连续签到+在超话内发帖+回复/转发超话内帖子”等日常任务获得积分。可以看到，微博超话的这一功能大大加大了饭圈粉丝们的群体认同：排名的存在带来了竞争，粉丝们通过“打榜”提升偶

像的排名来表达自己的爱与支持；这种任务积分制也让粉丝们更加团结甚至更加狂热，因为自己偶像排名的下降会被粉丝们归结为自己的懈怠。

总之，超话成功的把饭圈群体集中在了一起，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集中讨论的社区、平台。同时排行榜的竞争机制也大大增加了粉丝们的团结程度。

4. “大V”

所谓“大V”，往往指微博中拥有许多粉丝的人，他们往往有很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在饭圈中，他们也往往是粉丝的“头目”，负责组织粉丝，引导粉丝，甚至能直接和偶像或者偶像的经纪人交流。

综上，可以发现，微博本身并不是饭圈话语的制造者，但是微博为饭圈的成熟与发展提供了温床，微博的上述四个功能每个起到了吸引流量、博取关注、制造认同的作用。可以说，是微博真正的让粉丝文化变成了一个“圈”，甚至是大大影响外界的圈。

（二）资本的营销

资本在饭圈神话叙事的构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资本就是整个饭圈文化这一象征界的缔造者。资本利用这一象征界吸引、捕获粉丝，粉丝在其中构建自我的幻象，而粉丝在这一幻象的认同下，在幻想的引导下丰富、充实着这个符号秩序，并且吸引更多的粉丝。

1.人设

明星的人设是一个明星是否能够吸引到粉丝的关键所在。资本往往会通过一系列的“神话叙事”塑造一个特定形象的偶像。资本的魔力就体现在：神话不是单一的叙事可以构造的，神话这一单一的“意义”，比如某明星是一个学霸，往往需要许许多多的“符号”来进行塑造。而资本恰恰有着丰富的资源来构造多重叙事，完成神话的缔造。比如希望缔造某偶像是学霸的人设，往往通过：片场看书、在采访中透露、散发所谓的“明星学霸笔记”等等，以重重幻象塑造明星的这一人设。巴特说：神话的本质在于扭曲，使历史自然化。神话通过使一级符号的意义化为空洞来塑造自己想要的意义。人设的塑造也是如此：看的是什么书已经不重要了，笔记的内容、访谈讲的话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组织在其上的全心意义，重要的是将所有内容聚合在一起的神话叙事。通过这种方式，资本构造了各种各样的人设：傻、可爱、呆萌、盐系、禁欲系、娘化……明星本人是怎样的完全不重要，通过层层表象的包装塑造出来的这一神话才是最重要的。

2.综艺

真人秀类的综艺也是资本构造神话的方式之一。通过让明星参加各类真人秀，资本构建出了一种“明星的生活化”假象。相比于演唱会之类场合中的偶像形象，综艺中的明星更加的亲切、贴近粉丝：在综艺中，明星会做各种游戏、表达自己的想法、与其他明星做各种互动。通过综艺，粉丝们好像发现了自己爱豆的另一面：比较聪明、比较傻、爱开玩笑、勇敢、热心、粗心大意……总之，更加的生活化。但是，综艺都是有剧本的，所有看似亲近的画面也都是计划好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塑造明星的形象。然而，通过将明星的生活表演出来，让粉丝们觉得，自己的爱豆并不是高高在上、难以

接近的，而是亲近的，就像日常生活中的朋友一样。这一切，让粉丝们更加相信偶像的人设。

3.影视剧

资本为偶像们制造了一种新的影视剧模式，在这样的影视剧中，剧集的画面、故事、动作、剪辑等等都不再是关注的重点了。粉丝们的重点转到爱豆在剧集中的“人设”“形象”。如果说前两个资本的叙事模式尝试塑造的是“真实”，那么这一叙事塑造的就是幻象本身。粉丝们不在意偶像这一形象的真实与否，而是相信着这一形象就是偶像本身。粉丝不是沉浸在剧集的故事中，爱上了偶像在故事中的形象（当然，不排除粉丝因为某一角色爱上了其扮演者的情况），而是关注着在故事中的偶像。粉丝们关注着偶像的扮相，比如某一明星的古装扮相，并且将这一形象与明星本人结合。这一形象的真实与否不再重要了，粉丝们关注的就是这个形象，粉丝们爱着的也是这种虚幻。如果说前两个叙事模式是构建着“象征界”，那么这一叙事模式则是在塑造着想象的形象。

可以看到，商业资本在饭圈中起到的核心作用在于营造偶像的形象。他们会使用各种手段来塑造一个个吸引粉丝们的偶像。我想说的是，在这里商业资本的塑造起到的更多是塑造着“象征界”。他们运用着如今消费社会常见的塑造神话的手段，即在一级符号上附加新的意义，用多种符号塑造一个偶像的“神话”。饭圈的象征界就是这样被塑造出来的。

首先，它有着吸引外人的手段：充满着独特神秘感的热搜。

其次，有着全面的结构，让每个进入其中的人都能够在象征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是在象征界的“询唤”中找到一种身份认同。这种全面性体现在偶像的多元性——娘化的、痞帅的、阳光的、傻乎乎的……总有一个会是你的菜。

同时，它也有着很强的“询唤”能力。这体现在资本铺天盖地的宣传上。即使你不关注饭圈，你也无法避免你周围的人时不时聊到相关的话题。这时就难免会生出“我是不是落后时代了”这样的想法。在这个时候，其实主体就已经被象征界捕获了。

（三）粉丝们的神话叙事

关于粉丝们的神话，我觉得是一个象征界和想象界交织的情况，这本身也是拉康定义中两者特征所在。粉丝们一方面在通过各种文案、二创的行为丰富象征界，另一方面沉浸在自己的想象“误认”中，将偶像视作和自己想象中一样的情况，甚至将这一想象带入到其生活中，我想这可能也是生活中各种东西都能“饭圈化”的原因所在。

叙事正是粉丝们对于象征界的丰富。许多文笔好的粉丝们会通过写充满感染力的诗句、文章甚至是小说，来丰富甚至是构建新的偶像的形象。这导致一个偶像有很多种形象，甚至相互间可能是冲突的。但是这并不重要，粉丝们喜欢的只是她们心目中的那一个想象性的形象。

1.长篇叙事 话语认同

长篇叙事有很多种。比如，悲情叙事。悲情叙事往往是粉丝中的领导者们通过动人的笔触编造偶像的悲情故事，比如“他从小刻苦练舞，就是为了这一刻能够在舞台上有很好的表现”“他被众人否定，

被社会否定，他有的只有我们了”。通过催人泪下的描写，粉丝们塑造了一个悲剧性的，艰苦、乐观，有着理想却郁郁不得志的偶像，唤起众人的情感共鸣，让更多人支持这个偶像，为他“打榜”。这一种叙事非常常见，比如在前一段时间很火的“偶像练习生”中，就会有很多粉丝塑造自己的偶像努力训练就是为了此刻出道的形象，以拉到更多的票。

再比如，对于偶像舞台表现的神话描写。让我举几个例子：“（华晨宇）唱法结构七重人格，从童真到癫狂，层层剖析自我……”“（蔡徐坤）犹如不死鸟，以自我涅槃寻求重生，以永恒不朽的重生追求自己的新生”我们不该去创造森林的幻觉，而应创造处于森里气氛中人的幻觉”通过艺术化的描写，粉丝们给偶像塑造了更神话性的形象：艺术、突破自我、追求新生。

也有对于偶像“有钱”“有流量”的叙事：“一套更比一套贵，现在戴的项链都是 438 万的，蔡徐坤有多贵？直接按几套房来计算了”“毕竟是靠近帅哥心脏的广告位”“蔡徐坤在音乐上有多舍得？顶级舞台、顶级交响乐团，和无数知名 dj 学习”

2.同人作品

同人作品中，最常见的是同人小说和绘画。一些粉丝会以自己的偶像为主角写一些网络小说，其中的情节往往是虚构的，核心目的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心中对于偶像形象的想象。一些小说中的“人设”是和现实中资本塑造的人设相似的，还有一些就纯粹是虚构的，比如前文提到的肖战的“男男”同人文。这一种虚构性叙事的过程恰恰是粉丝想象界和象征界的转化过程。粉丝心中构建了一个偶像的镜像形象，并且通过叙事将这种形象象征化，转化为象征界吸引更多的人。

3.文艺的短句

歌词、诗句这一类文艺的短句在笔者观察微博超话社区中是最多的。几乎每个人都会发，毕竟，拥有高超的写作、绘画能力的人终究是少数，能够用长篇叙事号召粉丝的也只是那些粉丝较多的“大粉丝”。但是引用歌词和诗句，再配上几张爱豆的照片，谁都会做。

这些句子往往都很“文艺”。让我举几个例子吧：“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肖战我喜欢你，喜欢你扬在脸上的自信，喜欢你长在心底的善良，喜欢你融进血里的骨气”“我在人间贩卖黄昏，只为搜集世间温柔去见你”这种文艺的句子往往很有感染力，配上一些偶像的照片，人们自然就会将这些文艺的句子和偶像联系在一起，或者说，通过这些句子去塑造自己心中偶像的理想形象。

4.照片+文案

这种形式最能塑造“神话”。比如几张黑白滤镜，爱豆在拉伸、训练的照片，加上一段文字“认真投入、沉浸专注”就塑造了一个爱豆认真努力，专注练习，只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的神话。一个爱豆在看书的照片就能够塑造爱豆爱学习的形象。

这种方式和上文中的文艺短句正是“神话”二级含义掩盖初级含义，通过组合缔造神话的典例：没有人在意照片背后的事实是什么，偶像真的在看书吗？偶像真的爱学习吗？没有人在意句子的原始含义，融在血里的骨气体现在哪？这些都不重要。这一切都是为了组合在一起，缔造一个爱豆的理想

形象。

粉丝的神话叙事方法肯定不止上面几种，这也只是我的一种粗略的归类。但是手法基本上大同小异：通过文本、图像等多种符号的组合来缔造一个他们想要的意义。这也是饭圈神话叙事的根本手法：心中已经有了一个理想的幻想形象，以其为目的寻找素材，通过素材的组合表达意义。一切素材的原初含义都不重要，它们的作用就在于通过组合传达新的意义。

同时，结合拉康的理论分析，我认为，粉丝们的象征叙事不仅仅是一种塑造，更是一种“呈现”。这里我想举拉康的一个例子来说明：

在《超越快感原则》中，弗洛伊德描述了一个儿童在母亲外出时玩的一扔线轴游戏：儿童一手拿着线，另一个手不断的把线轴扔出去，再用线拉回来，嘴里还不停发出“没有了……出来了！”的声音。拉康在这里展开了自己的在场与缺席的辩证法：婴儿无法让母亲永远在场，永远陪伴他（人无法直接、完全的满足欲望）反复的扔出和拉回线轴体现了儿童通过象征化的语言来掌控在场与缺席，这两个声音成为了母亲在场与缺席的象征，也就是说，儿童通过象征界的象征化方式来化解母亲离去的失落感。

在粉丝这里也是一样的。偶像无法真正对粉丝在场，因为粉丝们爱着的只是自己心中镜像的偶像形象，这一种想象永远无法在现实中在场。于是偶像只能以缺席的形式在场。而这一种再现的方式就是粉丝们的“叙事”。通过对象征界的塑造，粉丝们就像上文中的儿童一样，通过象征获得了“掌控的权力”。想象的偶像不再是遥不可及，通过粉丝们的神话叙事，通过照片、同人，对于偶像的欲望得以实现。这也正是“想象界”对于新的“象征界”的塑造。

四、想象与象征的辩证法

上一章对于饭圈神话的分析中有分开讲到一些理论。本章将将其综合起来，尝试说明饭圈中象征界与想象界的辩证转换关系。这里笔者只是尝试为饭圈的疯狂提供一个解释维度。

（一）原初的象征秩序

原初的象征秩序毫无疑问来自于资本。中国偶像的制造方式基本上是学习的韩国模式：训练、组团、出道。通过资源的倾斜来塑造偶像。让偶像参与各种综艺、参演电视剧、电影来增加影响力与流量。再通过“立人设”吸引更多粉丝。总之，资本就是偶像的一系列象征符号的最初缔造者，也就是原初的象征秩序的制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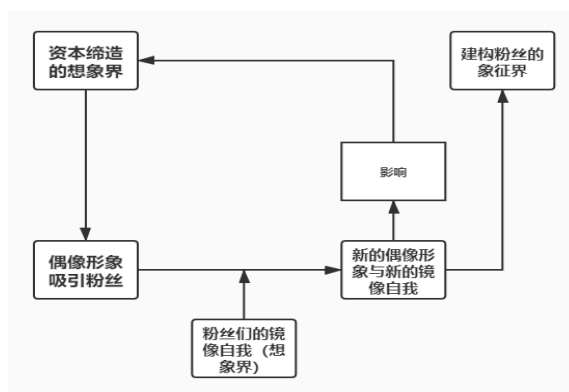
（二）粉丝们的想象构建

首先，粉丝们是被资本缔造的象征界捕获的，也就是被某一个形象吸引，在整个象征界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象征界帮助粉丝们心中塑造了一个镜像形象，一个想象的偶像形象。想象界在象征界中诞生。

但是粉丝们往往并不会满足于最初的形象，在对心中理想形象的建构过程中，往往不全是依赖象征界的。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有着粉丝们之前的想象形象的影响。毕竟镜像认同在婴儿阶段就开始了。在过去构建的镜像形象往往会影响人们对于他者的映像，就好似老师对学生们的想象决定了老师的讲

课方式一样。如果过去教过很多差生，那么他对新学生的映像很可能受到影响。粉丝们在心中构建偶像形象时，也会将自己的想象投射在这一形象上：可爱的、娘化的、阳光的……在想象界和象征界的综合作用下，一个虚幻的偶像形象得以建构。这一点的依据在于许多偶像的理想形象和资本原初构建的并不一样。粉丝们对于偶像的情感往往是很强烈的，这一“他者”不同于以往的他者。在粉丝对偶像的喜爱进一步加深的过程中，这一新的形象深深影响了粉丝们过去的镜像认知。简单来说就是，偶像的形象改变了粉丝们之前的镜像自我。

需要强调的是，想象界中，处于核心的是自我的认知方式，或者说想象方式，而不是偶像的形象。一切想象都是由原初的那一个镜像自我决定的。而粉丝们在上述过程中，最终改变的是她们的认知方式，而所谓理想的偶像形象是通过这一认知关系构建出来的。我试图用流程图解释这一关系：



（三）想象界对象征界的重塑

首先，粉丝们通过前文提到的神话叙事手法构建了新的符号世界，一个以她们心中的偶像形象为基础的符号世界。其次，粉丝们对于偶像的想象也大大影响了资本的秩序构建：资本毕竟是逐利的，什么人设更赚钱，它们也更愿意去迎合。于是，原初的象征界也遭到了改写。

（四）偶像的异化

粉丝们的想象界与象征界组合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大大影响了资本与偶像的行为。但是，象征符号的本质不在于赋予物一个符号，而在于对物的在场的一种隐喻性替换。前文有提到，粉丝们通过叙事使理想化的偶像形象以不在场的方式在场。通过这样的方式，实际上真正处在中心的不是偶像自身，而是偶像的这一理想形象。

粉丝们爱着的是自己心中镜像的偶像形象，这也可以算是偶像的一种异化了：偶像的镜像扼杀了偶像本身，偶像必须言行时刻与镜像相符合，最后完全活成了这一镜像的模样。这不正是拉康镜像与自我侵袭性关系的最好呈现么！到底哪个才是偶像本身呢？其真实生活中的样子？还是粉丝想象中的镜像？这两种形象相互冲突，最后镜像宣称了其绝对的胜利。

（五）中心的扭转

可以看到，在上述关系中，处在中心地位的成为了粉丝们心中的理想形象。这一形象直接影响了

象征界，甚至影响了资本和偶像的行为。大部分情况下，虽然想象界和象征界之间是一种“互构”的关系，但是两者要么是象征界（意识形态）起到主导作用，要么是不存在强烈的决定关系。但是在饭圈文化中，这一想象关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许正是疯狂的来源。

（六）粉丝的疯狂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粉丝都是疯狂地，很多粉丝是理智追星，即与象征界保持着一定距离，更别提想象界被改变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饭圈中有着为数不少的疯狂粉丝，她们的疯狂也有很多类型，下面我试图解释其中几种我观察到比较普遍的。

一般情况下，对于理智的粉丝，偶像形象的“塌房”即象征界的崩塌只是意味着脱粉，或者是难过一段时间。但是她们往往是相信象征界崩塌这一事实的。但是有一类粉丝，并不相信这一形象的崩塌。这是因为她们心中相信的并不是“象征界”，而是“想象界”。也就是我前文提到的想象界走到了认知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偶像的理想形象处在了粉丝们认知的中心，“杀死”这一形象就好似“杀死”她们自己的理想自我一样。她们势必不可能相信，而是采取各种手段证明偶像的无辜。在介绍理论的时候，我有提到镜像的“侵袭性”，这一特性在这个阶段也体现了出来：粉丝们将这一种侵袭性投射到外界，将所有“他者”视为敌人，带有迫害妄想地认为整个世界都想陷害她们的偶像。于是在网上用各种人身攻击辱骂破坏她们偶像形象的人。

还有一种情况，这时粉丝们想象界中的理想形象并不是那个偶像，饭圈改变的只是她们想象外界的方式。所以偶像的“塌房”对他们来说影响不大。她们更在意的是这一“饭圈”的模式。于是就有了“一切皆可饭圈”的文化：动漫、运动员甚至是数码产品，这一些都能成为饭圈。就比如东京奥运会乒乓球队受到了很大的关注，于是马龙、张继科、许昕就被饭圈化。

结语：关于饭圈

在笔者写这一段总结的时候，国家已经开始整治饭圈文化了，禁止一切“排行榜”行为、整治劣迹明星……这是一件好事，很多时候这也是政府的铁腕才能真正解决。但我更是觉得，不仅仅是整治、打压，更要思考这饭圈文化背后的神话叙事术，今天可以是饭圈，明天可以是抖音、快手、B站，资本营造爆点、制造差异的这一叙事术遍布社会每个角落，不从深处思考这一点的话，可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参考文献：

- [1]吴琼，2011，第402、413、425、436页，《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拉康，2001，第110、287、297、299页，《拉康选集》(Écrits : A Selection)，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作者简介：李卓燃，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2020级本科生

☆ 责任编辑：邢小龙

退捕背景下渔民生计资本的重建与挖掘

——以苏州太湖渔民为例

李汀

摘要：“太湖退捕”过程中，太湖渔民如何进行转产转业的问题实质上涉及的是如何重建与挖掘渔民生计资本以及生计能力的问题。本研究希望能够通过对苏州太湖沿岸的渔民群体进行调查，对其生计情况、群体特征进行一个细致的描述与划分。研究目的的一方面是要根据渔民群体内部异质性讨论其生计资本情况的差异，另外一方面是期待给出如何从更全面的视角解决其生计困境的建议。

关键词：渔民生计资本 转产转业

长江是中华民族母亲河，是世界上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河流之一。为扭转长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趋势，去年12月，农业农村部明确从2020年开始，长江全面进入10年休养生息期。

长江“十年禁渔”是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目标任务。纪检监察机关将督促落实禁渔禁捕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强有力的监督推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有效落实，使长江真正得到休养生息。

在“长江禁捕十年”的大背景下，长江流域的各湖泊被要求“退捕”，沿江沿湖的渔民面临生计困境。这一问题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因此，各种转产转业政策纷纷出台，以求解决渔民们现阶段的困难。通过对“渔民转业”这一现象的深入分析，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比较复杂的是如何去重建与挖掘渔民生计资本以及生计能力。本研究旨在对这一个细节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期更深入地了解渔民转业，探究提升政策有效性的路径。

一、苏州太湖渔民情况

（一）区位

苏州位于太湖之滨。太湖总面积为2425平方公里，湖岸线总长为405公里。其中苏州太湖占到了约70%的湖域面积，也就是1700平方公里，湖岸线约280公里。太湖的渔民就生活在这条湖岸线上。

值得一提的是，苏州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根据《江苏省湖泊保护名录》¹，苏州市列入的湖泊有94个，数量占全省的68.6%，市内水域面积3608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42.5%。根据调查得知，最早在金鸡湖、独墅湖、阳澄湖、澄湖、淀山湖等区域捕鱼的渔民，因为各种政策规划以及生计安排，早已迁往太湖边进行捕鱼或水产养殖。

本调查经过对各渔村（或前渔村）区位的整体把握以及细致分析，最终将主要调查地确定在位于光福镇的渔港村以及横泾镇的新联（村）。

¹ 资料来源：江苏省人民政府，2019，《江苏省湖泊保护名录》。



图 渔港村以及新联村的位置

有趣的是，新联村其实现在在地图上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本文将该地称为“新联”，而不写作新联村。经过了早年“渔民上岸”的大调度，新联整个搬迁入安置房，不必再回到船居生活。但是如今在横泾镇一带的太湖湖面上能够看到的渔船以及彩钢板棚，仍然是“新联人”的。从名字上看，就可以猜想到新联村是一个联合村，由七八十年前外地迁入人口构成，由于这部分人居无定所，就一家一户一条船漂泊在太湖的湖域上，以打渔为业。由于早年新联人与当地人融入程度比较低，因此新联周边的村民慢慢退出渔业以后，新联人仍旧居于湖上。直到“退捕”前几年的大型“退渔”工作的展开，新联的渔民规模才缩小很多，由 300 多人减少到十几人。

另外一个调查点，即光福镇渔港村，被称为“中国内湖第一渔港”，占地面积为 1.66 平方公里。原先这里叫湖中村，后来进行环太湖旅游开发，于是在 2005 年更名为“太湖渔港村”，村子里有 1387 户人家，人口 4881 人，却拥有 2000 多条渔船，村中近 3000 人都在从事渔业相关工作。并且在苏州市，几乎只有渔港村能够看到带桅杆的渔船了。¹

（二）人口

根据市人社局渔民建档信息显示，苏州市渔民总数为 9839 人。

这个数据并不是说 9839 人都在以捕鱼为生或者说从事捕鱼工作。据人社局工作人员指出，渔民的统计方法是按户统计，而不是按人统计。根据 2020 年 9 月印发的《江苏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补偿安置指导意见》，渔民建档立卡的对象包括：“持有合法渔业捕捞许可证的船舶所有人及其核定成员。包括船主的家庭成员以及渔船上的其他作业人员。”因此在这近万人中，也存在不具备打渔技能的人。但是这并不是说要指出统计方面存在什么问题，其重要性在于后面展开分析时我们要关注到渔民人群内部的差异性，

在分析渔民人口构成时，年龄结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虽然没有精确的数字，但渔民人口结构呈现出老龄化特征是显著的现象。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几乎大多数退捕渔民都达到了退休年龄，在湖

¹ 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2019，《辖区简介》。

面上也难以见到年轻面孔。比如在渔民聚居的渔港村，受访的渔民都表示村里没有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在从事这份事业。

这种老龄特征一方面能够为退捕工作带来了困难，因为老龄化人群本身就业比较困难，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好处，原因在于这一部分人群本身对再就业的要求比较低。倘若能够给出一定的生活补贴，则可以获得其对政策的支持。

（三）特点

在渔民的职业特点这一节里，需要关注的是渔民生活的一些时间安排以及不同之处。

首先，渔民的生活本来就不只是单一的捕捞生活。一般来说，每年的2月到8月是太湖的休捕期，就像农业地区有农闲农忙一样。在这段时间里，渔民本来就会寻求其他的生计方式。比较常见的就是从事水产养殖。水产养殖的条件是近湖，比如在太湖边的渔民就会承包一路之隔的水田，引活水进行养殖。在这个过程中，就存在着生计资本的复杂性。相关退捕工作开展的时候，正是出于对其原有的生活状态的挖掘，大部分渔民转业都是转入水产养殖的方向。在调查中还发现有的渔民过着半耕半渔的生活，不过就像耕种不是他们主要的生计依赖一样，打渔同样也不是。最多的情况是一户渔民老夫妻两个，丈夫打渔，妻子种地。丈夫早晨出航，上午回来，有可能还会从事一些比较简单的劳动工作，妻子除耕种家庭耕地之外，往往还可能在一些纺织厂上班，或者在家中“做羊毛衫”。这种生计状态在渔港村有的地方是上溯三代皆如此。

根据渔港村村干部的描述，在村中完全靠出航打渔为生的几乎都要七十岁以上了，大部分人都是同时操持着水产养殖生意，或者农家乐生意。因此我们可以总结为，至少在苏州太湖地区，“渔民”比起职业更像是一种身份，反应的是村民与渔业的距离很近，而不是其完全的生计选择。

渔民生计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不具有稳定性，受到天气以及季节影响很大，正是由于这种职业特点，许多渔民都不愿意年轻人也回来从事渔业。并且，就像所有的形态较为传统的工作一样，渔民的生活十分辛苦。渔民一天的生活作息情况是，早晨往往四点半就需要出湖打渔，六点半左右就能将捕来的鱼在埠岸上卖掉。这是小船日常的捕捞。倘若是比较大型的捕捞，那么需要开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第一处捕捞点，然后在船上呆一整晚，这种情况的话开的是带桅杆的大船。

按照我们的预想，渔民转业据有难度。但是也需要反过来考虑到，渔民作为生计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的人想上船做渔民，同样也很难。现在的渔民的技艺来源大多是代代相传，儿子跟随父亲出航，年长日久自然掌握了这些技术，成长以后也可以打渔为生。渔民本身就掌握如下基本技能：游水、划船、结网、张网、水产保鲜、看水路、鱼类识别，尤其有经验的渔民还会看天气、涨水退水的情况，将这些项目罗列出来很轻易，但要做好仍然是很依靠经验积累的。

综合上述各种特点，渔民作为一项生计，其传承本来就存在问题。渔民自己也在积极寻求职业转变。

二、职业认知

前面的文字里已经说过，“渔民”与其说是一项职业，不如说是一种身份。无论是新联村还是渔港

村的渔民都认为自己的职业是终将消失的，在大多数远离渔村的城市居民的印象里，依靠打渔为生的苏州人应该已经消失了。

首先，渔民的生计收入并不低，有时一天捕到的鱼就能卖到 3000 元。即便是收入一般的时候，小船一天的收入也能达到八百一千。加之出航打来的鱼被市场称为“野生鱼”，尽管营养价值未被确认有何不同，但是市价远远高于“养殖鱼”，并且往往供不应求。新联的渔民说，有时打到几条大白鱼，上午卖掉，下午就能舒舒服服地去麻将馆娱乐了。“比打工肯定好。”这是一位新联渔民感想。

看上去渔民的心态十分矛盾，一方面他们觉得这项工作收入不低，并且有兴趣，但是另外一方面觉得辛苦、缺少体面，是传统的生计方式，肯定会消失，不适合年轻人做。“年轻人要来张网肯定是没有出息的。”“没出息”或许可以解释为不保收，没有发展空间，不体面且无保障。

前面已经说过，在开展退捕工作之前，苏州市早已经有了大型的退渔工作。也就是“渔民上岸”。2018 年，姑苏区最后一位渔民下船。到 2020 年 5 月的时候，苏州园区的所有渔民完成退渔转业，或者说是老龄渔民的天然“退休”。

有的老年渔民对自己职业的认识是，有时不是生计，而是一种习惯和兴趣。比起“以捕鱼为业”，说他们是“以捕鱼为乐”更恰当。比如在采访的时候，一位 70 岁的娄葑街道退休渔民表示，“其实觉得早就不应该干了，本来就打算这几年收渔网（指退渔），没想到这个时候下船政府还要每个月在养老金里面补贴。”面对政府预想的“生计伤害估计”，老年渔民都会觉得很意外。“子女也都不靠这个吃了，我们老年人又不靠这个赚钱了。”

渔民心态还有一个矛盾的点在于，虽然他们确信渔民得另谋出路，不能再每一代都当渔民，“我们这一辈应该是末代渔民了”，但是完全没有渔民又是一件不太容易想象事情。“渔民本来就是太湖边上的一道风景线，没有人打鱼好像缺了什么一样的。”

三、退捕政策与生计转型政策

笔者在横泾镇调查的时候，发现有一家开了很多年的渔网店，出于对渔网生意是否受到影响的好奇，于是对渔网店的店主也做了简单的访谈。意外的是，渔网店老板称生意没有受到什么特别大的影响：“还是有人来买网张鱼的。”这件事情促进了笔者对政策理解的转向，就是“退捕”和“禁捕”的含义区别很大。退捕不是完全禁止捕捞。就像过去“数罟不入汙池”，严法之下仍然存在合理的空间。

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 2020 年 7 月 12 日出台的方案及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8 月 7 日发布的公告，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决定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收回太湖渔业生产者捕捞权，撤回捕捞许可，相关证书予以注销。

退捕并不是指禁捕。长江大保护是禁捕，但是长江流域的太湖是退捕，也就是说不进行大规模的捕捞，但是小规模捕捞不予禁止。渔管部门工作人员说：“退捕不意味着不捕。是改无序捕捞为有增殖、有配额的捕捞，更有效地保护好鱼虾资源。”生态系统也有其维持自然稳定的方法，很多鱼虾寿命也就一两年，不捕捞同样会造成浪费。今后 40 万亩太湖保护区以外的水域，将由第三方机构对太湖渔业资源评估，制定新的捕捞政策，以专业捕捞公司的形式对太湖水产有组织地捕捞。直接肩负起禁捕

检查重任的是太湖上的渔政巡查监督员，监督员也会对捕鱼的情况作出区分，“只要能保证安全，小网小钓是不会为难的。而且人家小弄弄也要阻止肯定是不人性化的。”

了解到了退捕留存的空间，政策在保证不严苛也不松散的情况下，就要进一步寻求把强制性色彩转化成为一种福利性手段。这种转变就是要想办法让渔民没有“失去感”而要有获得感。所谓的获得感，是从两个方面建立起来的，一是给予直接的现金补贴，二是提供就业、创业途径。制度经济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具有外部性的经济行为会造成市场失灵，需要制度变迁或政府干预进行调节，以激励个体行为服从于集体，进而获取集团或组织利益最大化取向。对于转产就业而言，渔民退捕放弃了具有用益物权属性的捕捞权利，将失去赖以生存的生计来源，同时具有长江水生生物恢复和保护的生态效应。政府未干预情景下，成本将由个人承担、生态正外部性将由组成国家这一集团的分散个体享受，存在行为成本和收益不对称，作为经济人的渔民无积极性参与禁捕退捕。

根据收集到的渔民补偿信息，可以归纳出如下的一些补偿措施：

1.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享受对象：已认定就困人员，并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参保退捕渔民。

补贴标准：每月补贴 491 元，其中，女性年满 45 周岁、男性年满 55 周岁的每月补贴 654 元。补贴期限一般不超过 36 个月，2020 年 1 月 1 日起，对就困人员享受政策期满后仍未实现稳定就业的，可延长 1 年。

2.创业社会保险补贴

享受对象：登记失业，创业并进行商事登记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正常运转并依法缴纳社保的本区户籍退捕渔民。

补贴标准：按实补贴，最高不超过当年企业、个体工商户各险种参保缴费基数下限计算单位缴纳部分之和的 120%。

3.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登记失业的本区户籍退捕渔民可参加免费技能培训、SIYB 创业培训、创业大讲堂，可至户籍所在社区（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站报名。

4.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补贴标准：对吸纳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就业，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满 3 个月的企业，给予 1000 元/人的补贴。实行简易程序，无需企业申请。

在就业帮扶这个部分，就拿吴中区来说，举办了技能培训 6 期，创业大讲堂 6 期，政策解读 8 期，涉及退捕渔民 1063 人（次）。区内木渎、光福、胥口三镇自 2020 年 10 月以来召开了 19 场专场招聘会。苏州大市范围内总计召开 43 场，提供岗位 15363 个。其中很多是针对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的公益性岗位，有 115 名渔民投入到这些公益性岗位中。截至 2021 年 1 月 8 日，苏州市退捕渔民 9839

人已 100% 实现转产转业，全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¹

在与渔业部门访谈时，了解到，在这些招聘会上，其实还有些年轻面孔。有的是来自渔民家庭，对本来的职位不是十分满意，也会参与到这些岗位的招工中来。这个现象并不是要表现渔民家庭“钻了空子”之类的，而是说明这些招聘本来具有比较浓厚的福利色彩。就渔民家庭的青壮年人群来说，以其本来的能力找到的工作，不如今天政府号召下提供的岗位好，这说明政策提供了很显然的让利，这也是“获得感”创设中的关键一步。甚至有些岗位的开设面向的本来就是渔民家庭中的这部分青壮年人群，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四、渔民的生计资本

一般认为，转产后的渔户依旧面临来自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多重扰动的威胁。一方面，渔户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生计能力弱，转后面临适应新生计方式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政府会给渔民提供很多多种多样的职业培训，但是在这个连接旧职业与新职业的过程中，职业技能培训是偏向新职业的，从旧生计入手也是相当重要的，这就需要对渔民的生计资本做一个整理。

（一）原有的技能与知识

前文已经提到，经常从事捕捞工作的渔民具有很多水上技能。因此在与渔政部门的访谈中，很多渔民已经进入到了河道清洁甚至是渔政工作中去。苏州市东山镇的渔民共计移交渔船 760 条，其中 710 条船只只被拆解处理，剩余 50 条使用情况较为良好的船只予以保留，用于打捞水草和清理垃圾。

原有的技能与知识反映的是熟练度与意愿。如果能够提供与渔民原有的技能与知识高度符合的工作，那么这种转变就不会显得剧烈。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这对社区提出的要求就是要评估渔民对各种技能的学习情况。而这个环节现在看来是很多社区缺乏的。

（二）依托何种环境资源

渔民生活在湖域，湖域即意味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旅游资源。就拿渔港村所在地来说，这一带的太湖水域十分开阔，烟波浩渺。不远处有著名的光福香雪海赏梅胜地，以及太湖七十二主峰中的蟠螭山等。现在渔港村的 2000 多条渔船停靠的湖岸本身也成为了一处观光胜地。因此，渔民在其所生活的环境，据有着非常优质的资源。

据太湖渔港村的村干部介绍，该地有不少渔民开始发展以“船菜”为特色的“农家乐”。同时也具备比较好的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指农户的房屋、家用各类物质设施及当地政府为渔民提供的当地良好的基础设施等。人力资本指农户家庭中的劳动力，在乡村这个环境中，邻里关系较为紧密，一家创办某份事业的时候，邻里、居住较近的亲戚能够提供必要的帮助。并且许多家庭的年轻人据有良好的知识水平，相比于老一代更具开拓思维，能够结合自己对社会的年轻化的认知去提供发展第三产业的思路。

因此，环境资源作为渔民自身以外的生计资本也是不可忽视的。

¹ 数据来源：苏州市人社局，2021。

五、结论与建议

（一）作为一种式微景观的渔民生活

其实对于所有靠太湖的渔民来说，捕鱼更是一种景观。

从职业的角度来说，渔民的转业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但是整个调查过程中，对渔民这一身份有高度认同的渔民话里话外都透露出非常真挚的惋惜之情，以及对这种传统生计形式的感情。以往关于苏州太湖的摄影当中，摄影师们都会去关注渔船上渔民扔出的那张大尼龙网，背景就是太湖暮色。与一个地区有着较高依存度的职业与这个地区的文化一定有着相当重要的关联。比如生态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认为，环境和文化是不可分离的互动关系，而非是简单的、线性的因果关系，文化在环境的型塑下而具有特定的地域性特征，文化生态适应才是文化变迁的动力，并认为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变迁都由技术或生计变化而引起的，其中生计方式是其文化核心。

在完成退渔的娄葑街道金益社区，地方政府建起了很多的渔耕文化园，在馆中展出鱼篓、渔网，还有等比例缩小的渔船，对这个地区来说，这是一种记忆，也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因此，从政策角度出发，或许可以在以后注重建成这样的文化馆，或者保留一些渔船景观，留存特殊的地区记忆。

（二）退捕的生态作用与渔民的返湖

当然我们将渔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景观来怀念，并不是说要认为退捕不应该进行，相反地，退捕能够起到非常显著的生态恢复作用，从长远角度来说，退捕是对太湖水域生态多样性的最为行之有效的保护。

今年刚好是退捕一年期满，有关管理部门在进行水质观察以及渔业监测的时候发现，退捕的这段时间，太湖流域的生态多样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太湖流域的一些村庄的河流里，也出现了一些以前难以见到的一些鱼类。

退捕不仅仅是捕捞行为的被阻断，同时，1900多亩的原本用于停靠渔船、放置渔篷的太湖滩涂得到了整治，1.58万亩围网得到了拆除，还有很多养殖池塘得到了标准化改造。

表面上看，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环境面貌，需要让渔民退出湖泊，但无法否认的是渔民才是最了解水域的人。在渔民再就业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渔民被聘用为河道、太湖水域水质清洁员，进行打捞水草的工作。退捕生态作用的更好的发挥也需要渔民的维护。所有的改变，都需要照顾到渔民的情绪，得到渔民的支持。

（三）生计资本挖掘与重建的策略与原则

由本次调查可以获知，生计资本的挖掘与重建需要遵照一些基本的原则，才能够高效落实宏大的政策。退捕禁捕与生计转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为了使整个长江流域长达十年的退捕禁捕对渔民生活不构成重大影响，只有使生计的平稳过渡成为其前提与保障。所谓的平稳过渡，其实就是对其原来具备的条件进行再利用，对其不具备的条件进行全力的创设。渔民本来具有比较多的生活技能，并且已经具备一些转型的可能，呈现出生计多元化或者是退渔的倾向。

因此，政策要坚持的第一条原则是以渔民的选择和条件为本，政策应当提供的作用是发展型指导，

而非带来某种切断式巨变。就渔民这个群体来说，他们中本来就有一部分群体选择去进行水产养殖，因为对这项工作熟悉，且掌握很多相关知识。同时他们本来就与渔业市场有过生意上的往来，积累了必将充足的社会资本。但是，也需要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渔民都希望去从事某种特定的职业，这时政策需要做的就是为渔民提供一些方案。方案的多样性要确保的不是照顾到所有的需要，而是提供选择。比如现行的方案中，可以选择“买断式”的补贴，也可以选择按月付偿。如果对职业有要求，那么可以选择创业补贴，也可以选择再就业支持。选择多了以后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会被考虑到，重点在于提供一种“被考虑”的良好心态，借此容易获得渔民们后续的支持。

第二个原则是，涉及到生计转变的政策应该尽可能的精确化。正如脱贫攻坚、农民退耕等工作一样，国家的政策在一步步走向精确化。精确化一方面会加重统计的负担，但是另外一方面能够使得政策更加人性化，照顾到更多的需要。一项工作的建档立卡应当从渔民自主登记转化为自主与调研相配合，提高信息的完整度。

第三个原则是长远考虑。拉长时间线，考虑到这项工作的后续影响。比如说在前一个问题中讨论的作为景观的渔民生活问题。其实表面上看太湖只是退捕了十年，但是实际上，太湖一代十年后可能只会有渔业，不会再有船居的渔民了。

参考文献：

- [1]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刘子飞, 2020, 《长江退捕渔民转产就业政策: 目标、进展与建议》, 《农业经济问题》第 8 期。
- [3]陈风波、汪聪、Samantha Punch, 2015, 《“陆上定居”对渔民生计的影响》,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 [4]朱利安·斯图尔德, 2013, 《文化变迁论》, 谭卫华、罗康隆译, 杨庭硕校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 作者简介: 李汀, 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19 级本科生

☆ 责任编辑: 邢小龙

灯饰产业集群现象的社会学研究

——以中山市古镇镇为例

龚 宇

摘要: 广东省经济发展迅猛, 位居全国前列。在对外开放和创新创业上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积累了大量外资和华侨等海外资源和创新资源。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起, 逐步崛起了一批基于一种或几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 主导产业相对集中、经济规模较大、专业化配套协作程度较高的专业镇。中山市古镇镇是一个有着超 40 万人口的专业镇, 灯饰产业是全镇支柱型产业, 是珠三角地区“特色小镇”的典型代表。在政府推动、市场主导、行会帮扶等诸多力量的影响下, 古镇镇的产业集聚展示出其独特之处。

关键词: 特色小镇 产业集群

一、 导言

中山市古镇镇地处珠三角腹地, 土壤肥沃、植被丰富。早期经济以第一产业为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古镇镇开始出现镇级工业, 制糖业成为全镇的支柱型产业。典型代表是穗丰年、德丰隆等糖厂。进入人民公社时期后, 机砖厂、机械厂等工业型企业迅速发展, 产品远销外省。

灯饰行业属于日用品行业, 其产品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前后, 北京、上海、温州、佛山等地均出现相关产业。古镇镇家用电器厂生产的简易版台灯得到了良好的市场反响, 使古镇镇政府及人民看到了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利用侨乡的历史优势、地处珠三角腹地的地理优势、国家的政策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市场优势, 古镇灯饰行业迅速发展, 很快成为全镇支柱型产业。

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 古镇灯饰相继打败北京、上海、温州等地的灯饰企业, 成为全国灯饰产业的重要集聚地。据 2000 年广东统计年报显示, 当年古镇工业总产值达 32.46 亿元, 特色产业即灯饰产业的产值达 25 亿元, 占工业总产值 77%¹。2002 年, 古镇荣获“中国灯饰之都”称号。2016 年, 古镇入选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 国家层面给予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 古镇灯饰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2017 年, 古镇共有灯饰企业 1.8 万家, 灯饰及相关配套企业占全镇制造业 80% 以上, 占据国内 70% 以上灯饰市场的份额, 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扛鼎者。

¹ 广东统计局:《广东统计年鉴:200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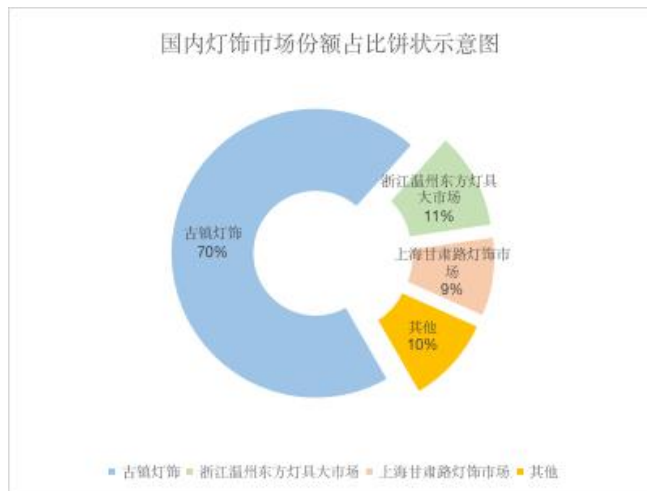


图 1 国内灯饰市场份额占比示意图

本调查从对古镇镇灯饰产业集群现象的集聚过程与产业升级出发，运用产业集群演化三阶段模型理论，即成功的产业集群一般会经历数量扩张期、质量提升期和研发与品牌创新期 3 个阶段，描述古镇灯饰产业集群演化规律，及其在城镇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而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上述演进的内在机制，刻画古镇灯饰行业发展现状，探究其成功原因及面临问题。最后，通过总结和反思古镇灯饰产业集群现象的相关经验，提出对灯饰产业升级的意见和建议，并对以产业化建设带动城镇化建设的路径进行可行性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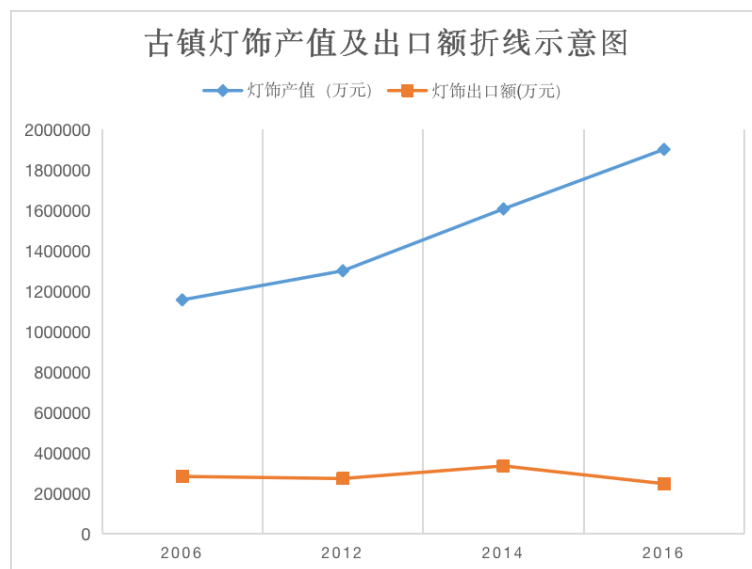


图 2 古镇灯饰产值及出口额示意图

二.文献回顾

申兆光、邝国良将产业集群的形成模式分成三种，分别是：（1）市场自发型形成模式。初始动因来自个人、企业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市场在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中起着相对重要的作用。（2）政

府推动型形成模式。初始动因来自政府对本地区经济利益的追求，政府在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相对重要的作用。(3) 混合型形成模式。初始动因来自个人、企业和政府对各自经济利益的追求，其决策的偶然性和一致性导致某种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中市场和政府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根据调查发现，古镇在灯饰产业的集聚过程中，市场和政府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从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上看，属于混合型形成模式。

从古镇灯饰产业的起源上看，米增渝认为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尤其是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空间使得在顺德、南海等地首先恢复了如纺织、小电器、五金和花卉生产等方面的传统。临近香港的优势又使得在技术、管理上得到外来的知识和支持，结果在这些地区形成了一批历史形成的专业镇或者企业集群。

从发展上看，盛世豪、张伟明提出，如果我们将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各地以传统特色产业为基础形成的块状经济视作区域产业集聚的 1.0，将传统特色产业在区域范围内按市场机制分工协作后形成的传统产业集群视作产业集聚的 2.0，那么，以特色小镇为代表的特色产业发展平台，则是在原有传统产业集群模式基础上的创新和升级，是区域产业集聚的 3.0。参照浙江特色小镇的标准，可以大致推断出古镇产业集聚位于 2.0 向 3.0 的转型过渡阶段，产业集聚呈现新特点。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不断的壮大，并且成为世界四大灯饰基地之一，古镇政府总结出五大优势：一是市场占有率高。据统计，古镇灯饰在国内各主要装饰类灯具市场上的占有率已超过 6 成，使区域品牌的知名度不断提升；二是行业集中程度高，形成了全国知名专业市场。经过长期引导和扶持，在成本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基础上逐步确立的比较优势，是古镇“灯饰一条街”专业市场规模不断壮大的根本保证；三是企业经营机制灵活。古镇灯饰企业基本上都是个体、私营企业，因毗邻港澳而积累了较强的市场应变能力和出口加工能力，市场竞争能力明显提高；四是灯饰产品自身优势。产业集聚带来优势也促进激烈竞争，因此古镇灯饰产品更新速度更快，产品款式新颖，品种丰富；五是外销的产品更具有价格优势。这五大优势吸引国内外客商和生产商源源不断进入古镇灯饰行业。

从现状来看，古镇灯饰产业集群尽管市场占有率多，但是产业的转型升级也遭遇瓶颈。阮建青等提出的产业集群演化三阶段模型理论，即成功的产业集群一般会经历数量扩张期、质量提升期和研发与品牌创新期 3 个阶段，从数量扩张期演进到质量提升期的主要原因是内生质量危机，从质量提升期演进到研究与品牌创新期的主要原因是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如何把握行业发展的现状，早日完成产业转型，是古镇镇政府下一步应当重点关注的。

姚尚健认为，特色小镇首先是经济转型的产物，承担着产业升级与转型的重任。所以更好的了解灯饰产业集聚现象，有助于其“产业化带动城镇化”的特色小镇建设示范功能的发挥。

不难发现的是，当前对于产业集群现象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浙江省的特色小镇。而对于广东省以及古镇镇的产业集群的研究较少，尤其缺少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的相关研究。除此之外，现有研究往往从大处着手，多以全镇作为研究抓手，而忽略村级工业。

本次调查致力客观描画古镇镇灯饰产业集群的契机、发展和现状，从社会学视角分析其产业集聚

现象。通过对其特色产业的呈现，发现存在问题，总结发展经验。

三、研究方法与特色

本次调查主要运用了文献法和访谈法两种社会调查方法。通过阅读古镇镇的历史资料和照明行业统计年鉴等相关文献，对古镇灯饰行业的起源、发展及现状有了大致的了解，奠定了调查的基础。同时，对于古镇在全国乃至全球灯饰行业中的地位，有了大致定位。通过阅读文献，正本清源，有利于更好把握调查对象。

在积累背景知识后，积极联系古镇镇政府人员。在镇团委的帮助下，成功与镇相关工作人员建立联系，并获得《古镇镇志》等官方资料，丰富了资料来源。

除了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外，还与广东省湖北商会照明电器分会会长取得联系，并顺利访谈。最后与多位灯饰行业从业者进行交流，获得较多实践经验。

本次调查跳出产业集聚与发展是市场、区位或政府推动的研究范畴，将行业起源的偶然性、社会关系网络、地区文化、共同价值观、互惠关系等要素纳入调查内容，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其经济行为背后的社会性因素，并关注社会关系网络、地区文化等社会要素在其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四、古镇镇概况

（一）地理概况

古镇镇是中山市下辖镇，位于广东省中山市西北面，中山、江门、佛山市（顺德区）三市的交汇处，毗邻港澳。距广州 80 多公里。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暖湿润，气候宜人。全镇总面积 52.22 平方千米，下辖 12 个行政村、1 个社区。2016 年，常住人口 15 万人。截至到 2015 年，古镇镇有 S364、S268 和轻轨穿境而过，轻轨站为古镇站，总面积 44100 平方米，设计最高流量 8000 人/天。

（二）经济概况

古镇镇以灯饰、花卉苗木两大产业为支柱，是华南地区较大的花卉苗木种植基地和销售市场之一。同时，也是世界四大灯饰基地之一，是“中国灯饰之都”。2016 年实现地区工业总产值 253.8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6.89%；其中灯饰产业产值 190.3 亿元，占比超过 70%。三次产业比例为 1.84:62.56:35.6。全镇有工商部门登记各类企业、个体户 1.8 万户，其中登记注册灯饰销售企业 9661 户、灯饰制造企业 8856 户。有中国驰名商标 3 个、广东省名牌产品 7 个、广东省驰名商标 3 件、广东省著名商标 15 个¹。

目前，古镇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灯饰灯具生产基地和批发市场。其中，“古镇灯饰”被国家工信部核定为首批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示范区，古镇镇利和灯博中心获批成为第四批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全镇登记注册的灯饰企业 18517 个，灯饰产业总产值超过 150 亿元²。灯饰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占国内市场份额的 70% 以上，并出口到港澳台、东南亚、日本、美国及欧洲等 130 多个国家和地

¹ 数据来源：《中山市古镇镇年鉴：2006-2017》。

² 数据来源：《中山市古镇镇年鉴：2019》。

区，拥有全球性的产业商贸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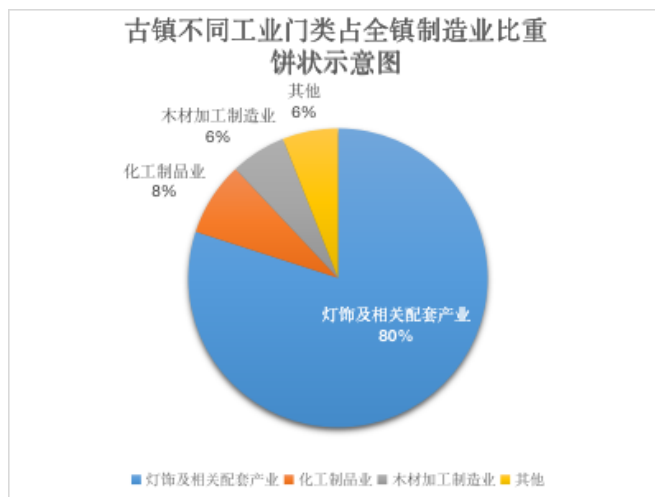


图3 古镇不同工业门类占比示意图

（三）移民概况

古镇镇华侨历史源远流长。当地《观音始庙序言》记载，清乾隆三十年，“喜外侨归梓里，慷慨解囊，筑红墙绿瓦，煌然庙貌宏观”¹。证明早在乾隆年间，古镇便有人出洋侨居。根据2018年古镇镇归国华侨联合会的数据，全镇有华侨华人3300多户，23000多人，分布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香港、澳门、台湾等23个国家和地区。广大旅外乡亲爱国爱乡，兴教育，建医院，热心慈善事业，捐资赠物，历年累计捐赠公益慈善金额超1000万港元。

五.灯饰产业集聚过程

（一）萌芽阶段——好风凭借力

1.偶然的契机

据古镇镇志记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古镇村民去往香港寻亲谋生路，数年后返乡。在返乡村民携带的大量“新奇物件”中，“台灯”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当时古镇人民大多使用的是煤油灯，气味大，光线弱。这盏“台灯”的出现，在古镇人民心中埋下了种子。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古镇家用电器厂的供销员在推销的过程中发现了人们对台灯的需求，该厂员工马上土法上马，开始用“一根电线、一条弯管、一个灯泡加灯座”生产出最初的简易版台灯，这可以看作是古镇灯饰最早的起源。

2.历史的机遇

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中山古镇处于珠三角腹地，毗邻港澳与深圳和珠海两个经济特区，享受到国家资源的倾斜和政策的支持。

¹ 资料来源：《中山市古镇镇志》。

乘着改革开放和深圳经济特区的东风，灯饰企业的发展逐渐走上快车道。1985年，古镇镇提出“发展工业”的战略，倡导建立村级工业区，集体和私营工业经济得到发展的机会。随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不与民争”的优惠民营企业政策，把镇集体企业中的灯饰企业全部撤出。东方灯饰公司、华艺灯饰公司等一批企业得以顺利发展。到1986年，灯饰企业产值已达1158万元。

3.工业的基础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古镇镇在周边城镇小型民族资本企业的影响下，涌现出最早的一批工业企业。制糖业从一众小型民族工业中脱颖而出，成为全镇的支柱型产业。尤以穗丰年、德丰隆等糖厂为代表。进入人民公社时期后，机砖厂、机械厂等工业型企业迅速发展，产品远销外省。小工业的发展为后期转型灯具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发现“简易台灯”巨大的商业市场后，古镇机砖四厂转产为“古镇异型灯具厂”，开始小批量生产环形弯管、吸顶灯、台灯、应急灯等。由于市场反响剧烈，临近地区都开始进行灯饰的仿制加工。到1982年，又集体合资开办了两间较大型灯饰厂。

4.侨乡的优势

与东南沿海的其他地方一样，古镇有悠久的移民历史，清末至民国时期，国内生存环境愈发困难，19世纪中叶，出现第一次出洋浪潮。据统计，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姓名和居住地址的古镇旅居外国华侨及外籍华人有3744人。2000年，又在全镇范围内进行的侨情调查，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的人数和分布状况如下：

2000年古镇镇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人数分布统计表

洲别	侨居地	人数(人)	洲别	侨居地	人数(人)	洲别	侨居地	人数(人)
北美洲	美国	817	欧洲	英国	18	亚洲	新加坡	776
	加拿大	460		法国	17		马来西亚	264
				西班牙	5		泰国	138
				瑞典	4		印度尼西亚	137
				葡萄牙	3		越南	86
				比利时	2		柬埔寨	12
				瑞士	4		日本	9
南美洲	智利	1	大洋洲	澳大利亚	244	(港澳台)	香港	9786
				新西兰	7		澳门	3423
							台湾	112

图4 2000年古镇镇华侨、港澳台同胞人数分布统计表¹

大量的海外华侨在国外大展拳脚，积累财富。改革开放后，镇区连年举办大型庆典活动，积极向旅外乡亲发邀请函。1981年开始，回乡探亲、旅游观光的人数显著增多。1984年，中山市先后制定了《关于外商来投资企业的10条优惠办法》和《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决定》等优惠政策，鼓励侨胞和外

¹ 数据来源：《中山市古镇镇志》。

商来中山兴办企业。据数据显示，1989-1999年间，古镇共引进外资1.98亿港元，外资企业达55家，“三资”企业24家，主要分布于灯饰行业。

旅外乡亲除了投资设厂、引进设备与技术、引进人才外，还是古镇工业制成品“走出去”的重要销售渠道。1979年，古镇镇政府与港商签订来料加工雨衣、保温瓶带、录音带盒等项目，年收入54.6万元，占当年总收入的54.6%。对于灯饰产品更是如此。出口初期，在旅外乡亲的大力支持下，依靠过硬的产品质量和慢慢积累的口碑，顺利度过幼生期，进入成长期。接下来，古镇灯饰产品“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速，走过“桥梁”，去到更广阔的海外市场。

（二）数量发展阶段——细分与扩大

1. 政府推动——筑巢引蜂

80年代初，灯饰业成为古镇镇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从最初的“兄弟厂”、“夫妻店”的手工作坊起步，在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慢慢发展成为有现代化设备的大型民营企业集群。其中，最典型的方式就是建成“灯饰大卖场”、“灯饰一条街”，例如政府沿新兴大道、中兴大道建设了约10公里的“灯饰街”，共有铺位3600多家，使得要素空间集聚化，促进产业集聚，以此来发挥优势。

灯饰大卖场不同于一般的日用品大卖场，具有更强的专业性，即只售卖成品灯。灯饰一条街和灯饰大卖场有相同的意思。“大卖场”的空间较为封闭，单指某一幢建筑，例如“星光联盟”、“灯都时代广场”等就是古镇现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灯饰大卖场。而“一条街”的则较为开放，在空间上具有很强的延展性，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温州灯饰一条街”。古镇镇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全镇范围内，推进农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鼓励村集体出资建设大型建筑，规划专业产业街。由于各村集体经济规模不同，早期发展状况不同，产业集聚种类不同，因而确定了不同的发展定位，从一开始就避免了同质化竞争局面的出现。通过走访，对各村典型的“灯饰卖场”和“发展成果”有了大致的了解，以下选取四个跟灯饰行业密切相关的村进行介绍：

古一村：

1994年起确立物业投资出租发展的方向，先后兴建了古一灯饰城商业楼、古一灯饰配件城、古一货运场、古镇车站。近年来则致力兴建了新兴商业广场、瑞丰国际灯配城、庆丰LED商贸广场。因为古一村地处镇区中心位置，工业起步时间较早。从2002年开始，古一村就开始向房地产行业发展，建成新兴商住楼、乐丰花园大型商住区等小区。需要注意的是，古一村的主要商用门面以出售成品灯为主。

古二村：

该村经济发展以物业出租为主，建成有翠盈明珠花园、汇盈大厦、顺成楼、顺兴楼、顺发楼等。在地理位置上距离古一村更近，所以该村主要的商用门面以出售玻璃配件为主，也有部分成品灯的销售。

古三村：

古三村在地理位置上更加偏僻，房租价格普遍偏低。玻璃行业的“配套产业”在此集聚。例如钻

孔厂、电镀厂、包装厂等。钻孔厂用水量比较大，电镀厂、包装厂则对厂房的面积要求比较大。在提供同样的服务下，古三村具有更低的房租和用水用电费用的优势，使得这类工厂在此集聚。

古四村：

该村是真正意义上的镇区“中心”。全村面积约 1350 亩，其中有 650 亩是住宅用地。高档小区、镇政府、大型灯饰连锁企业、购物中心、美食一条街等在此汇聚。“双子塔”、灯都时代广场、国贸大厦、星光联盟等，是古镇镇对外交流的“门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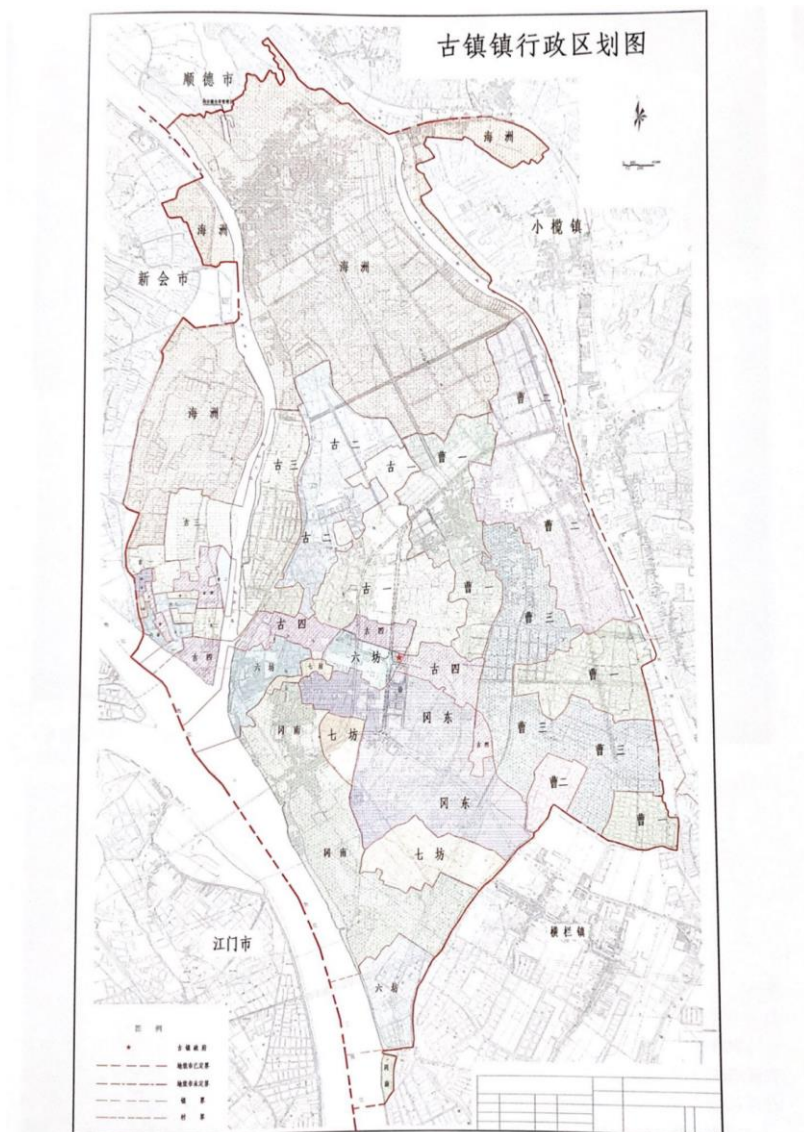


图 5 古镇镇行政区划图

通过资料可以发现，几乎调查的所有村级集体经济，选择经济发展的模式都是物业投资出租，实质上就是“集体经济搭台，自由市场唱戏”。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基本的交通、水电、厂房、门面等，筑好“蜂巢”，增加古镇灯饰行业的吸引力。例如，2020 年 3 月 28 日，由古镇经信局举办了

以“新机遇、新动力、新发展”为主题的“2020年中山投资经贸交流会暨中山人才节”，古镇灯饰产业智造基地将签约承接增资扩产和新投资子项目共22个，预计投资28亿元，将助力灯饰产业强壮链条，实现“智能制造”、“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如何促进同类企业集聚上，除了市场的自主选择外，由村集体经济自营的物业也会发挥其推动作用。例如古一村自营的古一物业，主管全村大多数商用铺面，在对外整体出售或者出租时，会对该铺面以后的使用进行规定，即应尽量以成品灯销售为主业，或是高新技术产业。如果在出租时，租客表示出要把铺面用以其他方面，例如玻璃或者物流，则往往会以“门面已出租”，或涨价等方式被“劝退”，以此来促进灯饰产业细化集聚。



图6 古镇地标建筑——星光联盟

2. 市场选择——集聚优势

根据马歇尔外部经济理论，产业区是一个中小企业聚集的地区，区域里创新气氛十分浓郁，新工艺、新思想能很快被接受、传播，各个中小企业之间形成一个既有效竞争又合作交流的网络。他在论述中总结了“产业区”所具备的6个方面的特征：①与当地社区同源的价值系统 and 协同的创新环境；②生产垂直联系的企业群体；③最优的人力资源配置；④产业区理想的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⑤竞争与合作并存；⑥富有特色的本地金融系统。

随着古镇灯饰行业的不断发展，配套企业也越来越完善，产业链得到有效延伸。灯饰产品上、下游分工细化、配套完善，带动了包括玻璃、五金、电线、电器、包装等在内的配套企业的发展，形成了专业市场。目前，较大规模的专业灯饰配件市场有4个，各类配件门市1000多家、相关配件生产企业近1000家。在古镇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就能找到几乎所有灯饰产品相关的产品和配套工业。产业链的延伸和配套企业的完善使得灯饰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生产成本和物流成本。

由于古镇灯饰行业具有准入门槛低，配套资源齐全，需求市场广阔等特点，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到灯饰行业中来。很多工人在灯饰厂或者玻璃厂打工一两年后，就会选择自己开办工厂或者门市，这直接导致古镇现有的灯饰及其相关企业中，超过 90%为小微企业。例如，最初的华艺灯饰厂便是由曲炳文与另外两人凑的 5 万元，聘请的 4 名工人组成，中小企业的数量庞大，起到了活跃市场的作用。

除此之外，古镇镇重视发挥“以节兴业”“以节扬名”的功效。连年举办如“灯饰博览会”等活动，成功打响古镇灯饰品牌，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洲，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以伊朗为代表的中亚，以及韩国、澳大利亚等地的采购商都会来古镇采购灯饰。这也造成古镇灯饰销售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外贸占比大。2018 年，古镇镇进出口总值 25.2 亿元。其中进口总值 2.5 亿元，出口总值 22.7 亿元¹。如此巨大的需求市场，和比较之下相对廉价的房租、水电和人工，使得古镇灯饰产业的行业参与者越来越多，产业集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3.行会帮扶——重要补充

古镇镇拥有大量的商会，规模比较大的有江西商会、浙江商会、温州商会、福建商会、湖北商会、安徽商会等。此次调查以湖北商会为例，进行行会有关内容的展开。

（1）规模与入会条件

湖北商会全称是广东省湖北商会照明电器分会，在古镇镇拥有超 200 家会员单位。加入商会的基本要求是企业法人必须为湖北籍。其次是对成员的经营范围、状况、资产进行大概的了解。这些是申请入会成员本人填写的，资产状况无需验证。而一般只要交纳一定的会费，定期参加商会组织的活动，就可以成功成为会员单位。

（2）吸纳新会员的方式

①老会员带新会员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个人从经济欠发达的省份流动到经济发达的省份，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经济效益。灯饰行业由于准入门槛较低，对于经营者的要求不高，且一直有原来是打工仔，后来通过努力自己开厂当老板的成功案例，故而更加吸引外地人前来经商。这种“新老关系”可以是邻居、亲属也可以是朋友。例如有哥哥先过来开厂，赚取财富后，弟弟也过来走哥哥走过的路。内在的原因还是因为相关利益的吸引，而加入商会往往对生意的成功有所帮助。

②出于需要主动加入

这种情况同第一种情况比起来会少一些。以湖北商会为例，有湖北的灯饰厂商到古镇来设厂或者采购部，因为“人生地不熟”的关系，加入商会往往可以得到一些讯息和便利。

（3）会员选择加入商会的动因

①心理慰藉

尽管加入商会需要一笔不菲的用作商会的日常运作和商会团建的“入会费”，但是大部分“老乡”

¹ 数据来源：《中山市古镇镇年鉴：2019》。

还是愿意定期花上这样一笔钱。根据从湖北商会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当商会进行聚会时，基本都会说湖北话，而不讲普通话。同样身处异乡的老乡们，通过语言的方式，可聊慰自己的思乡之情。

②信息交流互通与资源整合

所谓“商人重利轻别离”，信息的交流互通和资源的整合才是促使他们加入商会的最主要因素。例如湖北商会的某成品灯企业接到一笔订单，上游的玻璃配件行业、电镀行业、包装行业，下游的搬运行业、物流行业等等会迅速联动，“近水楼台先得月”。在了解最新的相关产业信息后，甚至一些货源比较紧张的配件也会提前被收购，然后再转卖出去赚取差价。

③“抱团取暖”

根据古镇镇统计年鉴的数据，发现全镇灯饰企业中，超过 90%为小微企业。小微企业可以活跃市场，但受限于规模和资金，生产能力和效率往往较为低下。但是如果小微企业能够聚集到一起，通过整合资源，可能就能发挥出较大的力量。商会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可以联系会内成员并搭建需求平台。例如 2014 年湖北商会就在古镇举办“山水武宁”灯饰城专题推介会，300 多家企业参展，成交额高达数百万元。

（4）商会在产业集聚中的作用

①提供归属感

古镇的原居民是有很强的优越感或者说是对外乡人的歧视，称外乡人为“捞仔”。而分布在古镇镇的诸多商会，让更多的“外乡人”在当地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这也是他们年复一年来到异乡的一个原因。商会为“同乡”们提供了交流和联络的平台，是很重要的心理寄托。

②扩大产业集聚规模

商会为了维持自身发展乃至壮大，需要吸纳新会员以不断充实，这就使得各种关系中都可能存在“先进带后进”的情况。通过兄弟情谊、展示财富等手段，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同乡进入灯饰行业，直接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和集聚。

③区域沟通的桥梁

商会同家乡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家乡既可以是产品的销售地，也可以是产品的上游工厂。以江西、安徽等地为例，由于古镇用地已十分紧张，原本在周边城镇例如江门、小榄开设的工厂，由于近年来严查环保，纷纷面临关厂的窘境。于是选择回乡开办工厂，或者与家乡工厂建立合作关系，以此来规避环保问题。尽管多是个企行为，但是商会在其中也发挥着信息的传递、牵线搭桥甚至担保等作用。调查中了解到，某玻璃企业的原材料生产厂由于环境污染惩罚而被迫关闭，在商会的牵线搭桥下，该企业与家乡某相关材料制造厂签署了合同，有效解决了玻璃企业原材料采购困难的问题。

（三）质量发展阶段——提升与引资

1.质量检测机制

古镇镇政府和灯饰厂历来注重灯饰产品的更新换代，及时淘汰档次低、质量不过关的灯饰产品，提出“产品质量决定企业生命”、“没有质量的产品是废品”的口号，全镇狠抓灯饰产品质量，成立“镇

质量技术监督办公室”、“个体私营质量技术监督协会”、“广东国际灯饰城（中国）出口有限公司”等中介服务机构，配足专职人员，对灯饰产品进行质量监督。

1999年，镇政府成立健全企业产品质量监督领导机构，进行专项整治，配备6名专职人员，组成110多人的跨部门、镇村联合整治队伍。2000年，全古镇厂企确立“以质量求生存”的战略思想，采取有效措施，提升产品的档次。到2005年被定为“古镇产品质量年”，加大对存在隐患的灯产品的整治，出动800人次，清查企业1464家。至此时，古镇拥有国家免检产品7个，年产品平均合格率达到80%以上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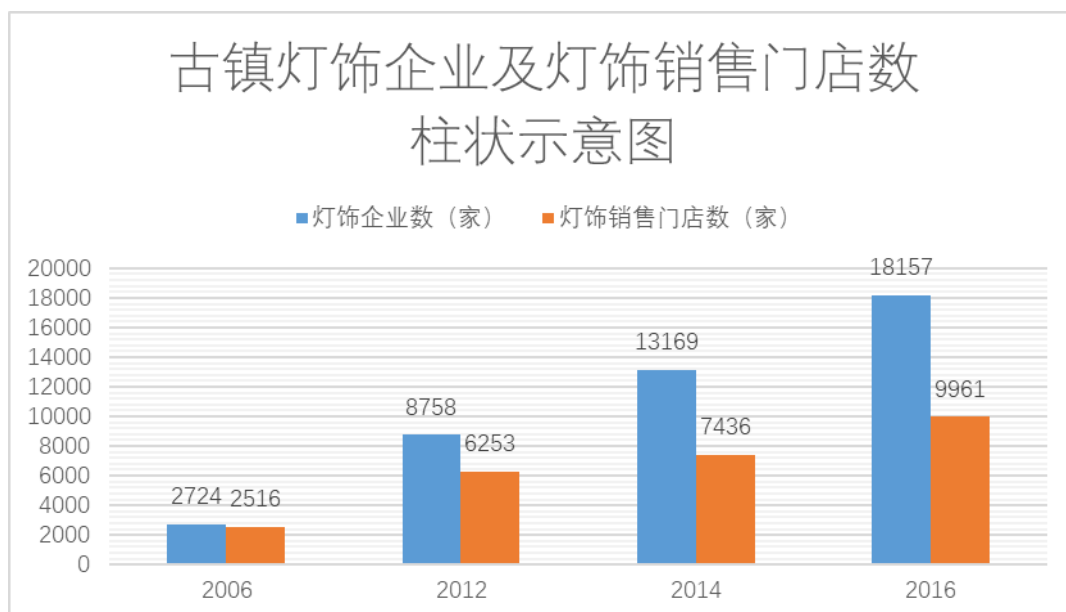


图7 古镇灯饰企业及灯饰销售门店示意图

2. 举办国际博览会

1999年10月15-20日，古镇举办第一届中国国际灯饰博览会。从1999年到2005年，古镇成功举办四届灯饰博览会，会展的水平一届比一届高，规模一届比一届大。每届灯博会目标与主题清晰，真正“让世界认识古镇，让古镇走向世界”，提高“中国灯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四）研发与品牌创新阶段

1. 加强研究开发中心、检测所、监测站管理

2000年，古镇实施“质量兴镇”战略，提高产品的质量，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技术创新平台。2001年组建了以中山市照明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和中山市企业技术中心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平台，带动各企业技术研发工作的开展，形成“镇级有行业技术中心，大企业有研发中心，中小企业有研究开发室”的立体型技术创新体系。同年开展“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工作，先后与多所大学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包括天津大学、中山大学等等。

¹ 数据来源：《中山市古镇镇志》。

2.创名牌、名优产品战略

2000年6月，古镇镇政府提出：要抓好创名优企业、名牌产品的建设，狠抓企业产品质量，实施品牌战略。2002年开展评选活动，选出镇内十大名牌产、灯饰的十大精品、十大强优企业，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实施商标战略、创名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重商标、创名牌”的好氛围。2003年到2005年，组织企业申报各级名牌商标，开展名牌评比活动。在古镇镇政府与企业的共同努力下，2005年，古镇已有6个著名商标、5个省名牌产品¹，极大程度地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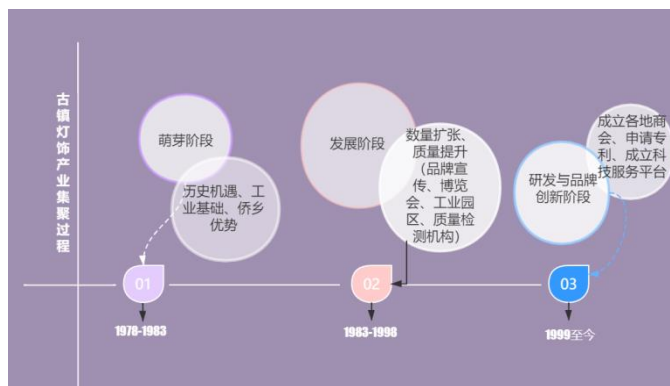


图8 古镇灯饰产业发展时间轴

六.古镇灯饰产业集聚特征

（一）同乡商会组织繁荣

民营企业兴起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需求。其中，属于个别企业特殊需求的，由企业自己解决；属于这些企业共同需求而各个企业无力解决的，有些需要政府供给，还有的需要政企合作供给，政府背后支持。对于民营企业的共同需求，由单个企业向政府诉求，既缺乏渠道表达，也缺乏表达能力和表达质量，这些共同的诉求即便偶为政府知晓，也难得受重视。因此，一方面，为了使政府重视，民营企业有了联合起来向政府表达共同诉求的需要；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联合起来后，也能互帮互益，共同合作满足自身需求。这就是商会产生的原动力。

古镇有超20家注册商会，且特色明显，大部分为灯饰行业同乡商会。这些商会规模大小不一，规模大的，会员单位超过200家，规模小的，会员单位也有几十家之多。不仅以省域为单位的同乡商会，如湖南商会、江西商会、湖北商会等，还有以市域为单位的同乡商会，如温州商会，台州商会等。后者比前者拥有更强的凝聚力。例如温州商会，甚至在古镇形成了著名的“温州灯饰一条街”，大量温州企业在此集聚，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同风雨，共进退”。也正是温州企业家这种“抱团发展”精神的成功实践，发挥了开创性和示范性的带头意义。此后，越来越多的灯饰行业同乡商会在古镇发展兴起，且呈现出“区域精细化”的特点。更具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同乡商会，是古镇灯饰行业发展崛起的一大特色。

¹ 数据来源：《中山市古镇镇志》。



图9 部分商会古镇办事处照片

（二）批发为主，零售为辅的经销模式

灯饰行业的销售，无论是成品灯，还是配件，一直以来主要的销售对象都是“圈内人”，即都是在灯饰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经销商。据中国照明协会的数据显示，批发在古镇灯饰销售中占比在 85% 以上。这也造成了“唯价格论”的出现。在产品质量差不多或者略有差异的情况下，往往是“价格为王”，价格更低，哪怕质量稍微差一点，也能够销路畅通，而真正优质的产品只有在外销单或者特别要求注重品质的时候，才会被关注和青睐。

因为“批发为主，零售为辅”的经销模式，使得古镇灯饰能够在短短不到 30 年的时间内，成功占据国内 60% 以上的灯饰市场，并且远销海外。也是因为该模式，导致“灯饰品牌”在日常生活中存在感较低。长期面对经销商的代理销售模式，使得终端消费者对于灯具产品毫无品牌意识可言。尽管全国有超过 70% 的成品灯来自古镇，人们所熟知的常州、温州灯饰，也有超过 60% 以上的产品来自古镇，然而经过二级经销商一转手，更换了产品名称和包装，就无人知晓了。

（三）侨乡经济优势明显

如果说“华”与“侨”两字的结合，重心在海外，专指特殊的人——侨胞；那么“侨”与“乡”两个字的结合，重心则在国内，专指特殊的乡村。“侨乡”之“侨”，取“客”“旅”这种特殊中国人之意；“侨乡”之“乡”，则特指“侨”的输出之地。简言之，侨乡是华人的祖籍地、华侨的家乡、归侨侨眷的聚居地。人、地结合，地域性是侨乡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古镇的侨乡文化特点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出洋者众，海外移民返乡现象普遍，人口流动

性强；其二，侨汇大量流入，成为侨眷重要的生活来源；其三，从物质到观念、行为，侨乡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四，侨乡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从中国传统乡村经济单一对土地的依赖，转向对侨汇依赖与土地依赖并重，甚至前者冲击动摇着对后者的依赖，输血型经济模式逐渐形成。

从灯饰行业的起源上看，海外侨胞为古镇灯饰行业的发展注入了第一批投资。前期“输血式”的投入很多不是市场行为，是不计产出的，更多是出于对家乡的情感，不惜财力的进行投资和帮扶。而古镇政府通过向旅外乡亲发放“问候函”和“祝福函”等，维系旅外乡亲和家乡之间的联系和情感，这在早期对古镇引进投资至关重要。古镇政府没有一直依赖“输血”，而是积极变“依赖输血”为“自主造血”。在前期投资有了良好的行业基础后，古镇灯饰不仅引进投资，在国内市场较闭塞的情况下，通过侨胞，开拓海外市场。据数据显示，古镇灯饰出口额 2006 年以来一直超 200 亿人民币¹。

七. “古镇经验”的总结与反思

（一）古镇镇灯饰产业成功的原因分析

1. 敏锐把握市场走向

相较于港澳、上海等地，古镇并没有灯饰生产的传统。作为“舶来品”的灯饰，却在古镇生根发芽，并不断发展壮大，这与古镇人民与政府精准把握市场走向是分不开的。从“一根电线、一条弯管、一个灯泡加灯座”的简易版台灯热烈的市场反响中，古镇人看到了灯饰市场巨大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不平衡。于是“夫妻厂”、“兄弟店”应运而生。房前是店面，房后是卧室，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古镇灯饰慢慢发展起来。

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逐渐鼓起来的“钱袋子”，对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对灯饰的要求不仅仅是实用，还要兼顾美观。在这种大背景下，古镇人锐意创新，打造出玻璃灯、亚克力灯、贝壳灯、木灯等新品灯饰，上市后市场反响剧烈，不仅成品灯的销售逐步走向正规，相关配套产业也越来越多的集聚于此。

进入新时代后，“节能、环保”成为灯饰产品的新诉求。“LED 灯”、节能型台灯、壁灯、夜灯等出现在市场上。灯饰常常与风扇“争夺”屋顶空间，于是就有了“风扇灯”。中国家庭对于子女的培养越来越重视，于是有了“儿童灯”、“护眼灯”等。

总而言之，古镇灯饰的每一次进步和改变，都是对于时代要求和市场需求的回应。而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蜕变与洗礼中，古镇灯饰越来越成长，最终成为全国灯饰行业的执牛耳者。

¹ 数据来源：《中山市古镇镇年鉴：2019》。



图 10 最新款灯饰——艺术灯

2. 政府政策的支持

古镇镇政府在早期就对灯饰行业的发展进行了很好的引导和保护。从起源上看，偶然的简易台灯的爆火，让古镇镇政府看到了经济发展的方向。乘着改革开放和侨胞返乡投资的东风，出台《关于外商来投资企业的 10 条优惠办法》和《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决定》等优惠政策，鼓励侨胞和外商来中山，来古镇兴办企业。不仅出台相关政策，并且积极落实。据资料显示，古镇镇政府早期几乎每年都会向海外侨胞邮寄“家乡来信”，通过这种方式来与海外侨胞维系情感，并唤起旅外乡亲内心深处的乡愁。毫无疑问，此举大获成功。

除了积极引进外资，古镇镇政府同时鼓励本土企业的发展。1985 年，古镇镇提出“发展工业”的战略，倡导建立村级工业区，集体和私营工业经济得到发展的机会。随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不与民争”的优惠民营企业政策，把镇集体企业中的灯饰企业全部撤出¹。东方灯饰公司、华艺灯饰公司等一批企业得以顺利发展。

进入新时代后，积极贯彻上级政府政策，减负减税，降低企业审批门槛，鼓励创新创业。保护原创，支持企业申请专利，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古镇灯饰行业发展持续发力，连年实现产值正增长，成功入选 2016 年全国第一批“特色小镇”名单。政府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发展前景良好。

3. “多强群英”局面的形成

与其他地区产业集聚很不同的地方在于，古镇产业集聚没有所谓的“龙头企业”。核心环节可以明确是成品灯的制作。在成品灯领域，有欧普、华艺、胜球、东方、太平洋等等比较大型的企业，但是并没有在行业中形成“垄断”的势头。“江山代有才人出”，每次产业转型或者产品更新的关口，都会有新企业乘势而上，也会有大型企业黯然退场。这就使得古镇的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确定核心环节的状况后，配套环节的情况也相差不多。例如玻璃行业，甚至没有出现“一强”，而

¹ 资料来源：《中山市古镇镇志》。

完全呈现出一种“平庸的平等”的局面。即没有特别出名的玻璃品牌或玻璃供应商。玻璃是从哪个门市部拿的，这个玻璃的品牌就是这个门市部的名字。而“炒货”的普遍存在，使得玻璃市场更是呈现出一种无序的状态。

从整体上来看，这种“多强群英”局面的出现，使得古镇的灯饰行业迸发出不同于其他行业的活力与压力。没有完全打得响的品牌，意味着每一笔订单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也让行业从业者都有机会成就财富，增加行业吸引力。上下游及配套产业也因此不断完善和丰富，形成良性循环。

4.多样化的发展动力源

古镇灯饰产业集聚形成的初始动因可看做是来自个人、企业和政府对各自经济利益的追求。而灯饰产业在集聚发展乃至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无疑受到了更多来自内外部动力的共同作用。以下所列是古镇灯饰产业集聚发展较为典型的发展动力源。

(1) 特色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模式

中国中山（灯饰）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是全国首个针对单一行业的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2011年，中国中山（灯饰）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正式成立，2018年，中山（灯饰）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业务系统上线使用¹。

大多数灯饰产品主要靠外观吸引顾客，而以低成本优势进行市场竞争的中小企业，不可能投入大量成本来进行产品的外观设计，所以模仿就成为中小企业顺应市场需求的重要手段。从初期的国内企业模仿国外企业到现在中小企业模仿大企业，无不表明模仿在古镇灯饰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模仿本身就是一种侵权知识产权的行为，过于泛滥的模仿使设计公司不仅没有办法有效维权，甚至由于较为高昂的设计费用而失去低价的吸引力，如一盆凉水浇灭了设计者的创新热情。

而快速维权模式正好可以解决申请专利的时间较长而灯饰产品的流行周期较短，导致创新企业寻求法律保护上的困难。随着专利相关案件的办理，可以潜移默化中提高人们的知识产权意识，调动企业自主研发创新的积极性。当创意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并带来不菲的利益时，企业才会向创新方向投入更多的资源。创新驱动可以有力的促进灯饰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与升级。

2018年9月3—5日，由中山市知识产权局和中山市古镇镇人民政府代表组成的中山市代表团赴瑞士日内瓦参加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总部举行的执法咨询委员会（ACE）第十三届会议。4日会议上，中山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尹明以“工业品外观设计保护中山古镇模式”作主题演讲，向WIPO成员国推广介绍中山古镇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模式，分享中山市实施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的经验，展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与成效，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肯定。

将特色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模式的“古镇经验”分享给国际社会，体现了古镇模式的独创性、先进性、权威性和可推广性，扩大了古镇灯饰的国际影响力，为其他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一个创新范本。

¹ 资料来源：《中山市古镇镇年鉴：2019》。

快维机制动态完善



图 11 古镇特色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模式

知识产权运用效益提升，极大地促进灯饰产业发展。大量创新资源的聚集，使古镇灯饰产业增加了大量的外观设计产出，提高了灯饰产品的附加值，进而提高了整个灯饰产业的产品整体竞争力和经济效益，提高了古镇灯饰市场的份额，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构建知识产权快速维权工作体系，有效的推动了灯饰产业的创新发展。

古镇灯饰企业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件）时间柱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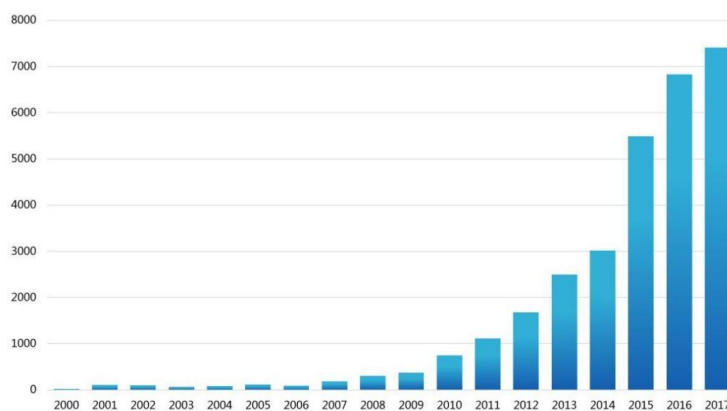


图 12 古镇灯饰企业外观专利授权量时间柱状图¹

(2) 专业人才的不输入

如果把古镇灯饰产业比作一片河湖，那么新的从业者就是流入这片河湖的各种溪流，有的溪流清澈见底，有的则浑浊不堪。在灯饰产业遭遇转型升级的瓶颈时，如何让更多清澈的溪流进入这片水域，或许是一种解决措施。

¹ 资料来源：《中山市古镇镇年鉴：2006-2017》。

2018年，古镇灯饰学院有学生284名，通过“工作室+工厂+市场”教学模式，学生不仅能够学习专业化的灯饰知识，还能把在学校学习到的书本内容应用到实践中。既接受专业的课程教育，深入当地灯饰工厂实践调查，又感受瞬息万变的市场潮流，越来越多年轻、专业而又富有创意的人才进入灯饰行业，为行业带来了新鲜血液，有利于抑制灯饰产业的闭环发展和故步自封，促进产业集聚的创新型发展。

（3）“以节兴业”、“以节扬名”

2018年，古镇镇政府举办了第7届国际照明灯具设计大赛、创意灯光小品设计大赛、第21届第22届灯博会。以第21届灯博会为例，展会以内销为主，兼顾外销，联手7大分会场，参展企业近2000家，同时结合古镇灯博会“展网融合”型B2B网站打造开春采购旺季，最终吸引了全球91个国家和地区近29万人次前来观展采购¹。

这些活动不仅为古镇灯饰的大中小企业搭建了销售的平台，让更多的企业和商品得到了更多的市场曝光，还呈现了多场精辟的行业研讨，协助业界捕捉商机，甚至丰富古镇灯饰的文化内涵，提高灯饰文化品位。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对于提升“灯饰之都”的知名度，以及加快灯饰产业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5. 举足轻重的行业中心

据中国照明协会的数据显示，全国有超过70%的成品灯来自古镇，人们所熟知的常州、温州灯饰，也有超过60%以上的产品来自古镇。除此之外，古镇还有大量的产品出口到欧美、日本及中亚各国，甚至有一大批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灯饰企业。从市场占比上看，古镇是毋庸置疑的灯饰龙头。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特色小镇”，古镇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前景。从上下游配套产业和产业链上看，古镇拥有国内最完善的配套产业体系和最完整的产业链。尽管近年来受到环保问题的影响，大量的工厂倒闭或者外迁，但外迁企业所生产的如玻璃等配件，依旧以运回古镇销售为主。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古镇立于时代潮头。从最初的简易台灯到后来的玻璃灯、亚克力灯、LED等和节能灯，每次产品的更新迭代，古镇都走在最前沿。

因此，在当下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古镇将继续保持其行业中心的地位，“中国灯饰之都”名副其实。

（二）灯饰产业的发展瓶颈

1. 劳动力资源丰富，高层次人才缺乏

古镇镇一开始只是一个落后的农村，因为把握住了机遇，积极转型，成为了“中国灯饰之都”。然而在产业转型升级时，人口的转型升级明显有些脱节。以政府机关为例，到2016年，某村才实现全部干部高中（职高）以上学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或者层次较低的劳动力在初期确实促进了产业的发展 and 集聚。上文提到的十数万外来人口，学历也普遍偏低。由于广东集群中的企业主大都是“洗脚上

¹ 数据来源：《中山市古镇镇年鉴：2019》。

田”的农民,缺乏进一步创新、创业的动机或能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古镇镇的产业转型升级无疑是矛盾的。当地创新中心通过举办讲座、培训班、请专家教授前来授课,并且组织他们走出去参观考察开阔视野。

高层次人才的缺乏已经成为古镇镇灯饰行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制约因素。尽管早在 2007 年,古镇镇就开始实行 15 年义务教育,即除免除全国统一的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和课本费外,还免除学前三年教育的保教费和高中三年教育的学杂费。希望以此来提高全镇人的文化水平。同时,还推出灯饰行业“名师”工程,加强与中山技师学院、中山职业技术学院、中山大学等院校的合作,并成立“灯具设计师”、“灯具高级技工”等职业技能资格认定评审组织单位。创新中心为推进灯饰产品的研发工作,积极推动与清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在技术创新、新产品研发、企业信息化方面进行交流学习。古镇一方面与复旦大学合作,多渠道培养专业人才,有委托培训、远程函授、现场授课等多种形式,另一方面联系上级职业培训中心经常性开设企业经营管理、产品标准、安全生产、劳动技能。在一系列举措下,目前已经初现成效,但离挣脱瓶颈,仍有一段路要走。

2.市场活跃却潜藏风险

目前,照明企业数量众多,但行业处于同质化竞争,市场无序发展当中,尤其是流量的碎片化冲击较为明显,过去企业的流量大多来自于线下的流量,但随着近几年电商、互联网等的蓬勃发展,很多照明企业都感受到了冲击,不同程度地逼迫着传统照明企业亟需转型升级。

根据古镇镇政府的调查数据显示,全镇的灯饰企业中,有超过 90%为中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数量庞大,广泛分布在灯饰行业的上下游企业中,成为活跃自由市场的主要因子。但是由于古镇特殊的金融交易体系——月结,使得市场呈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

所谓月结是指通过支票等形式,延期付款的一种交易方式。月结,表面上看是为了方便财务的对账、记账,实际上给需求方占用供应方的资金或货品提供借口。在实际操作中需求方可以用该“理由”占用供应商的资金达 30 天、60 天、90 天甚至更长时间。不仅给经营不善的跑路者规则的漏洞,为经济的发展带来无穷的隐患,也影响了很多本来很正常的经营者资金运转,带来了无尽的压力。

而由于准入门槛低,小微企业数量众多。小微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弱,一旦遇到风险或者生意上的失败,往往会选择跑路的方式来躲避债务。而月结恰好给这一操作提供了空间。而这种“跑路”所带来的反应是连锁的,一旦发生,就会对市场产生一些难以预料的后果。



图 13 某小微企业的生产车间

3. “区域有名，品牌无名”

灯饰行业的发展路径一般为：手工生产—机械生产—标准化—同质化—规模化—资本化—集约化。手工生产的生产率低下，必然会过渡到机械生产，而机械生产的特性也造成了灯具生产的标准化，由于标准化的大范围的推行，这就产生了同质化的灯具大量涌入市场，使得行业靠打价格战才能在这个市场上生存下来，行业利润不断被压缩，为了增加利润，有实力的厂家和经销商只能硬着头皮去扩大生产规模，由此进入规模化，没有实力的厂家和经销商只能沦为巨头垄断路上的垫脚石，垄断需要大量资本的支持，行业资本化就出现了，银行和金融家开始不断蚕食灯饰行业，最终通过资本入股，左右或者控制了巨头们，结果就是集约化的生产了。这时的行业利润才真真正正地上去，但是这个场景不会持续太久，因为消费者不满意这种局面，灯卖的非常贵，所以自然而然会有人跑出来打破这种局面，新品牌就出现了，之后经过一系列惨烈的市场角逐，又回到了规模化---资本化---集约化这条老路上，不断的推动灯饰行业的螺旋式上升。而目前古镇灯饰行业处于规模化向资本化方向过度，要想在未来几年不被吞噬，中小经销商和厂家只能往专业市场方向发展，通过细分市场来错位竞争。

古镇通过打造一系列活动，如“古镇灯饰博览会”等，使得“中国灯饰之都”的名头十分响亮。古镇因其灯饰区域品牌被工信部列入全国首批产业集群区域品牌示范区，古镇镇政府成立专门机构，以（古镇+图）商标为基础要素的优质产品标识为载体、以高质量标准及管理体系为前提，努力塑造古镇灯饰优质产品形象，推进古镇灯饰原产地标识进入实质性使用。以“古镇商标”为核心元素并标注“优质灯饰产品”的字样，包括标识的激光防伪标签、官网二维码等静态识别图文等。随着每年灯博会等大型特色节日的成功举办，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了解古镇，知道其在灯饰行业中的龙头地位。然

而在区域如此出名之下的，是品牌的默默无闻。尽管截止 2005 年 10 月，全镇已有广东省名牌产品 5 个、广东省著名商标 4 个、国家免检产品 4 个，规模企业数也由 2000 年的 60 家增加到 139 家。根据 2013 年的数据，中国驰名商标增加至 5 个，广东省名牌增加至 9 个，广东省著名商标增加至 15 个¹。名牌产品的数量虽然也有所增多，但是真正能够被大众所熟知的却几乎没有。哪怕是在行业内如雷贯耳的欧普、华艺、胜球等品牌，在行业外也是默默无闻的。灯饰品牌陷入“品牌无名”的尴尬窘境。



图 14 古镇“优质灯饰产品”商标

八.经验的推广——路径模式探寻

（一）古镇灯饰产业经验的可推广性

从 1984 年中山古镇灯饰产业兴起，到 2002 年古镇灯饰执全国灯饰产业的牛耳，再到 2020 年来到新的时代当口，风风雨雨三十六载。展望中国灯饰的发展，古镇仍将是行业举足轻重的集聚中心。因灯而立，随灯而长的古镇既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也有被淘汰的风险。制造产业链条完善的光环下，是核心技术、管理和营销的有待提升。其次，超过 90% 的小微企业活跃市场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如何更好引导小微企业的良性成长，营造更良好的创业环境，对于灯饰行业整体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区域出名”而“品牌无名”的窘境亟待解决，打响“古镇制造”的同时，也要不断丰富其内涵，打造更多具有代表性的，更广为人知品牌。在集群效应之外，打造更具优势的行业名片。

不难发现，古镇的特色产业——灯饰产业，并不是古镇的原生产业。作为“舶来品”的灯饰在古镇生根发芽，政府通过结合自身已有优势，如侨胞之乡、工业基础较好、劳动力资源较丰富等优势条件，积极培育特色产业，最终收获成功。在一次又一次市场和行业转型的冲击与洗礼中，把握机会，锐意创新，使得灯饰行业越办越好，最终成为全镇的支柱型特色产业。其他小城镇的发展，应当从古镇以专业化市场为基础的专业镇模式的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规避教训。了解自身实际情况，扬长避短。不盲目学习，结合自身实际，发展更具本土特色的产业。

¹ 数据来源：《中山市古镇镇志》。

（二）从产业集聚到正向空间溢出的路径

2016年，古镇入选中国第一批“特色小镇”名单。意味着古镇镇特色产业的发展得到了国家的认可。特色小镇产业集聚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从集聚发展到协同创新、从相对孤立到深度融合”，从而“优化内部生产力，扩大区域影响力”。在古镇特色小镇的建设过程中，灯饰产业集聚度不断提高，这也就使得古镇灯饰的产业识别度不断提高，灯具生产的各个环节也在优化提升。除此以外，古镇灯饰特色小镇的集聚能够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邻近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明确了古镇产业与周边区域产业发展具体的互补或者协同关系，吸引更多灯具企业迁往古镇。

（三）“以产带城”模式

“以产带城”指的是用产业化发展带动城镇化的发展。一方面，古镇灯饰产业集聚能够为古镇镇的城镇化快速推进打牢经济基础，提供就业保障。灯饰产业的优化升级也带动着城镇化的更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也将产业集聚推向更高水平的发展。

古镇镇地处中山市边远地区，基础建设差，交通不方便，农业生产单一，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并不发达。

改革开放后，镇党委和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业立镇、工农商并举，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方针，推进经济建设和城镇建设。1985年古镇镇被省认定为卫星镇后，镇政府按卫星镇的规划进行村镇建设，古镇镇成为首届全国投资环境100强的乡镇之一。1989-1990年，镇党委和镇政府聘请专家考察境内的地形与资源，论证和制定了《1990-2000年古镇镇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开始创建现代化城镇。

地理空间城镇化，农村地区或者自然区域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截至2016年，古镇镇土地总面积为52.21平方公里（包括河流水域面积），其中建设用地面积28.4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54.4%。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古镇的商业区、商住区、工业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与成熟¹。

产业结构城市化，改革开放以来，古镇镇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截至2018年古镇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22.8亿元，比上年增加6.4%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为31.8%和67.8%，第一产业占比只有0.4%，经济城镇化水平非常高，灯饰行业的迅速发展对当地经济结构的转型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社会文明城镇化，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不仅给当地带来了新的活力，也不断冲击着当地原本的宗族社会关系，原本当地人从事灯饰产业往往以宗族为单位，从灯饰产业的上游到下游的从业者都有一定的血缘关系，早期大部分的外资和技术的引进也主要来源于古镇旅居境外的侨胞，主要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1985年后，内地与港澳的经贸来往密切，结婚、投资者增多，1989至1999年，古镇共引进外资1.98亿港元，截至2005年全镇侨胞总计人数达22051人。由于宗族文化的根深蒂固，甚至出现了“治保会”这样的民众自发性组织用于调解商业矛盾与纠纷。但随着古镇灯

¹ 数据来源：《中山市古镇镇年鉴：2006-2017》。

饰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外贸出口在古镇灯饰行业占有重要地位，当地政府对商业市场的管理越来越规范成熟，不再需要太多的所谓知根知底的亲戚力量。法制建设的日益完善，人们的法制观念逐渐增强，良好的经商投资环境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商业投资，促进古镇经济更好的发展。

今天，无论是从中央的战略导向，还是地方政府决策者，以及社会资本对乡村的发展介入模式和载体，小城镇、特色小镇、文旅小镇等，越来越被重视，小城镇正在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战场”。费孝通先生认为，当小城镇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是农村工业化，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一部分村、乡(镇)企业建到了小城镇，从而给小城镇带来了人气与活力。在南方一镇一产业，一村一产品的布局非常常见，广东等沿海地区有大量与古镇相似的乡镇，通过古镇灯饰产业发展推动城镇化的，我们可以了解到类似于古镇这样具有专门化工业小城镇类型的城镇化发展路径。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集聚是城镇化的本质。灯饰产业集聚直接促进各地劳动人口向该地集中，为古镇城镇化发展带来了最为重要的条件：基础劳动力缺失的解决与消费需求的增加。前者使得制造业不断扩大，正向调整古镇原有的产业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就业结构也得到了调整。后者使得城镇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以及公共性服务业不断聚集，完善了服务体系，深刻改变了城镇治理状况。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地区性福利分配也必然提高到新的水平，制度更加健全，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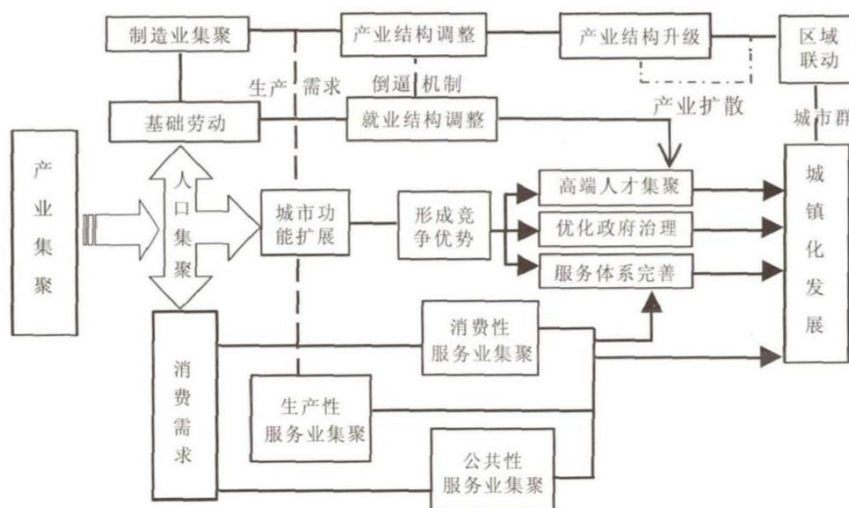


图 15 示意图

总而言之，通过古镇灯饰产业“以产带城”的实际发展效果看，城镇化发展应擅用产业化发展动力，将产业化发展与城镇化深度融合。在区域发展的良好基础上形成扩散效应，将发展成果进一步辐射到更广的区域中。

参考文献:

- [1] 赧金洲、赵迎军, 2021,《特色小镇产业集聚与都市圈区域集聚的耦合机制研究——以浙江省为例》,《软科学》, 2021 年。
- [2] 广东统计局,《广东统计年鉴: 2000》,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3] 李敢, 2015,《另辟蹊径的城镇化——基于浙江“钢琴之乡”双重产业集群化路径的案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第 9 期。
- [4] 米增渝, 2003,《论珠江三角洲专业镇经济的发展——中山市古镇灯饰专业镇的个案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 [5] 丘海雄、徐建牛, 2004,《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管理世界》第 10 期。
- [6] 阮建青、石琦、张晓波, 2014,《产业集群动态演化规律与地方政府政策》,《管理世界》第 12 期。
- [7] 冉琰杰、张国雄, 2020,《地域视野下的侨乡文化——以广东侨乡为例》,《广东社会科学》第 6 期。
- [8] 沈关宝, 2014,《<小城镇 大问题>与当前的城镇化发展》,《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 [9] 盛世豪、张伟明, 2016,《特色小镇:一种产业空间组织形式》,《浙江社会科学》第 3 期。
- [10] 申兆光、邝国良, 2007,《广东中山古镇灯饰产业集群模式研究》,《改革与战略》第 11 期。
- [11] 吴志国, 2017,《当代中国同乡商会组织兴起背景与原因的分层讨论》,《湖南社会科学》第 1 期。
- [12] 杨仁发、李娜娜, 2016,《产业集聚能否促进城镇化》,《财经科学》第 6 期。
- [13] 姚尚建, 2017,《城乡一体中的治理合流——基于“特色小镇”的政策议题》,《社会科学研究》第 1 期。
- [14] 张涵、杨晓昕, 2019,《异质性人力资本、空间溢出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科技进步与对策》第 22 期。
- [15] 中山市古镇镇经济贸易办公室, 2006,《中山市古镇灯饰产业集群》,《现代乡镇》第 1 期。

☆ 作者简介: 龚宇, 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18 级本科生

☆ 责任编辑: 徐婧怡



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演变：历程与逻辑¹

赖慧苏 曹海林

摘要：通过宏观研究发现，中国公众环境参与在各种要素的影响下不断演进，其在主体构成、主题领域、组织形式和参与效果等方面呈现阶段性差异。基于“演变动因—演变机理—演变趋势”的分析框架，展现了公众环境参与演变的逻辑，即公众环境参与的低效决定其需向前演进，自上而下的正式力量和自下而上的非正式力量的生成和激励共同推动它从“运动式”迈向常态化、从边缘化迈向主体式、从形式性逐渐转变为实质性参与。只有同时注重正式力量和非正式力量的生成和激励，才能持续推动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良性变迁。

关键词：公众环境参与 正式力量 非正式力量

一、问题的提出

公众环境参与是当代环境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环境社会学、环境法学和环境政治学等诸多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概念。全球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邻避冲突问题日趋严峻，这对各国在环境治理方面的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公众是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弥补政府与市场“失灵”和促进环境公平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使得公众环境参与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强调构建多元参与的环境治理格局，这充分体现了公众参与在中国环境治理中的重要性。

公众环境参与指普通民众作为个人，如普通市民、消费者、环保主义者，或群体的一部分，如环保组织成员等，参与环境保护和公共环境事务的处理^[1]。学界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关注集中于它的横向面剖析。例如，涂正革^[2]和史亚东^[3]等人致力于探究公众环境参与的理论来源和逻辑；洪大用^[4]和王晓楠^[5]等人利用CGSS数据，进行公众环境行为的多层分析，探究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因素和在不同领域中的表现；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分析公众环境参与的现状和困境^[6-7]。综观现有文献，从纵向层面探讨公众环境参与变迁的研究凤毛麟角。其中，韦惠兰和李颖将半干旱地区公众环境意识历史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并总结了它的演变特点^[8]；郑君君等人运用数据爬虫

¹ 本文已刊发于《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1年第39卷09期。

技术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嵌入在动态社会网络中的公众环保行为演化规律进行了研究^[9]；涂正革将 20 世纪 60 年代后的公众环境参与分为“萌芽阶段”、“概念性阶段”、“实质性阶段”和“科学性阶段”，并阐述了公众参与的渠道和理论逻辑^[10]。已有的纵向研究要么关注特殊区域，时间跨度过大；要么过于微观，聚焦于特定门户网站上公众环保行为短时间的内在变化过程；又或是只根据公众环境参与的不同体现划分了阶段，并没有解释变迁的内在机理。纵向宏观的公众环境参与研究的缺乏，不利于人们系统了解公众环境参与动态变化的阶段性特征、整体脉络和内在逻辑。

1973 年以来，公众环境参与日渐受到重视，其参与形式和内容不断发展。了解其四十多年来的变化、特征、演变逻辑等问题有利于更加精准、有效的激发公众环境参与的主体性，充分发挥其对环境治理的效能，为推动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经验与理论参考。文中着眼于变迁视角，对 40 多年来的公众环境参与进行宏观上的历程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三个问题：中国公众环境参与为何要演变？何以可能变？演变趋势如何？通过研究变迁逻辑，以期对当前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者的决策提供参考，同时推动公众环境参与实践的发展。

二、公众环境参与的演变历程与特征

通过纵向宏观考察可以发现，1973 年以来我国公众环境参与在一些重要的法律、政策和社会事件的影响下，呈现阶段性差异。根据标志性法律文件和事件，结合适时的总体表现和它在主体构成、主题领域、组织形式和参与效果等维度的特征，文中将公众环境参与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如表 1)。

表 1 公众环境参与的演变历程与特征

Table1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阶段	主体构成	主题领域	组织形式	参与效果
萌芽阶段	城市精英群体	环境宣传与教育	政府组织	催生少部分人的环保意识
发展阶段	城市精英群体部分直接利益相关者	环境宣传与教育、自然资源保护、环境监督和诉讼等	政府和民间环保团体组织	保护了珍稀资源，促进环保知识的扩散等
深化阶段	城市精英群体直接利益相关者和部分非利益相关者	环境宣传与教育、自然资源保护、环境抗争、监督、诉讼、决策和日常环境友好行为	政府民间环保团体组织和群众自组织	推动政府对环境治理问题的关注，促进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和环境正义，让环保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常规化阶段	城市精英群体直接利益相关者更多非利益相关者	环境宣传与教育、自然资源保护、环境抗争、监督、诉讼、决策、政策执行和日常环境友好行为	政府、民间环保团体、企业组织和群众自组织	促进城乡人居环境的改善、决策的民主性、公平性和有效性，促使企业合法和科学排污，减少环境污染

（一）公众环境参与萌芽(1973-1991 年)

在国际影响和官方倡导下，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公众环境参与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萌芽。1972 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国际环境保护大会，会上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唤醒了世人的环境意识，也使我国从经济发展中觉醒。1973 年，我国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上指出国内存在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亟需开展污染治理。针对这点，该会议制定了包含“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在内的 32 字方针，强调公众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其中第八条规定：“公民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有权监督、检举和控告。被检举、控告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最初的法律依据。从我国的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开始，环境保护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环保概念开始初步传播，环保意识也在部分群众心中萌芽。

这一阶段的公众环境参与呈现以下特征：在主体构成上，以作家和大学老师等城市精英群体为主；在主题领域，以环境宣传与教育为主；在组织方式上，以政府组织活动，群众参加为主；在参与效果上，催生了少部分人的环保意识，实际环境效果不明显。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公众环境参与多为政府和环保精英倡导下的产物，属于倡导式参与，参与层次低、规模小、频率低、方式有限，因环境污染而产生的矛盾虽偶有发生，但并没有形成大规模抗争运动，环境监督和诉讼等较高等级的参与形式罕见。

（二）公众环境参与发展(1992-2001 年)

20 世纪 90 年代，在政府和民间环保组织的持续动员下，公众环境参与得到进一步发展。1992 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此影响下，我国环境保护的方向从“以污染治理为中心”转变为“以环境管理为中心”，这为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奠定了理念基础。1992 年，苏州召开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全国首届环境教育会议，会上时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倡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教育体系，标志着我国环境教育进入新阶段。90 年代也是民间环保组织成立的黄金年代，各类民间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积极开展群众性活动，动员人们进行环境保护。例如，在 1994—1999 年间，“地球村”动员了 3400 多人加入绿色志愿者网络和七八千人次直接参与绿色家园志愿者活动^[11]。可见，越来越多人关注环境保护。

这一阶段的公众环境参与呈现以下特征：在主体构成上，仍然以城市精英群体为主，部分环境利益相关者被卷入；在主题领域上，不再局限于环境宣传和教育，而是扩展到自然资源保护、环境监督和诉讼领域。在组织方式上，由政府动员转变为政府和民间环保组织共同动员，零散的个体参与逐渐走向有组织的团体参与；在参与效果上，保护了部分珍稀资源，促进环保知识的扩散。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更多人关注环保话题，并且开始逐渐将环保意识转化成行为，公众环境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得以拓展，组织化程度提高。不过，这一时期的公众参与仍然很被动，呈现出动员式参与的特征，公众的环境自觉性较低，参与主题游离在政策之外，“国家—社会”共治的环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

（三）公众环境参与深化(2002-2012 年)

21 世纪初，我国公众环境参与在形式和内容上得到深化。2002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一次正式赋予公众在环境问题中的参与权^[12]，其后国家颁布《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等重要法律文件，逐步建立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环保总局在 2005 年首次举行了公众听证会——北京圆明园环境整治工程的环境影响听证会，开启了公众参与环境听证会之路。这一阶段，全国信访数量逐年增多，化工企业重金属污染事件、水污染事件、PX 事件和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等环境类群体性事件频发，在 2006 至 2010 年间，环保部直接调度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高达 705 起^[13]。另外，21 世纪初期，随着国家战略调整，“节能减排”和“低碳生活”等概念成为社会主流话语，越来越多人采取环境友好行为。

这一阶段公众环境参与呈现以下特征：在主体构成上，除了城市精英群体，受环境污染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和部分非利益相关的普通居民也加入进来；在主题领域上，日常环境友好行为增多，公众采取游行、示威等方式对政府不合理的环境决策和企业的污染行为进行抗议，人们也开始有意识的进行环境监督、投诉、诉讼和决策，参与环境听证会 and 环境影响评价座谈会，参与环境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在组织方式上，政府、民间环保团体和群众自组织共同存在；在参与效果上，一定程度上推动政府对环境治理问题的关注^[14]，也促进了环境污染的解决和环境正义，让环保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总体来说，公众环境参与在多个维度得到深化，渐趋形成多元化参与格局。

（四）公众环境参与常规化(2013 年至今)

中共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此后我国公众环境参与不断常规化。2014 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将公众参与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明确了公众的参与权。2018 年实施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从资源节约、绿色消费和低碳出行等方面为公众提供了行为规范参考，强化了公众的环境意识，有利于推动公众在日常生活中保护环境。此外，部分环保组织和企业依托互联网开发环保项目，带动了大批公众参与线上环保活动。以“阿里巴巴”为例，该公司开发的“蚂蚁森林”项目自 2016 年上线至 2019 年 8 月底，用户累计达到 5 亿人，线下种植树木达到 1.22 亿棵^[15]。《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20 年)》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公民自身的行为对保护生态环境重要，其中能做到不食用野生动植物的人有 91.5%，拒绝购买珍稀野生动植物制品的人有 86.4%，选择低碳出行的有 68.5%，分类投放垃圾的有 54.2%^[16]。可见，公众的环保实践率正在逐年提高。

这一阶段公众环境参与呈现以下特征：在主体构成上，除了城市精英和直接利益相关者外，更多非利益相关的普通居民加入环保事业；在主题领域，环境污染和邻避效应导致的环境抗争依然存在，绿色出行、垃圾分类和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日常环境友好行为增多，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立法相关的座谈会、听证会等行为也逐渐增多；在组织形式上，以政府、民间环保团体、企业组织和群众自组织为主；在参与效果上，居民日常环境友好行为的增多促进了城乡人居环境的改善，公众民主参与环境决策，促进决策的民主性、公平性和有效性，对污染企业的监督，促使其合法和

科学排污，减少环境污染。总体上，公众的主动性增强，亲环境行为和嵌入性环境治理行为增多，逐渐呈现日常性参与的特征。

三、公众环境参与的演变逻辑

理解公众环境参与演变，不仅要清楚它的阶段性表现，还需明晰它演变过程中的逻辑，即理解公众环境参与为何演变，何以可能变和演变趋势如何?鉴于此，文中以“演变动因—演变机理—演变趋势”这一分析框架，展现中国公众环境参与 40 多年的变迁逻辑(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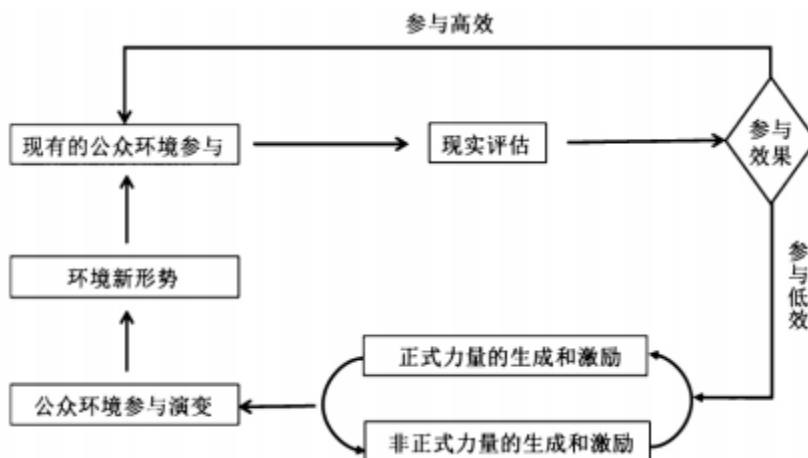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演变逻辑

Figure1 Evolutionary logic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一) 演变动因：公众环境参与的低效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环境领域的问题此起彼伏，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治理能力虽然不断提高，但它们在每一阶段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每一阶段的环境治理能力要和当时环境问题所产生的破坏力达成抑制性均衡，则这两个主体的局限性在应然上需要公众来弥补。但在实然上，每个阶段的公众环境参与存在特定困境，难以高效的弥补政府和企业的不足，三个主体构成的环境治理能力无法与环境问题的破坏力达成抑制性均衡。因此，公众环境参与在应然和实然层面的差距就是其不断演进的动力，即公众环境参与的演变动因在于它本身的低效。

1973 年以前，我国水污染和资源不合理利用等问题已经凸显，但国内上下沉浸于经济发展之中，全国的环保事业尚未开启。此时，环境问题尚未进入公众视野，虽有少数居民出于省钱和生活习惯而节约水、电、柴等资源，但这种小范围的资源节约行为对解决全国范围内的环境污染问题，作用微乎其微。当时的情境亟需群众主动采取更多行动来抵抗环境破坏力。缘此，有意识的公众环境参与就在这种需求中萌芽。

上世纪 80 年代，粗放型的工业发展和资源利用模式造成了严重的工业污染和资源浪费。彼时，政府尚未形成成熟的环境管理和治理体系，企业逐利性质难遏，成为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和环境治理的对象，公众环境参与刚刚萌芽，处于意识的培养阶段，成效不明显，难以助力政府抑制工业企

业的环境破坏行为，从而改善环境状况。在这种背景下，公众环境参与进行了演变，表现为公众参与人数增多、组织化程度提高、环境主题和参与方式更加多元等。

90年代末，我国“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环境污染严重，同时存在工厂企业主等强势群体污染普通居民等弱势群体并使其利益受损的现象^[11]，社会矛盾突出。那时，政府的环境治理虽有改善，但各地政府官员在“晋升锦标赛模式”^[17]的驱动下，注重工业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忽视对它的污染管理，甚至与之共谋，导致政府监管失灵^[18]。当时，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意识不清，环境科学知识不足，环境信息的获得、传达和反馈通道不畅^[19]，且以电话或问卷调查等较低层次的方式为主，信访和诉讼等较高层次的参与行为较少^[20]。所以，公众环境参与难以解决政府监管不力和环境非正义问题。鉴于此，公众环境参与又一次演变，具体表现为：开始进行维权式环境抗争，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监督，对污染现象进行投诉和诉讼等。

21世纪初期，由环境利益不均衡分配延伸出的邻避效应和环境抗争等不断浮现，而企业履责水平低，政府环境治理中存在理性有限、中立有限、实力有限、灵活有限等问题^[21]，难以遏制严峻的环境与社会问题。例如，出于反抗阻力和成本的考虑，政府和企业将邻避设施选址于城郊或者农村等贫穷地区^[22]，无形中让该地区居民的身体和生活状况更加窘迫^[23]。这期间，公众环境参与也存在主动参与不足、能力不足、缺乏公共性^[24]、形式参与和末端参与等问题^[25]，无法从源头上阻滞邻避效应和企业污染等问题的发生。基于此，公众环境参与又一次进行演变，具体表现为：事前的环境决策和事中的环境监督增多，更多人自发加入“互联网+环保公益”活动，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环境友好行为等。

（二）演变机理：正式力量和非正式力量的生成与激励

梳理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演变历程发现，它的每一次变迁都受到正式力量和非正式力量的助推。正式力量是指官方意志主导下产生的文本和实践活动，非正式力量则包含民间环保组织、社会团体与企业等主导开展的各种环保活动等。那么，正式力量和非正式力量是如何推动公众环境参与的变迁呢？文中在下文中展现其中机理。

1. 正式力量的生成和激励

在公众环境参与从无到有的阶段，正式力量为我国公众环境参与提供了历史经验。建国后，为了应对水旱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民众开展各种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运动，积攒了动员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经验，也为后面正式提出依靠群众保护环境的理念奠定了基础。国际上，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保护大会和《人类环境宣言》对我国公众环境参与的萌芽起到重要作用。

在萌芽过渡到发展阶段期间，正式力量发挥了动员和引导作用，推动环保概念和知识的扩散。我国在80年代大力开展全民环境教育和宣传、不断发展完善相关制度，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引导国民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当时各个环境领域的立法当中也或多或少的涉及鼓励群众参与污染防治的内容，赋予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最初的合法性。《中国环境报》创刊，《人民日报》和

《光明日报》等官方主流报刊纷纷单独开辟环保专栏，加强了环境污染的舆论监督和环境知识的传播。80年代后期，中国受到国际环境运动的影响，国家每年主导开展“世界环境日”和“地球日”等活动，激励了更多公民关注环保。

从发展演变至深化阶段期间，正式力量促进了公众环境参与的规范化。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为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行动蓝图。在这次会议的影响下，我国于1994年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其中第20章“团体及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阐明了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及其参与的途径和方案，意味着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正式步入正轨。1995年底，《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1996—2010年)》颁发，推动中国特色的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环境教育体系的形成，促进我国环境教育的制度化和规范化。1996年，我国正式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首次对公众参与政府管理进行规范，维护了公众在环境信访中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1998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通过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奥胡斯公约》，该公约在环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环境司法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在推动欧洲各国保障公众环境参与的权利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也为我国的环境信息公开、环境公益诉讼和公众参与等提供了参考指南。在实践层面，各级政府陆续开展大型环保宣传活动“中华环保世纪行”、创建“绿色学校”和实施“中国中小学绿色教育行动”等，对环境法制宣传，推动公众更广泛的参与起到了很大作用。

从深化迈向常规化阶段，正式力量推动了公众环境参与的法制化和制度化。纵然我国在本世纪之前出台了涉及公众环境参与内容的法律，但它们对公众参与的规定过于抽象，内容涉及面狭窄，缺乏操作指南和实施细则，更无激励公众全过程参与的措施^[26]。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复杂化，一部分人污染另一部分人并使其权益受损的问题突出^[11]，针对这一问题，夏光指出要让社会内部相互制衡，让受害群体对抗污染环境的群体^[27]，而这就需要明确的法律来保障利益受损者的权益。在此背景下，我国审议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公众的环境权益首次被纳入国家法律，对保障公众参与环境监督和决策等权利有深远的意义；同时发布《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推动政府的环境信息公开，保障了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另外，《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和《环境信访办法》等法律进一步明确公众参与的具体操作指南和细则，为公众反对环境污染和不合理的环境决策提供了依据，促进了维权式环境运动的产生。2006年，国务院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倡导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勾勒出我国公民绿色生活的蓝图。

2013年后，新时代的正式力量为公众环境参与水平的提升奠定了理念、制度与技术基础^[28]。国家审议通过《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和《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两个专门性文件，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公众环境参与的法制化进程。针对以往“政府直控型单项规制”^[29]环境治理模式的信息不对称和公众动员效果不佳等弊端，十九大报告提出“共建共治共享”和“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的理念，为公众的主体式参与

提供理念基础。另外，为提高地方政府的环境关注度，国家将环境纳入地方官员人事任免和绩效考核指标内，在此激励下，地方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机制创新，将公众纳入环境治理的全过程，创新了诸如“安吉模式”、“嘉兴模式”、“社区磋商小组”和“社区环境圆桌会议”等多元参与的环境治理模式，为公众提供更多的体制内参与路径，同时创造了“智慧治理”等便捷式参与渠道和平台，为公众赋能、赋权，拓宽了公众参与的制度平台和实践空间。

2.非正式力量的生成和激励

在从无到有阶段，国际非正式力量推动了国内公众环境参与的产生。20世纪40、50年代，全球陆续爆发令世人震惊的八大公害事件，激起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诞生了一批诸如《寂静的春天》、《只有一个地球》和《增长的极限》等具有环境警示意义的著作。在国际环保运动和环保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公众环境参与的思想缓慢成长。

在萌芽过渡到发展阶段期间，非正式力量推动了公众环境参与的规模化和组织化。上世纪70、80年代，知识分子成为第一批环保启蒙者。徐凤翔和徐刚等人通过生态研究和撰写书籍等方式，传递生态环保观念，动员一批人加入环境运动，其中部分成了民间环保组织的创始人。这群人依托环保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和自然资源保护等自然保育运动，通过出书、办讲座和创办绿色社区等方式进行群众动员，提高了公众的环境意识，扩大了公众参与的规模，增强了他们的组织化程度，也将环境参与主题领域拓宽至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诉讼等领域。

从发展演变至深化阶段期间，非正式力量加强了公众环境参与的自发性和实质性。在环境记者和作家等“环保先驱”的带领下，我国“环境文学”和环境报道蔚为大观，环境问题通过媒体报道和文学展现的形式大量涌现。这些非正式力量的助力，增强了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敏感度，使更多人关注身边的环境问题。另外，借助媒体的舆论效力、环保精英的知识优势和“护弱”立场，作为受害者的村民更加敢于运用法律和舆论工具，抗议施害者的污染行为，也敢于挑战政府权威，争取自身环境利益，推动了更多公民自发性参与环境维权活动。

从深化转变为常规化阶段，非正式力量加强了公众环境参与的广泛性和普遍性。2000年后，我国陆续爆发四川沱江特大水污染、湖南岳阳镉污染、厦门PX和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等事件，这些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高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社会行动力增强，其共同作用形成的社会力量倒逼国家改善环境治理体系^[30]，而这又反过来从结构上改善公众环境参与。2011年下半年北京持续出现雾霾，美国驻中国使馆官微公布北京PM2.5浓度“爆表”，这一事件在微薄上引发了一场关于空气质量和PM2.5的全国性争议，潘石屹、李开复和郑渊洁等知名人士也加入其中。这次事件激发了人们的环境敏感性，促进我国公众对公共环境问题的参与式讨论。

2013年后，随着环保红利的日益凸显，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大型民营企业依托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工具积极开发“蚂蚁森林”和“微信运动”等项目，在特定的运行机制下，激励了大量公众参与其中。互联网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建构了广阔的绿色公共领域，扩大了公众参与规模，提供了更加多元

化、常规化、个性化和线上与线下一体化的参与渠道，构建了公众环境参与的“互联网+环保公益”模式。总体来说，在大众传媒、民间环保组织和城市知识分子等非正式力量的持续性营造下，维权意识和环保理念潜移默化的融入居民生产生活，人们的生产、消费、出行和社交等方面体现出更多的环保意涵，加强了公众环境参与的普遍性。

（三）演变趋势：迈向常态化、主体式和实质性参与

综上所述，可看出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公众环境参与的演变趋势为：从“运动式”参与迈向常态化参与、从边缘化参与迈向主体式参与、从形式性参与逐渐转变为实质性参与。

(1)从“运动式”参与迈向常态化参与。据前述可知，早期的公众环境参与多数以活动的形式开展，非活动形式的参与行为罕见，政府和环保组织举办活动的频率、规模和主题决定了该阶段公众参与的程度。此后，以环境污染事件为基础的环境抗争爆发，公众进行维权式抗争，待事件问题得到解决后，他们的参与行为则随之停止。可见，前期的公众参与具有较为明显的“运动式”特征，即基于外界力量的活动动员或某种事件的应急反应而被动式参与环境保护和治理。随着公众参与的制度平台和实践空间的拓展，公众环境参与不再以某个事件或者某个活动为契机，而是以特定规则和权利，可持续的加入到相关的环境活动当中，公众参与在制度层面上迈向了常态化。另外，越来越多的人进行公益性环境保护，采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公众的日常性环境参与也展现了它的常态化趋势。

(2)从边缘化参与迈向主体式参与。在公众环境参与的萌芽阶段，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虽然已经赫然显现，但基于当时经济发展需求远高于环境保护需求的国情，国家无法以壮士断腕之势解决环境问题，虽然以各种形式强调环境保护需要依靠群众，但并未将公众纳入环境管理的范畴，公众长时间在体制外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环保活动。在发展和深化阶段，环境领域的参与式治理模式开始建构，但在建构初期，公众依然通过接受问卷调查、参加听证会、座谈会等较低层次的方式，以非主体的角色进行环境参与。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和公众自身的呼吁，社会协同共治的理念兴起并反映在政策和制度层面，公众成为环境治理的主体之一，曾经游离在制度设计边缘的公众加入到环境规则制定中来。经此过程，公众从非正式的边缘化参与逐渐成为与政府和企业共同治理环境的主体之一。

(3)从形式性参与转变为实质性参与。总体来说，我国前 30 年公众环境参与的作用甚微^[31]。前期的公众参与属于接受、理解、消化和传播环保概念的阶段，具有形式性参与的特征，公众对政府或环保组织开展活动的响应效果无外乎增强个体的环保意识，抑或推动环境知识的扩散，无法对整个国家的环境管理和治理产生实质可见的效用。本世纪以来的公众环境参与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效益。公众通过直观的、冲击性大和轰动性强的方式反映环境矛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保障公众合法环境权益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也推动了环境治理体系的完善，进而加快了公众环境参与在政策和制度层面的常态化进程。所以，我国公众环境参与在效果层面经历了从形式性转变为实质性的过程。

四、讨论

要想全面了解公众环境参与，就必须从宏观和整体上探究它的历史轨迹和变迁图景。从根本上来说，某个事物只有当自身力量达不到情境需要和外界期待时，才会有动力改变，公众环境参与亦如此。在面对环境困境时，政府和企业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果要解决环境问题，那么在应然层面上，公众就应该有较高的环境治理效率。但实际上，每一个阶段的公众环境参与都有很多缺陷，恰恰是这种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才推动其在各个维度不断深化。公众环境参与的不断演进不仅改善了环境客体的状态，还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意义，它在提高我国国民素质、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我国的公众环境参与日益步入常规化阶段，下一步则是让环保作为一种习惯，普遍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中，迈入大规模的、主体潜意识的科学性参与阶段。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突破目前公众环境参与能力不足、公共性不足和效率不高等困境。如何破解这些困境，促进公众环境参与的持续演进，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议题。总体上，只有同时注重正式力量和非正式力量的生成和激励，才能持续推动公众环境参与的良性变迁。具体来说，国家和政府一方面要继续拓宽公众环境参与的制度平台和实践空间，完善公众意见接纳和反馈机制，保障公众环境参与畅通；另一方面，要为环保组织和环保精英赋权，鼓励发挥其宣传和动员作用，为公众赋能，提高其参与能力和环境治理水平。作为普通个体，则要积极主动响应政策倡导，依法参与环境监督、决策和诉讼，践行科学、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带动更多人参与到环境保护事业中来。

五、结论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的环境治理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下一个目标则是实现环境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达成这一目标的要求之一则是将公众纳入环境治理体系，构建多主体参与的环境治理格局。鉴于此，文中选取公众环境参与作为研究主题，经过历程梳理和逻辑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从近 50 年的历史长镜头来看，中国的公众环境参与经历了萌芽、发展、深化和常规化四个阶段，其在主体构成、主题领域、组织形式和参与效果等方面有了渐进式的发展；公众环境参与的演变动因在于它本身的低效，自上而下的正式力量和自下而上的非正式力量的生成和激励共同推动公众环境参与从“运动式”迈向常态化、从边缘化迈向主体式、从形式性逐渐转变为实质性参与。

参考文献：

- [1]崔浩，2012，《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 [2]涂正革、邓辉、甘天琦，2018，《公众参与中国环境治理的逻辑：理论、实践和模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3]史亚东，2019，《公众环境参与的多重理论源流探析与融合》，《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 期。
- [4]洪大用、卢春天，2011，《公众环境关心的多层分析—基于中国 CGSS2003 的数据应用》，《社会

- 学研究》第6期。
- [5]王晓楠, 2018,《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多层分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6]戴京、隋兆鑫, 2008,《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现状、问题及对策》,《环境保护》,第12期。
- [7]崔树义, 2002,《公众环境意识:现状、问题与对策》,《理论学刊》第4期。
- [8]韦惠兰、李颖, 2003,《中国半干旱区公众环境意识历史演变的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3期。
- [9]郑君君、程翼、马刚、邵聪, 2020,《基于数据爬虫与动态社会网络的公众环保行为演化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第1期。
- [10]涂正革, 2018,《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模式》,《国家治理》第4期。
- [11]洪大用, 2007,《中国民间环保力量的成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2]何苗, 2020,《中国与欧洲公众环境参与权的比较研究》,《法学评论》第1期。
- [13]李静, 2016,《绿色选择:环境问题调研实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 [14]郑思齐、万广华、孙伟增、罗党论, 2013,《公众诉求与城市环境治理》,《管理世界》第6期。
- [15]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2019,《互联网平台背景下公众低碳生活方式研究报告》(http://www.prcee.org/yjcg/yjbg/201909/t20190909_733041.html.)
- [16]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2020,《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20年)》(http://www.mee.gov.cn/ywgz/xcyj/gzcy_27007/202007/t20200714_789277.Shtml.)
- [17]周黎安, 2007,《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
- [18]杨海生、陈少凌、周永章, 2008,《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政策—来自中国省份数据的证据》,《南方经济》第6期。
- [19]张保伟, 2016,《公众环境参与的结构困境及化解路径—基于协商民主理论的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第4期。
- [20]董新宇、杨立波、齐璞, 2018,《环境决策中政府行为对公众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西安市的实证分析》,《公共管理学报》第1期。
- [21]夏光, 1993,《论环境权益的市场化代理制度》,《中国工业经济研究》第8期。
- [22]MINEHART D、NEEMAN Z, 2002, *Effective siting of waste treatment facilit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第2期。
- [23]SZASZ A, 1994, *Ecopopulism: Toxic waste and the movement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24]周晓丽, 2019,《论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问题与对策》,《中国行政管理》第12期。
- [25]辛方坤、孙荣, 2016,《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授权合作的“嘉兴模式”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 [26]黄桂琴, 2004,《论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河北法学》第1期。
- [27]夏光,《旗帜·方向·定位—环境保护工作地位与政策的有关思考》,《中国环境报》,1997年4月6日。
- [28]周文翠、于景志,2018,《共建共享治理观下新时代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学术交流》第11期。
- [29]张为杰,2017,《生态文明导向下中国的公众环境诉求与辖区政府环境政策回应》,《宏观经济研究》第1期。
- [30]董海军、郭岩升,2017,《中国社会变迁背景下的环境治理流变》,《学习与探索》第7期。
- [31]李艳芳,2004,《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建设—以非政府组织(NGO)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第2期。

Evolut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Process and logic

LAI Huisu, CAO Hail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macro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China's environ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constantly evol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elements, and there are stage differences in main composition, subject areas,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participation effects. This research presents the evolution logic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evolution causes-evolution mechanisms-evolution trend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mains low and ineffectiv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op-down effects of formal forces and bottom-up effect of informal forces can promote and incentive China's environ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involving from a "movement" type to normalization, from marginalization to subjectivity, and from formality to substantive participation. Overall, it is imperative to combine formal and informal forces to facilitate the continu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formal power; informal power

☆ 作者简介: 赖慧苏, 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19 级博士研究生

曹海林,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 杨梓聪

※ ※

我院社会工作专业师生在第十三届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苏皖片区年会荣获佳绩

2021年12月5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苏皖片区第十三届年会暨现代社会工作制度与中国高质量发展论坛于线上举行。本届年会由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苏皖片区社会工作中心主办，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承办。本次年会吸引了苏皖片区近百名师生参与，共同交流探讨“十四五”规划背景下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问题。

本届苏皖片区年会中，我院社会工作专业师生表现出极高的学术热情。在本次会议的系列学术讲座环节，我校王毅杰教授参与评议顾东辉教授的《中国社会工作走的怎么样和应该怎样走》的报告。在大会主旨报告环节，我校武艳华副教授作了题为《国际社区协商治理逻辑的类型化分析与制度反思——基于多案例的比较分析》的发言。在会议分论坛的研讨中，我校也有多名师生参与交流。

经过激烈的评选，我院参会师生所提交的会议论文中共有五篇论文获奖。武艳华、张志华、房子琪的论文《“互动下的协商”：国际社区协商治理的模式与逻辑——基于四个国际社区协商治理案例的比较分析》、张伟、张志鹏《基于区块链的社区信任重建与分布式治理》获得一等奖；赵元科、施国庆、杨涛的论文《实施关系、价值与反思：灾害救助中的社会工作研究——以郑州市D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为例》和周鸿玮的论文《资源嵌入：社会组织参与乡村产业助农过程研究——以X社会组织为例》获得二等奖；秦雨丝的论文《项目制下社区志愿者的培育过程研究——以淳化街道综合服务中心为例》获得三等奖。

通过参加此次会议，我校师生既拓展了学术研究视野，又展示了河海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勃勃生机。未来，我校社会工作专业将进一步努力，争取更好地推进社会工作教育的扎实发展。

隔绝、掠夺、规划与共享：野生动物管理模式探究¹

吴迪 顾金土

摘要：随着生态建设不断取得重大进展，许多野生动物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甚至其中一部分成为生活在城市中的野生动物。面对具有不同风险的野生动物，生态管理应该正确处理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选择恰当的管理方式。文中旨在探究不同类型的关系伦理与风险感知对野生动物管理模式的影响。本研究采用自填问卷的形式收集资料。通过调节效应与 Logit 回归分析发现：1)对野生动物风险感知不同，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具有显著差异。2)对野生动物具有高风险感知时，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下和生物平等主义下的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分别为隔绝模式、规划模式。3)对野生动物具有低风险感知时，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下和生物平等主义下的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分别为掠夺模式、共享模式。

关键词：关系伦理 风险感知 野生动物 管理模式

野生动物并非指所有现存动物，而是指在大自然的环境下生长且未被驯化的动物。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下，人与野生动物关系有所不同。但不管我们与野生动物处于何种关系中，人类都不可能脱离野生动物而独自生存。野生动物作为一种生物资源，既能给人们提供必要的资源，也有利于维持生态平衡。但野生动物也可能危及人们的生存安全。若不能恰当处理野生动物带来的威胁，人类社会将一直处于缺失本体安全感之中，进而造成普遍的社会性焦虑。通过野生动物传播的病毒是人类面临的现实危机之一。原本仅存在于野生动物界的病毒，经过人与野生动物的直接或间接接触后进入人类社会，造成人兽共患病的灾难^[1]。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不断遭受病毒带来的疾病，如禽流感、非典、艾滋病、疯牛病等。这些传染性疾病加上现代社会的高度流动性使人类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政治互信减弱、工业生产停滞、经济市场衰退、文化交流阻隔等^[2]。现有研究中，有关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研究多数集中在关系模式与关系伦理探讨。较少研究从动态视角探讨不同风险感知下的野生动物管理模式。文中将重点探讨在对野生动物不同风险感知中，不同关系伦理下的野生动物管理模式。人对野生动物管理模式的构建，将有利于正确处理人与野生动物关系，最大化实现生命共同体的整体利益。

根据已有研究，人与野生动物关系伦理呈现出一个连续统序列。连续统序列两端为两个相对立的伦理原则：传统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与生物平等主义(bioequivalence)。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的生存发展为中心，强调人对自然具有绝对支配权。一切以人的利益为重，野生动物只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工具。只有当野生动物有利于人们的生存发展时，其才具有相应的价值^[3]。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支配下，人与野生动物关系主要体现为一系列不平等关系：改造和被改造、利用和被利用、奴役和被奴役等。这一明显带有不平等关系的观念成为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行为原则^[4]。生物平等主义着

¹ 本文已发刊于《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1年第35卷09期。

重关心野生动物福利，赋予野生动物道德身份。哲学家史怀泽提出的“敬畏生命伦理”和哲学家泰勒提出的“尊重自然伦理”从不同角度解释了生物平等主义的基本精神^[5]。史怀泽认为我们应当敬畏所有生命，而不仅仅敬畏人类自身。他指出善的本质就是尊重生命，使所有生命都实现最高价值^[6]。泰勒的“尊重自然伦理”指出，人与野生动物共存于地球，相互依存。每个生命体都是平等的，人类应当抛弃凌驾于野生动物之上的优越感。泰勒进一步提出四条伦理原则：不作恶原则、不干涉原则、忠诚原则、补偿正义原则^[7]。

目前，学界并未对风险感知概念达成一致的定義。对于不同的对象，具有不同的风险感知定义。如部分学者提出环境风险感知是指人们在面对外部客观环境时的主观判断和直接感受^[8]。在本研究中，风险感知主要指人们面对野生动物时的主观判断和直接感受。Kasperson 等提出风险感知具有社会放大效应，其会对人们的风险应对行为产生影响^[9]。不同的风险感知对事件的演进具有不同的影响。在心理反应层面，风险感知可能会造成公众的恐惧心理、从众心理等，但也可能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进而有利于应对风险。在行为反应层面，风险感知可能会造成人们做出非理性行为，但也有可能增强公众的风险防范行为^[10]。总之，风险感知的高低将对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本研究将探究不同风险感知对人与野生动物行为策略的影响。

文中野生动物管理模式是指在不同环境中，人对野生动物采取的管理形式。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研究将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分为四类：隔绝、掠夺、规划与共享。隔绝模式指通过隔离或灭绝野生动物增加人与野生动物的距离，以达到阻止野生动物进入人类活动领域的目的。掠夺模式指人们为追逐自身利益，不顾一切后果夺取野生动物的相关资源。规划模式指对人们与野生动物各自的活动空间进行合理规划，最大限度地将两者间的紧张关系控制在较低水平。规划模式与隔绝模式不同，隔绝模式忽视了野生动物的生存与发展，规划模式强调对人与野生动物活动领域的协调，以促进两者的共同发展。共享模式指人与野生动物维持平等关系，共同分享地球上的所有资源。人类不再独自享有任意的资源，人与野生动物的活动领域混为一体。

一、材料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人与野生动物关系认知调查”的问卷调查数据。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全国公众。该调查由来自不同省份(或直辖市、自治区)的 30 位调查员组成，每位调查员通过方便抽样选择调查员所在省份的调查对象。调查组于 2020 年 3—6 月间，通过网络共发放电子问卷 1650 份，收集有效问卷 1568 份，有效率为 93.03%。在调查样本中，调查者男女性别比约为 1:2.1。在年龄方面，中青年群体(18—60 岁)约占全体调查对象的 79.8%，符合我国人口年龄分布结构。在教育程度方面，本科学历约占全体调查对象的 43.9%。高中及中专、研究生及以上的群体，分别约占全体调查对象的 17.1%、15.6%。在职业方面，政府/事业单位人员、企业/商业人员、农业从业人员、学生分别约占全体调查对象的 15.7%、16.9%、12.6%、20.4%。

(二) 变量测量

为探究在不同风险感知人群中，关系伦理对野生动物管理模式的影响，文中以野生动物管理模式为因变量，关系伦理为自变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为控制变量，风险感知为调节变量。文中将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分为四类:隔绝、掠夺、规划与共享。变量编码情况汇总在表 1 中。关系伦理指调查对象对人与野生动物相处关系的道德评价，本研究采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与生物平等主义两种态度。通过李克特量表探究调查对象所认为的人与野生动物关系伦理。选项“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依次赋值 1、2、3、4、5。得分越高，关系伦理越接近生物平等主义。反之，越接近传统人类中心主义。风险感知是指对野生动物造成的风险的认知。调查对象从数字 0 到 5 选取一个值代表风险感知程度。选值越高，表示调查对象认为野生动物带来的风险越大。对风险感知得分取均值，高于均值的编为“高风险组”，低于均值的编为“低风险组”。表 2 为关系伦理变量的信度与效度验证，验证结果支持该变量测量模型。

表 2 变量编码情况

Table 1 Variable coding

变 量	编 码
行为策略	1=隔绝；2=掠夺；3=规划；4=共享
性别	1=男性；2=女性
年龄	1=少年（18 岁以下）；2=青年（20-45 岁）；3=中年（45-60 岁）；4=老年（60 岁以上）
教育	1=初中以下；2=高中及中专；3=专科；4=本科；5=研究生及以上；
收入	1=3000 以下；2=3001-5000；3=5001-7000；4=7001-9000；5=9001-11000；6=11001 以上
风险感知	0=低风险；1=高风险
关系伦理	连续变量

表 3 连续变量基本情况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continuous variables

变 量	测 量	均 值	因子载荷	信 度 Cronbach's Alpha	收敛效度 AVE
关系伦理	野生动物保护优先于经济建设	3.12	0.781	0.719	0.564
	保护野生动物与每一个人都相关	2.89	0.773		
	人类的活动空间向野生动物完全开放	2.73	0.702		
	野生动物需要享受福利	3.17	0.66		
	人们不应该随意捕杀野生动物	3.97	0.793		
	人与野生动物应平等相待	3.56	0.787		

（三）研究假设

风险感知是指人们对风险类型和程度的主观感受和判断，这种主观感受和判断具有情景性和动态性^[11]。现有研究认为风险感知在一定程度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如 Timothy D 等人指出风险感知和回应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12]。对野生动物的风险感知可能会对人们的管理行为产生影响。为此，文中提出以下假设：

H1：对野生动物风险感知不同，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具有显著差异。

尚未有相关文献探讨关系伦理对管理模式的影响。关系伦理本质是一种道德评价观念，而道德评价观念对行为策略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议题。王迎迎等人指出人们存在“知行分离”的现象，道德观念并非总是对行为产生影响^[13]。但也有部分学者指出道德观念能够成为其他因素对行为产生影响的中介变量，通过道德观念，其他因素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14]。因此，根据以往研究所揭示的道德评价观念与行为关系，文中将探究关系伦理对管理行为的影响。考虑到情境影响，将风险感知作为研究中的情境因素。因此，文中提出以下假设：

H2：对野生动物具有高风险感知时，若关系伦理倾向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则倾向于隔绝模式；若关系伦理倾向于生物平等主义，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则倾向于规划模式。

H3：对野生动物具有低风险感知时，若关系伦理倾向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则倾向于掠夺模式；若关系伦理倾向于生物平等主义，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则倾向于共享模式模式。

（四）分析模型

首先对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简单描述调查对象对待野生动物的管理模式。在对数据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之上，采用调节效应分析与 Logit 回归分析。文中因变量为野生动物管理模式，自变量为关系伦理，调节变量为风险感知，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Process 是基于 Spss26 分析软件的插件，专门用于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分析。Process 总共设定 70 多个模型。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基于不同的自变量、因变量、中介或调节变量选择相对应的模型。本研究采用 Process 中的 Model1 进行调节效应分析。调节效应分析的目的在于说明不同风险感知下，关系伦理对野生动物管理模式的影响。若调节效应的显著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文中将进一步使用 Logit 回归分析，具体说明在不同风险感知下，不同类型的关系伦理对野生动物管理模式的影响差异。

本研究采用 Process 进行调节效应分析，其中所使用的模型为 Model1。在调节效应分析的基础上，文中将使用 Logit 回归分析。考虑到因变量被处理为 4 个虚拟变量，本研究将针对这 4 个虚拟变量分别使用二元 Logit 回归方法进行分析。文中建构的 Logit 模型方程为：

$$\text{Logit}(P_a/P_b)=\alpha+\beta_1X_1+\beta_2X_2+\dots+\beta_nX_n$$

在上列模式方程中：P_a表示因变量中事件 a 的发生概率；P_b表示因变量中参照事件(事件 b)的发生概率；Logit(P_a/P_b)表示因变量两个类别概率比值的自然对数；X₁, X₂, X₃, …, X_n表示文中假定对因变量有影响的自变量或控制变量；β₁, β₂, β₃, …, β_n为自变量相应的回归系数。为更加清楚地理解模型结果，将上述方程转换为：

$$P_a/P_b = e^{\alpha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dots + \beta_n X_n} = e^{\alpha} * e^{\beta_1 X_1} * e^{\beta_2 X_2} * \dots * e^{\beta_n X_n}$$

P_a/P_b 表示所选择的两个类别概率比值(OR)。这一比值意味着自变量取某一类别时, 相比较于因变量第 b 类, 因变量第 a 类发生可能性的倍数(即 $\exp(\beta)$)。OR 值大于 1, 表示事件 a 发生可能性增加; OR 值小于 1, 表示事件 a 发生可能性减少。

二、结果与分析

(一) 管理模式选择

野生动物管理模式主要分为四类: 隔绝、掠夺、规划与共享。表 3 汇总调查对象对野生动物管理模式的选择结果。多数调查对象选择“规划模式”(39.9%)和“共享模共享式”(23.4%)。约五分之一的调查对象认为应当采取隔绝手段使野生动物应当消失在人们的活动领域。交叉表卡方值为 166.326, 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高风险组与低风险组的野生动物管理模式结果显著不同。在高风险感知组中, 多数调查对象选择“隔绝模式”和“规划模式”。在低风险感知组中, 多数调查对象选择“掠夺模式”和“共享模式”。由此看来, 在对野生动物具有不同风险感知中, 野生动物管理模式有所不同。在对野生动物具有高风险感知的调查对象中, 大部分人都希望远离野生动物, 通过隔绝抑制野生动物的生存或者通过规划活动空间将野生动物限制在某一范围内。在对野生动物具有低风险感知的调查对象中, 大部分人选择接触野生动物。即掠夺野生动物资源或者与野生动物共享生命资源。

表 4 行为策略选择结果 (%)

Table 3 Result of behavior strategy selection

管理模式	高风险感知组	低风险感知组	总计
隔绝	26.3	10.8	23
掠夺	5.3	45	13.7
规划	49.2	5.4	39.9
共享	19.3	38.7	23.4

卡方值: 166.326***

注: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二) 影响因素探究

将“野生动物管理模式”虚拟化为四个哑变量, 虚拟化后的四个哑变量分别作为因变量。风险感知作为调节变量, 关系伦理作为自变量, 其余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文中首先采用 Process 中的 Model1 对调节效应进行分析。在调节效应分析中, 收入与年龄均视为连续变量。根据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表 4), 四个模型中的调节效应均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 在不同的风险感知状况中, 关系伦理对野生动物管理模式的影响作用不同。

表 5 调节效应分析表

Table 4 Analysis of regulatory effect

变量	隔绝	掠夺	规划	共享
截距	0.92	15.77***	-5.22	-18.97***

性 别	-0.05	0.58**	-0.14**	-0.19
年 龄	0.16**	-0.15	0.17	-0.10**
教 育	-0.05**	0.09**	-0.02**	0.05**
收 入	0.07**	-0.02**	-0.07	-0.08**
风险感知	16.71***	-14.61***	-7.48***	9.87***
关系伦理	-0.06***	-0.54***	0.05***	0.56***
风险感知*关系伦理	-0.45***	0.37***	0.30***	-0.34***

注：*表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

为具体分析在不同的风险感知中，关系伦理对野生动物管理模式的影响差异，文中使用 Logit 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统计在不同风险感知组中，关系伦理对野生动物管理模式的影响。统计结果汇总在表 5 中。除模型 4 的皮尔逊卡方不显著外，其余模型的皮尔逊卡方均在 5% 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 6 Logit 回归分析

Table 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变 量	隔 绝		掠 夺		规 划		共 享	
	模型 1 (无风险)	模型 2 (有风险)	模型 3 (无风险)	模型 4 (有风险)	模型 5 (无风险)	模型 6 (有风险)	模型 7 (无风险)	模型 8 (有风险)
常 量	-12.861	19.564***	28.106***	2.181	-33.831	-14.945***	-34.68***	-9.295***
年龄=1	2.186**	-0.64	-1.221	0.544	-0.808	0.569	2.45**	-0.628
年龄=2	-0.818	-0.108	-0.392	0.012	-0.61	-0.136	0.858	-0.011
年龄=3	-0.743**	-0.414	-1.065	-0.619	1.486	0.412	-2.6	0.008**
性别=1	0.049	-0.029	-0.427	-0.893**	0.26	0.149**	-0.15	0.278
教育=1	-2.417	1.217**	0.085	-18.656	2.334**	-0.768	-1.835	0.389**
教育=2	-1.668	-0.214**	-1.835**	0.45	0.488**	-0.254	-0.115	-0.069
教育=3	-0.794	0.729**	-3.055***	-0.378	1.028**	-0.568	2.882	0.28**
教育=4	0.374	0.233	-2.693***	0.23	0.6	-0.414	-0.265	0.392
收入=1	18.668	-1.429	1.061**	0.034	-0.511	1.351	0.03**	0.451
收入=2	19.001**	-0.306	0.915**	0.067	-2.406	0.465	1.337**	0.495
收入=3	21.58**	-1.136	0.244**	0.724	-1.968	1.009	-1.335**	0.191
收入=4	20.417**	-0.724	-5.1	0.431	-21.748	1.083	5.716	-0.291
收入=5	20.754**	-1.748	0.709	1.01	-0.16	1.344	0.34	-0.225
关系伦理	-0.082	-0.524***	-0.78***	-0.182***	0.974	0.366***	0.794***	0.244***
皮尔逊卡方	30.551**	236.992***	94.429***	26.689	72.263***	185.548***	101.275***	60.067***

注：*表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

在以“隔绝模式”为因变量的模型 1 与模型 2 中，可观察到“关系伦理”仅在“高风险组”中显著，且影响方向为负。这说明，在对野生动物具有高风险感知的人群中，若关系伦理接近传统人类中

心主义，对待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倾向于隔绝模式。在以“掠夺模式”为因变量的模型 3 与模型 4 中，可观察到“关系伦理”在“低风险组”和“高风险组”中均显著，且影响方向均为负。在“低风险组”中关系伦理的影响作用明显大于“高风险组”。这说明在低风险组中，关系伦理的作用更为重要。在对野生动物具有低风险感知的人群中，若关系伦理接近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对待野生动物的管理模式则倾向于掠夺。在以“规划模式”为因变量的模型 5 与模型 6 中，可观察到“关系伦理”仅在“高风险组”中显著，且影响方向为正。这说明，在对野生动物具有高风险感知的人群中，若关系伦理接近生物平等主义，对待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则倾向于规划。在以“共享模式”为因变量的模型 7 与模型 8 中，可观察到“关系伦理”在“低风险组”和“高风险组”中均显著，且影响方向均为正。在“低风险组”中关系伦理的影响作用明显大于“高风险组”。这说明在对野生动物具有低风险感知的人群中，关系伦理的作用更为重要。调查对象认为野生动物较为安全时，若关系伦理接近生物平等主义，对待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则倾向于共享。

三、讨论

贝克提出，风险是指以系统的方式应对由现代化自身引发的危险和不安^[15]。吉登斯指出人类主要面临两种风险：一种是自然的固定性所带来的外部风险；另一种是科学知识发展带来的风险。虽然吉登斯进一步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后面一种类型的风险占据主导地位。比如，疫情作为自然的固定性所带来的外部风险，依旧会对当今社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风险感知指个人或群体对威胁的负面后果的判断，通常是指自然灾害或生态危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16]。本研究发现，在对野生动物具有高风险感知时，大部分调查对象所认可的管理模式为隔绝模式和规划模式；在对野生动物具有低风险感知时，大部分调查对象所认可的管理模式为掠夺模式和共享模式。也就是说，在风险感知较强的调查对象中，倾向于增大人与野生动物的空间距离，将野生动物隔绝或者规划在一定区域中。在风险感知较弱的调查对象中，倾向于缩小人与野生动物的空间距离，通过接触野生动物进而达到共享或掠夺的目的。可以看出，风险感知、空间距离、接受度存在一定的关系。从风险感知的角度看，距离在一定程度上是安全的“量度”。研究表明，风险感知越强，人们越倾向于减少风险暴露，增大与风险的空间距离，换句话说，对造成风险的事物的接受度越低^[17-18]。在本研究中，在对野生动物具有高风险感知的调查对象中，公众对野生动物的接受度降低，倾向于增大与野生动物的距离。在对野生动物具有低风险感知的调查对象中，公众对野生动物的接受度增高，倾向于缩小与野生动物的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从理想状态出发，将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划分为隔绝、掠夺、规划与共享四类模式。但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仅仅存在单一类型的管理模式。面对不同的野生动物，人们具有不同的风险感知与管理模式。此外，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并非固定不变，随着社会、经济、生态的发展，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将发生相应变化。不同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如何协调发展将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文中在此无需过多赘述。

四、结论

根据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本研究将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划分为四类：隔绝、掠夺、规划与共享。通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作者发现多数调查对象坚持人与野生动物共生关系,主张通过合理的手段(规划、共享)对待野生动物。但也有部分调查对象主张人类征服野生动物,用隔绝或掠夺的手段对待野生动物。通过调节效应分析与 Logit 回归分析,研究发现:

(1)对野生动物风险感知不同,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具有显著差异。在高风险感知下,管理模式倾向于隔绝和规划模式。在低风险感知下,管理模式倾向于掠夺和共享模式。

(2)对野生动物具有高风险感知时,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下和生物平等主义下的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分别为隔绝模式、规划模式。

(3)对野生动物具有低风险感知时,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下和生物平等主义下的野生动物管理模式分别为掠夺模式、共享模式。

参考文献:

- [1]LIF, 2009,《动物健康与人类健康的协作关系》,《中国家禽》第 8 期。
- [2]W.B., R.A., 库克, 2006,《动物与人类健康的关系》,《国外社会科学》第 1 期。
- [3]刘海龙, 2011,《生态伦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 [4]王苏, 2008,《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分析及其评价》,《社会科学家》第 5 期。
- [5]赵成, 2010,《环境伦理学研究中的几种伦理境界及其意义》北京: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
- [6]施韦泽, 2017,《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7]王素娟, 2007,《环境伦理学主要流派》,《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 [8]王晓楠, 2019,《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 [9]KASPE RSONJX,KASPE RSON RE,PIDGEOONNB, etal. 2003,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ssessing fifteen years of research and theory,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第一期。
- [10]王治莹、梁敬、刘小弟, 2018,《突发事件情境中公众的风险感知研究综述》,《情报杂志》第 10 期。
- [11]谢治菊, 2013,《西部地区农民对农村社会的风险感知与行为选择》,《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 [12]BAIRD TD, LESLIE W, MCCABE JT, 2009, *The effect of wildlife conservation on local perceptions of risk and behavioral response, Human Ecology*, 第 37 卷第 4 期。
- [13]王迎迎, 2015,《大学生道德观念与行为调查分析》,《思想教育研究》第 11 期。
- [14]李忠, 2010,《高等教育:观念与行为之间的问题及其应对》,《中国高教研究》第 9 期。
- [15]乌尔里希·贝克, 2018,《风险社会》,张文杰 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16]赵成、王思琦, 2019,《央地政府信任对城市居民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基于多层线性模型(HLM)的分析》,《地方治理研究》第 3 期。
- [17]FREDERIKF, WIEDEMANNPM, BROWNTWC, 2015, *Exposure perception as a key indicator of risk*

perception and acceptance of sources of radio 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Public Health.

[18]VENABLESD, PIDGEONN, SIMMONSP, et al. 2009, *Living with nuclear power: A Q —method study of local community perceptions*, Risk Analysis, 第 29 卷第 8 期 .

Isolation, plunder, planning and sharing: Discussion on wildlife management model

WU Di, GU Jint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many wild animals appear in people's lives, and even some of them become wild animals living in cities. Aiming of the wild animals that face different risks, ecological management should correct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wildlife, and choose the appropriate management mod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lationship ethics and risk perception on wildlife management model, relative data were collected by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Through the regulatory effect and logit regression analysis,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wildlife management models with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wildlife risk. When there is a high risk perception of wildlife, the traditional anthropocentrism and bioequivalence wildlife management models are isolation model and planning model, respectively. When there is a low risk perception of wildlife, the traditional anthropocentrism and bioequivalence wildlife management models are predatory model and sharing model respectively.

Key words: relationship ethics; risk perception; wildlife; management model

☆ 作者简介: 吴 迪, 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20 级博士研究生

顾金土,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责任编辑: 杨梓聪



政策变迁与村民计策¹

——基于苏南 N 市 WX 村征地拆迁的案例研究

秦祥瑞 沈毅

摘要：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伴随着大量征地拆迁，其中的利益博弈或伦理张力成为既有研究的关注焦点。本文以苏南 N 市 WX 村拆迁历程为个案，呈现基层民众计策行为随拆迁政策变迁的动态特征。村民计策行为以“多种田”“假离婚”“盖房子”为主，拆迁政策的逐步完善反而催生了村民长远性的计策谋划，其整体应对策略体现了从被动到主动、再到提前“合法”用足政策的转变。由此，计策行为减少了即时性的矛盾对抗，其非对抗性、非组织化、半隐蔽性、强模仿性、趋于前瞻性等特征充分显现了计策行为对组织制度的权宜“变通”，但长远意义上将对社区治理与人心价值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进行长期性制度规则完善，同时有效推动人心价值复归，最终促进城乡拆迁迈向实质性的体系化与规范化。

关键词：征地拆迁 政策变迁 计策行为 制度变通 社区治理

一、城乡拆迁研究的基本脉络

拆迁成为近年中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热点话题，也是形成中国城市经营与开发体制的重要基础（陈映芳，2008）。然则，拆迁政策的操作性空间以及其实施过程中所可能导致拆迁户的相对剥夺感与不公平感，使得城乡拆迁实践中常常产生了居民、政府、开发商间的系列矛盾，尤其是具体拆迁进程中往往面临着“钉子户”治理的难题（周娟，2019）。因此，学界也开始从不同视角对此展开了学理及政策层面的分析研究。

在对城市社区拆迁的组织化行政诉讼案例研究之中，有学者揭示了将自我边界蕴藏于集体行动的“选择性固化”机制，力图展现个体自我权利的凸显与国家—市场—社会—个人分化的积极面相（施芸卿，2013）。然则，中国传统中的“生存权”乃至近代以来逐步演化的某种偏向于儒家集体责任的“权利”观念，本质上始终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式“公民权”的自由传统（裴宜理，2008）²。比较而言，

¹ 本文已刊发于《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第8卷04期。

² 阎云翔（2012）在对“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问题的分析之中，也认为当代中国人的“个体化”常常是某种缺乏个人主义的个体化。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年轻一代建基于个人幸福与消费主义的“个体化”往往缺乏个人主义的权利与责任意识，由此其在诸多群体性事件中的利益诉求通常也没有政治层面的权利诉求与价值主张。

既有的城乡拆迁研究通常还是较多聚焦于拆迁抗争背后的利益之争。如在某些极端条件下，城中村村的底层抗争甚至会以身体为抗争手段争取更多的经济收益（刘怡然，2014）。在更一般意义上，董海军（2008）就底层政治提出了“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概念，以区别于完全消极性的“弱者的武器”（斯科特，2007），分析了农民非暴力性地以弱者身份作为武器争取更高利益补偿的行动策略。这些研究大多遵循利益导向的分析视角，揭示了“自上而下”城郊征地拆迁的制度背景与民众有限的行动空间。

在利益导向视角之外，一些研究也关注到了拆迁抗争中的价值伦理张力。陈映芳（2010）关注到在中国传统的“生存权”基础以及“道德资源”的支持下，某些民众的都市运动及社会抗争被作为某种市民/农民“保卫家园”的行动。与之相类似，朱晓阳（2012，2015）也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归之为自下而上的“农民城市化”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城市化”两种模式。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国家城市化”，造成了民众抗争保卫“家园”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林叶（2020）进一步从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出发，对“‘废墟’上的栖居”进行了典型案例的深描分析：某些情境下“钉子户”有可能在治理者的疏忽之下，在“废墟”之上形成自身的社会空间而达成临时生活正常化，以至于在“钉子户”与工地势力之间可能构成某种互惠图示的空间政治。与之相对照，地方政府则可能会借助于“国家发展与集体主义”话语，在通过权力强制完成征地拆迁的项目过程之中辅之以“集体主义”的道德话语动员（沈毅、刘俊雅，2020）。以上一些研究本质上力图突破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以及利益分析视角的局限性，而更多力图从“家”“国”秩序之中凸显出伦理的紧张性。

总之，征地拆迁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将构筑在农村土地上的国家、集体和个体三重社会性建构进行层层解构，以实现农村土地商品化的过程（张彬、熊万胜，2019）。近年来，随着拆迁政策的日益规范化特别是发达地区拆迁补偿及安置水平的提升，拆迁后居民家庭的总体生计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黄海艳、蔡银莺，2019）。随着相对发达地区土地市值和房地产市场的崛起，部分农民在征地拆迁中的房屋安置收益也逐渐增长以至于资产可观，于是盼望“拆迁致富”已成为相对发达地区周边城郊农民期待迅速扩大家庭财富积累的主要心态。事实上，有研究看到了某些事件中的农民上访行为，其逻辑也已出现了从维权到谋利的转变，突出表现在某些地方谋利型上访的蔓延和上访专业户群体的形成（田先红，2010）。区别于这种上访行为，谋利现象在当下较为发达地区的城乡拆迁进程中可能会进一步地发展为运用政策空间的计策性行为。计策性策略本质上也不同于农民在与强者的权力关系之中的消极规避性策略（斯科特，2007），很大程度上反而是越来越主动地为拆迁提前做好利益补偿的积极筹划。

事实上，农村草根行动者往往是既不完全认同于精英、也不完全代表底层，而是有着自身独特行动目标和逻辑的行动者（应星，2007）。正如前文所言，农村村民行动常常也并不局限于集体抗争的面相，而体现为不同条件下各种行为策略的分化选择。重利行为可能成为了部分农村拆迁中较为明显的特征，其基于利益预期而期盼在未来的征地拆迁中争取实惠，以至于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村民之间地权冲突的消极后果（杨华，2013）。中央和各级政府下达政策文件来推动拆迁进程，但这些政策文件有时只规定目标和“精神”而不限定具体手段，基层乡镇干部及村干部常常代表地方政府行使权力并与地方社会网络相结合，其实践的逻辑始终存在着对文本的种种“变通”（孙立平，2002）。由此，农村

拆迁以地方政府与基层政权建立的“委托—代理”关系为基础，拆迁的规模和进程直接影响着乡镇干部及村干部行为方式，村庄的权力格局某种程度上在具体的多次事件中被再生产出来（齐晓瑾等，2006）。总之，关于征地拆迁的研究，更应该放在微观的结构之网中考察（吴毅，2007），只有在具备较为丰满过程和事件的典型案例中，才能更好呈现拆迁实践中的具体情境和结构条件，从中进一步理解拆迁政策的变迁发展及其在实践中得以“变通”的内在机理。

二、案例聚焦与研究方法

N市位于江苏省苏南发达地区，长江下游区域。WX行政村处于N市西南部城郊，西面毗邻长江，205国道纵贯而过，气候适宜，四季分明，交通便利，所辖13个自然村，12个自然村自西向东分布在长江和国道之间，仅有M自然村位于国道东侧。自2004年A自然村首先被BJ开发区划入征迁范围后，直至2018年10月，M自然村拆迁才基本完成。2004—2018年，共有557户，2119人成为拆迁安置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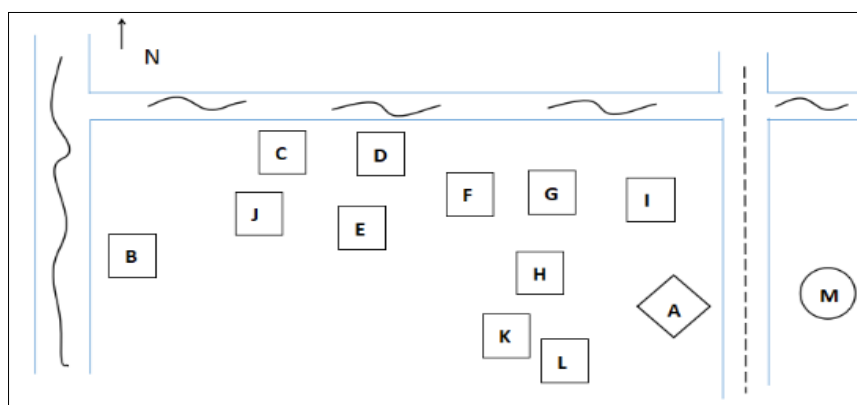


图 1：WX 村区位示意图

笔者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具体通过参与观察、政策文件分析和半结构访谈，基本还原了城郊 WX 村十多年拆迁过程。2018 年 7 月至 12 月，笔者参加了 4 次拆迁进度推进会议及部分拆迁村民的入户谈判，对了解拆迁情况的 5 位村民、4 位村干部、2 位社区工作者、1 位社区书记、1 位街道拆迁办主任进行了多次深度访谈。2021 年 6 月至 7 月又进行了补充调查与访谈。WX 村拆迁过程事实上分为了 2004—2005 年、2008—2011 年、2017—2018 年三个时段的拆迁，并且 WX 村拆迁安置标准及人口认定原则根据相关文件在 2008 年和 2017 年的后两个阶段拆迁中分别经历了两次变更。由于 WX 村的拆迁补偿依据的是所在区县征地及房屋拆迁文件，因此 WX 村三个阶段之间的拆迁政策变更实质上反映了其所在区县地方政府的拆迁政策变迁。

第一阶段拆迁（2004-2005）执行了所在县 2000 年《建设征用土地安置和补偿办法》的规定，其基本内容为：土地补偿费依法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青苗补偿费和附着物补偿费归其所有者所有；

房屋按人均建筑面积 25—30 平方米安置，年龄在 16 周岁以上，且未婚的，另行再照顾每人 25—30 平方米。

第二阶段拆迁（2008-2011）依据区政府 2005 年 166 号文《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一）征用村民小组土地，土地补偿费总额的 70% 纳入被征地农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土地补偿费总额的 30% 支付给该村民小组，纳入公积金管理，必须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生产和公益性事业，不得挪作他用。（二）征用镇、村集体土地，土地补偿费总额的 70% 纳入区政府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社会统筹账户，用于该镇村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土地补偿费总额的 30% 支付给镇、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三）先确定户数，根据每户房屋建筑面积确定安置房屋面积，安置房面积以 240 平方米为上限：1、被拆迁人（按户计算，下同）居住房屋建筑面积小于或等于 60m² 的，可按产权调换房的建筑面积 60m² 套型购买；2、被拆迁人居住房屋建筑面积超过 60m²，小于或等于 90m² 的，可按产权调换房的建筑面积 90m² 套型购买；3、被拆迁人居住房屋建筑面积超过 90m²，小于或等于 120m² 的，可按产权调换房的建筑面积 120m² 购买；4、被拆迁人居住房屋建筑面积超过 120m²，小于或等于 150m² 的，可按产权调换房的建筑面积 150m² 购买；5、被拆迁人居住房屋建筑面积超过 150m²，小于或等于 180m² 的，可按产权调换房的建筑面积 180m² 购买；6、被拆迁人居住房屋建筑面积超过 180m²，小于或等于 210m² 的，可按产权调换房的建筑面积 210m² 购买；7、被拆迁人居住房屋建筑面积超过 210m²，小于或等于 240m² 的，可按产权调换房的建筑面积 240m² 购买。

第三阶段拆迁（2017-2018）征地补偿依据 2016 年区政府 4 号文《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征地安置补偿费用由征地片区价补偿费、青苗和附着物综合补偿费两项费用组成。房屋补偿及安置依据区政府 2016 年 2 号文《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安置实施办法》及区政府 2016 年 3 号文《关于公布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补偿标准的通知》，房屋认定原则为：一人户不超过 120 平方米，二人户不超过 180 平方米，三人及以上户按人均不超过 80 平方米认定。

从拆迁运作主体而言，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拆迁的责任主体和投资方为开发区，街道配合社区下村谈判；第三阶段的拆迁投资方仍旧为开发区，同样是街道配合社区下村谈判，但采取了区政府财权上收的举措，并且监管、审计等部门同时参与。从政策变更特征来看，拆迁安置补偿的主要衡量标准实现了从单一的人口数、户口数向“人、砖、户”结合的政策转变，并且 2008 年第二阶段拆迁开始的补偿标准也有了相当明显的提升。总体而言，城郊 WX 村上述三个阶段的拆迁进程相对顺利，虽然也有极少数“钉子户”的存在，但绝大多数村民在各个阶段越来越多地呈现出系列计策行为的策略空间，基层干部也大都相应地加以配合“变通”。因此，通过拆迁政策变迁下 WX 村具体实践的案例分析，特别是村民观念与行为逻辑的变化，可揭示村民之于政策执行及政策变迁的应对策略，有助于分析村民计策行为的“变通”特征及其在基层社会所可能产生的重要结果。

三、“种田”“种人”“种房”：政策变迁与计策应对

计策，又名方法、谋略，兵家所述的“三十六计”的“智谋”深深影响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组织实践（胜雅律，2006）。从日常生活出发，计策行为通常指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采用一种十分巧妙的方法达到自己目的过程。但在组织实践之中，计策行为进一步突破日常生活的范畴而与组织制度发生勾连，体现为某种行动者对制度规则的权宜性策略。随着拆迁政策调整，WX村村民不断呈现出了以计策应对取向的行为特征，2004—2005年拆迁初期的第一阶段，村民采取夸大、瞒报农地附属物的“多种田”策略，到2008—2011年第二阶段发展为“假离婚”为主的“种人”策略，直至2017—2018年第三阶段进一步运用提前“盖房子”的“种房”策略。“种田”“种人”“种房”可以形象地展现上述三个阶段村民计策行为，进而充分说明村民计策行为对组织制度的变通性特征。

（一）夸大、瞒报的“多种田”

为拉动苏南经济发展，2003年省政府提出加快沿江开发的决策，区委、区政府结合21公里长江干线优势，设立BJ经济开发区。2006年5月BJ开发区升级为省级开发区，辖区面积258平方公里，总体规划面积126平方公里。随着开发计划实施，WX村逐渐被划归征迁范围。“要致富，先修路”，所辖A自然村因靠近已在拓宽改造计划内的国道，成为首先动迁的村庄，于2004年上半年开始按平方丈量，冻结房屋面积。一位村民向笔者袒露了当时猝不及防的心情：

04年开始丈量冻结，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拆迁，根本想不到还会拆迁。讲到拆迁感觉很稀奇，那拆就拆吧。那时候主要感觉不用种田种地了，最大的帮助就是比以前舒服了，特别是家里田地本来就没人种。要拆迁了，就想到这个，其它的想到什么呢，根本没想到，想不到后面政策会变化。（A村村民Y某：20180831）

2004—2005年第一阶段拆迁的房屋丈量时，村民的想法还未表现出较强的谋利动机，更多地只是想占点儿小便宜，亦即采取“夸大”“瞒报”地上附属物等方式挣点儿小实惠，表现为突击瞒报的“多种田”的策略。总体上，当时村民对于拆迁并不特别留意，对于拆迁房屋价值和预期升值空间也无意识，房屋丈量时户主常常“不在场”充分体现出了一些村民起初并未意识到拆迁补偿的重要性。

丈量的时候我们夫妻两个人不在家，老人一个人在家，根本不晓得，丈量好了，自家房屋面积多大自己心里清楚。附属物或种的树什么的，200棵、300棵随便我们报，也不怎么值钱，只要把握好房屋面积，那时候主要卡房子上面，基本不理睬附属物这些。（A村村民Y某：20180831）

应该说，村民起初对于拆迁房屋本身价值以及以后拆迁安置房的升值空间缺乏预估。因此，村民在前期拆迁中相对平和的心态与其后期的利益谋划构成了鲜明对照。由于村干部承担政府“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房屋丈量流程的相对顺利至少也说明即使有部分村民开始时有些不愿拆迁，但行为上还是接纳了村干部的例行公事行为。

当时的拆迁政策按照所在县2000年的340号文件执行，该补偿方案主要内容为：不分户，按人均建筑面积25—30平方米安置。年龄在16周岁以上，且未婚的，另行再照顾每人25—30平方米；家中只有一位老人，可以照顾30平方米；经认定的被拆迁人原房屋面积超过实际安置面积的，超出部分面

积按每平方米 100 元标准予以奖励，这一阶段安置房屋面积有 60、90、120 平方米的三种户型供村民选择，安置房未建成前发放足额过渡费，方案以家庭常住人口数为基准，对弱势群体也有所照顾，具体的谈判过程留有商议余地。当然，村民并不存在绝对的自主行动空间，选择夸大、瞒报的策略也是有所限制的。村干部认为具体拆迁过程之中也会考虑村民如何待人接物：村民在地上附属物等方面争取自主行动空间的计策选择时，需把握上报的尺度；同时村民素养决定了户主是否给村干部留下了负责的印象，胡搅蛮缠、态度不诚的村民得不到额外照顾。

树啊那些附属物什么的，我随你报，报到最后了，我问一句：你家还有了？随你自己报，你报到最后如果达不到我最终要给你的，报到最后他说没有了，我说再给你五千块钱，那村民就很高兴地点头了。如果真正报得太多了，乱报，我就实实在在地带他数。哪怕多个两三万块钱，都是不存在的事情。比如讲，我到你家去了，你跟我搞得蛮犟的，不理不睬的，但是在政策范围内比如讲，我可以给你一万五千块钱，我不敢不给你，但对你没有好感和好印象；但是呢，我到另一家去了，人家态度蛮好的，我还会觉得不好意思的，我把一万五给他了，我还会再多给他五千块钱，这就是在我权限范围内的，或者我给两万块钱，我也能给。（拆迁工作人员 L 某：20181204）

上述访谈所提到的“如果达不到我最终要给你的”，其实说明当时多数村民的期望也比较低，所要求的补偿常常要低于村干部所能掌握的内控标准。拆迁培训动员规定参与拆迁谈判的村干部的工作原则主要是控制房屋面积，在青苗补偿、住房附属物等相对补偿款较小的家庭财物方面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和决定权；同时给予村民谈判或商议的主动权，由村民先出价，如果村民的拆迁需要符合村干部预期且未突破政策底线，即意味着谈判的基本完成，村民可以签字画押。总之，与农村集体房屋征地拆迁的庞大体量以及开发区相对迫切的土地利用规划相比，政府在青苗补偿及其他附属物的现金方面给予农民适度的额外补贴总体上是无伤大雅的，也便于村干部处理自身作为政府“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之间的角色冲突。

这一阶段的拆迁谈判过程体现为心平气和的“商讨”“商量”“合议”。一方面，村民通常默认村干部提出的拆迁补偿方案，未对拆迁方案所依据的红头文件内容提出质疑或制度化要求，只是在多年后的访谈中才表达了没有留存住宅房屋补偿协议的遗憾。另一方面，当时并不存在与其他地方拆迁补偿方案对比的“相对剥夺感”，村民对于预期“收益—损失”尚没有估计，大都不会在拆迁之前做积极准备，同时通过乡村权力联结的运作“托关系”“走后门”以获得更大收益的现象也很少见。村民至多是在拆迁谈判的当场提出自己的诉求，通过“不行”“肯定讲房子不够”“带上去汇报、请示”“再来谈”“给优惠”等话语的“转圜”最终实现讲和。

总体而言，第一阶段的拆迁按照以“房屋面积为主，其它附属物为辅”的原则谈判，整体的拆迁补偿额度也就相当有限。以 30 平方米/人提供安置房面积，由于每家每户人口数相差不大，因此并未显现出较大的利益分化，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平均性。大多数被拆迁户的住房安置都是一户一套房子，拿两套房子的很少，超出安置额度的原房面积按 100 元/平方米的面积计算，最多可领到 2—3 万元的补偿款。突发的拆迁安排、紧迫的时间、经验不足导致绝大多数村民尚未意识到拆迁后潜藏的收益空间，

其“多种田”的手段也仅仅是为了获得些许小收益，于是很容易得到了变通默认。村民对安置面积的诉求体现为试探政策底线，由于政策具体执行细节由村干部自行掌握，因此早期的拆迁在 A 自然村得到了顺利推进。

（二）“假离婚”的“种人”

如上所述，第一阶段的拆迁谈判在和谐式“便宜行事”氛围下开展：作为拆迁政策预留的自主谈判空间的结果，村干部在青苗、房屋附属物等方面给予村民的额外补偿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默认。整体而言，第一阶段的征地拆迁标准还是较低的，同时多数村民的利益预期与补偿要求并不高；随着第二阶段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的调整，村民则开始更多地明显运作计策，体现为运用各种方法增加家庭户数以防止原房屋面积浪费。2008 年，第二阶段开始实施的拆迁范围逐渐扩大，涉及 WX 村所辖 11 个自然村，至 2011 年底完成了整体拆迁工作。

根据 2005 年以后开始执行的区政府 166 号文件的安置方案规定：被拆迁人有相等面积拆迁房屋安置补偿的情况下，安置房屋面积以 240 平方米上限；此外，按照分户原则，夫妻两人视为一户，未婚子女不能分户，但在产权调换基础上，每一户可另外安置 30 平方米，该政策为村民“假离婚”的计策行为提供了空间。1 村干部在规定范围内默许了村民各自家庭通过分户、办理离婚证等增加家庭户数的计策行为，以至于村民中存在两个已成家的儿子的大户，最后竟弄出了 3 本离婚证的现象，而村干部的态度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实上，村民的计策行为与村干部完成拆迁指标的工作任务不谋而合，村干部在地方社会有原则地照顾自己人，也是其做好人和工作技巧的体现。

村干部也帮忙，因为老百姓不懂政策，多分一户多 30 平方，只要有离婚证，我们帮忙操作。有人真的是去民政局离婚的，民政局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再一看是一个地方的人。所以为什么第三次拆迁政策变了，是因为 SJ 社区那边有一户人家房屋剩余补偿面积多，被民政局发现离婚、结婚好几次，最后全部取消了。（村干部 W 某：20180905）

总之，该阶段农民设法增加家庭人口与户数。在 11 个自然村拆迁过程中，有的农户以等待儿子结婚领结婚证为由而拖延签协议，甚至出现了农民为增加家庭户数，用已去世家庭成员户口冒充常住人口现象。与“假离婚”的相对普遍相比，经得起“拖”“耗”的少数“钉子户”恰好与开发区急于用地的压力相抵触，基层政府为完成土地利用规划对于“钉子户”最终还是采取了特殊主义对待的追加补偿方式，也使得提前搬迁的村民产生了区别对待的“不公平”感。

差距肯定有，比如 H 村 08 年拆迁的，跟 09、10 年的相比，就不一样，有点儿差距，不是政策，就是谈。这个人拆得越来越精，拆迁的时候不讲，一拆完迁就开始讲，哎你家拿多少房子拿多少钱啊，他一比较，好像比我拿得多一些嘛。所以讲这个政策搞到最后吵死嘛，要抵别人家的，他家房子多少

¹ 第二阶段的拆迁政策内容规定实行产权置换，每户面积 $\leq 60\text{ m}^2$ ，可按 60 m^2 购买， $60\text{ m}^2 <$ 每户面积 $\leq 90\text{ m}^2$ ，可按 90 m^2 购买， $90\text{ m}^2 <$ 每户面积 $\leq 120\text{ m}^2$ ，可按 120 m^2 购买。一般夫妻两人算一户，丧偶算一户，离异算两户，因此，案例地村民采取“假离婚”可以多分得 30 m^2 的安置房屋面积。例如，夫妻两人共有 90 m^2 房屋面积，一旦真/假离婚，则每人各分得 45 m^2 房屋面积，按照产权置换原则，则各可以分配 60 m^2 安置房屋，合计 120 m^2 ，比原房屋面积多出的 30 m^2 则是离婚所得，以此类推。

平方，为什么我家就拿这点钱，他抵哎，所以矛盾比较突出。前面拆的人亏得了，后来的“钉子户”啊，政府妥协了，政府为了开发那个地方，为了完成任务嘛。（村干部 W 某：20180905）

第二阶段拆迁牵涉到 11 个自然村，时间跨度从 2008 年至 2011 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有些微调整，加上具体拆迁谈判过程的“讨价还价”，社区干部回忆拆迁政策发现类似于“口袋政策”。村民在签订协议上与社区干部利益一致，甚至“共谋”“假离婚证”，然则“钉子户”的现象仍然有所存在。总体而言，在这一阶段，拆迁分户政策调整导致农民设法增加家庭人口，依靠村干部配合，或通过运用人际关系网络增加房屋安置面积，证明其计策行为的运作空间相较于第一阶段有了明显的拓展。然则，恰恰也正是由于“假离婚”行为的普遍化引发了民政等部门的关注，使得地方政府的拆迁政策随后做出了进一步调整并加以规范化。

（三）提前“盖房子”的“种房”

第二阶段拆迁过程中，村民的补偿收益有了相当可观的增长，从而使得尚未拆迁的 M 自然村村民对未来的拆迁充满了期待。2017 年秋冬，M 自然村终于传来了即将拆迁的音讯，有村民回忆了当时 M 村村民积极欢迎最后阶段拆迁的情形：

我们村有一家，按以前政策，他以为只能拿两套房子，拿不到什么钱，结果这次算下来能拿几套房子，还能拿几十万，他跟我们说：“为什么我不签？你们不签我签。”（M 村村民 Q 某：20180904）

拆迁安置政策随着城乡二元差异逐渐缩小不断优化，相对发达地区的失地农民在经济收入与社会保障方面都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吕璟、潘知常，2018）。2011 至 2018 年，考虑到城市建设与征迁范围扩大，为防止拆迁到来时补偿收益“吃亏”，M 自然村村民大多都在申请建房以扩大宅基地房屋面积，盖房现象相当普遍。据村干部估计，M 自然村几乎各家各户新盖或修葺了房屋，大多村民以“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儿女结婚，家庭人口增加”等为申请理由。这样的“种房”运动，显然有着提前预估筹划的明显特征，其申请理由相对于未来不能明确预期的拆迁而言，至少在形式上也是半隐藏的。然则只要将来一旦进入拆迁规划，拆迁政策尽管逐步规范，但补偿额度显然最终还是要回到现有住房面积的评估上。

参照家庭人口情况，可以申请盖房，2003—2018 年，小孩长大结婚的，怀孕生小孩家庭人口增加的，房子肯定不够住了，开发区这边适当把政策放开了。在 M 村，家家盖了房子，或多或少都盖了，多的也有，比如批准了 50 平方，盖了 60、70 的，根据自家宅基地面积，面积大，可以多盖点，最少的达到 300 多平方，400 多的很普遍，还有 500 多的，国道西侧控制得严，没有多盖的。（社区工作者 N 某：20180905）

综上，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为 M 自然村村民预留了盖房通道，只要符合实际情况或要求合理，可向居委会提交申请。与 2008 年拆迁执行的区政府 2005 年 166 号文相比，为防止“假离婚”，M 自然村拆迁安置执行的区政府 2016 年 2、3 号文对拆迁安置人口的认定作了更加严格的限定，按“人、砖、户”三位一体原则认定集体土地拆迁人口，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建房证明显示所在村组房屋、户口所在地为拆迁所在村组等条件须全部满足。安置房屋认定原则为：一人户不超过 120 平方米，二人户

不超过 180 平方米，三人及以上户按人均不超 80 平方米认定。该标准认定人口必须与家庭原住房面积相匹配，人口多、房屋面积大、分户多的家庭拆迁收益颇丰（参见表 1）。

表 1：M 自然村村民拆迁安置补偿情况

序号	人口数	户口分配	总平方(m ²)	安置房分配(m ²)	拆迁补偿款(W)
1	6	3 个 2 人户	525	105/90/90/90/90/60	79
2	5	3 个 1 人户，1 个 2 人户	510	120/90/90/90/60/60	83
3	8	1 个 2 人户，2 个 3 人户	450	90/90/90/60/60/60	65
4	8	1 个 2 人户，2 个 3 人户	435	120/90/90/75/60	65
5	6	3 个 2 人户	420	105/90/90/75/60	77
6	4	2 个 1 人户，1 个 2 人户	420	120/120/90/90	85
7	5	1 个 2 人户，1 个 3 人户	420	90/90/90/90/60	107
8	5	1 个 2 人户，1 个 3 人户	420	120/90/90/60/60	75
9	5	1 个 2 人户，1 个 3 人户	420	120/105/105/90	#
10	3	#	405	120/105/105/75	#
11	1	1 个 1 人户	105	105	14
12	1	1 个 1 人户	105	105	20
13	1	1 个 1 人户	105	105	22
14	1	1 个 1 人户	90	90	13
15	1	1 个 1 人户	90	90	26
16	1	1 个 1 人户	90	90	16
17	1	1 个 1 人户	75	75	6.42
18	1	1 个 1 人户	60	60	12
19	1	1 个 1 人户	60	60	0.99
20	1	1 个 1 人户	60	60	9.63

注：数据来源于 WX 村汇总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少数数据不明的用 # 代替

如表 1 所示，第三阶段拆迁的安置房分为 120m²、105m²、90m²、75m²、60m² 等五种户型。村民可根据分户结果得到的总安置面积自由择选不同户型，产权面积不够但有想法多拿安置房面积的村民可申请货币购买。虽然 M 自然村各户之间拆迁收益差距较大，但第三阶段拆迁比第一、二阶段公开透明得多，须经过无人机航拍冻结房屋面积、运用红外仪器丈量、拆迁公司现场具体评估、村干部与农户入户谈判、拆迁办审计协议等步骤，前任街道拆迁办主任详述了第三阶段的拆迁流程：

17—18 年拆迁，WX 这个区域根据体量的大小来分组，当时可能有十个组，每个组的工作人员一般是从各个社区和曾经参加过街道其它项目拆迁的人员中抽调的。另外，拆迁办也招聘了大学生，他们对业务这一块也是比较熟悉的，一般每个组有四五个人来构成每个村组的组织谈判体系。整个启动的过程目前来看都是很公开透明的程序，首先区房产公证部门通过摇号或竞争性谈判的形式公开房屋的丈量 and 评估过程，通过第三方经过联合确认确定房屋的价值，有七方：区房产局、房屋调查/登记部门、评估部门、审计部门、街道拆迁办、社区工作人员……由工作组针对每一户的家庭结构情况进行测算，这个测算就是根据所谓的 XX 区“人、砖、户”认定，人指人口，砖指房屋丈量面积、户指户口，根据这几个方面因素来计算，然后选择货币拆迁还是产权置换。当然，集体土地上拆迁还是以产权置换为主。整个工作组把这个大账换算出来之后，确定一个签约日期，集中进行签约，基本上是先签约先选房，这样也是有助于拆迁工作，基本上 95% 没问题。后期剩的 5% 包括一些对政策不理解的家庭有矛盾的，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工作组来多次多轮的解释政策，横向竖向做对比，一个个的攻坚，整个流程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过程。钉子户一般是签约期过了的，后签的没什么好的房子了。（前任街道拆迁办主任 H 某：20210722）

由上可见，这种拆迁小组乃至动迁公司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做到对村干部的“人情规避”（黄光国，1988）。因此，第三阶段的拆迁谈判过程中，规定了村干部需要回避亲属的制度举措，并多方联合形成了拆迁的“工作组”模式。然而，拆迁谈判虽然需要对村干部采取了一些回避举措，但对于个别拖到最后的“钉子户”，常常还是需要村干部出面去谈判，最终一般仍旧是通过适当增加补偿来加以解决。有村干部也从自身工作角度表达了隐忧：

所以这次拆迁，说是严格按政策执行，但不能在老百姓那边承诺坚决按政策，到时剩几户悄悄给五万、六万，结果他在外面讲，最后走多划算。所以我们也有疑问，是否有力度坚持下去，现在不需要这地方还好讲，一旦需要才特殊对待就不太好了，因为以前拆迁是这样的。（村干部 W 某：20180905）

总体而言，当政府实施较高补偿标准时，村委会成员利他程度越高，村民对拆迁合作水平越高（黄凯南等，2021）。在第三阶段，拆迁补偿标准优厚、提前搬迁奖励、先签字先选房等政府举措，明显减小了村委会工作难度，进而使得个别反对征地拆迁的“钉子户”陷于孤立，最终推动 M 自然村顺利完成了拆迁工作。应该说，这一阶段的拆迁政策制定与具体实践和之前两个阶段相比都更为规范，村民的早期盖房“筹划”也大都符合制度程序规定，较高的拆迁补偿与安置房标准使得各方都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但这种程序合法性，并不能掩盖村民计策筹划的实质非合理性，同时也说明应对于日益完善的拆迁政策，计策行为已经越来越具有前瞻性与半隐蔽性。与此同时，村干部与工作小组相配合的“变通”举措实质上构成了对村民计策行为的基本默认，从而最终达成了“和谐拆迁”的目标。

四、计策行为及其基本特征

以上 WX 村三个阶段的拆迁过程及村民计策行为的案例表明，随着拆迁政策的变迁与不断完善，村民应对性的计谋策略也日益成熟。这些策略表明村民从被动到主动，再至提前“合法”用足政策的心理及行为认知的转变。

表 2：各阶段拆迁基本原则与村民应对策略（2004—2018）

拆迁时间	基本原则	村民计策	应对策略
2004—2005 年	家庭人口数	瞒报、夸大土地附属物	被动应对
2008—2011 年	自然分户	真/假离婚 等儿女结婚	主动应对
2017—2018 年	“人砖户”认定	房屋修缮 建房申请	提前应对

如上表 2 所示，在拆迁初期，村民主要以“房子不够住”等实用性要求与社区干部“讨价还价”。其计策行为体现了村民在乡土层面某种“多种田”观念，通过“瞒报”“夸大”田地附属物等计策增加田地的补偿金额，村民认为这种适当地争取田地附属物的额外收益是合情理的。到了第二阶段，由于每户面积达到一定范围内的最低标准，则可以多争取 30m²的安置房面积，因此村民临时性地通过“假离婚”“等结婚”等计策，设法增加家庭户数以减少分摊在各户头上的面积，该类计策在与村干部“合谋”的基础上完成，表明村民计策已经通过社区干部形成了对拆迁政策文本的“渗透”。在最后阶段，M 自然村村民针对政策调整早已有所准备，村民在拆迁中日益膨胀的谋利动机也与拆迁补偿额度的逐步增加相契合，近些年来房地产市场的兴起使得拥有更多房屋不动产成为拆迁村民追求的主要目标。因此村民运用“房屋年久失修”“家庭人口增加”“儿子结婚”等伦理话语的转圜，递交建房申请积极筹划“种房运动”的策略翻建房屋，村民满足实用需求的同时也获得了在未来拆迁中收回建房投资的可能。结果，人口多、房屋面积大的村户在该阶段拆迁中获得了巨大收益，人口少或其他没有来得及申请宅基地建房的村户往往在拆迁中相对“吃亏”了。总之，最后阶段村民提前“种房”的筹划行为趋于“合法”地预测并用足政策，形式上似乎已经符合制度程序了，这样的“计策”谋略导向带有了更明显的长期利益规划取向。

在既有的中国人计策行为的研究之中，乔健（1988）较早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认识到了对中国人计策行为加以研究的重要性，并尝试提出了语意分析与文化语法的分析路径。翟学伟（2014）则从血缘与地缘等乡土关系的时空格局出发，认为传统中国农耕文化所带来的交往模式偏重于固定关系，由此导致中国人在长期性关系之中的计谋特征得以孕育出来。应该说，计策行为本质上构成了儒家伦理的对立面，但在中国社会的日常实践之中，行动者往往正是通过关系运作及计策行为而达成与社会结构相权宜变通的结果（翟学伟，1999）。本文通过对拆迁案例分析显示，村民的计策行为发展一方面受到征地拆迁的外部利益增长格局的影响，另一方面离不开村民间的相互模仿。这种从非规范性的“多种田”“假离婚”到规范性的“盖房子”等计策行为的普遍化，可能也说明了阶段性制度政策不断调整的内在局限性，其一方面充分展现了计策行为在某个阶段对组织制度有效权宜变通的可能，另一方面则

在长远意义上对组织绩效与制度规则构成了更为明显的挑战。从本文的案例分析出发，计策行为对社会结构或组织制度的权宜变通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非对抗性的利益目标指向。征地拆迁是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当征地拆迁作为政府或政企联合行为渗透于地方社会尤其是城郊农村时，城郊村民计策行为的主要目标即是通过各种策略为家庭在征地拆迁中谋取更多利益。其具体策略取向或采取“拖延”、多回合谈判策略试探政策底线，进而顺应拆迁政策的变动调整个体社会行动，并最终趋于揣摩或打听拆迁政策走向。相当部分村民计策行为的趋向实际上是基本生存权利的延伸，其目标是有限地、适度地在政府政策允许范围内增加收益与生计资本（黄海艳、蔡银莺，2019）。

非组织化的碎片化状态。在普遍受益情境下，村民的计策行为指向了如何各自运作获取额外收益这一目标，因而村民缺乏集体行动话语和组织社会动员的基础，呈现出非组织化的碎片化状态。某种程度上，“钉子户”的消极抵制行为同样也会呈现出非组织化的碎片化状态，但始终存在着“钉子户”之间联合组织行动的可能，而村民计策行为及其更多自身获利的普遍泛化，则进一步使得周边“钉子户”趋于减少而最终接受地方政府的补偿安排。因此，计策行为的普遍泛化往往进一步强化了行动者自利性行动的非组织化特征。

半隐蔽性与强模仿性的共存。村民各阶段计策行为的目标指向并不是对拆迁政策制度本身提出质疑或修改要求，而是通过随机应变、相互学习以至于私人关系运作绕过制度政策的变通举措争取更多的收益，因此半隐蔽性和强模仿性构成其行动策略的主要特征。强模仿性体现了系列计策行为得以泛化的功利主义文化氛围；半隐蔽性则指的是实施计策行为的过程之中，普通村民之间通常并不公开讨论的重要特征，夸大瞒报附属物、“假离婚”等具体情况更多是拆迁小组成员才能够知情的。

时间向度上趋于前瞻性。人们日常生活所呈现的活动及现象，往往是有目的的要使自己的生活会得更好一些，运筹就是更讲究前瞻性策略的运用（杨中芳，2001:7）。与群体性利益表达行动的相比，运筹讲究的是运作，即通过各种诉求准备和关系操纵，采取某种在可预估的将来收回成本的投资性行动。运筹是村民家庭自发的计策行为，即村民趋于前瞻性地把握未来政策的可能发展动向，符合制度程序地实现计策谋划行为的“合法化”。原先早期拆迁时的夸大瞒报附属物、“假离婚”等计谋更多还是即时性的，而后期拆迁提前筹划的“多盖房”行为则常常要早于拆迁数年。虽然修建住房可以用于自家改善居住环境，但较多的经济投入包括装修费用能否能得到未来的拆迁补偿是不能明确预知的，因此这种时间向度上的前瞻性已经带有很明显的预先投资或“赌一把”的意味。这种前瞻性或者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赌一把”，可能与理性选择的博弈论有较大差别，未来可以就这一理论问题再做深入分析。

总之，征地拆迁过程中日益趋于前瞻性的计策行为，本质上体现了村民盼望拆迁的利益目标指向，其表面上趋于私下的半隐蔽性，但实质上不甘心落后“吃亏”的相互模仿而呈现出某个阶段的同质性。从本质上而言，计策行为是实践过程中的某种变通性举措，其并不构成对组织制度或社会政策本身的质疑与挑战，更多是在制度所能容忍的界限之内或边缘地带达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则，计策行为

的权宜变通达成常常是以制度刚性不足或者说组织默认作为前提的，一旦组织加强制度刚性的监控或者收缩资源给予的弹性，计策行为的权宜策略空间完全可能被取缔。¹如本文拆迁案例中的村民策略性行为即得到了某种结构性的默认，这种相对较高的拆迁补偿标准及其制度变通的弹性虽然使得一些村民得以拆迁致富，但其可能触发的家庭财产分配矛盾等深层“人心”问题，反而造成了相当明显的家庭关系及社区发展的长远难题（秦祥瑞、沈毅，2019）。

五、总结与讨论

已有学者尝试从“保卫家园”（陈映芳，2010；朱晓阳，2015）的视角揭示当下城乡拆迁之中的伦理张力。事实上，不同地区面临的拆迁环境不同，从农业税费改革至城郊农村土地经济的兴起，某些相对发达地区的城郊农民对于“拆迁致富”充满了期待。这种对于拆迁预期的心态变化引发了村民计策行为的普遍泛化，显现了通过计策运作而达成各方阶段性妥协以至于共赢的“变通”可能性。

本文通过考察苏南 N 市城郊 WX 村十多年的拆迁过程发现，相当多数农民作为个体能动者在拆迁中的应对策略体现了从被动到主动，再至提前“合法”用足政策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消解了“钉子户”个体消极性抵制或集体组织化抗争的可能性。在地方政府拆迁政策的不断完善过程中，早期村干部与基层官员的执行裁量权不断收缩，村民也从原先的“农作物”“户口”方面的非规范操作日益走向提前规范化的合法建房策略，加之相对发达地区的基层政府与开发商可以承受相对较高的拆迁成本，从而达成了一种合法拆迁的制度化与利益分享机制。

随着地方政府随后相应的制度政策调整，原有的计策操作空间被取缔了，却也让更为前瞻性而符合制度规范的计策谋略得以酝酿。因此，一方面，必须就房屋拆迁补偿所可能涉及的离婚时间、盖房时间做出更为细致的制度规定，尽力预防拆迁补偿制度与政策本身所可能被利用的漏洞，并就其中所可能涉及的欺诈行为加强社会失信的登记与惩罚举措。另一方面，应该从整体制度层面建设与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在制度设计中并不能局限于文化传统的人性预设而裹足不前（翟学伟，2011；沈毅，2016）。总之，应当从根本上重建拆迁安置社区的“人心”安定与价值取向，最终促进城乡拆迁迈向实质性的体系化与规范化。

如果说基于“保卫家园”的积极抗争或消极抵制促使政府考虑到城镇化进程之中的民众权利和权益保障需要，那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计策行为则让村民充分运用现有政策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基层政府对村民计策行为的默许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消解了即时性的矛盾对抗。但就长时段而言，

¹ 计策行为常常有助于制度变通，“计策”与“变通”两者表面上都带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政策“擦边球”的基本特征。如果从宽泛意义上的制度弹性来理解“变通”，“计策”应能够纳入到“变通”的范畴之内。但如果从狭义意义上来看，“变通”往往是看到了现有制度政策的不合理性，而由地方政府或地方精英率先在基层制度或政策执行中加以灵活操作，其目的往往是通过实验试错最终推动制度与体制变革的进一步合理化，亦即“变通”有可能通过正式化程度的提升及其规模扩散有效推动正式的制度变迁（王汉生等，1997；孙立平，2002）。与之相比较，计策行为则更多是民众自身对现有政策的“擦边球”行为，亦即是老百姓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在利用制度政策的漏洞采取的策略行为，基层政府对此的默认也可以视之为某种缓解制度实践阻力的“变通”行为，或者说这可能是造成民众计策行为得以泛化的结构性动因。因此从长远意义而言，“计策”行为在有效推动制度变迁及“人心”共同体的建设方面往往是消极性的，或者说至多是以某种倒逼的方式推动制度政策的不断完善。“计策”与“变通”的异同与关联问题，有待未来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进一步加以展开。

泛化的计策行为却可能引发功利主义的氛围，在更大程度上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不劳而获的“人心”懒散问题最终也将影响社区治理的长远成效。推而广之，在组织运行过程之中，如何有效地避免计策行为与功利主义的泛化，在不同文化传统之中是否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社会认知与组织行为模式，应该也是组织制度研究的更为根本性的核心理论问题（Douglas,1986）。这需要我们持续地加以关注，并就制度规则、计策行为及权宜变通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系统研究。

参考文献：

- [1]陈映芳，2008，《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危机与合理性空间》，《社会学研究》第3期。
- [2]陈映芳，2010，《行动者的道德资源动员与中国社会兴起的逻辑》，《社会学研究》第4期。
- [3]董海军，2008，《“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社会》第4期。
- [4]黄光国，1988，《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载黄光国编：《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台北：桂冠图书公司。
- [5]黄海艳、蔡银莺，2019，《城中村拆迁还建居民家庭生计资本的流动特征——以武汉市两个拆迁安置小区为例》，《城市问题》第6期。
- [6]黄凯南、李菁萍、Roland Cheo、乔元波，2021，《房屋拆迁中影响村民合作的因素分析——基于7个村庄的田野调查和行为实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第1期。
- [7]林叶，2020，《“废墟”上的栖居——拆迁遗留地带的测度与空间生产》，《社会学评论》第4期。
- [8]刘怡然，2014，《城中村拆迁中的身体与底层抗争——以北京市城中村A为例》，《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
- [9]吕璟、潘知常，2018，《再造居民——社会空间视角下拆迁安置房社区失地农民问题研究》，《南京社会科学》第4期。
- [10]裴宜理，2008，《中国人的“权利”概念(下)——从孟子到毛泽东延至现在》，余钢译，《国外理论动态》第3期。
- [11]齐晓瑾、蔡澍、傅春晖，2006，《从征地过程看村干部的行动逻辑——以华东、华中三个村庄的征地事件为例》，《社会》第2期。
- [12]乔健，1988，《建立中国人计策行为模式刍议》，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台北：桂冠图书公司。
- [13]秦祥瑞、沈毅，2019，《拆迁安置、财产分配与血缘关系走向的实证研究——以TX社区为例》，《北京社会科学》第12期。
- [14]沈毅，2016，《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15]沈毅、刘俊雅，2020，《差序性权力圈层结构下的集体主义表象化——基于S村两个拆迁项目的案例比较研究》，《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

- [16]胜雅律, 2006,《智谋》,袁志英、刘晓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7]施芸卿, 2013,《自我边界的选择性固化——以 B 市被拆迁居民集团行政诉讼为例》,《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 [18]孙立平, 2002,《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 5 期。
- [19]田先红, 2010,《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开放时代》第 6 期。
- [20]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 1997,《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冬季号。
- [21]吴毅, 2007,《“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 [22]阎云翔, 2012,《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 [23]杨华, 2013,《城郊农民的预期征地拆迁概况、表现与影响——以荆门市城郊农村为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 [24]杨中芳, 2001,《有关关系与人情构念化之综述》,杨中芳主编:《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情感与信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25]应星, 2007,《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 年第 2 期。
- [26]翟学伟, 1999,《个人地位:一个概念及其分析框架——中国日常社会的真实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第 4 期。
- [27]翟学伟, 2011,《社会信用:人性假设与制度安排》,《开放时代》第 6 期。
- [28]翟学伟, 2014,《关系与谋略:中国人的日常计谋》,《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 [29]斯科特,詹姆斯·C., 2007,《弱者的武器》,郑广怀译,北京:译林出版社。
- [30]周娟, 2019,《农村征地拆迁中“钉子户”的产生机制及其治理》,《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31]朱晓阳, 2012,《物的城市化与神的战争》,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 10 卷),北京:法律出版社。
- [32]朱晓阳, 2015,《地势、民族志和“本体论转向”的人类学》,《思想战线》第 5 期。
- [33]Douglas, Mary. 1986, *How Institutions Think*.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秦祥瑞, 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17 级博士研究生

沈毅,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顾瑞

※ ※

我院研究生在“2021 中国社工教育协会年会”优秀论文评选中取得佳绩

2021 年 12 月 25-26 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2021 年会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工作发展研讨会”通过线上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主办，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协办。本届年会议程主要包括开幕式、工作会议、主旨发言、大会发言、大会报告、专委会工作汇报、大会闭幕等板块。

在优秀论文评选中，大会共评出 8 篇一等奖、18 篇二等奖、24 篇三等奖。其中，孙旌程的《后脱钩时代地方性行业协会的生存与发展》荣获一等奖，房子琪、张志华的《“人环互构”下外籍居民的志愿参与行为研究——以 N 市 R 国际社区外籍居民志愿者为例》荣获二等奖。

作为年会的一部分，我院承办的“全球化背景下移民治理的制度、路径及发展趋势”暨中国社工教育协会移民社工专委会第三届年会论坛，已于 11 月 28 日在线上成功举行。

本次年会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创造了学习的机会，促进专业学科的建设 and 专业人才的培养。此次获奖是对我校师生努力成果的肯定，同时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优秀作品的涌现。

后脱钩时代地方性行业协会的生存与发展¹

——基于江苏省 A 市的研究

孙旌程 王毅杰

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业协会，当前已进入“后脱钩”时代，并衍生出不同的生存样态。以 A 市行业协会为样本，分析脱钩后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会员单位(市场)之间的关系现状。研究发现地方性行业协会在脱钩后与行政机关之间存在紧密型、半松散型、松散型三种基本关系类型。半松散型协会面临着人力、财力和权威资源流失的发展状态，紧密型与松散型协会在脱钩后的生存发展相对健康但也有其发展局限。针对不同类型的协会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以期实现后脱钩时代行业协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行业协会 后脱钩时代 资源依赖 政会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行业协会作为一种提供行业共性服务、以产品为核心功能的行业型非营利社会组织，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力量。然而我国大部分行业协会出生于体制内，由原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转设而成，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作用发挥有限，行政化色彩严重，常以行政管理部门的助手角色出现，与政府关系密切。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从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始，国家大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指出要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在这一浪潮下，行业协会作为社会组织中的重要类型也从制度上开始逐步褪去官方色彩。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为行业协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即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强化行业自律，使其真正成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主体。201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中组部、中央编办等十部门联合颁布的《关于全面推行业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的实施意见》从脱钩主体与范围以及具体任务等方面进行了更为明确的划分，并要求在 2020 年底前基本完成脱钩任务。以“脱钩”为时间节点，我国行业协会迎来了由依赖政府发展向市场化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江苏省 A 市长期稳居全国县域经济发展前列，而行业协会对其地方产业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2017 年 10 月，A 市政府正式印发《深化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截至 2018 年 10 月，A 市行业协会脱钩率达到 95.4%，脱钩任务基本完成，脱钩改革制度框架基本建立，改革成效逐步显现。然而笔者于 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1 月在 A 市调研期间发现，脱钩后的行业协会发展存在

¹ 本文已刊发于《党政研究》2021 年第 6 期。

不同程度的分化，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市场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行业协会的发展离不开与所处环境的互动，环境可以为协会提供生存所需的包括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在内的外在资源。随着地方政会脱钩改革的推进，机构、职能、财务、人员和党建外事分离将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联一一斩断，实际上就是将行业协会在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行政资源从制度层面切断。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行业协会的“后脱钩时代”^[1]概念，笔者认为，后脱钩时代政会关系的重构，尤其是地方性行业协会与地方政府关系的重构是现阶段需要关注的重点。本文将研究聚焦于脱钩后的地方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具体互动过程，分析地方行业协会的生存逻辑，并尝试回应地方行业协会如何更好地应对脱钩带来的影响等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

早期研究倾向于从法团主义和多元主义视角探讨我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发现中国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掌握和管控较强^{[2][3]}，因此行业协会为了自身的发展必须与政府部门进行互动。也有研究从公民社会理论出发对浙江萧山地区以及温州地区依赖市场经济成长的行业协会展开分析^{[4][5][6]}，发现自下而上形成的行业协会正在蓬勃发展，它更强调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以及行业协会发展的自主性。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监管关系也实现了由“双重监管”到“直接登记”的转变^[7]。“直接登记”作为行业协会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成熟和完善的今天，对政会关系发展可以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8]。也有观点认为“直接登记”政策虽然能为行业协会发展带来机遇，但对政府监管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一关系模式下，政府部门因“重视事前监管，忽视事中和事后监管”导致对行业协会的违法违规问题监管不足。^[9]而行业协会也面临着业务主管单位难寻、协会定位偏离、行业代表资格垄断以及服务能力低下等问题。^[10]作为监管主体的政府各部门如何开展协调合作，现有法规怎样保障对行业协会的有效监督等问题，都会对行业协会的后期发展产生影响。^[11]随着政会脱钩改革的全面推行，不少研究认为我国行业协会的职能应当有所侧重和改变，强调应以服务会员为核心基础，推动市场体系建设，兼顾公共服务和行业环境治理。^{[12][13][14]}但在实际脱钩过程中，原先在行政机关强势干预下的行业协会没有得到充分的时间缓冲，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时的行为偏差也导致行业协会发展陷入困境^[15]。

在现阶段，行业协会的后脱钩时期，有学者提出政府与协会可以形成“政会共生”的理想类型。^[16]在实践中，也有行业协会通过创设常态化的平台与机制，植入政府与企业间管理与服务的行政通道，形成自我增能的借道机制，从而实现转型发展。^[17]

以上研究从多个层面对政会关系和脱钩改革进行了探讨，但由于脱钩改革对行业协会的影响还在持续发酵，学者们对行业协会脱钩后转型后的现状研究相对较少。虽然有转型

（二）分析框架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任何组织想获得其生存所依靠的资源，就一定要与其周围的环境（包括其他组

织)进行一系列的交换,没有组织是可以自给自足的^[18],也即行业协会必须与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同时,依赖的不对称性可以成为组织获得的特殊力量优势。在我国,不论全国性或地方性行业协会,自上而下的官办型协会都相对较多,而协会的发展离不开资源,对政府资源的依赖导致政会关系成为影响行业协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直接改变了行业协会在生存体系中的依赖地位,进而影响其生存发展。

国内学者将脱钩前行业协会与行政单位的关系划分为多种类别,其中较为主流的是根据协会的生成机制划分。该划分主要为三类,即体制内生成、体制外生成和体制内外结合生成。也有学者根据脱钩前协会对政府和企业所提供资源的依赖程度进行划分,分为全能型、半官方型、半市场型和市场型。^[19]本研究认为,在后脱钩时代,行业协会与不同主体间依赖关系的改变,导致行业协会的生存发展呈现不同样态。因此后脱钩时代的行业协会类型需要重新进行划分。

笔者在 A 市共对 8 家行业协会进行了调研,分别是建设协会、快递协会、特种设备协会、旅游协会、艺术培训协会、团膳协会、钓鱼协会和观赏石协会。其中有 6 家属于行业类协会,2 家属于民间协会;8 家协会中既有原本属于体制内生成的,也有依靠市场生成的。它们在按照政策要求脱钩后,生存发展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从政府发布的脱钩数据看,行业协会基本上已实现脱钩,这也意味着协会与行政机关间“科层性”关联的消失。但根据笔者在 A 市的调研发现,当地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实际上依旧保持着一定联系。多数呈现为行政机关的态度越包容,行业协会越会积极向行政机关靠拢;主管部门态度越冷淡,行业协会越倾向于依赖市场和会员单位发展。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双方之间关系形成的要素分别概括为“政府客观支持度”与“协会主观互动意愿”,并结合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和会员单位的互动依赖程度,得出 4 种政会关系模式,分别对应紧密型政会关系、半紧密型政会关系、松散型政会关系和半松散型政会关系(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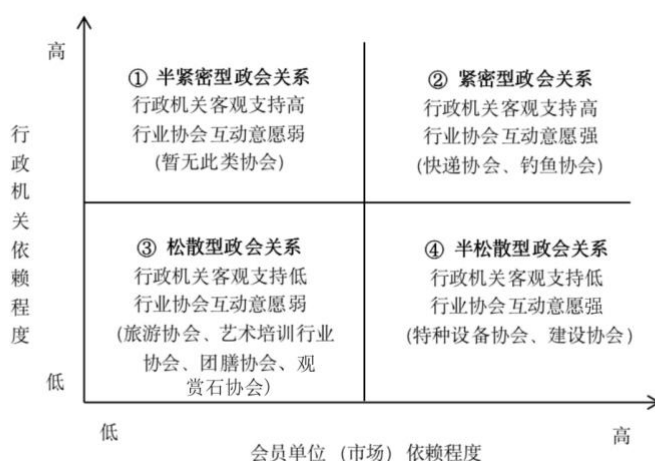


图 1 政会关系类型

根据在 A 市的调研,暂未在上述四类关系模式中发现半紧密型政会关系的行业协会。一种可能的

解释是，政府的强势地位和协会的弱势地位之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协会强烈的互动意愿可能只维持了协会与政府间的基本关系，而政府高度的支持却可以与协会产生密切联系。

因此，本研究暂且不对半紧密型的政会关系展开讨论。因此，根据行业协会对行政机关和市场的依赖程度，以及行政机关的支持度与行业协会主观互动的意愿，我们可以总结出脱钩后 A 市行业协会主要有三类政会关系，即高支持强互动意愿的紧密型关系，低支持强互动意愿的半松散型关系，以及低支持低互动意愿的松散型关系。组织会为获取资源而与环境中的其他组织进行互动，但在面对外部环境时并非完全被动，组织在面对力量较弱或较强的外部组织时处境和状态并不相同，其可以根据实际采取相应策略以减少自身对环境的依赖。由于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差异悬殊，脱钩后的行业协会往往会采取两种组织应对策略。第一，通过改变组织自身以应对外部要求；第二，改变单一的资源来源结构以适应组织发展。脱钩改革直接削弱甚至消除了行业协会对政府的资源依赖，从根本上改变了协会资源获取的结构。同时，由于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实际上是一种非对称的依赖关系，这也促使行业协会在脱钩后会采取一定的行动策略以应对新的环境。以下将结合经验材料对上述三种政会关系模式作进一步的分析论证。

三、“脱钩不脱管”——紧密型政会关系

紧密型政会关系是指，脱钩后行政机关依然全方面给予协会高度支持，协会与行政机关也有密切的互动行为。此外，协会也和会员单位（市场）产生积极的互动。质言之，此类协会的资源较为丰富，既有行政机关给予支持的，也有来自市场和会员单位的。且此类协会依然在原业务主管单位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的安排和部署等，协会运作在管理制度、会员服务等各方面较为规范，协会可以较好地承担行政机关与企业沟通的桥梁作用。在 A 市，关系紧密型协会主要涉及一些特殊领域的行业，比如医药器材类、化工类、物流类等，这类行业协会的共性特点是涉及公共安全，因此在寻求调研时较为困难，仅获得与快递协会秘书长交流的机会。根据国务院的要求，涉及公共安全等特殊领域的行业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这无疑为该类型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紧密互动提供了一定的必要依据。

（一）“挂协会名办事”：行政机关的高度支持

一个组织只要它现有的诱使因素足够吸引必要的贡献，就能生存下去。后脱钩时代，行政机关的高度支持，是紧密型行业协会为会员单位提供的诱使因素。这一因素主要表现为脱钩后协会依旧借助行政机关的背景开展工作，即，从原先由政府部门出面带领协会对接企业，变为协会在政府部门的指引下出面与企业对接。

“脱钩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太大影响，就在他们的眼皮下开展工作。很多事儿由协会出面，上面就出面了，但工作要求还是根据他们的来。比如督促检查，就是和他们的监管连在一起的。”（访谈记录 20190725 快递协会）

“领导们提出一个理念——‘脱钩不脱管’。就是要让企业感觉到协会还是受邮管局直接管理，协会对企业提出的要求实际上就是邮管局的要求，下面的企业心里要明白其中的分量。”（访谈记录 20190725 快递协会）

换言之，行政机关在脱钩后对协会的高度支持，实际上赋予了协会“官方背景”。为了凸显协会的工作成效，主管部门也会将由其实际推动的部分工作成果归功于协会。“之前要求快递网点在小区里的经营点都要合规，要求将分散在各处的快递点都安排在一个区域内。实际上，具体工作还是邮管局在落实，他们落实就带着协会，向上级汇报时说这个是协会牵头做的事情，对外也称是由协会牵头开展的工作。实际我们协会没有能力去协调小区的房子，也无法指挥协调快递企业入住。”（访谈记录 20190725 快递协会）

在查阅当地政府新闻时，还发现只有快递行业协会举办的活动会由主管部门发布新闻稿，例如《邮政管理局联合快递行业协会赴寄递企业开展高温慰问活动》《市快递行业协会开展首个寄递安全自律检查行动》等。而政府官网上其他协会的相关新闻极少，即便存在也仅仅是官网引用当地报纸发布的内容。由此推测，与脱钩前相比，现阶段行政机关的支持反而提升了协会工作的积极性，并且影响到应当市场化的行业协会对资源依赖的选择，以及在脱钩后的生存发展策略。

（二）“借助他们的力量”：高度支持下的主动配合

一般而言，行政机关作为强势方，行业协会与其进行互动的意愿都较为强烈，尤其是体制内生成的协会，更倾向于依赖政府资源。脱钩后，原本应当转型依附市场发展的协会，在面对行政机关依旧高度支持的状态时，也会权衡转型生存策略，将重心进行调整。

“我们每次开会都会主动请上级领导出席讲话，他们作为监管单位讲话，和我们讲话分量是不一样的。企业有事儿可以跟协会协调，都好商量，但是跟邮管局，就是要听他们的，所以我们借助他们的力量推进我们的工作。”（访谈记录 20190725 快递协会）

“按理说，脱钩是要完完全全的脱掉，但从实际工作的角度来说，他们对我们的支持是有利于协会工作的开展的。因为协会毕竟是一个民间的组织，还是需要借助政府的背景去做事情。”（访谈记录 20190725 快递协会）

为了获取资源，协会必须要与社会环境发生相互作用，而行政机关提供的资源是协会最为看重的。协会积极主动的互动意愿，实际上代表着他们的合法性诉求，政府资源可以保证协会工作开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从会员的角度出发，“积极互动”意味着协会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协会及时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消息和资源，这也是诱使企业加入协会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与主管部门加强互动，一些由主管部门组织的活动中也能看到行业协会的身影。

“实际上邮管局是交通运输局的下属，我们也会参加交通运输局举办的各种大型活动。虽然是他们要求我们参加的，但是我们也乐意。两年一次艺术节，两年一次运动会，错开的。像去年参加的是运动会，我们协会也能亮亮相。活动结束后放几张照片，写个新闻稿什么的，对协会发展也有好处。”（访谈记录 20190725 快递协会）

在具体实践中，快递协会通过与政府的积极互动，确实能够获得影响会员单位发展的相关政策，同时也可以避免会员单位因不遵守规范招致的处罚。A 市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名列前茅，其一年的快递业务量有时甚至可以达到某些省份一年的水平。同时，A 市邮管局对快递网点有着严格要求，如果网

点被检查出问题，会面临相当金额的处罚。

“协会每个月都会进行自律检查，把各个网点做得不到位的进行反馈，一段时间后再去复查是否已经整改好。我们也明确告诉他们，协会检查只是提醒，不罚款，但是邮管局查到有问题就要罚款。基本上后期邮管局检查时，不会出现太多问题，领导也会觉得协会日常的工作还是比较到位的。”（访谈记录 20190725 快递协会）

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协会在提前做好监管服务，保障企业利益的同时，也能向上级部门显示其积极的工作态度，减轻上级部门的负担，从而获得认可与支持。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紧密型协会对政府资源有着更强的依赖，对于市场和会员单位，协会则借助官方的背景依旧处于强势地位，保持良好互动。换言之，行政机关与协会间的双向互动，对于协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也与一些学者判断一致——行业协会必须要与政府、企业同时存在互补需求与互补资源，才可能获得政府与企业的双向支持，实现对上对下的双向合作。^[20]

四、“他们生的孩子”——半松散型政会关系

半松散型关系是指，脱钩后行业协会强烈期待与行政机关互动以获得可供发展的资源，但是行政机关的实际支持度较低。不过，协会仍然保留行政机关默许的部分便利条件，其诉求也可以向上沟通，两者保存着利于协会发展的沟通渠道。此外，协会也需要会员单位的支持，但其在会员单位的声望不高，难以向下获得可供依赖的资源。根据调研情况，该类型协会所处的行业主要包括建筑类、设计规划类、制造类等，这部分行业具备的共性特征，即企业和市场规模相对较大，并且对政府资源有着实际需求。

资源依赖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互相依赖的关系中必然存在着不对称性。一个组织影响其他组织的可能性主要有两点：第一，对其他组织所需资源的控制；第二，其他组织对该资源的依赖性，并且该资源的可替代资源是稀缺的。行业协会的早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具有在不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影响其他组织活动的的能力^[21]。实际上协会拥有官方背景对于会员单位而言意味着“政治资源”，对协会而言是其合法性的化身，为日常工作开展带来积极影响。半松散型关系意味着政府资源的失去，使得协会并不可能在行政机关和会员单位之间，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协会自身的发展受到阻碍。

（一）“资源置留”：历史情分的小恩小惠

脱钩前，在政府资源的加持下，行业协会可以对会员单位形成一定的威慑力，并且可以获得包括资金、场地、物资以及其他的便利条件进行发展。

“脱钩前政府能给协会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威慑力和影响力，有他们的影响力和威慑力在，大家都会积极主动参与到协会活动中。”（访谈记录 20190803 特种设备协会）

脱钩后，行政机关不再主动提供协会所需资源，而是逐渐将原先给予的资源收回，但仍会留下少部分。这里借用“血缘”概念来解释“资源置留”。在原始社会中，血缘关系是社会的基本关系，是社会组织的基础，对社会生产及人们的生活起着决定性作用。血缘关系是中国人极其看重的传统关系，

它不仅存在于各个家庭，在企业中也有母子公司之分。在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的关系状态中，体制内生成就代表着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因此，血缘关系也让一些主管部门为协会脱钩后的发展留存一定空间。

“脱钩后，上面也算照顾我们，像一些小型的招投标项目，他们会和企业说你们想要参加就得先成为协会的会员，这是条件之一。其实，我们发展不好他们肯定心里也不太舒服。”（访谈记录 20190730 建设协会）

“上级部门还是留了一点资源给我们，就是协会保留盈利点。特种设备的四个考试点还是放在我们协会里的，由协会进行操作，考试必须在我们这四个点进行。最后由协会组织发证，这是政府原先的主管单位授权的。毕竟是他们扶着协会起来的，还是有感情的。”（访谈记录 20190803 特种设备协会）

需要明确的是，虽然脱钩后主管部门留下了一些资源支持协会，但是这种支持很大程度是因血缘和情分给予的恩惠，这种恩惠也随时可以收走。从协会负责人对主管部门的态度描述中，不难察觉到两者之间的疏远，以及协会面临着难以获取政府资源的窘境。“我们原先和上面沟通还是蛮顺畅的，但是现在他们对我们的一些诉求喜欢拖延。以前都是他们主动联系我们，现在我们要主动去联系他们了。”（访谈记录 20190730 建设协会）

“领导们之前说支持协会做大，也口头承诺过提供业内的资源给我们。虽然现在脱钩了，但毕竟协会是他们生的孩子，是有感情的。以后新领导上任，可能会慢慢忘记了协会的过去的历史情况，最后彼此完全陌生。”（访谈记录 20190803 特种设备协会）

在政策要求下，部分主管部门不愿也不敢高度支持，“脱钩即脱管”是他们的态度。然而，“情分与血缘”促使行政机关不得不考虑协会未来的发展，只能将一些可控的边界模糊的资源留给协会，从而给予一定的发展帮助。除此之外，他们不会主动参与到协会的工作中。这就意味着，脱钩后协会向上无法依赖行政机关，难以获取政府资源，生存发展面临着棘手难题。沈永东等学者认为脱钩改革后需要行业协会商会将自身职能定位从为政府服务转向为会员服务，以推进市场体系建设为优先职能。^[22]但是笔者发现，在此状态下协会的发展策略依然是优先向政府靠拢，再考虑推进市场体系建设。

（二）“两手准备”：暧昧态度下的发展策略

对资源决定权控制的集中和资源对组织的重要性共同决定了中心组织对任何特定的其他群体或者组织的依赖程度。一些主管部门考虑到与行业协会之间的渊源情分，仍然会给予一些非主动支持型资源。这些资源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并不重要，却可以影响协会的发展。这种资源置留在协会看来是主管部门暧昧态度的信号，让协会对重拾官方“靠山”抱有一定期望和想象。

“我们还是想重新搭上政府的关系。因为他们的观点和我们的是一样的，可以说格局比较大。我一直觉得，虽然脱钩了，但是我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以后可以做到共赢。”（访谈记录 20190730 建设协会）

“我们现在每次开会员大会的时候，都会邀请特种设备科的领导来，他们基本上都会出席。有人去和没人去是不一样的！领导一去大家都来，沟通起来就比较方便了。还有理事大会，我们也主动邀请领导出席，领导很给面子都来了，理事单位也都很重视。我觉得还是过去的模式更好，不管哪个协会还是需要和政府打交道，因为企业是离不开政府的。从协会的角度出发，也比较希望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多一些。纯社会化运作就是让协会往死路上走。”（访谈记录 20190803 特种设备协会）

脱钩后，凭借着过去的“情谊”以及自身强烈的互动意愿，协会仍然保有与行政机关增进关系的渠道。但是为了防止最终无法重建稳定关系，协会还是会考虑从自身出发，扩大协会影响力，稳定协会现状。

“我们现在正想办法详细掌握协会中会员单位的情况，以后政府有什么需求，我们可以帮助政府进行协调。最重要的还是将内部制度完善好，提升工作效率。争取让会员对协会的认可度提升，让会员觉得加入协会有价值，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价值。当然，最终还是希望协会能够做到让政府觉得我们对他们可以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这样如果他们以后有项目，可以优先考虑到我们协会。”（访谈记录 20190730 建设协会）

“我们在争取多吸纳一些各行各业比较好的资源，更多层次高一点的企业进协会。就是把会员招收范围扩大到只要使用特种设备的，都可以加入。这样可以让协会的内部资源形成对接。后期还要多筹办一些活动，增加内部企业互动，使会员通过协会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当然，虽然脱钩了，但是我觉得政府给协会的支持还是要继续有的，毕竟交情在这，我们也得做好万全的应对准备。”（访谈记录 20190803 特种设备协会）

主管部门的暧昧态度让协会的行动策略始终以重拾政会关系为主，优化协会影响力为辅。在半松散型关系下，协会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依然是影响协会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政会脱钩的不可逆现状，也让协会负责人不得不考虑市场对协会未来发展的影响。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所有的组织成果实质上都建立在相互依赖原因和根源的基础之上。在半松散型关系中，行政机关对行业协会并没有实质性的依赖，例如对建筑工地的检查验收也存在可替代的组织人员，并不一定需要行业协会出面。而行业协会在开展诸多工作时却需要政治资源的支持，两者之间存在着单向依赖的关系。因此，半松散型行业协会的发展虽然需要政府资源，但是政府资源对发展无法起到确定性作用，某些时候协会的会员单位和市场反而可以帮助协会发展，只是目前该类型行业协会不具备组织活力，难以协调自身发展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五、“自生自灭”——松散型政会关系

松散型关系是指，行业协会脱钩后，与原先业务主管单位仅保持基本联系，即政策文件的收发和日常组织材料的汇报。主管部门对协会的支持度低，协会也没有强烈的互动意愿与行政机关深层次联络，协会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相对来说，这一类型的行业协会发展更多依靠市场需求，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较松散，该类型协会包括旅游协会、艺术培训协会等。

（一）“公事公办”：无处可寻的政府资源

在脱钩实践中，行政机关之间保持“公事公办”状态的松散型协会包括三种类型：第一，协会原先与主管部门关系密切，脱钩后仅保持常规互动。第二，协会原先与主管部门关系一般，脱钩后维持原状。第三，脱钩政策实施后新成立的行业协会，没有相关部门背景。笔者在调研时发现，松散型关系下的A市行业协会存在第二种类型的较少，主要是第一种和第三种。

脱钩前，旅游协会是由A市旅游局带头成立的，观赏石协会则挂靠在国土资源局，他们原先与政府的关系较为紧密，但在脱钩后，政府不再干预协会的任何发展。“原先我们就是旅游局成立的，脱钩后领导们也都不在协会里任职。现在一般只有大型活动时我们会跟领导报告，但是不一定非要他们来，他们如果愿意参加，我们也是欢迎的。”（访谈记录 20190801 旅游协会）

“2017年协会准备出版《石谱》时需要几十万，国土资源局、园林局、文化局都准备提供资金支持，只有国土局和园林局给了，文化局原先分管的领导更换后就没有下文。当时还说要安排一个副局长分管我们，结果一脱钩，副局长也不管不问了。”（访谈记录 20190810 观赏石协会）

团膳协会是在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卫监所和市私营个体经济协会有关职能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筹备完成的，原先的主管部门就不明确，脱钩后直接转为民政局指导。

“现在和政府的联系只有民政局这边，主要就是协会年审的时候，平常就是咨询一些文件问题和政府的文件下发。以我们现在的工作来看，一般都是政府下发的任务会有一点接触，像扫黑除恶的专题会议。政府对协会的支持也没有太多，毕竟工作上没有太大关系，我们都是自己进行的。”（访谈记录 20190805 团膳协会）

艺术培训协会是在脱钩后新成立的协会，原先就没有挂靠的业务主管单位。现在更是处于一种非亲非故没人疼爱的状态，无法获得政府部门的关注。“我们协会刚成立不久，政府活动的支持还是很少的，或者说我们和政府之间的交流较少，还没有能够引起政府足够的关注。”（访谈记录 20190807 艺术培训协会）

行业协会在松散型关系状态下，很难寻找到政府资源的支持。不论是体制内生成的还是体制外生成的协会，面对已经失去的政府资源，在生存发展时，需要充分考虑到组织可获得的其他资源，在组织的生存环境中寻求合适的互动主体。对于松散型关系的协会而言，依靠市场成为协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自给自足”：市场需求的自主发挥

根据调研发现，脱钩后行政机关对协会态度冷淡时，松散型协会的行动策略不会倾向于“热脸贴冷屁股”，而是选择依托市场发展壮大，或者保持现状无欲无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协会都选择与主管部门保持距离，究其原因，还是与协会自身的发展需求有关。

其中选择依托市场发展壮大的协会，其行业发展本身就依靠市场，且具有较高的自主性，这与李学楠提出的“市场型协会”^[23]较为一致。需要注意的是，本文认为现阶段的市场型，是指脱钩后协会的发展更依赖市场，由市场主导。也就是说，除了原先就是市场型的协会，还存在一批由政府主导型

的协会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的协会。例如旅游协会和艺术培训协会。

“以前我们协会都没有什么旅游品牌活动。脱钩前旅游局不让收太多会费，没有钱也就没有自主性。但是脱钩后我们把会员费用提高了，我们组织的活动也多了，可操作的空间就变大了。自己拥有决定权，会员单位也就慢慢活络了，大家对旅游市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访谈记录 20190801 旅游协会）

“本来我们也想将协会挂在文体广电旅游局下面，后来大家商量了一下觉得不挂比较好，相对来说自由一些。毕竟艺术培训行业还是依靠市场的，有了政府介入感觉会比较麻烦。”（访谈记录 20190807 艺术培训协会）

另一种情况是，会员单位本身掌握更多的市场主动权，协会相对而言能够给予会员的支持较少，只能给予辅助性服务，无法发挥统领作用，同时协会内部人力资源匮乏，因此协会对自身发展没有规划，更倾向于依靠会员单位维持协会的常规运转。

“协会现在的状态我觉得还蛮好的，我们这的工厂多，对团膳的需求量大。会员企业发展都依赖工厂的需求，大型工厂资源都在大型团膳企业自己手里。协会主要就是帮助一些需要零时配餐的小企业，大型的基本上都有固定合作。协会每个月 25 号提供菜品送检服务，这也是我们会员单位自愿参加的。如果会员愿意就将菜品送去，协会统一出钱。会员加在一起也就二十几家。”（访谈记录 20190805 团膳协会）

在这种状态下，会员对市场和资源的掌控强于协会，而协会的存在对会员单位的发展并无实质性影响。因此，协会本身的发展目标较低，对政府支持的需求度也不高，行政机关的态度对协会的发展影响较小。

事实上，松散型行业协会的发展主要看市场需求，并且基本形成协会与会员单位之间的互动闭环。行业协会为会员单位提供一定的支持服务，如提供低价活动场地、供货资源调配等，会员单位也为协会提供大型活动人员支持，进而产生资源依赖。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的支持对于松散型协会而言并非必需品，只要市场有需求，行业协会就可以生存。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之所以能够生存下去，是因为所包含的活动足够维持组织自身的运转。这一观点符合目前松散型行业协会的生存现状。

六、结论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总结归纳出地方性行业协会在脱钩后的生存逻辑，即，脱钩后协会与行政机关、会员单位（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资源依赖的现状。

从图 2 可以看出，紧密型协会在脱钩后发展状态目前较为健康，协会内部运作以及外部资源调动良好，协会可以承担起企业与政府之间沟通桥梁的作用。半松散型协会在脱钩后向上无法获取资源，向下无法得到会员信任，导致协会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作用较为鸡肋，发展状态处于病态。松散型协会尽管没有政府资源支持，但是其与会员单位（市场）的良好互动在脱钩后仍然可以保证自身的运转，只是缺少政府资源使其难以扩大自身发展规模。综上所述，在后脱钩时代，紧密型与松散型协会或与政府或会员单位（市场），都可以形成至少一种的双向互动关系，而半松散型协会却难以形成双向互动，

因而生存与发展相较于其他两类而言更为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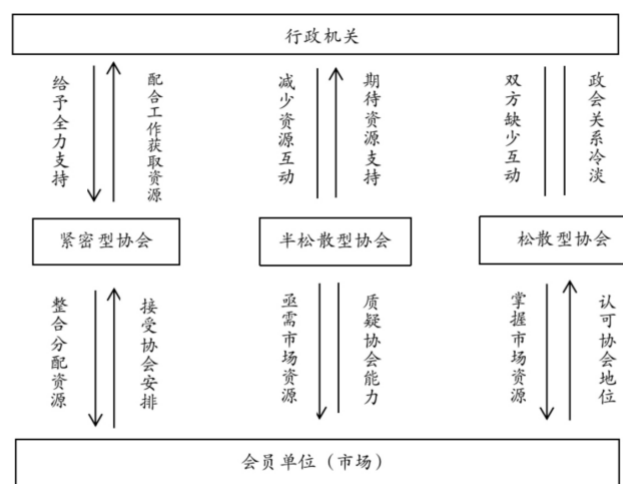


图2 政会关系模式图

此外，三种类型的行业协会虽然生存逻辑和发展状态不同，但是在脱钩后的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仍具有相似性。根据 A 市调研情况笔者发现，除发展较为健康的紧密型协会外，其余两类协会面临的主要困境大概有三类，即：人力资源困境、组织资源困境和政治资源困境。其中，人力资源困境主要体现在缺少专职工作人员及员工经验不足；组织资源困境主要体现在协会会费收缴困难及资源获取渠道单一；政治资源困境主要体现在缺少合法性职权对行业进行治理。另外，笔者发现，脱钩后不同类型的协会也对内部和外部发展进行了相应的规划，其中，三种协会的内部规划较为一致，都是从对规模影响力的基础需求逐步转变为对会员提供优质服务和对协会运营规范的重视。而在外部规划中，松散型协会对行业治理的自主权更为注重，半松散型协会则是期待与政府处好关系获得支持，紧密型协会更多的是希望维持现有关系，保障协会的正常运作。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如下事实和结论: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行业协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环境的变化促使一部分行业协会为了生存做出改变以适应环境，还有一部分行业协会仍在挣扎。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是利益的联合体，它面临着一个竞争性的、经常性冲突的、有需求的环境，并且还要从环境中索取缺乏的资源，行业协会的发展现状充分印证了资源依赖理论这一观点。然而，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国家政策改变后，行业协会生存发展所需要的资源的控制者已经发生改变。行政机关不再成为协会发展所需资源的提供者，而是将行业协会推向市场，减少行政因素对行业协会发展的影响。

如今行业协会的发展方向应朝着市场化推进，但现阶段的政会脱钩并不能让行业协会快速实现转型，协会需要对资源依赖体系重新构建。因此本文根据三类协会脱钩后的发展状态提出如下建议:其一，紧密型协会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利用好已有的政府资源，与会员单位加强联络。未雨绸缪，形成以服务品质为核心的协会凝聚力，增加服务内容，逐步加强市场资源依赖，以防政策变动带来的资源匮乏，保障协会日后工作的顺利开展。其二，半松散型协会需要对协会进行定位，明确协会的发展规划，

即明确是以市场需求为主还是行政服务为主。根据规划方向形成发展目标,可以考虑与其他协会搭建共同发展平台,组织与组织之间互相帮助。通过资源的交换互助,改善资源依赖体系,扩大协会的影响力,加强会员黏性。其三,松散型协会在以市场化发展为主的前提下,对协会内部的规章制度进行完善,确保协会发展的规范性。同时,提升协会服务范围以及品牌影响力,形成较强的认可度,积极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竞争,加强协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徐晞、吕晓琳、陆锦琳,2018,《“后脱钩时代”政会关系重构——基于纺织业案例研究》,《东南学术》第4期。
- [2]张钟汝、范明林、王拓涵,2009,《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第4期。
- [3]范明林,2010,《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基于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视角的比较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 [4]贾西津、沈恒超、胡文安等,2004,《转型时期的行业协会——角色、功能与管理体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5]郁建兴、江华、周俊,2008,《在参与中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基于浙江温州商会的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6]江华,2008,《民间商会的“一业多会”问题及其求解路径——基于温州行业协会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5期。
- [7]王名、孙伟林,2011,《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中国行政管理》第7期。
- [8][10]徐家良、郝斌,2015,《直接登记下行业协会与政府关系发展新趋势》,《教学与研究》第9期。
- [9][11]郁建兴、沈永东、周俊,2014,《从双重管理到合规性监管——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行业协会商会监管体制的重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 [12]张建民,2014,《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行业协会商会职能的新定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第5期。
- [13][22]沈永东、宋晓清,2016,《新一轮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的风险及其防范》,《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第2期。
- [14]罗文恩,2018,《后脱钩时代行业协会功能再定位:共益组织研究视角》,《治理研究》第5期。
- [15]周俊,2018,《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中地方政府应如何作为——以A市B区为例》,《中国社会组织》第14期。
- [16]罗文恩、王利君,2020,《从内嵌到共生:后脱钩时代政府与行业协会关系新框架》,《治理研究》第1期。
- [17][20]赵吉、彭勃,2020,《社会借道行政:后脱钩时代行业协会自我增能的有效机制》,《治理研究》第1期。

- [18] [美] 杰弗里·菲佛、杰勒尔德·R·萨兰基克, 2006,《组织的外部控制: 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 闫蕊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 [19][23]李学楠, 2015,《政社合作中资源依赖与权力平衡——基于上海市行业协会的调查分析》,《社会科学》第5期。
- [21] [美] 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 2008,《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 姚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作者简介: 孙旌程, 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20 级博士研究生

王毅杰,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责任编辑: 顾 瑞

※ ※

河海大学获批移民科学与工程交叉学科

2021 年 9 月, 河海大学自主设置的“移民科学与工程”交叉学科成功获批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 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移民科学与工程交叉学科点。

近年来, 河海大学高度重视交叉学科的建设工作,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建设思想, 发挥一流学科辐射带动作用, 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人工智能、“互联网+”“碳达峰、碳中和”、先进制造业集群等国家重大战略发展方向, 培育一批特色性强、成长性好的新兴学科, 以交叉集成促进学科整体水平提升。加快构建以水为特色, 以一流学科为核心,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学科体系, 全面提升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重点行业的能力。交叉学科的设置, 既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行业重大需求, 也体现了学校打破学院壁垒, 加强学科之间的互涉、渗透、交叉与融通的决心, 开启了学校培育学科增长点和构建人才培养高地的新篇章。

“移民科学与工程”交叉学科设置移民科学、移民工程、移民管理三个主要方向, 通过社会学、水利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测绘科学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等多个学科优势互补, 进行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科学、自然科学交叉研究, 瞄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灾害防治、扶贫开发、城镇化、工业化涉及的移民工程等社会重大应用需求的基础性、方向性问题开展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 由社会学学科牵头申报和建设, 公管院和多个学院联合协同, 远期愿景为建设成为基础扎实、发展迅猛、引领全球、理实结合、服务社会的国际一流的交叉学科。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徐雨菡

摘要：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日益凸显。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并结合访谈法的方式，调查了 1050 位江苏省婴幼儿家长，走访了 H 市 8 位家长及 4 家托育机构。研究发现：托育市场潜力巨大，但托育机构数量和品质难以满足家庭需求，托育需求受不同因素影响，年轻父母希望有专业照护，政府应承担更多责任，供给不足抑制生育意愿。提出政策建议：当前疫情背景下应加大对托育机构的扶持力度，推进托育机构的规范化建设，搭建与社区联系，促进机构为家庭提供育儿服务，加快推进普惠型托育机构建设。

关键词：婴幼儿 托育机构 托育服务 江苏省

一、问题的提出

一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2017 年 10 月，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明确提出现代社会需要实现“幼有所育”，由此，翻开了我国保障民生、关心民计的新篇章。2021 年 3 月，李克强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更是两次提出“十四五”时期需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强调了托育服务的重要性。

2019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上发布了宏观指导意见。之后，多项有关托育的政策出台，包括托育机构的管理规范等，为行业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2020 年国务院发行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健全托育政策、加强监管等指导性建议，推动地方及各部门的政策落实情况，增进融合新趋势，促进托育产业的健康新发展。

全国多地都陆续出台有关托育的政策，为实现“幼有所育”开展了积极的尝试。2018 年 4 月，上海市教委牵头颁布了全国第一个地区性落地政策：托育“1+2”政策（即包括一个指导意见、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以及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填补托育政策空白。接着，四川、湖北和浙江等地陆续出台相关政策。2017 年，南京市曾印发《南京市 0-3 岁婴幼儿早期发展工作提升行动计划（2017—2020 年）》，提出探索新理念、提升质量管理，努力以多元服务满足城乡家庭不同需求。2020 年，江苏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为构建与完善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作出自己的努力。

二是家庭现实需求。婴幼儿发展阶段是一个人成长中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婴幼儿的生理机能、行为举止、语言发展等方面都会有较快的发展。俗话说：“三岁看小”，就是说明如果一个孩子在三岁之前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那么他的身体、心理、个性都能得到良好的发展，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理智成熟的成年人。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现代家庭开始意识到婴幼儿阶段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对其生理、智力、性格和社会行为的形成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逐渐重视起婴幼儿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劳动力和家庭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前由家庭主导、甚至母亲作为婴幼儿主要照料者的情况已经向多元照料主体发生改变，家庭主妇减少，家庭的儿童照料功能大大减弱，导致替代性的照料需求在不断增长，更多父母在家庭之外寻找新的替代功能。

三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我国从2016年开始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然而，“全面二孩”人口新战略的实施使得家庭在照料0-3岁婴幼儿方面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不仅增加了养育时间和成本，如何教养孩子也成为新的挑战。在此政策背景下，大力推进早期育儿服务社会化，不仅是减轻家庭托育压力，提升公民生育意愿的关键环节，还是我国婴幼儿早期抚育方式转型的重要方向。数据显示，2016-2019年江苏省和全国出生人口数急剧下降，江苏省出生人口数量从77.96万人逐渐减至73.51万人，而全国出生人口更是从2016年的1785万人减至2019年的1465万人，由此可见，近年来出生人口减少，所以国家进一步发展并完善“全面二孩”政策势在必行。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可以创造一种更加宽松的生育环境，因而能够刺激托育的需求。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国家层面、家庭层面到社会层面，人们已经开始重视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问题。随着婴幼儿数量不断增长，托育服务将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建立及完善托育服务体系的问题迫在眉睫。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希望通过对家长的调研了解家庭托育需求及托育对生育的影响，为江苏省托育服务发展提供政策建议。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同时辅之以访谈法进行。首先，搜集国内外相关资料并进行文献分析，研究国内外关于托育发展总体状况，在此基础上制定问卷和访谈提纲；其次，确定抽样方法，通过问卷和访谈收集资料；最后，对问卷和访谈收集的资料进行辨别，在此基础上分析托育服务。

（一）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本研究的主要资料收集方法。问卷共分为三个部分，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托育服务现状、以及托育服务的重要性，共计41道题。第一，基本情况。主要了解调查对象所在地区、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等背景资料，也包子女及婴幼儿情况等，共计11道选择题；第二，托育服务需求。第二部分将接受调查的婴幼儿家长分为是否入托等两种不同的情况，在未入托的情况中又分了是否想入托等两种情况。在未入但想入托的情况中，主要调查选择现状的原因及孩子月龄等个人情况，家长自身想法及机构基本情况等影响因素。在不想入托的情况下，主要调查不想入托的原因、照料者、是否接受过早教或托育服务及花销等情况。在已经入托的情况下，主要调查婴幼儿基本情况，机构的基

本情况，以及机构存在问题的情况。本部分共计 20 个题目，意在探究当前托育服务的现状与不足；第三，家庭育儿需求、政府在托育服务中的作用、及生育意愿。共计 10 个问题，以此探讨托育服务的重要性。

问卷调查对象的选择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进行。面向整个江苏省（包括 13 个地级市及下属地区）发放调查问卷。共选取江苏省 0-3 岁婴幼儿家长 1050 名作为调查对象。家长入选标准为：0-3 岁婴幼儿的父亲或母亲；具有江苏省户籍，并在省内居住；自愿参与本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填写，在规定时间内回收，问卷共计发放 1050 份，回收 1050 份，回收率 100%。样本分布如下：苏北地区 731 人（69.6%），苏南地区 144 人（13.7%），以及苏中地区 175 人（16.7%）。

问卷回收后，对数据进行数据清理与核实后，进行编码与赋值，运用 SPSS21.0 进行处理，主要是运用频数分析、交叉列表、卡方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主要分析托育服务客观需求、主观需求以及托育服务需求的差异。

（二）实地调查法

实地调查主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在访谈进行中，依据访谈大纲和基本框架进行提问，并针对新发现的问题做一些追问。例如家长认为托育机构应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的看法等，从而了解影响托育服务的深层原因。研究旨在根据访谈来进一步理解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面对托育行业时，如何从家庭、机构、社会和政府等多个层面促进托育服务，构建多元化的托育服务体系。每次访谈时间约在十分钟左右，主要通过面谈及微信的方式进行，采取在家长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录音。访谈结束后研究者会将录音转换为文字稿并进行编码。

家长访谈主要运用方便抽样的方式，选取 8 位江苏省婴幼儿家长作为访谈对象，其中 4 人通过面谈，4 人通过微信进行。家长样本包含苏南以及苏北，也包含城市及农村地区。接受采访的家长中，既有参加线下亲子活动的家长，也有通过亲戚和朋友介绍的家长。（见表 1）

表 1 访谈样本情况

家长编号	家长身份	所在地区	孩子月龄/月	访谈方式
N1	妈妈	苏北	16	面谈
N2	妈妈	苏北	48	面谈
N3	妈妈	苏北	24 和 10	面谈
N4	妈妈	苏南	6	微信
N5	妈妈	苏南	3	面谈
N6	妈妈	苏南	2	微信
N7	爸爸	苏南	1	微信
N8	妈妈	苏南	1	微信

机构访谈采用典型抽样，由 H 市 Q 区卫健委推荐 4 个有代表性的托育机构，然后对托育机构进行

走访与面谈。被选中的托育机构中，包括私立早教中心、家庭式民办托育机构、民办连锁幼儿园、以及私立托育机构（见表 2）。走访的四家机构都属于私立民办机构。访问所得资料将在本研究中体现出来。

表 2 受访机构信息表

机构编号	机构名称	公立/私立	访谈方式
J1	X 托育早教中心	私立	面谈
J2	Y 启蒙园	私立	面谈
J3	J 幼儿园	私立	面谈
J4	E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私立	面谈

政府工作人员访谈主要 H 市和 Q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负责人口发展方面的官员，一共访问了 3 名政府工作人员，分别是江苏省 H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ZGQ 副主任，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 ZY 处长及 H 市 Q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BJC 副主任，了解他们对托育发展和行业规范等方面政策，以及地方行政主管部门对托育行业发展的支持。

（三）调查对象特征

样本的人口学特征。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婴幼儿的母亲（占 72.7%），调查对象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25-34 岁之间（占 68.9%）。来自市区的最多（占 47.3%），来自县城（27.8%）和乡镇（24.9%）的比重相差不大。可以看出调查对象所在区域苏北居多，性别上以母亲为主，年龄主要集中在 25-34 岁之间，主要居住在市区范围。

样本的社会经济特征。文化程度在大专及以上学历占绝大多数（占 76.9%），其中本科比例最高（占 43.6%）。调查对象的职业中，事业单位（24.8%）和私营企业（18.7%）较多，其次是其他（10.5%）、政府机关（9.9%）、个体经营户（8.7%）和国有企业（8.2%），合计占比 80.8%。（见表 2-2）说明大多数调查对象学历不低，大部分在大专及以上学历，职业分布相对比较分散。就收入情况来看，调查对象的家庭月收入主要在 6001-20000 元之间（67.2%），月收入过两万的也不少，占比 12.4%。说明养育幼儿经济压力巨大的家长占比很少。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家庭对于养育一个婴幼儿来说可能会有经济压力，但不存在特别巨大的经济压力。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托育服务总体情况

调查显示，24-36 个月的婴幼儿占比最大，为 48.6%，0-12 个月的婴幼儿与 6-12 个月的婴幼儿比重相差不大，分别占比 21.5% 和 29.9%。已有入托的孩子有 286 个，占 27.2%；没有入托的孩子有 764 个，占 72.8%。已入托的孩子大大少于未入托的婴幼儿，说明现在江苏省内的家长大多数都不会选择将自己的孩子入托。结合我国近年来 0-3 岁婴幼儿接受托育服务的情况来看，2016 年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

显示我国3岁前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当今托育情况不容乐观。

结果表明月龄大的婴幼儿入托的概率要大，月龄低的婴幼儿入托率要低。入托的月龄主要集中在24-36个月，即大于2岁的幼儿。说明家长更希望等孩子大一点的时候送其入托。

此外，虽然目前绝大多数0-3岁的婴幼儿仍未接受托育服务，但是近年来接受托育服务的群体发展迅速，从无到有，已入托的家庭超过1/4，而未入托的家长想送托的比例也不低，说明托育服务有一定市场。在实地调查的苏北H市就有226家托育机构，说明目前托育服务行业的发展较快，托育服务机构已经敏锐地觉察到托育需求在增长，这为政府对托育需求关注以及托育机构的监管都提出新的挑战。

当走访机构时，我们发现虽然当前托育机构发展迅速，但是受到疫情影响，会出现招生不足的问题。大部分受访机构都表示自己目前遭遇的最大困难就是招生的问题。J1表示，自己家“就是招生不太好。因为我们的竞争还是蛮强的。比如说，像我们家是属于证照齐全的，那其他家证照不齐全，价格肯定要比我们要低一点，而且我们这个行业口碑传的话比较慢，其实教育行业销售这一块很难做。完全是你抓住教学了，你就把外面市场就给丢了。”

（二）客观托育需求

托育客观需求指有婴幼儿入托的家庭托育的需求。在已入托的286个孩子中，孩子入托月龄在6-12个月的有34人，占11.9%；12-24个月的有92人，占32.2%；24-36个月的有160人，占55.9%。总的来说，绝大多数家长在孩子1周岁以后才会考虑送到托班内，已入托的孩子满一周岁的共占88.1%。

而对于孩子现在所上的托儿所或者托育机构的情况，绝大多数家长（72.4%）选择了全日托，以及选择了私人办的托儿所（66.1%）。从我们对托育机构的调查来看，当前托育机构都属于民办性质，家长只能选择民办托育机构。在托育花费方面，2019年40.9%的家庭选择月均托儿费用在1001-2000元之间，而月均花费在2000元以上的占36.4%。在访谈中，家长N2也谈到了曾去了解半日托的费用，大约1个学期3500-5500元，平均每个月在1000元左右。机构J4也表示，自己家虽然做的是精品托育，但是由于经验时间不长，所以费用不高，每个学生月均学费为三千元，以后做得好费用也还会涨。这说明婴幼儿家长大多都很重视孩子的早期发展，愿意在托育服务上面花钱的，从另外方面来看，托育也增加了家庭支出，成为家庭的一个负担。

从选择托儿机构的主要原因来看。认为被选机构需要距离家近的有72.4%，认为师资条件好的有44.1%，认为费用合理的有43.7%，认为硬件设施好的有32.9%，认为卫生条件好的有33.6%，这五个排在前5名。其中，选择原因排名前三的是距离家近、师资条件好、费用合理。说明家长在选择某家托儿机构时，考虑更多的是距离因素，其次才是托儿机构本身的因素，这也就是托育服务的局限性，它必须在人员集中居住区域，同时还要有支付能力的家庭，这也导致托育服务具有高成本、高投入的特征。大部分受访机构也表示自己的生源主要来自于周边社区，J2园长表示生源基本来自于周边小区内的住户以及从前来过的家长们的推荐。

除距离因素之外，师资力量也是入托家庭的家长们十分关心的因素。这其中不仅包括要有齐全的证书与教育水平，因为接受过专业教育的师资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托育服务，在教学内容更能够贴近婴

幼儿，在教学态度方面会有更多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

对于托育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方面，调查显示，影响因素排名前三的是分别是场地小（65.0%）、收费高（53.1%）、环境硬件设施简陋（45.5%），排名第 4-8 名的问题分别是照护人员不够专业（40.9%）、课程设置不合理（33.2%）、不注重饮食营养（30.4%）、卫生状况不好（17.8%），以及其他（14.0%）。

可以看出，场地小与费用高是两个核心问题，多于半数的家长都认为机构存在这些问题。机构自己与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J2：我们这儿唯一不好是没有户外。但这个没有办法，这也是大部分都存在的一种情况，不是每家都有，（但）基本上都像我们这样。

区卫健委 B 主任：像这个在小区边上还稍微好一点，可以跟小区内部这个活动场地进行共享。我们还有的机构是纯在商场，或者是那个商业体上面，它连这个公共活动场地都没有。

场地问题也是托育机构发展最重要投资，托育机构的场地问题存在明显的悖论：即场地要在高品质小区，因为这些小区的家庭有较高支付能力，而这些小区的场地房租又比较高，而且这些小区场地很难有其他配套的儿童活动空间。

（三）主观托育需求

托育主观需求指婴幼儿家长是否想让孩子入托。调查显示，在没有入托的 764 名家长中，想把孩子送入托育机构的家长有 339 位，占 44.4%；不想的有 425 位，占比 55.6%。不想把孩子送入托育机构的家长略多于想把孩子送入托育机构的家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近一半的家庭想送婴幼儿去托育机构，另外在家长访谈中，8 位家长中有 6 位都愿意尝试托育服务，说明托育需求已经成为家庭的现实需求。

1.想送孩子入托情况

在对于入托的合适年龄的调查中，大多数家长（97.1%）都认为 2-3 岁的孩子送入托育机构比较合适。与已入托的孩子月龄调查情况相比较来看，可以看出所有被调查的家长大部分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一岁以后再接受托育服务。

对于想把孩子送入托育机构的原因时，339 个家庭中，选择希望得到专业的照顾的占 81.4%，想让孩子有玩伴的占 69.6%，自己和配偶没有时间照料占 65.2%，这三个方面是家庭想孩子进托育机构最主要的原因。可以看出，多数家长先从孩子成长角度来考虑，其次才是从照料问题与自身的原因考虑。

对愿意入托家长在选择托育机构主要关心的因素方面分析，从高到低依次是：机构的师资质量（59.3%）、离家距离（54.0%）、机构养育水平（42.5%）、机构卫生状况（37.5%）、机构环境设施（34.2%）、托育费用（33.6%）、机构的饮食营养状况（20.1%）、机构口碑（15.9%）公办还是民办属性（2.9%）。可以看出多数家长主要关心的是机构照料的水平（包括师资水平与养育水平），其次关注机构的距离，对于费用问题关注程度并不高，而对于机构性质则关注更小，可以这样说，家长更关注托育机构提供的服务质量，距离也是重要因素。

通过已入托与未入托但想入托的家长面对选择机构时的希望和要求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托育机

构自身的服务质量、基础设置，以及机构离家的距离，都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尤其是机构的师资力量和机构离家距离。

对于选择的机构情况的希望，调查显示，多数家长能接受的托育费用范围在 3000 元以内，共计占 91.7%。同时，对于机构的地点和类型来说，多数家长希望托育机构在自己居住的社区附近（59.6%），极少数家长（3.5%）对托育机构的地点没有要求。绝大多数家长（72.9%）希望机构能够提供全日托，选择其他类型的相对较少。

当问及家长对托育机构期望，接受访问中愿意入托的家长表示：

N3：愿意去啊。一个月 1500-2000 吧。

N5：我希望家长可以在时间上自由安排，如果遇到我们没有时间带的情况下，再送到托班里面去。费用控制在一年一万以内吧。

关于机构类型的希望，本研究发现大多数家长都会选择全日托类型的机构。不仅多位学者的研究都证实了本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而且在本研究的受访家长中，有两位家长明确提出希望孩子上全日托，还有两位希望孩子能每日入托 5-6 个小时，基本符合全日托的标准。还有一位家长明确说明希望孩子上半日托，以及一位家长希望托育时间能够弹性安排。所以综合来看全日托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2. 没有入托意愿情况

对没有入托意愿的 425 位家长调查不想把孩子送去托育机构的原因，最主要是孩子太小（64.9%），其次是有人照看没有必要送（56.9%）。其他原因都不并突出，占比都在 20% 以下。传统来说，婴幼儿照料主要是家庭的责任，只有家庭没有办法履行这项职能时才可能由社会来承担。而且我们有隔代抚育的传统，尽管隔代抚育有弊端，但是作为传统家庭抚育后代的主要方式，还是受到家庭的认可。

对于不愿意入托的解释，在访谈中，家长对愿意入托的原因与问卷调查结果相符，肯定了孩子年龄太小和家里有人带孩子是主要原因。

N2：不愿意。我自己就是全职在家带宝宝的。

N4：我也不太愿意把孩子交到托育机构里面，现在孩子还太小了。

N7：最重要的是安全隐患吧，家长肯定都希望孩子平平安安的。可能还有老师的资质等。

调查研究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前，没有入托的孩子白天主要是由祖辈（49.2%）和孩子父母照看（41.4%），由保姆或者其他人员照看的情况较少。说明孩子一般由自家人（包括祖辈及父母等直系亲属）照看较多，鲜少假手于保姆等人。说明祖辈在孩子养育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角色。

在被访问的 8 位家长中，有 7 位都表示孩子大多是由家里人（主要是祖辈）帮忙照护的，只有 1 位表明自己是全职带孩子，即由父母亲自照护。说明现在大多数婴幼儿养育都需要接受祖辈的帮助。有了祖辈帮忙照料，育儿压力会减轻不少，所以托育意愿也会降低。

未入托的婴幼儿参加辅导班的情况，74.1%的家长没有给孩子上各种辅导班，只有 12.7%的家长上过兴趣班，15.3%的家庭上过早教班，9.4%的家庭上过亲子班。报班花费在 10000 元以上（25.7%）和花费 2000-8000 元的相对较多（53.1%）。可以看出父母都愿意为孩子花钱，愿意花大价钱让孩子学习的

也不在少数。

（四）家庭育儿需求

调查显示，家长在育儿方面面临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与祖辈在照料孩子方面的差异（55.7%）是育儿的最大障碍。可以看出年轻父母与其祖辈在育儿方面存在较大冲突，但由于自身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所以不得不接受隔代抚育的问题。现在婴幼儿父母对祖辈教育存在着较大的抗拒心理，这同时也为家庭选择托育服务提供了现实基础。

对于知识获取层面，婴幼儿家长最希望获得智力开发知识（62.5%），接着是习惯培养知识（46.8%）、营养保健知识（42.6%）等。说明家长首先对孩子自身发展的知识更感兴趣，希望能够培养孩子成才。其次是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以及亲子关系方面的知识感兴趣。由此可见，早教的需求仍是巨大的。

当问及是否愿意参与社会组织或托育机构开展的家庭育儿培训时，大部分家长都表示愿意（65.5%）。研究显示：76.8%的家长都选择了想通过亲子活动的方式来接受托育机构提供的育儿服务，从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家长都愿意参加家庭育儿培训，并且最愿意以参加亲子活动的方式学习育儿知识。从家长的访谈中，也可以看出亲子活动深受家长欢迎。主要是因为亲子活动有助于培养亲子关系，能够促进父母与孩子的互动，也有助于儿童与他人进行交流。

N2：我想让宝宝玩一些手工方面的，户外游戏也可以。希望时间可以长一点，短了宝宝刚进入状态就结束了。

N5：开展幼儿游戏活动，在游戏中观察孩子，然后机构记录下来给家长看看，家长也好发现孩子存在的问题。

（五）政府在托育服务中的作用

对于政府在托育服务的作用发挥方面，排名由上到下依次为：第一是发挥托育师资和保育员的培训与监督作用（63.3%），其次是制定托育服务的标准和规范（62.4%），第三是加强托育机构的登记和监管（44.7%），第四是宣传倡导科学育儿观念（31.8%），并列第五是开办公办托育机构（27.4%），以及对婴幼儿家庭给予经济支持（27.4%），第七是推进实施带薪育儿假（26.0%），最后是对托育机构提供财政补贴（17.0%）。可以看出，接受调查的家长们都希望政府在托育师资质量和托育服务标准和规范方面加强管理，为托育服务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在认为政府应当大力推进发展的托育机构类型方面，首先家长们肯定了公办幼儿园（托育托幼一体式）最受欢迎，56.9%的家长都选择相信公办机构，其次是社区托管点（19.0%）。此外，家长对家庭式托育和私人托育机构的认可度都比较低。

这与他人的研究结果基本相符。充分说明家长对于托育服务机构的期望性质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但对于公立托育服务机构会予以更多的期望。而目前我们在 H 市托育机构调研时发现，全部 226 家托育机构都是民办，政府目前没有介入托育服务。家长信任公办托育机构是因为托育服务质量有保证，而且收费相对规范，这对于当前政府是否介入托育服务提供提出了挑战，提供托育服务需要大量校舍、师资，以及大量的政府财政投入，从各地政府的情况来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以及财政预算至关重要

要。

（六）托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当问及“对于家庭生育几个孩子最为合适”之时，在被调查家长中有 69.2%的家庭认为两个孩子最为合适，27.5%的家庭认为有一个孩子最为合适，只有 3.2%的家庭认为有三个及以上的孩子最为合适。可以看出，大部分家长都觉得家庭有两个孩子最为合适，肯定了二胎政策的推行成效。

关于是否会生育二胎的问题，269 个家长表示愿意生育二孩，占比 25.6%。而 374 个家长选择了不愿意生育二孩，占比 35.6%。有 407 个家长选择了“已经有两个及以上的孩子”这个选项，占比 38.8%。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2016 年和 2017 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 1786 万人和 1723 万人，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 1644 万人的水平，政策效果显著。另外受访的家长中已有两个孩子的占了八分之五，剩下三个没有二胎的都仍然持观望态度。说明“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对现在的婴幼儿家长是否生育二胎、是否愿意生育二胎有一定的影响，但仅得一部分家长响应。

针对没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家长进一步调查影响其生育的原因，可以发现养育经济负担重（79.9%）和没有人照料孩子（68.7%）是最重要的两个原因，可以看出养育的经济压力和照料压力是影响生育二孩的最主要因素。关于怎么看待 0-3 岁婴幼儿的托儿/托育服务，有 659 名家长认为自己“需要”托育服务，占比共计 62.8%，24.6%的家长选择了“不清楚”，仅有 133 名家长认为自己“不需要”托育服务，占 12.7%。可以看出现在托育服务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四、结论与讨论

（一）托育市场潜力巨大

研究发现超过四分之一的家庭接受了托育服务，多子女家庭更容易接受托育服务。未入托的家庭有近一半的想送孩子入托，说明潜在的托育需求巨大，如果时机合适，将转变为现实的托育需求。这说明托育服务随着“全面二孩”的发展将有较大的市场。根据人口转变理论，现代社会逐渐进入“低生育”时代，然而人口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因此国家要想刺激生产，就需要保证生育率，当劳动力进入市场后，托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另外，养育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家庭更希望孩子得到专业化、科学的照料服务。所以说托育市场潜力巨大。

（二）托育机构数量和品质难以满足家庭需求

调查显示，年龄越大的婴幼儿接受托育服务比重越大，疫情抑制婴幼儿接受托育服务，若按正常年份托育需求将会逐渐增长。当前对于年龄更小的孩子，无论是受访家长，还是我们的日常经验，都会觉得一岁以下的孩子尚未脱离哺乳期，离不开家长的照顾与陪伴。而由于当前社会压力大，许多家长在产假结束之后，都不得不继续投入工作，如果没有祖辈的帮忙，照料孩子的压力在三四个月的产假结束后陡然上升，选择全日托的需求也就大大上升。

另外，托育机构存在场地小和收费高的问题，家长希望孩子得到专业的照护、对托育机构师资关注，这些都说明当前托育服务品质难以满足家庭托育的要求。收入越高的家长对于托育服务的选择率越低，其实高收入水平的家长更多可能会选择接受聘用保姆、家庭教师等服务，而不会选择将孩子送

去托育机构。收入中等的家庭往往更加会考虑自己是否要接受托育服务，然而托育机构由于自己本身的成本费用高、或是定位问题，收费往往不会便宜。就会使得这些中产阶级家庭觉得托育服务收费贵。在家长访谈中，有家长明确表示过托育机构的收费有些高，因此没有将孩子送去入托。另外，文化水平越低的家长，就会越觉得自己不需要托育服务。

通过与相关研究的横向对比，我们也发现不少研究也都意识到了托育服务收费高、受众面窄的问题。针对解决此问题的政策却少之又少，即使政府出台对于托育机构的相关补贴，接受补贴的标准也非常高。

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出台社会政策，对机构实行资助，对师资力量进行培训，为机构提供经济、场地设施、公共服务等扶持方案，从而促进机构数量与质量的提高，这相当于一种社会投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带动托育服务的发展，带来社会收益。

由此可见，托育机构的设施改进以及托育政策的完善，更加有利于满足家庭托育需求。

（三）托育需求受不同因素影响

想要送孩子入托的家庭，往往有两大原因促使他们关注托育服务：一是觉得自己养育孩子的能力不够，希望能有更加专业的人员代替他们照料孩子，让孩子能有更好的发展。不少受访家长就表示过自己希望如果孩子入托，能够得到早期的智力开发和行为习惯的培养。受访机构也表示现在的教育资源主要都面向幼儿园，如果自家的孩子出去面试幼儿园的成功率越高，家长就会越放心，机构的口碑也会越来越好。二是家长认为自己照顾孩子的精力与时间有限，进入托育机构不仅能够减少自己养育孩子的压力，也能让孩子更早地融入社会环境，在与玩伴和老师的交往中更好地完成社会化过程。

再者说，现在家长由于工作忙、以及祖辈照料居多等原因，促使家长对于机构的离家距离的远近更加关注，更会选择离家近的机构以方便对于孩子的照料。

对于不想送孩子入托家庭，主要是由于孩子太小和有家人照料。越小的孩子进行入托，孩子与家长，尤其是母亲，就越会产生一种“分离焦虑”。这种情绪问题使许多家长更加倾向于不让孩子进入托育机构。其次，如果孩子已经有了家人的照料，那么入托意愿就会大大降低。隔代照料可以说是符合中国传统与国情的一种照料模式，相较于托育机构，婴幼儿家长会更加信任自己的孩子由长辈代为照料，同时也能节约托育费用，可谓是一举多得。例如访谈家长 N2，由于自己是全职母亲，就不会想让孩子入托。家长 N4，由于认为自己孩子太小，以及已有祖辈可以提供照料，因此也不想让孩子入托。

（四）年轻父母希望有专业的照护

年轻婴幼儿父母对于隔代教育有抗拒心理，希望得到更科学的照料，这就是托育服务发展的基础。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家庭功能不断分化，育儿压力不断增大。一方面是家长自身无力照顾的压力，当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进入市场时，面对婴幼儿照料等方面，家长的时间和精力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是来自于社会大环境的压力，现在育儿理念与方式的增多往往也让家长眼花缭乱，养育水平的提升成为了必须，家长会更希望孩子能得到专业化的照顾。而托育服务恰恰能弥补这个缺陷，能对孩子进行系统化、理论化、专业化的照料与教育，因此托育服务有一定发展基础。

大多数父母更希望孩子得到专业照料，因此对于隔代教育会产生抗拒心理，可能包括如下原因：一是教育观念差异，祖辈对于孩子的要求往往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对学习成绩往往没有很高的要求，而父母大多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智力开发，会更加注重孩子的学习状况。二是教育水平差异，父母会更加希望孩子能够在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成长，但祖辈往往受文化水平制约，大多依靠经验照顾孩子，很难为孩子提供科学的照料。三是教育方式差异，祖辈对于孩子往往有溺爱的情况存在，当孩子犯了错，祖辈大多不会过于惩罚孩子，更多是采用说教的方式，然而父母就会以更加严肃认真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对于做错事的孩子更会采用惩罚的方式，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与品德。对于这样的情况，托育服务的存在就十分必要。而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往往都需要经过科学的培训以及通过相关部门的检验，提供的都是科学的育儿理论与方法，因此家长会更放心。

（五）政府应在托育服务供给方面承担更多责任

家长希望政府能在托育服务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比如在托育行业的服务质量和规范方面加强管理，以及大力推进托幼一体的公办幼儿园和社区托管点建设。

目前，与巨大的需求量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托育行业才刚处在起步阶段，作为一个新兴行业，近年来国家和社会开始重视起托育服务市场来，但同时托育服务行业的良莠不齐也让思考是否需要接受托育服务的家长们望而却步。因此，政府的介入就必不可少。

在不同阶段中，政府承担的角色也不尽相同。我国托育起步之始，政府未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市场上的托育机构基本都是民办机构，且收费、服务、场地等都没有明确标准。近年来，政府逐渐意识到托育服务的重要性，开始承担部分责任，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重视市场出现的问题并采取措施介入。未来，政府责任应从半纳向全纳转型。一方面，政府需要负起监管和规范托育市场的责任，托育服务标准化、规范化、高质量的实施将会成为家长们信赖与选择的标准，有助于托育行业的健康与繁荣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同时还要承担发展托育市场的责任，开设公办性质的单位与机构必不可少，这就要求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完善相应政策，建立普惠性的托育服务体系。

（六）托育服务供给不足抑制着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不高，与养育成本高有关，而多子女使养育压力增加，从而抑制生育意愿。现如今大多数父母都意识到了专业照料的重要性，对孩子有越高的期望，在孩子身上的投入就会越大，因此养育成本日益增加。在经济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养育成本越高，家长的生育意愿越会下降。多子女的家庭与独生子女的家庭相比，不光物质上的投入更多，在时间、精力等方面的成本也会大大增加，因而家庭的再生育意愿也会降低。由此，从鼓励生育的角度来看，更应该大力推进托育服务供给，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五、建议

（一）当前疫情背景下应加大对托育机构的扶持力度

研究证明，当前托育需求是巨大的。政府一方面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考虑出资建立多个托育点，合理规划城市建设，保障公办托育机构的服务质量、基础设施等。另一方面政府需要提高市场服

务的购买力，给予相应的资金补贴，以购买服务、税收优惠等方式，形成更完善的服务规模、资金、人员配备等，满足托育需求。此外，政府还应出台相应政策、完善相应政策补贴，以鼓励市场蓬勃发展，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充分发挥社会功能与力量。

（二）推进托育机构的规范化建设

机构的安全、卫生、场地建设等对于服务质量来说十分重要。首先是安全问题，例如逃生通道的清理、防火防灾的建设、防护措施的配备等需要规范化、标准化。其次是卫生问题，不仅包括食品安全，还包括日常卫生清洁。机构需要重视婴幼儿的生长发育、营养健康、疾病预防等多个方面的安全与卫生，做到让家长放心。再次，场地建设也十分重要。比如不光需要有室内活动的场所，还需要室外活动的地方。婴幼儿在户外活动不仅能锻炼身体，也能在感受自然的过程中获取新知识。再比如场地临时性问题，有些依附于幼儿园的早教班的场地往往由0-3岁早期教育与3-6岁学前教育共同使用。因此，拥有规范、独立的活动场地是必要的。

机构的师资力量是托育服务质量的关键点，要想改善师资质量，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介入：一是幼教专业培养。现在的幼教专业一般面向4-6岁的幼儿园儿童，针对三岁以下婴幼儿师资的专业培养与教育培训少之又少，因此亟需开设及扩展相关专业。政府应该将婴幼儿托育一道纳入到教育体系中，为托育人才设置相应的事业编制、工资保障制度，必要时加大人才培育资金建设，由政府出面为托育人才实施经济保障，以改善现况，减少人才流动。二是面对已经进入托育行业的人员，政府需要严格把控，设置相应的资格鉴定方式，完善育婴师等资格证的教育与考试制度，更要提供技术培训或指导性服务，完善绩效考核制度。

在相关技术的支持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及台湾的先进理论知识，但同时也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托育服务理论，并将之运用于实践之中。托育教育的内容及技术需要符合当地的社会环境及文化传统，服务形式需要多样化、因地制宜，如此，婴幼儿早期教育才能灵活适应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各种需求。

（三）搭建与社区联系

调查显示，家长更希望能将自己的孩子送去离家近的托育点。所以，政府应该完善城市规划建设，将托育地点设置在合适的社区周边，以方便人们生活。同时，由于目前的教育资源主要面向幼儿园及以上，而幼儿园往往也与家庭距离不远，所以政府可以考虑托幼一体化，在幼儿园中开设相应的托班，在“托”的同时实现“育”，让孩子的素质全面综合发展。这样做也可以部分解决现实中人员素质低下、收费昂贵、质量参差不齐、非科学的商业性宣传泛滥等问题。

（四）促进托育机构为家庭提供育儿服务

一方面，机构要回应家庭需求，必须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不仅应该完善自身的基础设施、规范自身的收费标准、丰富自身的教学内容、提高自身的办学质量，更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整合现有资源，开展包括亲子活动、公益讲座、个别咨询等多种形式的服务与活动。另一方面，机构不光要为自身的未来谋发展，更要履行社会义务。机构可以通过设计科学育儿宣传手册、建立成长档案、上门指

导等方式，积极宣传科学育儿知识，帮助提升家庭育儿能力，让专业人员、专业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此外，我们可以有效利用社会资源，促进社区服务与托育机构相结合，全方位向家庭提供育儿支持。

（五）加快推进普惠型托育机构建设

托育服务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完善的托育体系，坚持公益普惠的服务方向，将家庭、社区、机构、政府等多个主体纳入到托育体系中，从不同的方面促进托育服务的发展，从而实现家庭提高照料能力、社区提供照料资源、机构提升照料质量、政府完善照料保障。

政府需要起到带头作用。首先应该明确管理部门及其职责，与国家部门、社区等形成联动机制，设置早教指导站点或指导中心，形成与完善管理网络格局。其次，采用出资建立或购买服务的方式在多处建立公立托育机构，以及设立补助措施，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等建立民办托育机构，填补需求缺口。通过政府提供场地、设施，或者公办民营等方面加快推进普惠型的托育机构建设，为家庭提供质优价廉的托育服务，降低家庭育儿成本，促进生育意愿提升。

此外，托育服务也应该像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等一样，成为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创造一个重视托育、优化托育的大环境，构建并完善多元化的托育体系，才能够真正实现为人民谋幸福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陈卫、黄小燕，1999，《人口转变理论述评》，《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 [2]华怡佼，2018，《我国“二孩政策”下0-3岁儿童公共托育服务供给体系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3]蒋永萍、陈玉佩，2018，《重建并完善婴幼儿托育公共服务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
- [4]李沛霖、王晖、丁小平、傅晓红、刘鸿雁，2017，《对发达地区0-3岁儿童托育服务市场的调查与思考——以南京市为例》，《南方人口》第2期。
- [5]刘中一，2017，《全面两孩政策下我国托育服务发展的对策建议》，《湖南社会科学》第5期。
- [6]刘中一，2018，《加强托育服务相关研究 助力“幼有所育”战略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第4期。
- [7]刘中一，2018，《我国托育服务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第4期。
- [8]陆文静，2018，《上海市松江区公共托育服务政府供给问题的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9]马驰，2019，《城镇0-3岁幼儿托育服务亟须构建早教公共服务体系》，《黑龙江社会科学》第3期。
- [9]余宇、张冰子，2016，《适宜开端:构建0-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体系研究》，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 [10]韦素梅，2018，《上海市托育供需现状调查及对早教中心职能的再思考》，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1]鲜国容，2019，《城市地区托育服务供需现状个案研究》，喀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2]杨菊华，2018，《论政府在托育服务体系供给侧改革中的职能定位》，《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3期。

- [13]杨雪燕、井文、王洒洒、高琛卓, 2019,《中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实践模式评估》,《人口学刊》第 1 期。
- [14]张燕, 2019,《城市地区 0-3 岁婴幼儿家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15]Adamson E,Rennan D.2017,*Return of the nanny:public policy towards in-home childcare in the UK,Canada and Australia: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51(7).
- [16]J Brownleea,D Berthelsena,N Segarana,2009,*Childcare Workers' and Centre Directors' Beliefs about Infant Childcare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179(4).
- [17]Musgrave Suzanne Nicole,2000,*Between nap-time and nine-to-five:Workplace daycare as a step toward social and economic equity for employed mothers*,Canada:Mount Saint Vincent University.
- [18]OECD,2017,*Starting Strong 2017:Key OECD Indicators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Paris:OECD Publishing.

☆ 作者简介: 徐雨菡, 河海大学社会工作专业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徐雨菡

社会工作者助力多元共治农村人居环境咨询方案

——以 Y 村“三清”“三包”为例

秦 佳 杜尚尚 杨淑婷 薛雨珍

摘 要：江苏省宜兴市 Y 村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开展“三清”“三包”行动治理农村人居环境，但实际推行过程中出现村民不积极、村委缺乏公信力、村民村委沟通机制出现障碍等问题。为了深入探讨社会工作者在农村参与环境治理问题中可发挥的作用，本文基于在 Y 村的实习经历，进一步探讨乡村治理中出现的新问题，运用地区发展模式以及社区、个案等社会工作方法，就建立“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人居环境提出相关的专业咨询服务方案，帮助 Y 村突破现有人居环境治理的困境，以促进 Y 村人居环境的美好建设。

关键词：社会工作者 农村人居环境 多元共治

一、背景介绍

2018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强调农村人居环境是一个突出的短板，指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共中央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农村工作的总抓手。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村社会文明和谐。2021 年 2 月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扎实搞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从垃圾、污水、村庄清洁行动等方面着手，部署建设农村美丽家园，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夯实乡村振兴基础”。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同时，我国农村人居环境状况很不平衡，脏乱差问题在一些地区还比较突出，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短板。

2021 年江苏省一号文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夯实乡村振兴基础”。江苏省宜兴市 Y 村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根据《2021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要点》、《关于健全完善宜兴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管护机制的实施意见》文件要求，Y 村村委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召开村委会议，商讨“三清”“三包”相关工作的布置安排，并于同年 2 月初开始在村内推动工作实施，开展了“三清”“三包”行动，“三清”即清理农村生活垃圾、清理村内塘沟、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三包”主要包括包卫生、包绿化和包秩序，以促进 Y 村人居环境的改善。本组项目参与者 Q 于 2021 年 4 月

份开始在镇政府实习，参与了推进 Y 村“三清”“三包”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了解到 Y 村在“三清”“三包”行动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效果与目标脱节，村级领导班子采取强硬化手段较为明显，村民主体意识不强、缺乏参与动力。推行过程中还出现了村民不积极配合、村委缺乏公信力、村委与村民之间矛盾突出等问题，导致“三清”“三包”行动受阻，整体环境治理效果不佳。

为深入探讨社会工作在农村参与环境治理此类问题中可发挥的作用，更好的帮助 Y 村推行“三清”“三包”行动，提高环境治理的效果，现基于项目参与者 Q 在 Y 村的实习经历，通过实地的考察、调研与访谈等工作，了解 Y 村的具体情况以及村民和村委的诉求，并运用地区发展模式理论以及社区、个案等社会工作方法，建立政府、村委与村民等各方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人居环境治理咨询服务方案，帮助 Y 村突破现有人居环境治理的困境，使 Y 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二、案例介绍

（一）Y 村基本情况

1、Y 村的社会环境基本情况

Y 村为行政村，共含有 9 个自然村，村现有人口 3810 人，常住人口约为 1668 人，且因青年和中年夫妇等劳动力去往城镇工作，村里常年居住的人口基本为留守老人和少量儿童，留守老人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于白天管理自家农田与鸡鸭鹅舍或者外出为雇佣者做农活从而赚得生活费，晚上主要陪伴孙辈完成作业或外出打麻将。Y 村村委领导班子包括 5 人，即：村委书记、村委副书记、村会计、村妇联主席以及村民兵营长。从职责分工来看，村委书记负责对接镇政府与村委的衔接工作，安排一切事务；其余四位委员配合书记做好相关工作，实行分片管理。Y 村现有一支 17 人的保洁员队伍，专门负责村的全面保洁，村河道、池塘管理。随着乡村文化振兴的推动，Y 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于 2019 年建立了新的老年活动中心和党员教育基地。

2、Y 村的卫生环境基本情况

Y 村于十几年前便开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如土路石子路已经变为水泥路柏油路，粪坑粪桶已不复存在，白色污染垃圾已经逐渐减少等等。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仍然在继续，对于环境整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需要不断进行“回头看”工作。





图 1 Y 村村容环境

（二）“三清”“三包”行动简介

根据宜兴市与镇政府工作安排，江苏省宜兴市 Y 村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召开村委会议，商讨“三清”“三包”相关工作的布置安排，并于同年 2 月开始在村内推动工作实施。

1、“三清”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即清理农村生活垃圾、清理村内塘沟、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第一，清理农村生活垃圾是指清理村庄农户房前屋后和村巷道柴草杂物、积存垃圾、塑料袋等白色垃圾、河岸垃圾、沿村公路和村道沿线散落垃圾等，解决生活垃圾乱堆乱放污染问题。第二，清理村内塘沟是指推动农户节约用水，引导农户规范排放生活污水，宣传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常识，提高生活污水综合利用和处理能力。以房前屋后河塘沟渠、排水沟等为重点，清理水域漂浮物。有条件的地方实施清淤疏浚，采取综合措施恢复水生态，逐步消除农村黑臭水体。第三，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是指清理随意丢弃的病死畜禽尸体、农业投入品包装物、废旧农膜等农业生产废弃物，严格按照规定处置，积极推进资源化利用。规范村庄畜禽散养行为，减少养殖粪污影响村庄环境。

2、“三包”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即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第一，包卫生主要包括负责扫责任区内的垃圾，保持和维护门前、墙面等建筑物、构筑物及地面、树干、线干等整洁卫生，禁止和制止随地吐痰、乱泼、乱贴、乱画、乱挂和损坏道路和环卫设施等行为，及时清除痰迹、污物、污水、粪便、杂草和积雪，不得将垃圾堆放或扫入道路上，不得将污水洒向道路或倒入树下、绿地，自备垃圾存放器，按时倒入村环卫清运车。第二，包绿化主要包括负责责任区内花草、树木、绿地的管护，禁止和制止攀爬树木、拴绳挂物、依树搭草坪绿地，损害绿化设施和花草树木占用，污染绿地的行为。第三，包秩序主要包括维护门前村容村貌，制止乱堆乱放、乱停车辆、乱搭乱建、乱贴乱画广告及标语和其他违法行为，制止和及时清除“牛皮癣”等非法广告。

三、分析预估

（一）相关利益群体需求分析

项目参与者 Q 于 2021 年 4 月在镇政府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实习工作，参与了推进 Y 村人居环境整

治相关工作。Y村村委了解到项目参与者Q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表示想在工作的推进中得到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建议。通过对以往工作过程的梳理，我们发现，在推进人居环境治理过程中，村委认为镇政府分派的任务只要在时间节点完成并能通过检查就可以；村民认为这件事情不符合自己家的布局 and 安排，扰乱了家里的生活，村里环境与自己无关。总之，村委与村民之间的诉求严重不匹配，导致十几年来的人居环境治理成为阵风式治理，“常常治常常乱”。

基于地区发展模式理论，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参照罗伯特议事规则，通过两轮调研了解村民、村委的诉求以及各方打破困境的建议，使之成为解决Y村人居环境治理痛点、堵点的第一步和首要任务。

第一轮：了解基本诉求并建立诉求沟通链接

进入村庄之前，我们在镇政府查找了该村的一些基本资料、村子建成历史以及人口结构，并通过驻村干部了解Y村在人居环境整治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借着工作机会，对Y村各种资源、设施和环境也进行了现场考察，做到对村里情况基本熟悉。我们先预约了村书记进行访谈，相继对其它村委委员也召开了座谈会。并征求其意见，我们要对村民进行访谈。

在这一阶段，我们的目标在于了解村委会推进“三清”“三包”工作很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同时了解村民对于村委会推进这一项目工作的态度是什么。因此，我们主要从收集的各种问题中梳理出诉求。

1、了解基本诉求

村委的诉求。项目参与者Q通过与村书记M进行非结构式访谈，了解到村委在工作推进中十分无奈、焦虑，上级政府通常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项工作，但由于村委资金与资源不足以及部分村民不配合，工作通常难以顺利推行。从而在上级政府考核成效时，Y村绩效得分较低，从而无法获得年终奖励基金进行Y村“美丽乡村”的建设，村书记M对此感到无能为力。另外，村委工作人员较少，在工作推进中常感疲倦。

项目参与者Q对Y村进行为期数月的田野调查，了解到Y村的基本环境及人文状况以及周边资源。发现Y村工厂的确有污染气体排出，且每到傍晚气味十分刺鼻，工厂旁的水沟有黑色油渍。Y村外围的环境状况良好，但是村内角落违建乱建现象仍然十分普遍，门前屋后环境较差，部分河流中浮萍较多、禽畜围网养殖导致的水资源污染严重，非主干路的村民门口的路还是石子路土路等等。

此后，项目参与者Q到镇政府农业农村局、环保局等了解到，环保局对于村庄工厂的污染检查工作已经在今年的计划当中。同时，农业农村局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也在不断进行“回头看”工作，在改善环境的同时，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基于此调查，村委诉求有：

第一，村委对村民的诉求体现在构建和谐美丽新农村需要Y村所有村民共同努力，但Y村村民表现出来的不积极不主动的态度，使得村委工作受到阻碍。

第二，村委对镇政府的诉求体现在Y村作为宜兴市农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在环境整治方面需要来自上级镇政府的人才、资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充实Y村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

第三，村委自身诉求体现在Y村卫生整治方面存在欠缺，需要提升自身的综合水平，不断完善自

我。

村民的诉求。项目参与者 Q 对部分村民进行走访，了解到他们有自我诉求，村委并不会了解，首先最突出的就是村民考虑自身实际利益，柴火堆放、养鸡养鸭等这些都是他们认为生活中必须要做的事情，自身也没有什么知识文化水平和技能，但凭自己的力量是肯定不能解决村委提出的各项要求，因此他们要求村委应该从实际情况考虑，集中、统一整治，认为不能只拿我们农村老百姓开刀，不顾实际利益。另外，村民认为有些活动只是流于表面，自己没有必要参与其中。其次还有村民反映，环境整治就只针对老百姓吗？当地的榨油工厂也像我们一样吗？为什么要求我们一定要去做，凭什么？不能只针对我们普通的农民，基于此就需要去全方位的了解与环境治理相关的各类主体，避免出现某一方极端化。除此之外，Y 村情况比较特殊，现居人口一千多，其中老年人及孩童居多，多数靠养殖为主，所以目前相对于村民来说，他们仅仅追求正常、稳定的生活，突如其来的规定和不符合实际的要求使得他们一时无从接受。

基于此调查，村委诉求有：

第一，大部分村民根本不了解村里的相关活动及政策，还有一部分村民认为有些活动只是形式主义，自己没有必要参与其中。

第二，有村民反应“村里工厂也有污染，村委怎么不去管工厂，只会管我们，就觉得我们老百姓好欺负？”

第三，对村委要求的集体养鸭规定不满意，认为其不合理，不能充分考虑到村民自身的利益需求。

部分访谈内容

村民 A：村委于 2021 年 4 月初至村民 A 家中，向其传达政策要，即不能将鸭子围养在水中，只能按规定围养在岸上。村民 A 用极端的话语刺激村委：“如果你们一定要让我把鸭子养在岸上，不让我养在水里，除非从我尸体上迈过去。”见此情况，村委耐心地向村民 A 解释此政策的具体原因与解决办法，但工作未果。而后，由于政策需要，村委好几次至村民 A 家中，不断向其解释政策、讲人情，但村民 A 仍然不以为然。甚至后期，在村委离开 A 家后，村民 A 曾在村中散步时不断与其他村民说：“他们村委越叫我做，我还就不做，我还再多养几只鸭到河里，看谁搞得过谁。”村委见闻此状况感到无可奈何，十分焦虑。

村民 B：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工作不断推进中，村民门前屋后的三包工作也逐渐提上日程，且此工作的主体是村民本身要维护好自己家周围的卫生，但发现村民 B 仍然不以为然，不清理自己门口成堆的垃圾。而后通过村委与其多次沟通，仍然没有效果。最后，村委当中出了部分人去帮助村民 B 整理门前屋后的垃圾，打扫卫生，清理杂物。村民 B 仍不为所动，并说：“这可是你们自己要做的，和我可没关系，到时不要说我叫你们来做的…”。

村民 C：由于 Y 村所处地域气候的原因，气候会很潮湿，且 Y 村家中多为灶头烧饭，柴火是必要的，而且放在家中容易招老鼠，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把柴火堆放在门前屋后。然而，根据上级领导指示，现所有柴火不允许堆放在门前屋后，如果要堆放在屋檐下必须堆放整齐，且不允许用布盖着。村委来到村民 C 家中，向村民 C 普及相关政策，解释其中缘由，但村民 C 直接回绝村委：“这个事情不可能做到的，除非大家都做了。而且我堆在我自己的屋檐下又不影响别人家，还要堆放的十分整齐，这也太不符合实际了。”而后，村民不断与其讲人情，讲道理，但村民 C 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2、诉求沟通链接

在调查走访中，我们发现村民对村委尽力开展的工作并不十分了解，导致抱怨很多；而村委也认为自己做工作是让老百姓受益的，是这些村民素质不高才不支持工作。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双方的抱怨和诉求建立有效沟通链接，加深彼此了解，这是推进下一步工作的基础和关键。

针对村民的诉求建立链接与沟通。第一，针对村民反映强烈的工厂污染问题，向村委反映，并向相关机构（如环保局等）征询信息。在此之后可以将相关征询信息的结果告知村民，使村民对工厂污染相关问题有所了解。第二，针对村民反映的养鸡鸭问题，与村委进行系统的沟通，如何达到处理的效果。

针对村委的诉求建立链接与沟通。首先协助村民了解村委都做了哪些工作。比如在村口修建道路，安装路灯，方便村民的日常生活，更好的确保村民的安全。积极宣传相关政策，保障村民的利益、需求。同时，通过访谈、咨询交流等方法了解村民对村委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有哪些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针对好的地方继续保持、推进，针对不好的部分及时进行反思、修改，争取得到村民的认可与支持。其次与镇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联系，向其反映 Y 村村委推进工作过程中对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和诉求问题，并表达希望能够得到镇政府相关部门支持的诉求。

第二轮：了解各方打破困境的建议

基于第一轮调研以及诉求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再次与村民和村委展开调研。这一轮调研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沟通各方探寻一个“本地化”有效的破解困境的策略或方式。一是，从外部，鉴于村委和村民的一些诉求已经超越了村委的能力范围，我们联系镇政府，了解镇政府关于 Y 村污染工厂处理程序以及时间计划，并定期向村委告知处理进展；调研中，村委和村民都提到为何 Y 村如此困难，而周边其它村没有这么多问题，鉴于此，我们通过镇政府联系人居环境治理示范村，Y 村村委以及村民代表可以去示范村学习和了解。二是，从内部，如何改进村委有效的工作方式，倾听村民的想法；同时，如何能够有效激发村民的主体性，变抱怨为参与的动力。

经过多次入户访谈、座谈，我们与村委、村民一起梳理出以下建议：

第一，由镇里协调，村委组织村民代表到优秀村学习经验。在访谈中，镇相关领导提到，在所管辖的村中并不是所有的村都出现了 Y 村遇到的这些问题，有一些村的人居环境建设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因此镇领导提出，可以由他们进行协调，组织村民代表去优秀村进行学习，然后将学习到的经验结合 Y 村的实际情况进行实地实施。

第二，村委推进工作中应注重村民的主体性，保障村民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在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中，政策设计的优秀与否不是村居环境建设更好的决定性因素，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村民的落实情况 and 他们在落实过程中的主体性。在调研、访谈过程中，多方主体都提到了在 Y 村的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中，村民政策落实和主体参与程度不足，并提出可以从成立监督小组、实施积分制等方面加以改进。

第三，要在形式上创新。Y 村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中，村委主要还是采取传统的宣传形式，如标语、

黑板报宣传等，但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村民对于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是较为熟悉的，因此在后续的宣传过程中，可以进行形式创新，借助快手、抖音、公众号等平台进行宣传。

第四，污染企业的问题需要跟进，并向村民及时反馈进展。村民对于村委的不满有一部分来自于当地企业，认为村委不管污染更严重的企业，却要来管我们普通老农民，对村委多有抱怨。因此在之后的工作中，要时刻跟进污染企业的问题，并且村委要及时向村民反馈相关情况。

（二）需求分析总结

经过前期对 Y 村各方的诉求、抱怨以及问题调研分析，我们可以感知为了村民生活在好的环境中的“三清”“三包”工程实施效果不理想。为了应付镇政府的检查，Y 村村委成员在临检前会运动式开展一阵“三清、三包”工作，但几天后又恢复到原样，如杂物乱堆乱放，畜禽养殖污染水环境，而且村民的抱怨越来越多。

村民认为污染较重的工厂依然排放废水没有被处理，而自家房前屋后放什么、水塘里养鸭鹅却被认为污染环境。而且，Y 村常年居住的人口多以老年人及孩童为主，除了种些农作物，养殖鸭鹅也是一些村民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运动式的人居环境整治，让村民感觉不符合实际，自己的声音没有被听到。

村委认为“三清”“三包”属于上级政府统一要求，他们需要完成上级部门推行的各类政策和任务，其他村也都是如此实施推行，并没有什么不妥。其次，由于时间有限，为了完成相应的工作指标和应对上级相关领导的检查，只能用运动式、要求服从性的方式。同时，村庄常住人口以老人孩童居多，村里也没有产业、资金短缺，缺乏发展规划。他们认为村委力不从心。

从上述的问题可以梳理出村民和村委的需求。（见表 1）

村民和村委作为村庄社会治理的两大主体，二者之间需要形成良性的沟通渠道，才能有效疏解双方的抱怨和矛盾。社会工作者不能替代村民或村委来开展社会治理，而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启发、引领两大主体间建立“本地化”沟通渠道。

表 1 利益相关者需求调查分析

轮次	利益相关者	主要诉求	采用的方法
第一轮	村委	1、希望村民积极配合 2、希望得到上级政府的支持 3、希望提高自身的技能 4、希望学习更多的宣传方式来让村民了解到村委为村民所做工作 5、希望与相关部门保持良好联系	非结构性访谈
	村民	1、希望更好维护自身利益 2、希望得到平等对待 3、希望政策考虑到村民实际	访谈、问卷 参与观察

		4、希望与村委有效沟通	
第二轮	村委	1、希望向优秀村学习 2、希望学习注重村民的主体性方式 3、希望学习创新的宣传方式	半结构式访谈
	村民	1、需要更好了解政策 2、希望得到村委及时回应	访谈、问卷 参与观察

四、服务咨询方案

(一) 地区发展模式在 Y 村“三清”“三包”案例中的运用分析

地区发展模式是社会工作者在进行社区工作介入时常用的模式之一，通过当地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决策和行动的方式来实现社区变革。这是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的一种手法。在本案例中，我们便将社会工作专业当中的地区发展模式贯穿其中，引导 Y 村各类相关主体积极参与，促进问题得改善。

1、地区发展模式在 Y 村“三清”“三包”案例中的介入空间

Y 村环境问题由来已久，始终影响着村民的生产生活。而需求可以是被看作解决问题的内在驱动力，Y 村各类主体存在的需求就可以促使他们通过行动做出改变，而我们要关注他们各方的需求，广泛收集资料，深入了解社区，通过两轮的需求调研，全方位的了解、预估 Y 村各主体的相关需求，从而进行介入。

2、地区发展模式在 Y 村“三清”“三包”案例中的具体应用

第一，转变工作理念，坚持需求为导向。在地区发展模式指导下，更加注重在发展过程中，站在村民的角度思考问题，牢牢把握住村民等各相关主体的需求，才能使问题得到缓解。

第二，集体协商决策，确定发展目标。地区发展模式认为：目标的确定应该由村民通过群策集体协商。对于 Y 村来说，要考虑各个主体的需求与考虑，明确整体最适宜的发展目标，可通过金点子征询会、村民讨论大会等方式进行。

第三，加强地方政府的引导，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动员村民参与。地区发展模式强调通过社区居民的参与来促进公共性问题的解决，就环境治理任务来说，它具有明显的公共空间的性质。Y 村的主体是村民，动员村民参与到环境治理当中，使其积极主动地配合相关工作。与此同时，村委、地方政府等作为环境治理主体的一部分，需加强对村民的引导，通过行政、赋权、强化、宣传等方式引导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相关工作。

第四，挖掘培养 Y 村精英，发挥引领示范作用。Y 村的精英一般是村民中有威望的人、党员、年长者等，从一般意义上讲，他们比较注重在村中的声望和地位，同时有较强的责任感和归属感。因此通过动员该地的精英，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环境整治，依靠他们的引领示范作用动员村民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去，形成多元共治的局面。

（二）目标界定

1、总目标

形成本地化的咨询服务方案，助力 Y 村人居环境建设。

2、分目标

- （1）借助精英群体的带动作用调动村民的积极性，提升村民的自治意识；
- （2）明确村委的资源优势与不足，提升村委的亲民意识和工作效率；
- （3）通过社区活动加强村民与村委之间的联系，修复沟通链条。

（三）服务策略

1、推行文明实践积分制管理

在当地进行调研的过程中，了解到当地镇政府推行了文明实践积分制，通过与村民的交谈，大多数村民对于这一全新的形式都是比较支持的，参与的积极性也较高。但是由于村里老年人口居多，推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老年人不识字、不太会使用智能机，所以在注册、录入方面出现了问题，因此在积分制基础上，提出以下方案。

（1）村民以户为单位到常住地村便民服务中心申请并进行基本信息登记。对参与文明实践积分的村户，统一录入 APP，村民可以使用账号和密码进行登录，查看自己的积分及全村排名情况，对每个首次申请参与积分管理的农户给予 50 分的基础积分。

（2）从污染防治、房前屋后、室内卫生、菜园绿化美化、垃圾回收等方面对村民进行赋分。参与居民得到的礼遇包括：物品奖励（在村便民服务中心、文体活动室等人流密集场所开设积分兑换点，参与村民根据每月公示的积分，可到指定兑换点参与物品兑换）；经济奖励（村委会、镇政府对年度排名前 50 位的家庭户给予一定经济奖励）；政治礼遇：针对积分较高的家庭成员，根据其文化程度和特长爱好可优先考虑列为入党积极分子，推荐为村“两委”干部。

（3）村委招募一些年轻志愿者并进行相关培训，协助不识字或使用智能机不熟练的老年村民进行相关信息的注册、录入。

2、推行“裸地重利用”计划

在拆除了一些违规建筑之后，村庄多出一些荒废的“裸地”，通过访谈，村民和村委会都觉得不能让这些裸地荒废，但是还没有找到很合适的利用方法。结合苏州某地实施的“裸地重利用”计划，考虑当地实际情况，提出以下方案。

将荒废的裸地划分成块，一块一亩。如果有村民想要使用这些裸地，需要同村委会签订“裸地重利用”委托协议，协议规定严禁违章搭建、乱堆乱放、不规范养殖、种植污染环境的作物等规则，村民在不违反这些规则的前提下，可以自主选择想要种植的东西或者其他合理利用裸地的方式，村委会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规定村民必须种植什么。在此过程中，村民可以在村委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砌矮墙、围篱笆、种果树、种花草、种蔬菜等，或者其他合理利用的方式，并进行精心维护。对于工作做得特别好的村民进行奖励（如给村民奖励文明实践积分、发放奖金等）；同时如果违反协议将扣除文

明实践积分，到期后将视管护效果决定是否续签等等。

3、采用保洁员包干制，制定保洁员管理及考核制度

村中原有一支 17 人的保洁员队伍，专门负责村里的全面保洁，但是由于有些保洁员责任心不强、清理不及时等问题，村民反响较大，在了解了村民和村委的一些想法后，提出如下方案。在原有的保洁员基础上，采用保洁员包干制，村选派三名保洁员为各自保洁区域负责人，对村委负责并带好各自保洁队成员负责各区域的日常保洁。保洁干净与否、村民所反映的问题、环境巡查优差情况等有三个负责人向村委负责，并签订承包协议，奖罚分明。

具体包括：**a.**保洁员工资设基本工资和奖励工资，考核工资根据每月的村级自查和上级抽查情况综合核定。**b.**村组织考评小组每月自查 4 次以上（不定期）。对检查情况进行评比，确定每月奖励工资。**c.**考评组发现问题，签发整改单，保洁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并通过考评组考评，没有按期完成的，每个点另扣 50 元。逾期 3 次的，村委有权终止保洁合同。**d.**被上级检查评选为“红榜”的自然村保洁员，奖励 1000 元奖金。被上级检查评选为“黑榜”，扣除 500 元奖金。

4、村委做到信息公开化并成立监督小组

在村中进行调查时，有村民反映相关的政策内容他们有些时候并不是很清楚具体内容，而这也导致了村民对村委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村民提到希望村委的信息能更公开，并且村民应该进行监督。基于村民反映的情况以及与村委的对话，提出以下方案。

(1) 村委做到信息公开化，包括利用村里公告栏对政策内容及实施情况进行公示；村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告知居民代表有关政策内容并征询意见；村委会的责任分工、收入和支出情况要向村民公示；村里污染企业的问题需要跟进，并向村民及时反馈进展。

(2) 村里应成立监督小组，小组成员数量以 4-5 人为宜，其中至少 1 名女性。小组成员需要有热情、有责任心，且具有一定能力。小组成员由村民中具有威望、协调能力强的代表共同组成。成员可以由两种方式产生：由社区/村居民代表大会选取产生；自己推荐户以上村民代表推荐。

监督小组的任务主要有：协助村委会，与村民进行环境整治政策相关问题的协商与沟通；监督政策的实施情况，并定期向村民介绍监督的情况以及结果；认真收集村民的建议与意见，及时向村委会反馈。

5、建立抱怨与建议渠道

为保证村民参与积极性和广泛度，应建立透明的抱怨与建议渠道。由村委会、镇政府设置专门人员或部门接受、处理并反馈来自村民和监督小组的抱怨申诉事项，并进行登记汇报。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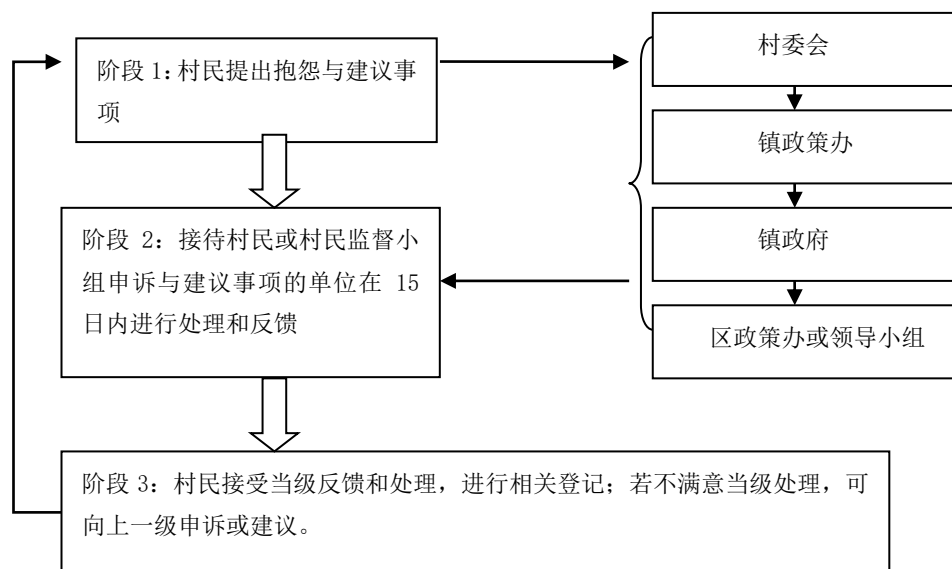


图 2 抱怨申诉处理流程图

6、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创造更丰富的宣传形式

通过与村民和村委的交谈了解到，在宣传相关政策时，还是以传统的村委会宣传栏、微信公众号、宣传横幅等为主，这些形式有一定的宣传效果。但是在此基础上，可以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创造更丰富的宣传形式，着重促进村民认知转变和主体意识的培养，让每一位村民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并积极参与相关活动。

(1) 琅轩武术马灯

琅轩武术马灯是当地非常具有特色且广受欢迎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宣传政策的过程中，借助这一广受欢迎的当地特色，将政策中的一些核心内容融入到表演中去，比如将一些内容融入到唱词中去，吸引更多的人参与相关活动。

(2) “一米杨巷”丰收节

每年，当地会举办一米杨巷丰收节，在丰收节上会有一系列的主题活动，比如彩色稻田 T 台走秀、野趣古筝表演、田园水幕光影等，将保护环境的一些理念融入到这些活动中去，让人们在享受文化的同时学习到一些环境知识。

(3) 借助宜兴话的语言特色

当地讲宜兴话的人占比很多，借助这一当地语言，可以把一些宣传标语编成宜兴话的歌谣，通过这种朗朗上口的歌谣形式，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

(四)各参与主体的责任

1、村委方面

村委必然是此次方案中最重要的组织者与管理者，他们在社区参与中主要的责任有：

(1) 协助社会工作者开展相关工作，促进各方参与，负责参与村民动员、协商农户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和召集工作，提供方案所需的村内外资源的基本信息；

(2) 协助社会工作者进行相关信息的告知和协商工作，事关村民利益的事宜做到信息公开；

(3) 定期组织召开居民大会，告知并协商方案进展及相关事宜；

(4) 据实际情况采取多样化的方式进行社区层面宣传工作，开展方案社区层面的主题宣传活动，使得村民能够最大程度的了解方案；

(5) 组织社区层面成立以村民为主体的方案监察小组。

2、村民方面

为保证方案目标的实现，需要提升区村民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本方案中涉及的村民主要包括普通村民和精英群体。

(1) 普通村民的主要责任是：

第一，积极参与并配合村委展开的环境保护活动，实事求是地向村委等提供自己与方案相关的意见建议；

第二，积极参与村里召开的协商和讨论活动，避免方案实施给自身带来更大的损失；

第三，积极参与方案实施及管理的监督和申诉，确保方案的实施质量及自身利益和权益保障。

(2) 精英群体除了要承担普通民众的责任之外还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将村民大众利益为己任，对社区活动的召开表现出更加积极活跃的带动作用；

第二，协助村委与村民之间搭建更加流畅的沟通桥梁，方便村民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及时反映问题，及时调整；

第三，在社区活动中主动识别活跃村民，将其发展为精英，扩大精英群体，从而提高村民整体的自治意识。

3、保洁员方面

保洁员属于方案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对方案的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其在社区参与中的主要职责为：

(1) 积极参与并配合村委的环境保护工作，准时准点高质量完成自己的工作；

(2) 实事求是的向村委、社会工作者等提供自己与方案相关的意见建议。

4、监督小组方面

社区层面的监督小组可以由村民代表推选和自荐两种方式成立，对方案独立行使监督权，其主要职责为：

(1) 协助村委，与居民开展方案相关问题的协商与沟通；

(2) 监督方案的实施情况，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方案实施质量；并向村民沟通监督的情况以及结果；

(3) 认真收集村民的建议与意见，及时向社区村委以及社会工作者等反馈。

五、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及需求跟进

经过前期多轮的需求评估以及咨询调研，最终制定出了符合 Y 村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方利益的咨询方案，并递交给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村委、村民以及镇政府。社会工作者首先通过与村委交流，感受到他们对此方案的赞许和认同，并提出愿意积极配合相关专业部门和人员推动方案实施；在与村民的接触与意见的征询过程中，了解到 Y 村村民对此方案的实施也表示一定的认可，并愿意配合村委相关工作，主动投身改善环境的行动中；同时 Y 村的相关工厂的负责人也表达了对该方案的认同态度，表示会配合村委及村民积极推进方案的实施。

因此在方案制定之后，得到了 Y 村多方利益主体的支持，这首先就保证推行环境整治工作的良好秩序。该方案站在各方立场上，综合考虑各方利益，确保了各利益主体整体的良性循环和多元共享，促进形成了多元共治的新格局；同时跟进方案实施过程中的各利益主体的需求。

根据方案制定之后了解到的关于 Y 村环境治理的最新情况，目前在河水治理、垃圾处理等各方面有了显著的变化，具体如下：

Y 村河水治理情况的改变

方案推行前：水污染严重

方案推行后：水源清澈



Y 村垃圾处理情况的改变

方案推行前：垃圾乱放

方案推行后：无垃圾堆放



六、专业反思

(一) 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

社会工作者服务相关案例时会利用一些专业的方法、技巧、活动等对目标对象开展介入和服务。如何保证介入和服务达到目标，并确保效果的可持续性，是我们社会工作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阅

读相关书籍以及上课过程中，我们总在思考，我们这些社会工作者离开之后会怎样，会发生什么，我们能够在开展服务时再多做些什么，如何开展？服务对象不同，需要的方法也不同。推进乡村振兴发展中，我们社会工作者需要能够提供的不应该是昙花一现的一闪而过，应该着眼于助力村庄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生态链接，以及主体性的激发。

本案例是基于 Y 村的实际情况，社会工作者依据专业的方法和思路，为其提供专业化的咨询方案，在面对这样一个复杂而庞大的服务群体，我们首先一定要全方位的了解其生态系统的相关情况，以及各个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具体需求，去进行整体的分析与评估，并不单单是针对某个问题去做具体的小组活动或者帮助去做一些实务性的任务，因为这样永远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较为片面，还是希望通过正确的咨询方案引导，去促使他们自己去尝试解决自己的问题，从而促进整个系统的良性循环。

（二）成员资格打破社工“融入难”的问题

在接触一个新的群体时，我们作为社会工作者是否会被真正接纳？同时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接触？所以获取成员资格就显得格外重要，首先我们要以平等的心态看待服务对象，与他们进行交流，尊重不同群体的个别化需求，使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见。

（三）重视精英群体的作用

在一个大的组织群体中，精英的作用必不可少，往往在农村这一领域会有更显著的体现，因此，精英的力量我们不可忽视。以 Y 村为例子，村民对于环境治理的相关工作不积极不配合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精英的模范带头作用，作为一种榜样的引导，逐渐改变部分村民封闭的自我意识。同时关于志愿者组织的成立，是否可以在农村普遍实现，这对一些相关工作的实施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四）“陪伴式”服务的思路探索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是一蹴而就的，“建广场”、“刷白墙”不是长久之计，只要遇到困难就会回到最初的脏乱差局面。“陪伴式”服务就是将咨询方案与乡村实际需求相融合，对村庄整治实时把控，对出现问题实时矫正，避免实践脱离实际。通过 Y 村的环境治理方案的实践经验与成效，希望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提供一些新的思路，真正建成长效的人居环境治理机制。

☆ 作者简介： 秦 佳，河海大学社会工作专业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杜尚尚，河海大学社会工作专业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杨淑婷，河海大学社会工作专业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薛雨珍，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薛雨珍

我不是坏小孩

——单亲家庭儿童攻击性行为矫正

张桃桃 杨夜平 庄颖彬 张安若 马 明

摘要：儿童攻击行为是儿童身上常见的一种侵犯行为，它主要表现为身体侵犯和言语攻击，攻击行为的产生大都与家庭教育和社会支持网络的缺失相关。为了更好地保障儿童权益，H社区当地的S社会工作机构开展了“爱在童心·联结未来”儿童幸福港湾项目。本案例中服务对象小A攻击性行为频发，给学习和生活带来诸多困扰。小A存在对攻击性行为的不良认知，缺乏来自家庭和同辈群体的支持。因此，社会工作者在认知行为理论与社会支持理论的指导下，围绕服务对象攻击性行为的矫正以及支持网络的建立这两个需求，制定工作目标及计划，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通过认知重构和行为矫正满足小A最迫切的需求，并通过社会支持网络的修复，巩固小A的改变。随着服务开展，小A攻击性行为频率逐渐下降，家庭和同辈支持网络逐步修复，更好地融入了社会生活。

关键词：儿童攻击性行为 社会工作 社会支持网络

一、案例背景

家庭是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相较于完整和谐的家庭，单亲家庭难以有效发挥抚育、教育等各项功能，处于社会化关键时期的儿童就会出现诸多问题，例如受到不良家庭氛围影响而产生的攻击性行为。攻击性行为是指个体故意性地伤害别人或破坏物体的行为。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身体侵犯，即利用身体的一些部位或武器、踢打他人；二是言语攻击，如通过讥笑、讽刺、诽谤、谩骂等方式对他人进行欺侮。儿童的攻击行为容易造成人际冲突，不利于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阻碍儿童个性和社会化的顺利形成。如果不对这种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和处理，儿童将会陷入成长和发展的困境。

为掀起全社会重视支持儿童工作的热潮，助力创建儿童友好城市，X市开展了幸福港湾实践项目。该项目引入专业力量，采用社会工作、心理疏导等方式，为困境、弱势儿童提供包括预防性、治疗性、发展性、替代性、参与性等专业化、全方位服务，保障儿童健康成长。本案例源于该项目在H社区提供的困境儿童帮扶服务，针对单亲家庭中儿童的攻击性行为展开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为具有相似问题的家庭提供可借鉴的服务方案，助力儿童健康成长。

二、理论阐述

（一）认知行为理论

认知行为理论是行为主义和认知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在认知、情绪和行为三者当中，认知扮演着中介与协调的作用，认知对个人的行动进行解读，这种解读直接影响着个体是否最终采取行动。认知

行为强调认知活动在心理或行为问题中的发生作用，在社会工作的实务中既采用各种认知矫正技术，又采用行为治疗技术。认知行为理论综合了认知理论和行为主义的主要观点及实践方法，对于解决儿童攻击性行为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本服务中，服务对象小 A 的攻击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不良认知导致的，因此，社会工作者要主动关注服务对象的内心世界，逐步了解服务对象不正确的认知，并通过专业的实施技巧，改变其偏颇或不理性的想法，从而达到矫正服务对象攻击性行为的目的。

（二）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网络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关系之中，无法自绝于社会而存在。因此，对那些社会网络资源不足或者利用社会网络的能力不足的个体，社会工作者要致力于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依据社会支持理论的观点，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就能够越好地应对各种来自环境的挑战。对于具有攻击性行为的儿童来说，不仅需要身边亲朋好友的帮助，也需要政府、机构的支持。在本案中，服务对象小 A 的攻击性行为不仅仅是由不良认知引起的，也包含诸多家庭因素。因此，社会工作者将进一步完善服务对象的家庭支持系统和朋辈支持系统，在矫正其攻击性行为的基础上，强化小 A 的社会支持网络，从而巩固小 A 的改变。

三、接案和预估

（一）接案

服务对象小 A 的奶奶主动来到 S 机构求助，她表示就读于二年级的小 A 经常会打骂同学，严重时甚至会打伤同学。这种行为不仅给老师、同学和家长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还不利于小 A 自身的健康发展。因此，小 A 的奶奶找到社会工作者，希望社会工作者能够帮助解决这一问题。社会工作者对照机构的功能，对自己的能力进行了初步评估，确定服务对象不需要转介，在与服务对象商定后，与其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双方的角色和义务。

（二）分析预估

1、问题评估

社会工作者通过与服务对象小 A 及小 A 奶奶的个案会谈，收集了小 A 的个人及环境资料，现对小 A 的问题进行初步预估：

第一，攻击行为认知偏差。服务对象的攻击性行为与其社会认知紧密联系。他的不良认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认为“攻击有用”。小 A 认为自身的攻击性行为是一种保护自己不受他人伤害的手段。第二，认为“攻击无害”。对于自己的攻击性行为，小 A 并不认为这会对自己造成伤害。第三，将攻击性行为“常态化”。服务对象在家庭中受到过爸爸、爷爷和奶奶的打骂，因此会下意识地学习家中长辈的行为，在家庭环境和现代大众传媒的影响下，服务对象认为自己会对攻击行为的模仿是无碍的，从而将攻击性行为“常态化”。

第二，攻击性行为频发。在认知偏差和复杂家庭环境的影响下，服务对象小 A 在与同辈群体的交往中频繁发生冲突，并习惯性使用攻击性行为武装自己，主要表现为肢体上的推打以及言语上的辱骂。

据班主任反映，她几乎每天都接到学生的投诉，说小 A 又辱骂他人或发生肢体冲突。小 A 的这种攻击性行为不仅给老师的教学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还使得自己在与同辈群体交往过程中受到孤立和排斥。

第三，家长亲职能力薄弱。服务对象小 A 的父母在他 4 岁时因感情破裂离异，离异后，小 A 的母亲几乎从未探望过他，因此，小 A 在成长过程中极度缺乏来自母亲的陪伴和管教。小 A 的父亲性格急躁，在未离异时就经常与小 A 的母亲争吵，激烈时甚至发生身体冲突。两年前的一场车祸，小 A 的父亲脑部受损，在此之后，他经常在家发脾气，对服务对象地不当行为会不问原因地进行暴力教育。服务对象的奶奶是小 A 的主要照顾人员，但奶奶文化程度不高，对孩子的教育缺乏科学的认知，且性格急躁强势，会对小 A 进行打骂教育。小 A 的爷爷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几乎处于透明化的角色。综上所述，小 A 的家长亲职能力薄弱，使得小 A 在成长过程中缺乏一定的家庭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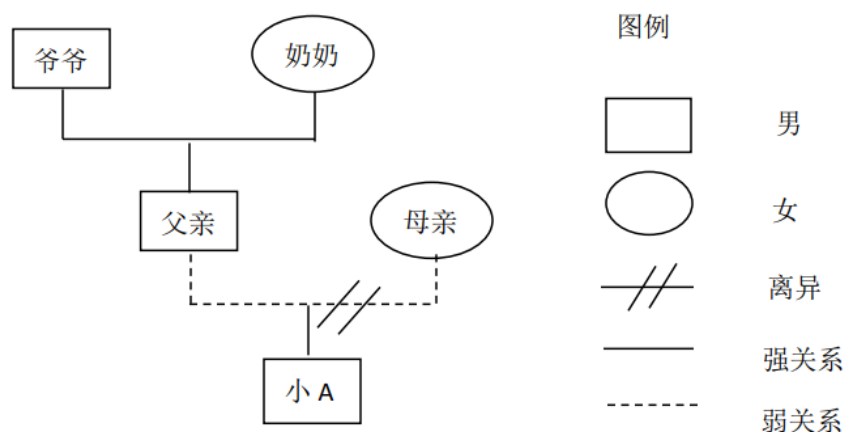


图 1 小 A 家谱图

第四，同辈群体交往缺失。同辈群体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服务对象小 A 易怒的性格特点，使得他在与同辈群体相处过程中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导致人际关系紧张。另一方面，服务对象也想通过使用攻击性行为来寻求他人的注意，希望得到他人的关注，但结果往往弄巧成拙，越是使用攻击性行为，越会被其他同学害怕甚至排挤。

2、需求分析

基于以上对服务对象问题的分析总结，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商讨，确定服务对象的需求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矫正攻击性行为。服务对象不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易怒情绪，对攻击性行为缺乏正确的认知，从而在社交中频繁地使用攻击性行为。因此，在本次服务中攻击性行为矫正是服务对象的第一需求。基于此，在后续服务中，社会工作者在认知行为理论指导下引导服务对象学会识别自己的不良情绪，澄清不良认知，并通过一定的行为疗法进一步矫正不良行为。

建立社会支持网络。服务对象攻击性行为频发及家长教养能力确实导致了服务对象的家庭及同辈

支持网络薄弱，此外，服务对象也表示渴望得到家长、老师以及同学的认可。基于此，在矫正服务对象攻击性行为后，社会工作者应通过家庭及同辈支持网络的修复，巩固服务对象的改变，促进服务对象人际关系的改善，进一步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

四、服务计划

（一）服务目标

基于上述问题与需求分析，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家长共同商定服务目标。

第一，近期目标以了解服务对象攻击性行为的表现为中心。社会工作者在了解并整合服务对象的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分析服务对象攻击性行为的表现及原因。

第二，中期目标以攻击性行为的矫正为中心。生活在有家庭暴力的单亲家庭中的服务对象，在家中受到亲人暴力行为的影响，存在一些非理性的认知，习惯用攻击性行为来处理问题。基于此，中期的具体目标就在于以下两点：一是通过认知重构，改变服务对象的不正确认知，从而达到矫正攻击性行为的效果；二是通过具体的行为疗法，进一步矫正攻击性行为。

第三，远期目标以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为中心。服务对象成长于单亲家庭，家长亲职能力薄弱，同时由于攻击性行为频发，与同辈群体关系紧张。基于此，社会工作者将通过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进一步巩固服务对象的改变，使服务对象更好地融入家庭与社会生活。

（二）服务计划

初步了解服务对象信息后，现与服务对象商议制定服务计划，预计通过以下介入，满足服务对象需求，具体服务计划如下：

表 1 个案工作计划表

介入阶段	阶段性目标	服务形式及内容
专业关系建立	1. 了解服务对象的基本信息及内心想法； 2. 建立相互信任的专业关系。	1. 通过沙盘游戏降低来访防御； 2. 与服务对象以及家长进行访谈。
共同制定目标	1. 总结服务对象问题及需求； 2. 共同商定服务目标。	与服务对象及家长进行面谈，在双方同意的前提下制定工作目标。
服务活动开展	1. 降低服务对象攻击行为频率； 2. 提升服务对象自信心。	1. 通过认知行为治疗技术矫正案主的攻击性行为； 2. 为服务对象建立家庭及朋辈支持网络。
评估与结案	1. 服务对象的攻击性行为频率减少； 2. 服务对象的社会适应和人际交往能力提升。	回顾整个个案服务过程，对服务对象进行跟进服务。

五、服务计划实施过程

（一）专业关系建立阶段

阶段性目标：了解服务对象基本信息，包括服务对象的生存环境、与家人的互动关系等；通过沙盘游戏降低来访抵御，与服务对象建立相互信任的专业关系。

介入过程：在个案工作中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对于服务顺利开展、提高服务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社会工作者要尊重服务对象的个性特点，接纳其负面情绪，对服务对象的表现持不评判的态度，同时运用尊重、积极倾听等专业技巧增进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者的信任，建立良好的服务关系。

该个案是服务对象的奶奶主动找到社会工作者。2021年5月6日，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第一次见面时，服务对象藏在奶奶身后，眼神不与社会工作者接触。因此，社会工作者以心理沙盘为入口，让服务对象在放松、有趣的沙盘室内，按照自己的想法通过沙子、玩偶，塑造一个与其心理状态相对应的内在世界。第一次沙盘时间为45分钟，社会工作者发现小A的沙盘作品的最大特点是划分了两个区域，两个区域的主题都和打斗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区域的划分是服务对象内在心理的呈现：两个阵营的士兵、坦克相互对立，处于防御状态，可见小A害怕别人侵犯自己的领地，但自己又要保护自己的矛盾心理。同时在小A的沙盘作品里，每个士兵都被安插的整整齐齐，代表希望的绿色基本没有，整个沙盘作品都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对战，给人一种压迫感。在沙盘结束后，社会工作者通过沙盘里的人物和服务对象开始第一次会谈。在会谈中，社会工作者认真倾听服务对象的诉求，接纳服务对象的非理性情绪并给予相应的反馈，让服务对象感受到真诚与接纳，借此会谈来了解服务对象的基本信息。

第一次面谈节选如下：

社会工作者：可以简单描述下你所摆放的这个沙盘吗？这有什么特殊寓意吗？

小A：这里面有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都有各自的士兵、坦克，准备开战。这个士兵他觉得别人在说他坏话，所以他要报复，不然的话他心里不舒服。这个旗帜代表各自的领地，不容许其他人进入，如果进入的话就会被守卫员围攻，然后把入侵者打伤。

社会工作者：我理解你想要守护自己营地的感受，那你有考虑过被打伤的士兵吗？

小A：有什么好考虑的，只有打赢了才能够征服他们。

通过与服务对象简单的会谈后，社会工作者又与服务对象的奶奶进行面谈，面谈内容节选如下：

社会工作者：方便说一下孩子爸妈在家里的相处模式吗？

奶奶：他爸爸妈妈在他小的时候就经常吵架，爸爸有时性子急了还会动手打妈妈。他们有时会当孩子面吵架，有时在卧室里面。

社会工作者：我理解您作为奶奶，也很心疼孩子。那对于爸爸的动手行为，小A看见后的反应是什么？

奶奶：刚开始的时候会哭，后面好像就没有什么反应了。他爸妈在他4岁的时候就离婚了，之后妈妈回了老家河南，也没怎么联系，但是孩子有时候会和我说说想妈妈，问我为什么妈妈不来看他。现在主要我在照顾他，男孩子皮嘛，我一急就会动手打他。

社会工作者：您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但是有时候处理不当，我明白您自己也会感到内疚，后面咱们可以一起探讨更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教育方式。

过程分析：在这一阶段的介入中，社会工作者通过和服务对象以及服务对象的奶奶进行初步会谈了解到服务对象的基本信息。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通过积极倾听来引导服务对象通过沙盘游戏探寻并描述内心真实的想法，可以看出服务对象具有一定程度的攻击性倾向，并且没有考虑该行为的后果。认知行为理论认为错误的认知会导致不良行为的形成，基于此，在后续的介入中，社会工作者要帮助服务对象重新建构自我认知，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适应性行为。

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也对服务对象及其家庭教养行为有了初步的了解。由于父母离异，且服务对象的父亲有一定程度的家暴行为，导致服务对象在成长过程中缺失母亲的陪伴。他对母亲的情感是矛盾的，既渴望母亲的陪伴，同时对于母亲的离去又感到非常愤怒。此外，在会谈中服务对象的奶奶表现出了较为强势的性格，在进行个案服务过程中可能会干涉服务过程，产生防御心理的风险。基于此，在后续服务中，工作者需要对服务对象亲人的家庭教养行为进行训练，重新建构家庭支持网络，并探索其他层面的社会支持网络。

（二）认知行为治疗阶段

阶段性目标：本阶段的介入以认知行为理论为指导，引导服务对象对自身的攻击性行为有正确的认识，知晓攻击性行为的危害，并通过认知重构，逐步矫正攻击性行为。

1、澄清服务对象不良认知

在第一次沙盘中，社会工作者了解到服务对象存在较强的报复心理，并且没有认识到这种攻击性行为的危害。基于此，在此次服务开始之初，社会工作者继续了解了服务对象攻击性行为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2021年5月14日，社会工作者通过与服务对象奶奶的第二次会谈得知，服务对象经常在学校打伤同学，最严重的一次把同班同学的脸打到流血，并且在学校里几乎没有玩得好的朋友。服务对象所在的学校就在家附近，邻里之间都熟悉孩子的情况，而服务对象与同学之间的冲突行为也在社区居民之间出了名，所以邻居也禁止自己孩子与服务对象玩耍，服务对象在社区无玩伴。社会工作者因此与服务对象班主任刘老师取得联系，并约定了面谈时间。在与老师面谈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得知，服务对象小A不仅曾经打伤同学，还会在上课的时候跑来跑去，扰乱课堂秩序；此外，对于老师布置的作业，服务对象会采取说谎的方式来逃避，有时还会将其他同学的试卷藏起来，给老师的工作造成麻烦。对此，老师也曾让服务对象的奶奶把服务对象带回家自己辅导。

基于社会工作者前期对于服务对象的心理沙盘以及与服务对象的奶奶及老师进行访谈了解的情况，可以界定服务对象攻击性行为的主要表现：一是身体攻击性行为。小A在家中受到过父亲、爷爷和奶奶打骂，因此会下意识地模仿家中长辈的行为，在面对让自己不开心的人或事时，会变得非常冲动，甚至与其发生肢体冲突。二是言语攻击性行为。服务对象经常采取强烈的言语攻击为进行自我防卫，情况严重时采取身体攻击性行为。例如：在做课间活动时，同学和小A发生了言语冲突，小A直接把同学的脸打伤了。

2021年5月15日，在厘清服务对象小A攻击性行为具体表现的基础之上，社会工作者对小A进行个案辅导，与小A一起回顾以往生活中出现不正确认知的场景以及感受，澄清小A的不正确认知。

社会工作者：上次我们一起做了沙盘，你说只有打赢了才算是征服了，你在日常生活中和同学家人相处时也是这么想的吗？

小A：是呀，我只有对他们凶他们才会怕我，才不会欺负我！而且我看电视里好多都是这么演的，把敌人打败就赢了。

社会工作者：我懂你想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心理，那你不怕同学们受到伤害后就再也不跟你一起玩了么？

小A：我才不在乎呢，他们本来就不想跟我玩。而且他们又没伤得多严重，只是流了一点点血，没什么大事的。

社会工作者：你认为自己在课间对同学的身体攻击和言语攻击并没有对他们造成实际伤害，并且这么做还能够保护自己，我说得对吗？

小A：没错，而且我看动画片里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被欺负了当然要反击。

通过与小A的访谈可以得知，小A认为攻击性行为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在与家人、同学相处时，习惯用这些暴力行为伪装自己，并从中“获益”，产生了“攻击有用”的不良认知。其次，对于自己的一些攻击性行为，小A并未认识到其中危害，他不认为自己对他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认为这点小伤是“不值一提”的。此外，在家庭环境以及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小A认为对攻击性行为的模仿是无碍的，将攻击性行为“常态化”。从而总结得出小A存在以下三点不良认知：第一，认为“攻击有用”；第二，认为“攻击无害”；第三，将攻击性行为“常态化”。基于此，在后续介入中，社会工作者将针对小A的这三点不良认知进行矫正，帮助小A重塑健康自我。

2、重新建构服务对象认知

2021年5月21日，针对服务对象小A的情况，社会工作者通过逐步分析，引导小A明晰自身的认知情况并深入了解错误认知会给自身带来的不良影响。基于此，社会工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帮助服务对象重新建构认知：第一，帮助小A正确分析自身的错误认知及攻击性行为的不良影响，矫正小A“攻击有用”的不良认知；第二，帮助小A分析家庭、学校和社区里的重要信息，引导小A合理分析自身错误认知所引发的攻击行为对人际关系网络的负面影响，从而矫正小A“攻击无害”的不良认知；第三，对小A从媒体渠道获取的信息进行正确引导，矫正小A“模仿无碍”的不良认知。

社会工作者：你和我说打架可以保护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小A：电视里都是这么演的呀。

社会工作者：但是电视里演的和现实状况是有区别的，在电视里打架或许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在现实里打架会让我们失去朋友，虽然你上次说并不在乎朋友，但没有朋友你过得也并不开心，是吗？

小A：好像是的，我一个人的时候就只能看电视，出去也找不到人一起玩。

社会工作者：那这是不是表示打架是无用的，还会带来很多危害。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呢，比如遇到问题先冷静思考，不要那么冲动，和朋友多沟通，你愿意这样试一试吗？

小 A：可以，但是我想你陪着我。

社会工作者：没问题，让我们一起面对。

在本次介入中，社会工作者通过个案会谈的方式帮助服务对象分析了以往攻击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步矫正了服务对象的三点不良认知，并通过建议的影响性技巧，为服务对象提供可参考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并共同约定，尝试建立新的认知。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出服务对象与社会工作者已经建立起了信任关系。

3、攻击性行为干预

在社会工作过程中，认知行为疗法既采用各种认知矫正技术，也采用行为治疗技术。在前两次介入中，社会工作者将重点放在服务对象不良认知的矫正上，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服务中，社会工作者将通过强化等行为治疗技术继续帮助服务对象小 A 矫正攻击性行为。

在运用行为疗法矫正服务对象的攻击性行为时，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在家庭中，向服务对象奶奶提供正面教育理念以及行为教养操作手册，使奶奶减少打骂孩子的行为，树立正面形象，发挥家长的正面角色作用，并引导家长通过对孩子的鼓励强化孩子的正向行为。第二，与学校协作，通过班会的开展，运用同辈群体的接纳与正向行为的鼓励，强化服务对象的适应性行为。第三，社会工作者也要对服务对象从接案到现在所发生的改变进行肯定和鼓励，提升服务对象的自信心，进而帮助服务对象深入学习良好的社会行为规范，对其自身的攻击性行为进行纠正。此外，社会工作者积极向社区居委会和家长发起倡议，倡导孩子观看正能量电视、网络视频，杜绝暴力，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教育孩子。

在上述服务完成后，社会工作者在 6 月 26 日对服务对象小 A 进行了第二次心理沙盘。有了前期的接触，在这次沙盘活动中，小 A 也慢慢的放下了心中的戒备，在分享沙盘作品中，无意中透露出自己内心的孤独和对完整家庭的向往。本次沙盘小 A 只花了 28 分钟，这次他比上次更加投入，沙子被他铺得很平整，这次沙盘和第一次沙盘作品有了明显的区别，两个阵营仍然呈现对立，但在双方阵营的周围开始出现绿植、道路，而这也代表着服务对象内心的希望。

4、朋辈支持网络建立

在上一次介入中，社会工作者强化了服务对象的家庭支持网络，在此阶段，社会工作者将继续帮助服务对象建立朋辈支持网络，完善服务对象的非正式支持，使得服务对象获得持续性的改变。

在此阶段，社会工作者同样通过链接小组活动资源的方式，让服务对象小 A 与社区内的儿童有进一步的相处，引导大家互帮互助。2021 年 7 月 5 日，社会工作者邀请到了军事基地教官来为社区的 6-14 岁孩子进行军事训练，青少年们穿着军训服，整装待发。在这一周的相处时间里面，服务对象小 A 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学习、训练，一起享受着集体活动带来的快乐。2021 年 7 月 12 日，该机构针对社区儿童开展了暑假班，为帮助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每周一，社会工作者所在机构都会开展心理剧活动，由

国家二级心理导师李老师引导小朋友们仔细感受、辨识各种情绪，用演戏的方式表达自己，释放内心隐藏的矛盾与冲突，更真实地了解自己，更真诚地与人相处。在专业心理导师与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小 A 掌握了一定的解决冲突的技巧，不再依靠暴力解决问题，学会与他人和平相处。

通过活动的开展，服务对象与社区内的同辈群体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以此形成了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在介入之初，社区内的小朋友并不愿意与小 A 共同玩耍，这也是导致小 A 习惯性使用攻击性行为伪装自己的原因之一，在朋辈支持网络建立后，小 A 就能够更好地融入到社区生活中，不再将暴力当作解决问题的准则。

六、评估与结案

（一）过程评估

1、介入前期

在介入前期，社会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与服务对象建立信任关系。通过心理沙盘疗法和个案访谈，对服务对象的资料进行整合，对小 A 的问题和需求进行分析，制定本次服务的目标与计划。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遵循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秉持尊重、接纳、不批判的原则开展服务，最终获得了服务对象的信任，建立起了良好的专业关系。

2、介入中期

在介入中期，社会工作者的任务主要是帮助服务对象进行认知与行为的矫正。通过心理沙盘疗法、个案访谈来帮助服务对象澄清不良认知、重构正确认知，并运用行为反思、肯定鼓励等技巧提升服务对象的自信心，帮助服务对象深入学习良好的社会行为规范，对自身的攻击性行为进行纠正。在此阶段，社会工作者始终坚持需求导向，服务对象小 A 也积极配合，双方共同促成服务目标的达成。

3、介入后期

在介入后期，社会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服务对象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对于服务对象而言，社会支持网络主要包括家庭支持网络和朋辈支持网络。为此，社会工作者通过亲子活动、体能训练等活动为服务对象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巩固服务对象的改变。

（二）结果评估

表 2 儿童攻击性行为频率记录表

	身体攻击次数	言语攻击次数	攻击次数总和
2021 年 5 月	9	15	24
2021 年 6 月	7	13	20
2021 年 7 月	3	8	11
2021 年 8 月	2	6	8
2021 年 9 月	1	3	4
2021 年 10 月	0	1	1

从服务对象攻击性行为矫正的需求来看，在社会工作者介入个案之前，服务对象小 A 月攻击次数总和为 24 次，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次攻击性行为。而随着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服务对象的攻击次数总和越来越低，到 2021 年 10 月已经低至 1 次，基本能够控制自己的攻击性行为。小 A 的攻击性行为主要是针对同辈群体而言，在 7、8 月份，社会工作者为小 A 链接了机构的军事训练和暑假班活动，在同辈支持网络建立的过程中，小 A 的攻击性行为频率逐步降低，在 9 月份开学后，小 A 的治疗效果依旧保持在良好的水平。此外，小 A 的沙盘治疗结果也呈现出良好趋势。在第一次沙盘治疗中，小 A 的沙盘充满战争、对立、防御等元素，没有代表希望的绿色。随着社会工作者深入介入，服务对象的沙盘逐渐出现了代表希望的绿植和道路，这也代表服务对象内心深处的暴力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变。

从服务对象的建立支持网络的需求来看，在家庭支持网络方面，社会工作者介入个案之前，服务对象对单亲家庭中父亲的暴力行为和奶奶的强硬教育方式习以为常，既害怕父亲和奶奶的棍棒式教育，又渴望家人的陪伴与爱护。而随着社会工作者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服务对象与家人的关系日益和谐，家长亲职能力有所提升。具体表现为服务对象的父亲和奶奶自社会工作者介入之后再也没有打骂过服务对象，服务对象放学回家后会主动帮奶奶做家务，服务对象的爸爸定期带服务对象去公园玩耍，并给服务对象买了礼物等。在朋辈支持网络方面，社会工作者介入个案之前，服务对象因攻击性行为频发而受到朋辈群体的排斥，这种状态还在持续。随着社会工作者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服务对象学会了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遇到冲突不再首先使用攻击性行为来解决问题，渐渐融入了朋辈群体。而且，随着朋辈支持网络的建立，在后续的跟踪回访中，奶奶也表示服务对象的学习成绩和课堂表现也有所提升，学习成绩从不及格提升到了 90 多分，还被评为年级“最强默写王”。

就最终结果而言，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基本上满足了服务对象对于矫正攻击性行为和建立支持网络的需求，因此，在 2021 年 8 月 27 日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及其家长共同商量选择结案。

七、专业反思

儿童攻击性行为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学界针对此类问题采用了不同的介入方法。引发儿童攻击性行为的因素主要有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共性，但也因儿童群体的不同存在差异。例如，留守儿童的攻击行为多和隔代抚养有关，单亲儿童的攻击行为与家庭环境离不开关系。本案例中，服务对象小 A 的攻击性行为主要受到家庭环境带来的不良认知的影响，社会工作者以认知行为理论为基础展开第一阶段的介入。在认知行为疗法中，认知重构和行为管理是紧密相连的，单独使用某一策略也可以有所成效，但弊端也暴露无遗。认知重构单独使用时难度大，见效慢；行为管理虽见效快，但持续性不佳。因此，本案例将两种方法结合，交叉使用，以提升介入效果。第二阶段的介入以社会支持网络理论为依据，充分利用家庭和朋辈群体的支持作用，建立以社会工作者、家长、朋辈群体为主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巩固服务对象的改变。同时通过链接资源，优化服务对象的社会支持系统，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本案例主要探讨了单亲家庭中儿童的攻击性行为，研究表明，父母冲突水平越高，子女卷入冲突关系的程度越深，就会表现出更多的行为问题，其中“父母冲突→亲子冲突→攻击行为”这一中介路

径在有暴力因素的离异家庭子女中的效应显著强于完整和谐家庭子女的效应。单亲儿童更易在家庭因素影响下，在无意识的模仿中产生攻击性行为。在完整家庭中，排除个体遗传因素的影响，儿童也可能在不良家庭教育的影响下，产生攻击性行为。因此，跳出此案例，在解决其他由不恰当的家庭教育方式引起的儿童攻击性行为中，可以采用相似的方案，通过“认知重塑-行为矫正-提供支持”三位一体的服务路径，从矫正到巩固，为具有攻击性行为的儿童带来长期有效的改变。在后续服务中，社会工作者也可以通过小组工作的服务方式，为具有相同困境的儿童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减轻攻击性行为在儿童交友、学习中的负面影响。

本案例从家庭环境的视角来分析服务对象小 A 的攻击性行为，但要使小 A 的家庭环境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并非短短数月的介入就能实现。社会工作者对小 A 攻击行为的分析主要在微观层面，缺乏宏观层面的思考，在提出介入策略时也缺乏宏观层面的建议。在之后的工作中，社会工作者要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化资源，开展专项服务，为儿童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 作者简介： 张桃桃，河海大学社会工作专业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杨夜平，河海大学社会工作专业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庄颖彬，河海大学社会工作专业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张安若，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马 明，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20 级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薛雨珍



硕士毕业 论文信息

2021 届社会学专业硕士论文信息统计表

姓名	题目	指导老师
安琪楠	民间环保组织的环境治理行动演变及其成效研究——以 M 协会为例	陈涛
卞维维	湿地产权界定逻辑的多重与流变——以一个湿地资源型村庄为例	胡亮
陈丹宁	文本与实践的分离：J 省第三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严登才
陈庆雨	知识女性二孩生育决策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施国庆
崔国璇	不同规模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差异研究——以南京、镇江、丹阳为例	秦贤宏
费露露	废品回收家庭的教养方式研究——以南京市城郊 XJ 村的流动家庭为例	沈洪成
傅颖	多元主体供给视角下农村失能老人长期照护问题研究——基于 J 县 G 村的调查	朱秀杰
宫晓爽	高校学生干部的选拔机制研究——以 H 大学研究生会为例	张虎彪
李雪	从竞争主义到平均主义——以 A 县产业扶贫进村项目历史演变为例	沈毅
刘青青	小农户如何衔接大市场？——海南山区农业产业扶贫研究	毛绵逵
聂钱玉	从“独角戏”到“大合唱”：垃圾治理行动主体的互动逻辑——T 市 Y 小区个案研究	石德生
茹溪	农民城乡两栖居住何以可能？——以内蒙古西部 A 嘎查为例	顾金土
施嘉怡	特色农业村庄的可持续性研究——以无锡市 H 村为例	顾金土
孙安琪	选秀类偶像粉丝的群体认同建构及重塑——以《青春有你 2》选手 Y 粉丝群体为例	许佳君
孙婷	备战幼升小——课外辅导班生产“名校中选者”的过程研究	沈洪成
陶候	信任视域下农村污水治理项目何以可能——以浙西 F 村为例	陈绍军
汪凤兰	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中村民行动策略研究——以安徽省 S 县 Y 村为例	叶南客
未兰兰	农村老年人基督教倚赖机制研究——以皖西北 Q 村基督教会为例	徐琴
吴倩莹	共有私用——村改居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研究	余文学

吴晓璐	小农户关系资源运作的阶段性差异研究——以 G 村蛋鸡养殖户为例	王毅杰
杨雪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媒人失范行为研究——以安徽省淮南市 C 镇为例	曹志杰
姚玉铃	亲代催婚、亲子关系、策略应对、择偶价值观一致性、资源依赖度	沈毅
赵培宇	初中生参加影子教育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大同市初中的调查	朱秀杰
郑玉婷	内卷：产业扶贫的运作实践与反思——以 B 县扶贫产业为例	胡亮
周玉娟	“以社治社”何以可能——以 N 市 M 街道“三级平台”模式为例	王毅杰
朱晨铭	农村社区垃圾分类奖励机制研究——基于黄山市 S 县生态美超市的个案研究	陈绍军
白杨	家庭教育投资及其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基于文化资本理论的分析	王毅杰
李珂	农村社区疫情防控策略研究——以河南省 C 村为例	张虎彪
马超群	河道环境治理何以难以成功——基于西村的案例研究	陈阿江
谈灿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宗族关系变迁研究——以 L 社区汪氏为例	何志扬

2021 届社会工作专业硕士论文信息统计表

姓名	题目	指导老师
崔菀桐	数字时代来华留学生社区融入小组工作介入研究——以 N 市 D 社区为例	王欢
白鸽	易地搬迁移民融入及社区介入研究——以河北省 B 社区为例	许佳君
白汝冰	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小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 DD 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例	曹志杰
曹慧萍	南京市困境儿童保护政策效果研究	亓迪
陈宇星	城市社区垃圾再利用的协商治理研究——以无锡 G 社区绿色生态链项目为例	武艳华
石燕梨	初中生挫折认知与应对小组介入研究——以湖南省张家界市 Z 小区为例	石德生
沈佳飞	萨提亚模式介入单亲家庭亲子矛盾的个案研究	亓迪
荣显琳	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介入亲子沟通障碍的研究——以绵阳市小学生小宣为个案	沈洪成
荣琴	社工机构介入下的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模式研究——以 C 村“蚂蚁治家”模式为例	何志扬
潘惠娟	影像发声法在认知症长者家属支持小组中应用——以“智萌之友”项目为例	施国庆
穆静静	集中安置居民社区认同的社区介入研究——以合肥市 C 社区为例	石德生
柳慧	老年友好社区建设过程中的社工机构介入研究——以南京市 M 社区为例	何志扬
刘艳丽	“村改居”社区高空抛物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南京市 X 社区为例	毛绵逵
李臻臻	农村失能老人家庭长期照护的困境研究——以鲁中 L 村个案为例	顾金土
姜敏	单亲家庭儿童社会适应障碍的小组工作介入研究——以无锡市 Y 机构为例	黄齐东
郑仪安	社会工作介入养老机构护理人员职业倦怠的研究——以孙护理的个案为例	张虎彪
何基翰	留守儿童阅读能力提升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严登才
李研秋	“90 后”离婚调解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秦贤宏
宋岚	公益创投项目中第三方机构督导实践研究	杨方
苏许映	城市社区居民垃圾分类的社会工作参与研究	沈洪成
孙紫玮	新冠疫情下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独居老人的个案研究	陈绍军
王丹	社区治理中的本土志愿者培育研究——以南京市 G 街道“谷粒计划”项目为例	黄齐东
王林林	系统理论视角下的项目运作研究——以昆山市困境儿童关爱之家项目为例	王毅杰
王露	个案工作介入养老机构高龄老人精神慰藉研究	陈涛

王桃桃	基于公益创投项目培育社区自组织的可持续研究	朱秀杰
危予敏	社会工作介入社会组织孵化培育的研究——以南京市 Y 基地为例	黄齐东
夏菊香	社会工作介入河南省南水北调外迁移民社区治理的模式及路径研究	施国庆
谢叶敏	公众污名与自我污名——基于宁德市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调查	毛绵逵
严娟	社会工作介入水库移民村村史文化建设研究——以河南省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 M 移民村为例	施国庆
杨静静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下社会组织的庭院改造行动分析——以蓝天环保社会组织为例	武艳华
尤燕娇	无物业老旧小区治理中的社工角色及参与机制——以南京市 H 社区为例	毛绵逵
张露	南京市彭禄社区公益力量的发掘与培育研究	顾金土
张伟	社区志愿者培育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情暖汇灯”志愿服务队为例	严登才
钟欣	多元协同视角下智力残疾儿童照顾服务优化研究——以龙马潭区为例	石德生
周翠华	老年人防诈骗能力提升的小组工作介入	杨方
邹琪	个案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照顾研究——以桑植县 X 村留守儿童为例	亓迪
左秀平	独居老人自杀倾向的叙事治疗介入研究——以 C 老人为例	陈涛
李庆栓	三建共建下的社区治理研究——以苏州市吴中高新区为例	王毅杰
牛子孺	“三级平台”式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研究——以南京市秣陵街道为例	武艳华
孙业雨	小组工作介入肢体残疾儿童心理障碍问题的研究——以 P 村关爱之家项目为例	张虎彪
韦全康	农村留守儿童手机依赖问题的小组工作介入研究——以临泉县 P 村小学为例	胡亮
张爱夕	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职业能力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武艳华
周小晴	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困境儿童研究	王毅杰
邢洁	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小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昆山市 A 机构“残疾人之家”项目为例	陈绍军